

希特勒传

(美) 约翰·托兰 著

前 言

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可称得上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撼动历史的人物。在这个时代也只有他毁灭了无数的生灵以及带来巨大的仇恨。曾几何时他也博得过广泛的尊敬，成为数百万人的理想和希望。他已经死了 30 多年，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对他的看法几乎不曾有所改变。如今，人们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墨索里尼这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人物们，有了比较客观的看法，但希特勒的形象却不曾改变。在某些追随希特勒的人眼里，他是英雄，是失败的救世主；在其他看来，他依旧是疯子，是个政治军事蠢才，是个无可救药的杀人狂。他的那些成就，充满了兽性及血腥。

我本人的生活与不少人一样，也曾经被希特勒所破坏，写这本书期间，我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只当他是百年前的古人。我和许多对希特勒有深刻了解的人见过面，有崇拜者，也不乏嘲笑者。谈起过去的幸，许多人均侃侃而谈，且生动详细。多年以前，人们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感到恐惧，以至于观点会遭到歪曲，表现得吞吞吐吐，这种情形现在已荡然无存了。我与希特勒的副官们、秘书、飞机驾驶员、医生、心腹军官和建筑师、第一任新闻发布官、军事领导人还有最崇拜他的女人等会见了不下 250 次。其中有几十次会见作了录音，这些会见的谈话录音带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已列入本书的有关章

希特勒传

节本人均审阅。他们对其进行了修改，还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

为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参考了许多报告、文件和专门的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文件，其中有一个特工人员与希特勒之妹保拉会见的谈话；1918 年对希特勒作的精神病的神秘报告这样从未发表过的国家档案局的文件；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开发表的文件；不久前发现的纳格莱里与戈林 1924 年至 1925 年间的通信，这些信件成为揭露法西斯与纳粹关系的有力证据；没公开发表的记录、日记、回忆录等，例如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希姆莱的秘密讲话。

此书不设主题，书中的一些结论，均在写作过程中得出，也许在众多结论中最有意义的一点是希特勒要比我所能想到的更矛盾、更复杂。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主人公说：“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往往是最伟大的圣人，最残暴的人也难免会有圣洁之情。”由于失去了天堂，希特勒于是选择地狱——其实他当然知道这两者是不同的。由于被要将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荡涤净尽的美梦所折磨，直到最后，他依旧是个十字骑士，是个变态的天使，是柳西胡和普罗米修斯的混神。

序幕 攻其背后

1

那是 1918 年 10 月 15 日左右，有列火车满载着伤兵缓缓驶向帝国东部边界的安全方向，车厢两边满是革命口号。车内数百名伤兵中，许多刚刚在比利时结束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13 日夜，德军前沿阵地遭到英军炮火的毁灭性猛轰之后，又被施放的毒气所袭击。三个月前德军战局急转直下，此次炮击又成为一连串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后撤，但终究还没有崩溃。这次战役，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团首当其冲，他们在田野间和山间的战壕里躲藏，无法将头抬起来。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战场布满了弹坑，看上去就像是沼泽地。精疲力尽的士兵在战壕里蜷缩着；他们周围一颗颗英军的炮弹在爆炸，地面被无情地撕扯着，德军阵地里满是谣言，传说许多德军业已投降，他们便更加士气低落，没精打采。老兵们已经变得麻木，新兵则吓得魂飞魄散。

突然间，一阵尘土被炮弹掀起，尘土中夹杂着刺鼻的气味向战壕袭来。有人高喊一声：“是毒气！”他们第一次遇到芥子气。这种气体有人闻着是香的，有人闻着则是辛辣刺鼻的，但人们都知道不能将其吸入。士兵们连忙将防毒面具戴上，弯着

希特勒传

腰，靠着战壕的土墙纹丝不动，数小时后防毒面具内充满了污浊不堪的空气。有个实在憋的难受的新兵取下了面具，想要呼吸些新鲜空气，致命的毒气却抢先进入了他的身体。毒气一进喉咙，新兵便仰面倒地，由于窒息咕噜咕噜地口吐白沫，他慢慢地死去。

拂晓时分，毒气才慢慢消散，可新一轮的炮击代替了刚刚消散的毒气，摘下面具的士兵们，贪婪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充满了火药味以及淡淡芥子味的空气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天堂。”这天堂却是那么短暂。这是无从预测的使敌人疯狂的残酷方式——喘息未了，硝烟和毒气再度袭来。来不及戴好面具，许多士兵便像新兵们那样，立即翻身倒地身亡。那些幸免于难的士兵，除了一个人，其余均成了瞎子，这人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视力。他让众人抓住彼此衣尾，跟着他逃命。士兵们排成单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跌跌撞撞地前行，直到看见第一个急救站。这些从死神手中逃脱的士兵中，有名下士年仅 29 岁，他便是阿道夫·希特勒。

失去视觉的希特勒乘火车东行，身心几乎崩溃。他与其他受害者一样，双眼红肿，脸胀得像皮球。这些士兵说起话来有气无力，鬼一样的恐怖。对于前来照料的护士，他们总是雷霆大发，予以拒绝。他们拒绝进食饮水，拒绝治疗。医生说可以通过治疗恢复视力也无济于事，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呻吟，想要解除痛苦，哪怕这方法是死亡。

这个身心受到重创，15 年后一跃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对德国失败到何种地步一无所知。四年前，当德军第一次发动强大攻势，比利时、法、英三国军队毫无招架之功时，曾在此地首次血战的希特勒所在兵团，在短短一星期里，竟折损

希特勒传

八成兵将，这简直不可思议。这些损失对于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并不显得沮丧，相反，这正体现了德军的战斗精神。他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信中这样写道：“……为我的兵团骄傲，因为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殉职沙场，我连仅幸存中士两名。战至第六天，我兵团共牺牲 2989 人。”

那样的岁月，许多德国人都自豪地想，德国式的英雄气概便是如此。时间飞逝，战争陷入了僵持阶段。两军对垒，中间的一片焦土毫无生息，一方向对方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会留下数以万计的尸骨。起初乐观的情绪逐渐消失了，士气低落的士兵们像老鼠一样躲着，战壕上空弥漫着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的阴云。英国人的封锁，切断了国内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痛苦和饥饿在德军中蔓延开来。自战争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起，德军由起初的必胜信念转向后来以活命为目的。士兵们常痛斥领导者的愚蠢，再战无益，他们心知肚明。为数不少的官兵对失败主义嗤之以鼻，其中包括希特勒。无论他表现得如何英勇，他依旧只是下士，不过，他并未因不受重视而沮丧。他常呵斥同伴，尤其是新兵，因为他们把“内地的毒素”带进了军队。如有人与他争论，据他一位战友回忆：“他便会雷霆大发，双手插进口袋边来回踱步，边对悲观失望的人们破口大骂。”

悲观主义者或许真的错了。四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随 1918 年的到来摆好了架势准备又一次发动进攻，只有西线未打开僵局，德军在其余战场上大获全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俄国，逐一屈服——俄国屈服在德军强大攻势面前，一如它屈服革命。与摇篮中的苏维埃政权签订和约，德国人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欧洲面包篮——乌克兰大平原。由于东线敌人溃不成军，德军抽调了东线一百多万人马赴法，以求打破西线僵

希特勒传

局，进行决战。被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这位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的人物称之为“皇帝之役”的战役即将开始。

德军在那年春天发动了四次大规模进攻，英国、法国被迫先后撤退。由于形势所迫，英军必须战斗至最后。决战于7月15日在莱姆斯市附近展开，双方心知肚明，此仗为决定性的一仗，战争胜负在此一举。鲁登道夫说：“若我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我们便赢得了此次战争。”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持相同意见。他曾这样说：“如德军进攻得手，我们便输掉了此次战争。”进攻以失败而告终。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联军得到美军强有力的支持，粮食和武器还源源不断地自美国涌来。

德军的逃兵数量大大增加。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起义和叛乱。英军于8月初在亚眠地区发动突袭，德军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凯撒大兵有时居然会向孤零零的一名步兵集体投降。后撤的部队在遇见开赴前线的援兵时常这样喊道：“搞破坏的人们！”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德军后撤了，但阵地还被保留。失败主义者与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的比例为100:1，可是国内却渐渐丧失了信念，一次次的举行罢工，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无一不在谈论革命。对于希特勒这样的强硬派人物来说，安全的、未受战争破坏的后方，以及那些投机钻营者、落伍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贼，还有那些不尊敬也不热爱祖国的犹太人，在最严峻的时刻将战斗前方出卖了。其实真正被吓破胆的是鲁登道夫，他是那么竭尽全力地催促文官政府签订和约。

不管是否为时已晚，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强硬派依然坚信，只要将抵抗进行到底，胜利还是属于他们的。前线并非溃不成

军，后撤依然井井有条。失败的根源在内部，根源正是那些装病逃避责任者、投机钻营者、还有那些并不爱国的犹太人。

2

希特勒不曾怀疑地加以尊敬的权力的瓦解，为他最终走向取得权力的道路打开了大门。在他的头脑中，世界是贵族统治的，世界属于古代皇帝的后裔。所有军事、政治、外交上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级教育和修养的贵族担任。然而这一切被战争改变了。战壕里，不分高低贵贱，人们平等地并肩作战，那些原本属于贵族军官的肥缺也慢慢由普通人物填补。

整个欧洲的皇室的权力也只是徒有虚名。在普通人中，即将出现打造实权的人物，例如希特勒。这些起初平凡甚至庸俗的人物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奔涌而来。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轻易地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的反战情绪高涨，人们不愿为说不清目标的战争而牺牲。

当他乘着火车向位于波默拉尼亚省的一座小城巴斯瓦尔克的医院驶去时，身体的痛苦与内心的失望把他崇高的愿望抛到了九霄云外。然而，希特勒在几个星期的治疗后视力得到了恢复。角膜不再发炎，双眼也已消肿，眼眶的剧痛也开始缓解了。“我逐渐可以看清四周事物的轮廓”。随着视力的恢复，沮丧情绪也自然消失了，本来需要柏林大学精神病专家、神经病院主任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迅速痊愈。由于不明白芥子气的杀伤力，福斯特医生认为希特勒失明的原因是歇斯底里。希特勒的视力为何能得以恢复，这原是个谜，

希特勒传

可无论如何，康复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希特勒其实曾出现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一般症状：红肿、发热、沮丧、呻吟，以及数星期内即可治愈。

视力的恢复又将希望还给了希特勒，他又一次对当前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柏林事实上已被包围，新任总理又为签订停火协议敦促德皇退位。希特勒听说，德国国内叛乱事件层出不穷，但他却认为这些纯属谣言。11月的一个早晨，他的病房涌进了一群“赤色水手”，企图说服病人闹革命。这下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原本就反感，而水手的领导人有三名犹太青年，没有人上过前线，于是他更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现在有什么资格在国内高举红旗？”过分的激动令他休克，于是他再次卧床。“我痛苦万分，卧床不起，却无法说出真正的感觉。当你认为德国行将瓦解，想到哭泣，我便反感”。一位威严的老牧师于11月9日来医院探望他，他从老牧师那里证实了叛乱的消息，连慕尼黑也爆发了革命。

希特勒记得，当时小厅里聚集着很多病人，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仑市议会已摘下了德国皇冠，德国已实行共和制时，众人好像由于愤怒而全身打颤。而在年迈的牧师赞扬霍亨佐仑的贡献时，他不禁热泪盈眶，小厅内众人郁闷万分，泪流满面。牧师继续说，战争务必马上停止，一切都不复存在，人们不得不匍匐在获胜的“盟国”脚下以求宽恕。希特勒认为革命是不可饶恕的。“我时刻都坐立不安，一切又都重现。我摇晃着摸索着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头蒙在枕头和毛毯下”。

11年前希特勒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母亲的坟前，他第一次流泪。在“麻木的沉默中”他曾受到失明的恐惧以及失去如

希特勒传

此众多的同伴的痛苦。“我不能控制自己。我现在才恍然大悟，个人的痛苦与祖国的不幸相比是如此不值一提”。极端的失望使他下定决心。“是继续当建筑师还是步入政界呢，我总是举棋不定。如今我不再犹豫了。我当晚便决定，若视力恢复，就要从政”。医学上无法解释希特勒的二度失明，福斯特医生对他的初期诊断更加坚信，即希特勒患有“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然而，希特勒本人坚信他永不能复明。

德国于11月11日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是耻辱的，这耻辱令他万分痛苦。生活变得忍无可忍，但是，经过一晚或是两晚，绝望地静静地躺着的他，因一种“超自然的幻影”而摆脱痛苦。就像圣女贞德，他听见有无数声音在呼唤他，他是德国的救世主。瞬间奇迹出现了，希特勒冲出笼罩在他周围的黑暗，他复明了！如同他的承诺，他郑重地宣誓，他要“成为政治家，不惜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的承诺”。

当晚，巴斯瓦尔克医院寂静的病房里，20世纪最残暴的势力诞生了。不是希特勒从政，而是政治投身于希特勒。

希特勒传

第一部 “幻想家就是我”

希特勒传

第一章 蒂固根深

1889—1907

1

希特勒谈话时很少涉及自己的家庭，只有对其少数心腹，他才肯透露因为父亲独断专行自己无法与其相处。他母亲的性格安静而温柔，希特勒对母亲极其尊重，但父亲主宰着这个家庭。父母都来自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北部的农村，一个叫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地方，离现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很近。据希特勒家族的人说，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摩拉维亚人的血。希特勒这个姓氏在奥地利很普遍，大概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切克”或“希德拉”演变而来。自1430年，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对于希特勒这个姓的拼写方法很多，先后出现过“Hyd-ler”“Hytler”“Hidler”。1650年，有人取名格奥尔格·希德勒，他是阿道夫。希特勒母亲的直系祖先。此人的后裔偶尔也将其姓拼成“Hitler”或“Huttler”。就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那个时候拼写无足轻重，也无规律可循。

瓦尔德维尔特尔地处丘陵地带，树林繁多，没有什么独特的风景。林子整齐地布满斜坡，坡面上也有世代勤劳节俭的农民开垦的耕地。1837年6月7日，在斯特隆斯村，希特勒的父

希特勒传

亲出生了，那位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的产妇是个未婚的42岁女人。因为斯特隆斯是个小村落，以至于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这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非婚生婴儿在多拉萨姆登记在册。父亲姓名无人知晓，直到今日，这个谜仍未揭开：他大概是邻村的。希特勒的祖父也许是个富裕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雷德或弗兰肯伯格。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受雇于这位犹太人，主人年轻的儿子也许就是孩子的父亲。

邻村希皮塔耳有一个游动磨坊工，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在阿洛伊斯快5岁时娶了玛丽亚。但他们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第六年母亲去世，继父又继续流浪。此后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便担负起抚养阿洛伊斯的责任。这间和附近的一间农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起过重要作用，因为有五六个暑假希特勒是在这里度过的。

希皮塔耳后来的情形让阿洛伊斯难以忍受，于是13岁的他背起小小的行囊，背井离乡。这段插曲成为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一段让人动情的故事。“绝境中，他作出决定，怀揣着几枚左尔登作路费，踏上吉凶未卜的征途”。一路上，他不断地打零工，终于有一天来到了维也纳，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在维也纳，他学上了做鞋。5年过去了，他做鞋的手艺也已练成，但是又想做点体面的活，于是，他参了军，去守护祖国的边疆。这样，他成为了一名比神职还略高一筹的公仆。由于勤奋好学他通过了特别考试，24岁的他，已升为监管。这种级别，在瓦尔德维尔特村看来，是多么超凡的荣誉。胸怀大志的阿洛伊斯，此后不断得到晋升。多瑙河上的布劳瑙海关与德国隔江而望，1875年，阿洛

伊斯成为海关督察。

最为阿洛伊斯的平步青云感到骄傲的莫过于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这个将他抚养成人的男人。希德勒家族，从未有过如此荣耀。由于希德勒之姓氏后继无人，1876年春末奈波穆克决定采取措施。他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于6月6日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谎称是希特勒的哥哥——他们称他为“希特勒”——曾数次告诉他们，并在他的遗嘱中称他有个名阿洛伊斯的私生子，他要给他合法的身份，将他立为子嗣。

也许是因为大意，“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也许是狡猾的农民的计策，故意不使此事变得明朗。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第二天一同来到阿洛伊斯出生登记地，多拉萨姆。教区年迈的牧师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证实在1842年确有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与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结婚，于是他便同意将出生登记更改。也许因为迟疑或是有所提防，在他更改“不合法”记录，并划掉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时并没有将另一个名字补上。他密密麻麻地在最后一个栏目写道：“签字人证明，签字人与本栏登记的‘父名’的格奥尔格·希德勒甚熟，据他所说孩子的父亲承认与阿洛伊斯的父子关系，同意接受他，并希望将孩子列入本区的洗礼名册。”牧师代替三名证人签字，三人各自在登记册上画了个十字架。

那位牧师对修改登记册一事产生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登记册上既没日期，又没签名。婚姻登记册上的名字为“希德勒”，他却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且他心知肚明，此手续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如想与已故之人确立父子关系必须通过法庭，并且需要得到母亲的证实。

希特勒传

当事人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对改名一事并未表态，也是此事令人疑惑的一点。私生子的不合法身份并不让他觉得难堪，此事在奥地利南部并不稀奇，在边远山区，有 40% 为私生子，在孩子就是命脉的农村，男人们身强力壮往往会受到欢迎。而真正令他难堪的恰恰是改名换姓，因为“施克尔格鲁勃”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

不管动机如何，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确诱使阿洛伊斯改名。然而，他最终接受“希特勒”之名，此事事关重大。因为七千万人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的场景的确难以想象”！

身着制服、梳军式短发，留着八字胡，浓眉大眼，干净的脸颊两边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实在是英俊潇洒，而他不停地朝姑娘们送着秋波。就像他的合法父亲，他也拥有一个私生女。他虽然成为帝国烟草垄断公司的一个稽查员的女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寻花问柳。况且比他年长 4 岁的妻子体弱多病。

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是希皮塔耳木村最诱人的姑娘。16 岁的她，性情温和，面容娇嫩，身材苗条匀称，一头棕色头发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很配。也许是一见钟情，也许是单纯想为病妻找个女佣，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说服家人，带她至布劳瑙，并与他的家人同住在客栈——在那里，阿洛伊斯已勾搭上了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

希特勒夫人对此忍无可忍，她离开阿洛伊斯，两人合法分居。于是，法妮正式登上了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她俨然是位合法夫人，而绝非情妇。漂亮的女佣对多情的阿洛伊斯来说，实在太具诱惑力了，这一点法妮心知肚明，将克拉拉弄走是她

的第一步棋。法妮于两年后，也就是 1882 年产下一男孩——就像他的父亲，是个私生子。

1883 年，希特勒出走的妻子由于肺病而撒手人寰，于是法妮正式成了他的妻子。婚礼结束不到两个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于是阿洛伊斯终于有了合法婚生子，虽然怀孕是不合法的。他还负有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虽然法妮的身份已经合法，但并没有因此而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再次犯了朝三暮四的老毛病。就像他的第一任妻子，法妮同样患了严重的肺病，她必须离开布劳瑙，到邻近的乡间呼吸些新鲜空气。阿洛伊斯和两个小孩子又回到了波马客栈的顶层，他符合情理地向漂亮的侄女求助。克拉拉以女佣、保姆兼情妇的身份又一次住进波马客栈。阿道夫·希特勒有一个心地善良的母亲，她常去看望法妮，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法妮竟很奇怪地欣然接受来自情敌的照料。

可怜的法妮于 1884 年夏离开了人间。正如人们所料，希特勒家未来的夫人已有孕在身。因为克拉拉照顾他的孩子，而孩子们也非常喜欢克拉拉，阿洛伊斯决定娶克拉拉。但结合遭到教堂的禁止，因为那个假证，他父亲是克拉拉祖父的兄弟。阿洛伊斯通过牧师请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申请在一个月之内得到获准，因为克拉拉已经怀孕了。克拉拉便和阿洛伊斯在波马客栈正式结为夫妻，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两个孩子参加了婚礼，克拉拉之妹约翰娜及两个海关官员是婚礼的证人。一个新来的女佣为婚礼做了一切准备。由于客厅被烧得过热，女佣成了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的笑柄。婚礼后的蜜月被一顿简单的饭菜所代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到了海关。克拉拉后来回忆，她丈夫在中午之前便上班去了。

希特勒传

阿洛伊斯私生活的不检点，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依旧老实、忠诚、办事高效，得到了同僚和上司的认可。虽然在家乡他没有很好的名声——在小镇里，婚外情必然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但是他依然认为自己很不错。人们谣传他第一个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了棺材。

克拉拉成为家庭主妇后，可谓事事顺利。她是个称职的管家，全心全意地照顾两个孩子，视如己生。结婚第四个月，她自己的孩子便出生了。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双儿女。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不幸夭折。不久，另外两个孩子也因患白喉不治而亡。这个悲剧使克拉拉面临崩溃。她将母爱全部倾泻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但与丈夫却相处得不融洽。起初她还认为丈夫高人一等，而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这条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说来是如此复杂，以致她竟然叫丈夫为叔叔。

显而易见三个孩子的不幸夭折，影响了她受孕的机率，第四个孩子直到 1889 年 4 月 20 日才出世。他的体内存在着希特勒、施克尔格鲁勃、波尔兹尔以及四分之一不确定的血统。他正式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据克拉拉回忆，阿道夫瘦弱多病，她害怕再次承受丧子之痛。可是她家的女佣说，阿道夫“健康活泼，发育正常”。

无论怎样，希特勒太太宠爱阿道夫，阿道夫或许被宠坏了。在波马客栈的日子平淡无奇。父亲常与朋友聚会，又有养蜂的爱好，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超过了在家的时间，他在性生活方面变得检点是显而易见的，至少谨慎了许多。他给女佣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说他虽然严厉，但容易相处，体贴下人。他可以为了不弄脏刚擦干净的地板而很高兴地脱去靴子。然而，新任海关监察却说阿洛伊斯·希特勒不好接触，“严格、倔强、

希特勒传

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显得有些傲慢，喜欢穿着它留影。”

阿洛伊斯在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再次晋升，全家到巴索定居。巴索城位于波马客栈下方的德国境内，面积不小，是海关督察办公室所在地。在德国的城市里生活，与德国孩子玩耍，这永世不灭的痕迹留在了年轻的希特勒身上。他的母语为巴伐利亚南部方言。这一切常令他忆起少年时代。

希特勒太太很长时间没再生孩子。有人认为，她为了给瘦弱多病的阿道夫足够的营养，一直未给他断奶。第二个孩子埃德蒙直到他快5岁时才出生。在终于挣脱母亲的管教之后阿道夫几乎完全自由了。阿洛伊斯的一家因为孩子刚出生仍旧留在巴索。5岁的阿道夫经常和德国孩子东跑西颠，尽情玩耍。

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一整年。全家于1895年春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位于林嗣西南约30英里的小村子，他们住在大约9英亩的斜坡上的一个农舍里。四周后，阿道夫在6岁的时候进入小学。小学设在离家有数英里的弗希拉姆。阿道夫再次离开了母亲的严格的管教，父亲在他入学数星期后退休了。本来因为上学就受管教，现在又加上父亲严格管教，阿道夫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服务40年的父亲隐退乡间，过着舒适的生活，俨然一位乡间绅士。

他们坐落在小斜坡上的房子小巧精致，几乎被各种果树遮掩。屋旁是条人工修成的小溪，溪水清可见底，潺潺的水声终日不休。如此美好的生活环境，使阿道夫无比快乐，常有邻近的孩子和他作伴。

阿道夫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上学需要走一个多小时，对于小孩子这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学校的建筑破旧原始，只有两间

希特勒传

教室，男女各用一个。校长对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印象很好，他这样评价：服从师长，思维敏锐，又活泼；孩子们的书包里边叠放整齐，是同学们的楷模。

“我第一个理想形成于这个时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写道，“上学时的长途跋涉，野外的玩耍，特别是跟那些野孩子们的接触，使我无法忍受家中的寂寞。”很小时候他已敢于高声表达自己。

后来的几个月，他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不懂耕作的阿洛伊斯退休后生活有些沉闷，他的第五个孩子保拉在 1896 年出世，景况越发糟糕。五个孩子挤在一起，其中一个只知道哭，阿洛伊斯酗酒更加厉害，他变得暴躁起来，小阿洛伊斯成为他的主要目标。因为父亲的尊严和儿子的叛逆，父子俩时常拌嘴。小阿洛伊斯曾经痛苦地抱怨父亲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然而那时的奥地利，孩子挨打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是司空见惯的。有一回，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阿洛伊斯知道后狠狠地把小阿洛伊斯揍了一顿，还将儿子的颈背抓住，用脑袋去撞树，直至他昏迷。还有人说：虽然小阿洛伊斯不再经常挨打，但是他家的狗却被父亲虐待，常被打得屁滚尿流。后来，小阿洛伊斯说，那只狗甚至遭到过温顺的克拉拉的虐待。这也许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年轻的阿洛伊斯对哈菲尔德的生活忍无可忍。他认为父亲虐待他，后母不关心他，阿道夫傲慢专横，爱发怒，不听任何人的话，1948 年他这样回忆道：“我后母对阿道夫的袒护，让他常想入非非又可以轻易逃脱惩罚。如果违背了他的意志，他就会雷霆大发……他不喜欢任何人，没有朋友，无情冷酷。一点小事都会让他暴跳如雷。”

希特勒传

由于不堪忍受虐待和抛弃，14岁那年小阿洛伊斯像他父亲那样，离家出走，父子老死不相往来。父亲为了报复，将要给儿子的遗产减到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哥哥离家出走使阿道夫成了老子的发泄对象，如果阿道夫不能完成他加的额外负担，必然会引来一顿打。这位爱唠叨的乡绅由于不满现状，变卖了已成为负担的农场，带着全家到6英里外的朗巴赫过起了城市生活。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有一所名利旅馆，一家人在旅馆的三楼住了半年。没有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优异。1897 - 1898学年的大考，他得了12个“优”。他有一副很好的嗓子，时常利用下午时间到修道院的圣歌班练习唱歌，本哈德·格罗纳神父成了他的指导教师。有座拱桥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桥上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有很明显的卍字。

教堂里庄严而又灿烂辉煌，节日气氛浓郁，每到此时他便“陶醉了”。修道院的院长成了他的偶像，而能步入教会也成了他的梦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愿望竟得到一直是反教人物的父亲的支持。阿道夫曾经这样告诉汉夫施坦格尔夫人：“小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牧师。他常借用厨房女佣的围裙当作神衣披在肩上，便长时间、热心地趴在椅子上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非常赞同儿子的这个理想，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他因为抽烟被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宽敞、舒适的二楼，与一工厂主成了邻居。在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男孩子看来，这是个极其理想的司令部提供给他做他最喜欢的游戏“印第安人和牛仔”的各类的

希特勒传

场所。对工厂主来说，阿道夫就像个“小流氓”，很少见他在家，“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他”。且他常带头向梨树进攻和搞恶作剧。回到家里时，“这野孩子”的裤子常常都是撕破的，手脚也总是可以看见累累伤痕。

在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看来，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没有区别，一样的乏味。1899年，他来到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幢舒适的房屋。房子的一侧是块坟地，虽然面积和别的房子没什么区别，但地点却合阿洛伊斯的口味。大约3000人在里昂丁居住，这里有戏院、剧场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的比邻，终日受到文明的熏陶。当地居民相处和睦。

小阿洛伊斯出走后，阿道夫得到父亲全部的观注。据保拉·希特勒说：“阿道夫经常惹火父亲，每天他都会挨揍。他是个叛逆的小流氓，父亲的打骂，教训，教他热爱祖国，这一切均无济于事。而我母亲又尽量用慈母之心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让他受到的伤害，母亲是那么宠爱他。”

阿道夫决定以出走的方式来抗议。阿洛伊斯听说这件事后，把阿道夫锁在楼上。阿道夫企图在晚上从窗户逃走。因为窗户太高，他脱下衣裳准备当绳索溜下去，在他马上就要获得自由的时候，忽然传来父亲的脚步声，他跳下来连忙用台布遮住赤裸的身体。小阿洛伊斯竟没有吃鞭子，父亲反而放声大笑，高声招呼母亲上楼来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这样的讥讽比皮鞭的伤害更深。他曾经私下告诉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许多年后才将此事忘掉。”

据一个秘书回忆，有本冒险小说这样写到，对痛苦的忍耐程度是人有多少勇气的体现。“于是我告诉自己在挨打的时候永不再哭。没过几天，我便迎来了考验。母亲吓得跑出了家

希特勒传

门。我便默默地记下屁股上挨棍子的次数。”希特勒说，从此以后，他便从未挨过父亲的揍了。

年仅 11 岁的阿道夫面容削瘦，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浮现在他的脸上。在里昂丁小学班级合照中，站在顶排中央，高出同学们数英寸的他，昂着头，双手在胸前交叉。他骄傲自负，富有造反精神；他聪明，在学习上，费不了太多力气；他还是个绘画的天才，1900 年 3 月 26 日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使他在绘画方面初露锋芒。上课时他会偷偷地作画。有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看见他凭记忆画出的“邵姆堡城堡”，不禁瞠目结舌。

放学后或课间休息，在同学们中间他俨然是一位领袖。因为他见多识广，在同学们看来他是个人物。弗尼摩·库伯及其摩仿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经常鼓励和启发着玩耍中的他。没有到过美国的卡尔·梅依写的关于印第安贵族和强壮的牛仔的故事，成了一代代法国和奥地利男孩子们的福音。老萨特汉和同伙的冒险让阿道夫为之疯狂，他不厌其烦地和同学们演着这些故事，大一点儿的孩子失去热情了，年纪小些的甚至会有女孩子继续演出。

这个时候，两本关于 1870 年普法战争的杂志给了他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杂志的插图和文章。“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计策，便在我内心生根发芽”，“自然我对战争或因此而从军的有关的东西愈发的热心”。

一年前波尔战争爆发，这便大大激发了他作为日耳曼人的民族自尊，并且给他提供了游戏的素材。他率领“波尔军”，与那些扮演英军的孩子们“激战”几个小时。他沉迷于游戏中流连忘返，害得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的父亲要

希特勒传

等上一个钟头。后来，温伯格说，回到家的阿道夫通常会受到“热忱”的欢迎。充满了冒险的岁月，也许影响了希特勒的一生。他写道：“草地和树林，是解决生活中随时随地存在的‘冲突’的战场。”

同年6岁的埃德蒙患麻疹不治而亡。失去了四个孩子，克拉拉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小阿洛伊斯出走，只有阿道夫一人可以继承家族姓氏了。家庭的悲剧使即将完成小学学业的阿道夫和父亲的冲突加剧。阿洛伊期要求孩子像他那样当名公仆，并以切身体会启发儿子。儿子的理想是当画家，革命计划暂且深埋心中。他没做任何争论地接受了继续进修的计划，预科学校、技工学校任由阿道夫选择。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为他选择了后者。因为这种学校设有绘画课，所以阿道夫默然同意。

阿道夫于1900年9月17日背着绿色的行囊，朝设在林嗣那所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走去。三英里的路程，他走了一半，林嗣城和多瑙河便映入眼帘。在一个未在城市成长的孩子看来，眼前的景色可怕而具有魔力。举世闻名的昆伯堡在远处的高地上耸立着，据说那里是尼伯龙根之歌的诞生地。眼前是一座座巍峨的大楼和一排排的教堂尖塔，脚下是陡峭的山坡以及弯曲的道路，技工学校位于市中心。学校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有座很黑的四层建筑物，像是一座可怕而实用的办公楼，其实那就是学校。

那时候，阿道夫的成绩一落千丈，不再是最有天赋、最聪明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感到惊恐。没有人看得起这个来自郊区农村的学生，而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阿道夫失去了原有的关注。在那年班级合照中，虽然他还在顶排，但原有的傲慢不复存在，人们见到的只有愁眉苦脸和失神。

希特勒传

他逐渐变得沉默和羞怯，对功课丧失了兴趣。“我认为父亲会因为我在技工学校无什么进步，而让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他是否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这样解释，对其因自然和算术、历史不及格而留级，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或理由。诽谤他的人说那是天生懒惰而造成的，也可能是报复父亲的一种方式，有些感情用事，或者仅因对课程不感兴趣而不下功夫。

阿道夫在第二年转变了方式，成绩大幅提高。因年纪稍大，他又成领袖了。约瑟夫·凯普林格说：“我们喜欢他，无论何时都喜欢。他有‘神’，他几乎从不头脑发热，总是通情达理。他具有很难统一的双重性格，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因为阿道夫会套圈，每到放学同学们便跟着他到多瑙河畔的草地上玩“印第安人与牛仔”。他会在休息时讲波尔战争给同学们听，把他画的波尔勇士展示给大家看，并谈起他想参加波尔人军队的事情。这次战争唤醒了年轻的希特勒的爱国主义热忱，多数男孩子们都会有这种情感。凯普林格这样回忆：在我们看来，俾斯麦是民族英雄，赞扬俾斯麦的以及许多相似的歌曲是禁唱的，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也是犯法。虽然私下里老师们并不认为我们有错，如果谁唱了这些歌曲或对奥国不忠，便会受到来自老师的严厉的惩罚。”

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入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要背叛他那一位哈斯堡政权忠实的支持者的父亲。有一回，凯普林格和阿道夫沿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去阿道夫家，希特勒停在山顶上一座小教堂前，他毫无顾忌地说：“你不是日耳曼人，你的头发、眼睛都是黑的。”他为自己的黑眼睛和淡棕色头发而感到无比骄傲。

希特勒传

此时的他还沉迷于德国神话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希特勒长到 12 岁的时候便在林嗣剧院欣赏过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迅速地沉浸在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的音乐里，由于剧中煽情的台词，他内心的民族和种族主义感情第一次被唤醒。

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

让帝国的敌人赶快出现，
我们作好准备短兵相见。
自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德国要靠德国刀，
帝国雄风不动摇！

阿道夫所学课程全部合格，勤奋程度和操行成绩达到“优”和“良”。可二年级的时候，他几乎从学期伊始便不在状态，数学又一次没及格，勤奋程度被评定为“中”。圣诞假期刚刚结束，家庭悲剧将学校里的危机掩盖了。

那是 1903 年 1 月 3 日，阿洛伊斯照常一大早便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在桌旁刚坐定，便觉身体不适，片刻后，由于胸膜出血而撒手人寰。

他于两天后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教堂公墓。这位前海关官员那张目光坚定的遗像被制成椭圆形镶在墓碑上。林嗣《每日邮报》的讣闻中称颂死者说：“他的言辞有时会像刀一样锋利，但是隐藏在粗鲁外表下的热心是不能被抹煞的。他是秩序与法律的得力维护者，他见多识广，对事物有着权威的见解。”

2

阿洛伊斯的去世并没有使家人的生活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贫困。在他去世之前，可以领取 2420 克朗的养老金，超过了一个小学校长。他的遗孀可以得到半数养老金以及一次付清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每个孩子在满 24 岁或得以自立前每年可得到约 240 克朗，视何种情况为先。

从此小屋里的紧张气氛没有了，当年阿洛伊斯独断专行的阴影已烟消云散，快 14 岁的阿道夫主宰了整个家庭。克拉拉原想按照丈夫的遗训安排儿子的前程，但她惟有祈求这件武器。这对阿道夫的梦想不起任何作用，任何人问他的理想时，他的回答只有一个：“画家，而且是伟大的。”

春季学期获准在林嗣寄宿的阿道夫，摆脱了每日的长途跋涉，也摆脱了母亲原本已微弱的影响。在林嗣，他和另外 5 个孩子的房东是位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他开始变得彬彬有礼，对房东老太太以及他的同窗都称呼“您”。新的环境虽然未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但是他读书和绘画的时间变得充裕了。据塞琪拉太太回忆，他因常在晚上用功而耗去蜡烛无数。有一次，她发现他聚精会神地看地图，还不停地用有色铅笔做着标记。“喂，阿道夫，你在干什么？”她问。他答道：“分析地图。”

学年又在散漫中度过，数学再次不及格。学校通知了希特勒太太，假如秋季的补考不及格阿道夫将不能升学。一片不大的阴云又来到家庭上空。那年夏天一家人应邀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带有两只盛满了衣服和盘子的两只老式大木箱乘火车前往乡下。克拉拉的妹夫安夫·施密特赶着牛车到威特拉火车

希特勒传

站迎接希特勒一家。这个夏天是那么快乐。克拉拉有家人作伴以及众人的怜悯；阿道夫逃脱了农活，偶尔也同施密特家的孩子们玩耍。他做了一个色彩丰富，有长尾巴的风筝送给他们，风筝飘在空中，非常美丽。但是更多的时间他还是花在读书和画画上，对于这两项的追求可以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据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每当下雨的时候，他便在屋里来回踱步，或拿笔不停地画着。他会很生气地把打扰到他的我推出门外，然后叫他母亲给哭泣的我一点糖或别的东西。阿道夫·希特勒常成为我们的笑料。他在里边，我们会往他的窗户上扔东西，因为这样他会追赶我们。”

返回里昂丁不久，“活泼爱哭”、善于享受人生的安吉拉嫁给了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阿道夫很讨厌里奥，因为他酗酒赌博，但是他讨厌新婚的姐夫更主要的原因是姐夫反对他以画画为职业。

阿道夫补考及格后，正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法语是他最困难的课程。事隔多年，他仍对学法语耿耿于怀，认为“简直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这样回忆年青时的阿道夫，“他所具有的天赋面太窄，没有很好的自我修养，非常地好战，任性、易怒、傲慢。因为懒惰，成绩不好，若他那份天才加上勤奋，成绩将提高不只一点。在绘画方面，他绘画的风格流畅，科学课程也学得很好。但是对艰苦工作他的热情顷刻便荡然无存。”休谟博士兼任阿道夫的班级顾问和德文教师，他对阿道夫十分地感兴趣。“阿道夫会对受到的规劝和斥责怀恨在心。同时，他又自作领导要同学们盲从于他，极其放肆地搞恶作剧，这些戏谑行为并无大害，在幼稚的青年中司空见惯。”

希特勒传

休谟教授也会为这位削瘦的青年而感到骄傲，他尽力去引导阿道夫。然而，事与愿违，年轻的阿道夫已然定型，将劝告当成耳边风，对于想打进他私人天地的人，他会退避三舍。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给内向的阿道夫留下了印象。阿道夫简直被古代条顿人的历史迷住了。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这样写道：“我对这灰白发老人的友善的感情直至今日。他讲课时的炽烈情感，有时竟让我们好像跨越了时空；他用魔力带我们回到古代。他用数千年编织的历史面纱，牢固地系着历史事实，带进鲜活的现实。每当此时，我们热血沸腾地端坐在那里，有时竟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在课余，沉闷常使希特勒感到不安。学校在 1904 年春已枯燥无味。5 月的圣神降临节，他怀着不耐烦的心情在林嗣教堂行坚信礼。埃玛努尔·卢加特这样回忆：“没有任何男孩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坐立不安、脸色阴沉。让他开口说话是很困难的……他讨厌坚信礼的整个过程，他极勉强地行完礼。”阿道夫一回到里昂丁便马上去找他的游伴。他们绕着房子跑来跑去，玩一种叫‘红印第安人’的游戏，简直要闹翻天了！

那年，阿道夫没有通过法文考试。秋季补考勉强及格，但是他的最后一年级不能在林嗣学校念。15 岁的阿道夫被迫再次到离家约 25 英里，也是离家最近的设在斯狄尔的一所中学读书。希特勒太太陪儿子一同到斯狄尔，让他住在西希尼家的一间小屋。阿道夫从一开始就讨厌这个城市，讨厌窗外那些令人恶心的景物。“我常在窗口练习射击，目标就是那些老鼠”。比起功课阿道夫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绘画和射老鼠上。第一学期体操课为“优”，绘画为“良”。地理和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

希特勒传

也只得了“中”，德文和数学不及格。逃学让他更加荒唐。一天早晨他围了条大围脖，谎称嗓子坏了。于是校方将他送回家了事。

后来他的分数有所上升，学校同意如果他通过秋季补考便让他毕业。在1905年7月的一个天气闷热的日子，阿道夫告诉了母亲这个好消息。不久以前，她已将里昂丁那所充满了混乱与不幸的农庄卖掉，在林嗣市中心座落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成了她的家。她租了这座阴暗楼房里的一套房子。一年后，远离了母亲的关心和照顾的阿道夫看上去头发蓬乱，胡子依稀可见，他已变成面带梦想表情、举止颇为浪漫的波希米亚青年了。一幅名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的画出自他在斯狄尔的同学斯道伯格之手，这幅画记录了阿道夫此时的一切。

克拉拉欣喜若狂，认为儿子简直就是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亲密无间，不久，在他们再次和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的时候，阿道夫患了肺炎。这病更加密切了母子的关系。这个夏天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阿道夫被放逐至“斯狄尔”，但对正享受愉快假期的母子二人来说，这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阿道夫的身体康复之日，也是他们一家离开乡下之时，9月16日，他回到斯狄尔参加补考，并且都及格了。当晚为表示庆祝，他秘密地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开了个小酒会，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我把晚上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自己被一个送奶工叫醒，当时是凌晨，地点在公路上。他为了不再蒙受此辱，决定永远不再喝醉酒，这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

尽管补考及格，希特勒仍然无法应付毕业考试。因为他一想到又要回到技术学校就会感到异常反感。他以肺不好为由

希特勒传

——“疾病如雪中送炭”——说服了母亲，让他不再继续学习。后来，这件事变成诽谤者攻击他的一个素材，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身体不好的问题撒了谎，然而保拉却证实，他的确患有出血症。一个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回忆，“他患有严重的咳嗽和鼻膜炎，尤其在下雾和潮湿的日子，更加厉害”。有个邻居回忆：“他因为肺不好，所以身体很差，以至辍学，后来还咳血。”

16岁的他在没有父亲和学校管教的日子里自由自在、四处游荡、藐视权威。他就像一个出逃者。他对于速写、看书如饥似渴。他进剧场，上博馆，去蜡人馆。有一次在火车站放映的一场电影，极大地改变了他的道德观念。他讨厌与人交往；从此独来独往，对儿戏的领袖不屑一顾。他可以独自漫步在林嗣街道而不感到孤单，理想在他心中猛烈地翻腾。他在1905年深秋终于遇上了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的父亲是个装修商，库比席克的梦想是成为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已学会拉大提琴和小提琴，还会吹低音和小号大喇叭，且就读于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个晚上，两人在剧院相遇。在库比席克眼里希特勒少语寡言，衣着考究。“他面色苍白，身体消瘦，与我的年龄相仿，他的表情随着演出的进展而变化。”库比席克比看上去敏锐，头发卷曲，宽额，好像天生是个艺术家。

库比席克和阿道夫每晚都要去剧场。若无戏可看，两人便漫步在兰德大街。每逢此时，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与阿道夫形影不离。一天，库比席克斗胆问他寡言少语的朋友是否有工作，阿道夫粗鲁的回答说：“当然没有”。他对“糊口”的工作不屑一顾。

希特勒传

因为希特勒对自己绝口不提，他们的话题只局限于艺术和音乐。有一次，希特勒出人意料地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把他刚写好的一首诗朗诵给库比席克听，随后又将设计稿和几幅画展示给他，承认自己的梦想是当画家。他的这种不可动摇的超过实际年龄的决心给库比席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希特勒成为他心中的英雄，以至于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常常是夸张的甚至臆造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能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如此地深刻。

两人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性格却相距甚远。库比席克称自己“能够为更好地适应环境而随时作出让步”，而希特勒则是“高谈阔论，暴躁易怒”。这种性格差异反而让他们的友谊加深了。库比席克常处于被动，心甘情愿地去倾听，“因为我明白，在朋友的心里我是多么的重要”。库比席克这个热心的听众，给了阿道夫温暖。他于是常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迹的山路时高谈阔论，对着库比席克手舞足蹈的。如火山爆发，又如舞台上的一幕。这常使库比席克张口结舌，纹丝不动，忘记了鼓掌。库比席克过了好久才明白，他的朋友认真，并非儿戏。对于希特勒的这些高谈阔论，他不允许别人持反对意见。当库比席克对希特勒的口才而非内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随时都会对他的想法点头称是。这段时间，他俩常去图姆莱顿维克。阿道夫会在那里读书、速写、画水彩。俩人偶尔会在多瑙河畔的石阶闲坐。希特勒常会在这幽僻之地倾吐他的计划和希望，其中有的是异想天开。了解当然是双方面的。对于库比席克的思想，阿道夫可以说了如指掌。“我需要和缺少的他都已如指掌。有时我会认为，他在过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这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是住的地

方极其简陋。汉波尔德大街的那套住房房间很小。透过厨房仅有的那扇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景色。这间小厨房颇为舒适。克拉拉和保拉睡在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的客厅里，第三个房间的面积与洗手间相似，是阿道夫的卧室。与原来的家相比，现在的家是多么安静，多么和睦。这个家实际上是给阿道夫这位少爷准备的。每年，阿道夫都会送给母亲一张戏票，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在克拉拉看来，阿道夫这位天才尚未苏醒的年轻王子注定将来要名声大振。所以，克拉拉并没有为增加家庭收入而听从亲朋的建议，让阿道夫去学实用的手艺。

阿道夫在 1906 年春实现了他的一个梦想：得到母亲的允许，他来到维也纳这个音乐、艺术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典而浪漫的城市里，他完全陶醉了。在这里游玩的一个月中他一直与库比席克保持书信往来。“我明天去看歌剧《崔斯坦》，后天是《飞翔的荷兰人》等”，他 5 月 7 日在寄出的明信片上写着：“虽然这里是那么的美好，但我想回林嗣了。今天的安排是去国立剧场。”他在当天寄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将皇家歌剧院的设施描述得很平常。“巨大的声浪席卷大厅，将风的呼啸吞没，人们才忘却厅内拥挤不堪的绫罗绸缎和金碧辉煌，情感才得以升华。”这些话成为代表这个初露锋芒的画家的典型——不通的语法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而敏感。

回到林嗣的阿道夫更是潜心于建筑与绘画。他强迫库比席克同操此业，库比席克起初不同意，但终究敌不过阿道夫强大的语言攻势，两人合伙购买了 10 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在讲述赚来的钱如何使用时滔滔不绝。他要租下在多瑙河畔一座大楼的二层。两人的房间相距要远，使两人互不干扰。房

希特勒传

间的装饰由阿道夫本人负责，包括墙画和家具，他是画家兼设计师。他们的房子将成为艺术爱好者们的基地，“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那里，学音乐，读书和搞研究，但学习还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可能将领域宽广的德国艺术研究完”。还有一条虽令人高兴，却泄露天机的规定：“这个家的女主人应受过良好教育，她将成为‘城主之妻’。她的性格必须文静，避免惹来我们讨厌的意图或奢望。”这个幻想毕竟是幻想：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平淡的夏天，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数他送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台幻灯。从乡下回来的他依旧重复着幻想家和萌芽画家的生活。10月初，他在库比席克的指导下学起了钢琴。保拉曾回忆说：“他在母亲给他买的那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前一坐便是数个小时，为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会心痛。”此时库比席克发现了阿道夫的一件令他惊诧的新鲜事。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故事主角罗马的保护人的升降在阿道夫身上产生了奇特的效果。这晚，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大落幕时仍对演员或音乐指手划脚，而是出奇地安静，“用一种奇怪而有些敌对的目光”，盯得库比席克目瞪口呆。希特勒脸色更惨白，他竖着衣领，沉默着，大步走向大街。时值寒冷的11月。“脸色阴恶”的他领着他已目瞪口呆的同伴，爬上陡峭的山顶。突然，他把库比席克的双手紧紧地握住，眼睛里充满“激动的狂热”，声音有些沙哑。库比席克觉得眼前的人不再是刚才的阿道夫——“完全地欣喜若狂。虽然他并没有提到剧中主角是他的榜样或楷模，他将主角黎恩济幻想为自己壮志雄心的楷模”。库比席克对他朋友想要成为伟大的建筑师或画家毫不怀疑。其实现在的阿道夫已经完全变

希特勒传

成一个陌生人，开始口出狂言，“好像终有一天，他将肩负人民赋予的重任”，——人民呼唤他，要他带领他们获得自由。这一幕情景也许是库比席克的夸张，但它真切地反映出他这位浪漫的朋友的心情。凌晨了他们才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再次上山，因为他想“独自待一会儿”。他的家人成了他幻想的受益者——但仍有些怀疑。保拉回忆，“他常富有激情地给我们讲政治和历史”。

此事发生不久，他逐渐消沉了。此时的他认为自己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遭人唾弃，心灵受到创伤。甚至他可以从“青春”迈进人世。钢琴课只持续了4个月。库比席克这样解释，“也许阿道夫并不适合这种单调、乏味的手指动作”，但克拉拉·希特勒的身体变坏也许是真正的原因。他母亲在1907年1月14日去一位名叫爱德华·布洛克的犹太医生那儿去看病，他是当地有名的“穷人的医生”。她告诉医生自己胸痛得夜不能寐时很镇静。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个大肿瘤”，诊断表明为癌症，但病人自己并不知道。次日，医生召来保拉和阿道夫。他们的母亲“身患绝症”，外科手术也许是惟一的希望。阿道夫低下长长的蜡黄脸，两行泪水溢出眼眶。他询问着医生是否还有别的办法治他母亲的病。此时，我才体会到他们是何等的母子情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做手术。克拉拉·希特勒于1月17日住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第二天，卡尔·乌尔班医生执刀做乳房切除术。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的约翰娜婶婶从希皮塔耳赶来照顾孩子们。克拉拉在3克朗一天的三等病房里休养了19天。为了节约开支，她并没有住进她本可以住的较舒适的病房。为了避免克拉拉爬楼梯，全家于同年春由汉波尔

希特勒传

德大街的那幢房子迁至多瑙河畔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 9 号。新屋子是石块砌的，外观漂亮。他们住在二楼的三间房子里。这里舒适、安静。坐着电车跨越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的去处。

阿道夫又多了一桩心事：他恋爱了。在她之前，他与任何姑娘的关系都显得微不足道。有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在牲口圈里。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进一步交往时，他却逃跑了，一桶鲜牛奶被打翻在地。他与库比席克漫步在兰德大街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端庄，身材修长的”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梳成发髻的浓发，简直就是年轻的“瓦尔基里”。阿道夫抓住库比席克的胳膊，激动而坚定地说：“告诉她，我对她一见钟情。”她叫斯特芬妮·詹斯坦，同样住在乌法尔。阿道夫把为她写的众多情诗中的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的诗朗诵给忠诚的库比席克。他承认，他从未与她交谈，但“此时无声胜有声”。希特勒称，他们是绝配，彼此眉目可传情。“这些事是没有原由的，”他说，“我们俩心有灵犀。”希特勒拒绝了库比席克让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与她形影不离的母亲进行自我介绍的建议。他说，如果自我介绍，免不了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并没有成为职业画家。此外，他正潜心研究德国和挪威神话。在研究中他发现，神话中的女人都是那么的超凡脱俗。而他自己对性概念的理解又有些浪漫、骑士化。向这位年轻的齐格飞作介绍有些平淡无奇而且多余。幻想变成狂想。一切都不成功，他将趁她母亲与库比席克谈话之机绑架她！

斯特芬妮对他继续不理不睬。他认为她在生他的气。失望的阿道夫立誓不再为情所困。“我要了结此事！”他决定和斯特

希特勒传

芬妮一起跳进多瑙河殉情。他制订了详尽的计划，甚至连大家应说的话也包括在内。库比席克的角色是悲剧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非常符合这个爱幻想、感情容易冲动的年轻人。成功的结果是二人的结合，而成为一名画家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将继续这又喜又痛的幻想。斯特芬妮由于一些重要的事而退出舞台。阿道夫的创作热情转入建筑。虽然他画水彩画仍孜孜不倦，但他的那些显示出他某些天才的作品却不能满足在他胸中沸腾的理想和感情。库比席克说：“比起绘画，阿道夫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只不过是理想之外的爱好，他对此从未认真过。”但他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充分地展现在他的建筑设计上。为了理想，他竟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时常站在新教堂前，对其进行称赞或批评，他居然把该教堂重新设计了，并且一鼓作气地一遍遍地画着。“他完全沉浸于他想像的建筑物中。”当与库比席克这个惟一的听众逛街时，希特勒常常对街头建筑品头论足，并详细阐述修改方案。他想设计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来代替现在这座不够威武雄壮的市政大楼。他要重新设计已经破旧的城堡，想要恢复它原有的雄姿。

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进一步体现在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上。他要拆除那些正在不断扩大的林嗣的那些丑陋而碍事的交通铁轨，铁轨将深埋地下，车站将建于城沿。扩建公园至旧火车站。他那些无边际的想像力又促使他计划将铁路延伸至里兹顿维克顶端，在那里建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 300 英尺的可以俯瞰架设得多瑙河上高水平桥梁的铁塔。

他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晚上，他迟迟不入睡；白天，则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画画、搞设计。邮政局长的老婆

希特勒传

住在他楼下，她回忆希特勒常在黄昏 6 时与库比席克出去闲逛，回来以后，便在起居室内踱步至凌晨。阿道夫拒绝了她丈夫劝他步入邮政界的建议，因为他坚信自己会成为伟大的画家。“当告诉他缺乏必要的人事关系和途径时，他的回答是那么简短：‘卢本斯和马卡特出名前曾经那么贫寒。’”

林嗣已经不能满足生性好动的希特勒了。他向往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维也纳。他想方设法让母亲相信，他可以进入美术学院。另外，克拉拉的孩子们的监护约瑟夫·梅洛福和女婿同时劝说和逼迫她，说孩子已经应该有一份好工作了。梅洛福甚至为阿道夫请来了一位教烤面包的师傅。

然而，克拉拉面对儿子的热切请求却无计可施。同年夏天，阿道夫揣着原来存在“奥地利抵押银行”的约 700 克朗的继承财产，带着内疚而兴奋的心情踏上了去维也纳的路途，因为母亲的身体进一步恶化，这笔钱是他在维也纳一年的开销，其中还有美术学院的学费。美术学院将在 10 月上旬举行入学考试，如他不抓紧时间，他的职业又会被推迟一年。那是 1907 年一个深秋的清晨，库比席克来到阿道夫家，克拉拉、保拉以及阿道夫三个人的眼里均含着泪水。他的皮箱重得必须由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

记得他初次去维也纳时，曾不停地寄明信片给库比席克。这次却是一连 10 天杳无音信。库比席克暗自为阿道夫担心，生病了？遭车祸了？要不就是已经去天堂了？于是，他便想从希特勒太太那儿得到一点消息。可谁知她一见到库比席克就问：“有没有阿道夫的消息？”她的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饱经风霜的脸更加憔悴。似乎她的灵魂也随阿道夫一同去了维也纳，留在这里的不过是个“病魔缠身而苍老”的躯

希特勒传

壳。她又开始重复着她的惋惜：画画或写故事并不是个好职业，挣不着钱。“无谓的维也纳之行”只是在浪费他继承的财产。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帮我照顾一下小保拉？

阿道夫在维也纳的住所是靠近维斯马诺夫的斯通帕大街29号2号楼，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成了他的房东。踌躇满志的阿道夫对入学考试颇有信心，然而结果却使他目瞪口呆，精神萎靡不振：“应试画作不合格。”校长根据他的要求作出如下解释：“此生在建筑方面可能颇有能力，但不适于绘画。”

几天后，垂头丧气的阿道夫恍然大悟，原来他画画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而真正的职业应是一个建筑师，正如库比席克较早时的预料。而他又面临重重困难：没有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不能进入建筑学校学习，从而无法进入建筑学院。他坚信自己会取得成功，然而那些无法忽视的困难又令他沮丧。此后的几星期，他毫无目的地生活着，在小屋内看书，晚上去看戏，或在街头闲逛，欣赏建筑。

在乌法尔，邮电局长太太飞书阿道夫通知他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让他迅速返回。他于10月22日再访布洛克医生。医生说，只有采取激烈疗法，才能延长病人的寿命。由于“病毒已侵入肋膜”，手术为时已晚。这种激烈疗法充满了危险，因为伤口需要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并不在乎花多少钱，同意先支付碘酒钱，随后付清治疗费。

库比席克对阿道夫的突然造访大吃一惊，只见他双目光，脸色惨白。在向库比席克说明返回乌法尔的原因后，他对医生破口大骂。他们竟敢称他母亲已无药可救？只不过是掩饰他们的无能！他说，因为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临

希特勒传

产，他要在家里照顾母亲。阿道夫对斯特芬妮只字不提，这使库比席克很诧异，就连以后也未曾听他提起她。他“全神贯注”地照顾母亲。

克拉拉到 11 月 6 日差不多一天都离不开碘酒了。上碘酒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将事先在碘酒中泡好的沙布叠好，敷在伤口上，碘酒浸入肌体时会有钻心的疼痛，一旦进入内脏，克拉拉由于不能喝水而使喉咙干得冒火，此时任何液体都像毒药。

全心照料母亲的希特勒，还要分担邮电局长的老婆、约翰娜婶婶和保拉的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全天有火的厨房里，一张卧榻代替了原来的碗橱。为了照料老母，阿道夫就睡在这里。阿道夫会在白天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告诉库比席克，她现在的好胃口前所未有的。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在她苍白的脸上看到一些血色。她享受着儿子归来以及对她无微不至照料的快乐，那张饱经风霜、毫无笑容的脸有了不少的改观。

在那些潮湿而寒冷的日子里，库比席克对希特勒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听不到任何粗话，毫无怨言，对母亲几乎惟命是从。”阿道夫“活着只为母亲”，甚至成了这个家的家长。他会斥责没有取得好成绩的保拉，并且让她发誓，日后要努力学习。希特勒这种不寻常的表现给库比席克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希特勒想让母亲明白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清醒的克拉拉万分痛苦。布洛克医生回忆说：“她的忍耐力非比寻常，毫无怨言，不屈不挠。可她的儿子却被折磨坏了。他心灵上的痛楚并不亚于他母亲身体上的痛苦。”

12 月 20 日晚上，库比席克看见希特勒太太的时候，她为减轻痛苦而双眼深陷，嘴唇紧闭，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希特勒用手势示意他的朋友离开。这时克拉拉小声叫住正要离开的

希特勒传

库比席克：“库斯特尔。”她并不像平时那样称他为库斯特尔先生。“我死了以后，请继续做阿道夫的好朋友。他只有你了。”

午夜时分，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全家没有再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能为力。12月21日，希特勒说：“我的母亲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芒中，走向了天堂。”天亮了，布洛克医生被安吉拉找来签署死亡证书。他看见面色惨白的阿道夫守在母亲身边。速写本上有一张克拉拉的画像，应该是最后的记忆。医生告诉阿道夫，只有死亡才能让克拉拉摆脱痛苦，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曾经经历无数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在我的整个行医生涯中，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的悲痛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章 从生活中学习

1907·12—1913·5

1

1907年12月23日的清晨潮湿且大雾弥漫。躺在一口“光滑、坚硬、金属镶紧四周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人们抬着离开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缓缓地沿着泥泞的街道驶向教堂。告别仪式是简短的，由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组成的小小的送葬队伍缓慢地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驶向昂丁。她将在丈夫的身旁长眠，这是她的遗愿，她的名字则和丈夫刻在一起。身着丧服的一家人，默默地站在雾气蒙蒙的墓地——这里靠近他们原来那座舒适的小房子。在库比席克看来，身着黑大衣，手托黑色高顶帽的阿道夫的脸色是那么的苍白，“镇静而严峻”。

希特勒一家在剧痛中度过了圣诞之夜。全家为付医药费正式拜访了医生布洛克。医药费一共花去了359克朗，其中包括预付的59克朗。这是笔为数不少的款项，占了克拉拉资产总额的1/10，这笔帐是有据可寻的——问诊77次和47次的治疗费。那300克朗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整个过程中只是两姐妹在说话，阿道夫穿着黑色外衣，领带松弛，双眼盯着地板，一

希特勒传

撮头发披在前额。后来，他握紧医生的手，双眼望着医生。“我永远感激您对我家的恩情，”他边说边深鞠一躬。布洛克医生35年后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这一幕不知他是否还有印象”，“可以肯定，他记得并且恪守诺言。我得到了奥地利和全德国犹太人均未得到的来自他的好处”。

阿道夫和保拉那天得到拉波尔一家让他们去他家过节的邀请，但阿道夫拒绝了。这个随时都企图劝说他放弃成为伟大画家的理想的姐夫，使他逐渐感到不安。他告诉库比席克，他逃到维也纳是为了摆脱亲戚们的纠缠。这个心胸狭窄的家族促使他决心用最终成为画家的事实来证实他们的错误。

他毫无疑问地认为，可以成为职业音乐家的库比席克应离开其父的装璜商店。库比席克家曾在去年秋天反对库斯特尔去维也纳。但是，希特勒并不放弃，据理力争，用维也纳的音乐会、歌剧，以及对学音乐的人充满的无穷尽的机会说服了库斯特尔和他的母亲。可是最大的阻力来自库比席克老先生，因为他眼中的阿道夫是个不学无术且自负的小伙子。然而年轻的希特勒有不同寻常的说服力。于是这位现实的父亲同意儿子到首都一试身手。库斯特尔将和一位诚心学得艺术真经的学生同住，是希特勒说服他的一个论点。

希特勒又一次回到了里昂丁，为的是告诉他的监护人自己将去维也纳定居。这次，一切都很平静。梅洛福先生有些无奈，却终于没有阻挠，他告诉女儿，他必须这样做，这是责任。阿道夫与约翰娜婶婶和安吉拉在以后的数年中住在一起，安排好家事。当付完3370元丧葬费后，他们将所有债务还清了。阿道夫对各位邻居在母亲生病期间所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无尽的感激。特别是邮电局长夫妇，阿道夫以画相赠。由于克拉

希特勒传

拉的精打细算，余下了约 3000 克朗的遗产。由于 11 岁的保拉由安吉拉来照顾，她得到了超过 $2/3$ 的遗产。小阿洛伊斯·希特勒曾经告诉他的儿子，由于拉波尔家没有足够的钱，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安吉拉和保拉，于是安吉拉得到了阿道夫的那份，而保拉则得到了阿洛伊斯的那份。如果真如阿洛伊斯所说，阿道夫带到维也纳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孤儿津贴以及他继承遗产的余额。

刚进入 2 月，便从维也纳传来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皇家剧院舞台设计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被一位邻居说服，同意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选择职业提供实况，这对希特勒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对于反对他从事绘画的家人是个有力的驳斥。希特勒将作维也纳之行。他填写了保拉和自己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表格由于未经监护人签字而于 1908 年 2 月 13 日被退回，并被转给了梅洛福先生，迫不及待的他未得到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急切地打点行装告别了家人以及布鲁登加斯 9 号。

可能是 2 月 17 日，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阿道夫送行。希特勒在候车时提及斯特芬妮，他说还没来得及向她介绍自己，但也许会写信给她。火车缓缓启动，阿道夫伸出头，喊道：“库斯特尔，我希望尽早在维也纳看到你。”这个年轻人也许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假若读过，他毫无疑问会认为他与主人公是同一类人。在五个半克朗的三等车厢里经过了 5 个小时，阿道夫·希特勒在他 18 岁的时候第三次拜访维也纳这个神奇的城市。步行 5 分钟便能从维斯巴诺夫来到了斯通帕大街 29 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带着沉重行李的他，艰难地走完了这段路。虽然那年 1 月天气沉闷，但阿道夫看上去神采奕奕。他于 2 月 18 日寄了一封明信片给库比席克，上面

写着热情洋溢的文字：

“ 亲爱的 ” 的库斯特尔：

焦急地等待与你在维也纳的相会。你务必前来，并及时来信告之，以便我做好热情迎接你的准备。整个维也纳都在期盼……按照我们的约定，你先与我同住，以后看情况而定。只需 50—60 弗罗令便可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买到钢琴。代我向你父母致敬。我再次期盼你的到来！

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5 天过去了，在一个大雾笼罩的礼拜天，库斯特尔背着装满了吃食的棕色帆布袋，赶到维斯巴诺夫。就在他置身于繁忙的候车室而不知所措时，阿道夫这个维也纳市民向他走来。“头戴黑帽，身着高级黑大衣，手持那根象牙柄手杖，他是那么的风度翩翩。”阿道夫为朋友的到来而万分高兴，热情地亲吻库比席克的面颊。两人一块提起口袋，隐没于闹市中。天色已晚，车站在广场弧光灯的照射下“有如白昼”。

两人走进雄壮威武的斯通帕加斯 29 号宽敞的大门，经过一个小院落，在一座略显破旧的楼前停下了脚步。他们艰难地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二楼。房内满是画稿。阿道夫将报纸铺在桌上，摆出牛奶、面包和香肠，这是他仅有的。库比席克挪开这些东西，从帆布口袋里拿出刚烤好的面包、烤肉、果酱、奶酪、咖啡。据说阿道夫这样喊道：“这就是有母亲和没母亲的区别呀！”

希特勒在吃饱喝足后坚持要这个疲倦不堪的朋友去参观市

希特勒传

容。“没有看到马戏场，库比席克你怎能安然入睡？”他们的第一站是辉煌的歌剧院，“我似乎置身于外星球，印象深刻，使我为之倾倒”。第二站便是雅致的圣·斯特藩塔楼。阿道夫后来又坚持带他来到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雾气弥漫在维也纳城，由于看不清多少东西，库比席克很希望早点回去，但他们到家时已过深夜。库比席克迫不及待地躺在房东老太太给他铺好的地铺上。

一架大钢琴和两个人使这间小屋实在拥挤不堪，查克雷斯太太被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给他们换了大屋。他们同意每月付 20 克朗，相当于以前租金的二倍。可钢琴又与阿道夫用于踱步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所以，室内的家具被重新安排，阿道夫有了三步长的空地。

两天之内，库斯特尔在音乐学院登记了，并且通过入学考试。“我的朋友如此聪明，真出乎我的意料，”希特勒评论说。他对此后数星期内库比席克的进步毫无兴趣。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前来拜访库斯特尔，他大闹一通。她离开后，希特勒边踱步边大放厥词：“让女人求学简直是胡闹。”库比席克认为，“阿道夫精神不正常，区区小事便可惹得他雷霆大发”。库比席克的一举一动，希特勒总是看不惯，“使我们很难相处……他在这个充满不义、敌对情绪和仇恨的世界里挣扎”。

实际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希特勒自己的落第，他曾有一次大声痛斥美术学院，使他仇世的原因昭然若揭。“……这些老顽固、官僚头脑硬化，不通情达理，一群蠢货！该炸掉整个学院！”他铁青着脸，双眼闪动着仇恨。他终究还是道出真情，原来他落选了，被扫地出门。“现在如何是好？”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拿着书，坐在桌旁，平静地回答：“没什么。”

希特勒传

尽管他经常夸口对成功是多么自信，他仍必须依靠罗勒教授。他几次提包在这位四海扬名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门口徘徊，始终没有胆量敲门。最后，介绍信被他撕得粉碎，“它的引诱将再不能打扰他了”。也许是怕自己作品的水平有限，也许是内心之失败感，也许完全是因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求见使他有了这一举动。

梅洛福先生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得到津贴办公室通知，阿道夫·希特勒和保拉每年每人可领到 300 克朗，直至年满 24 岁。每年应领的 600 克朗津贴办公室委托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他们每人每月可得到 25 个克朗。

这笔定期款项毫无疑问是希特勒新的希望。但就算遗产中的 650 个克朗他拥有大部分，也不能太大地改善他艰苦的生活。希特勒的同室回忆他常忍饥挨饿。“他一连 5 天只有牛奶、黄油和面包。”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库比席克一无所知。他认为“希特勒会因为缺钱暗暗含辱。有时他在生气时会咆哮这样生活简直牛马不如”。

希特勒把省吃俭用得来的钱都花在每周几次去戏院或歌剧院上。为了保持体面，他总是将裤子压在席子底下“熨”的。希特勒不喜欢和那些只追求打情骂俏的女孩子们一起坐，他宁愿花两克朗高价，去那些只有男人出入的舞场，且会强迫库比席克同行。他们从未看一场完整的长歌剧，因为他们只有在晚上 9 点 45 分离开，在斯通帕加斯 9 号关大门前到家，才能省去给看门人小费。但是回来以后库比席克会被希特勒强迫着用钢琴弹出未看完的部分。

希特勒听了瓦格纳的作品会心旷神怡的。他会强迫库斯特尔放弃威尔弟作品的首演，和他去看皇家剧院上演的瓦格纳作

希特勒传

品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他百听不厌，使他慢慢地走进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消除他的狂乱天性所致的紧张。《罗安格林》是阿道夫最喜欢的，他们一同看过 10 次。同样让他入迷的是“诗歌会”，他常引用第二幕里的几行诗：

我依旧没有成功。
可以感觉，我却不能明了，
不能挽留，亦无法忘怀，
若执之，又无法衡量。

希特勒曾同库比席克去看过几次威尔第的歌剧，但他只欣赏“阿伊达”。虚假的舞台效果使他大加反对：“这些意大利人没有刀该怎么办？”一天，他听见街头艺人在用手风琴演奏《贵妇与庶民》，喊道：“你想想，手风琴能演奏罗安格林的故事吗？”

许多夜晚，他们都一起出席音乐会——因为库比席克是学音乐的，他有免费票。阿道夫开始对“交响乐”着迷，库比席克对此感到诧异。希特勒尤其偏爱浪漫主义作曲家——舒伯特、韦伯、舒曼和门德尔松。还有布鲁克纳、格里格和贝多芬——他们的钢琴曲也常常使他感动。

维也纳的光辉并未因为他们缺乏金钱而变得暗淡。那时正是音乐和歌剧的鼎盛时期。刚退出皇家剧院的古斯塔夫·马勒加盟了纽约市的“大都市乐团”，留下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其中有很多罗勒的设计。最著名的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戒指》的第一、二部分以及《黎恩济》。因为删去马勒的某部作品的某些情节，新任导演费力克斯·文加纳招来了一些愤怒。他仍在

希特勒传

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作品——《戒指》，并由罗勒对舞台进行重新设计。巧的是，他们都是犹太人维也纳文学艺术界中有成就的人，例如，冯·霍夫曼斯达尔、雨果、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尔·霍夫曼，以及赫尔曼·巴尔等许多都是犹太人。

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正是维也纳，那里没有统一的语言，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炫丽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时常伴随着城市的没落。哈斯堡王朝从传统上说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却非常独特。维也纳既是财政金融中心，又是时装和文化中心，善于融合互不协调的民族是其与德国最大的不同。“许多世纪以来，马札儿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纷纷涌向这里，”当时有个记者评论道，“他们说，德国血液在这个城市已不存在了。”这里有波希米亚剧场、意大利歌剧院；有波兰人的俱乐部，也有法国的歌星；在一部分咖啡馆里，你也许可以读到斯拉夫文、捷克文、匈牙利文和波兰文的报纸——惟独没有德文的。你也许“是个地道的德国人，但你也许会找到加里西亚或波兰妻子，波希米亚厨师，达尔马西亚或伊士特里亚保姆，塞尔维亚男仆，斯拉夫车夫，马札儿人理发师，法国老师……不是的，维也纳不属于德国”。

那些离开了奥地利其它地方来到维也纳的人们同阿道夫一样，也许是因为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在它的魔力下屈服。维也纳是个贫民窟和魅力混杂的城市，既具有古老、悠久的传统，又有知识阶层激进的试验，思想自由和强烈的民族偏见共存。光辉夺目的维也纳虽然吸引了阿道夫，但是，时光流逝以及希望的破灭，使他开始反感“这个魔术般的值得怀疑的民族熔炉”。

库比席克和他常饥肠辘辘地离开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穿

希特勒传

过中产阶级居住着的昏暗街道，走向豪华和辉煌的大楼旅馆林立，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逐渐变得叛逆，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常遭到他不停的诅咒。到处是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比饥饿更令他厌恶。库比席克后来说，希特勒“对可能危害身体的东西特别敏感”。

他不止对维也纳有这种感情。“维也纳既隐藏着无数让人们取得最大成功的机遇，也具有阻碍这些成功的最顽固的力量。成长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的成功人物，一旦成名，便生活在辩证的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混合体中。”这是布鲁诺·华尔特在自传中写到马勒时提到的。希特勒几乎每月都看一次马勒的作品，《崔斯坦》是那么鼓舞人心，由马勒配上色彩鲜明的布景——紫色的、橙色的和灰色的。总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有专门改去优秀公民的习惯的爱骂不平的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奥斯卡·科科契卡的鲜艳色彩都被他们嘲笑，对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达尔的作品，他们仍然认为很多地方要批评。

青年希特勒时而愤世疾俗，时而如痴如醉，常常想方设法挖掘深藏在这座城市华丽表面下的罪恶。库比席克认为希特勒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他回忆，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起伏不定。他会跑去“研究”梅德林区工人的住宅，也会花上数小时去考察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回到脏乱狭小的房内后，他便重新设计首都。这个青年扮演市政计划者和建筑师的双重角色。他在大钢琴间与大门的过道上来回踱步的同时又强迫库比席克充当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的听众。有一回，他在失踪3天后回来宣布，应该铲除住宅区，并连夜把工

人模范村设计出来。

晚上，一盏油灯便是唯一的光源。他在摇摆不定的灯光下写作到深夜。库比席克出于好奇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

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后景是“圣山”；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武士将一头庞大的黑牛按在石板的空处。身穿黑袍的祭师，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周围有许多大胡子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手执长矛，倚着盾牌。

库比席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希特勒则认为是话剧。他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激动地描述了一番——山里人决心杀掉传教士。因为他们不相信新的信仰，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他呢——有的只有构思，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刚刚开始，或取自日耳曼人的历史和神话。有时阿道夫会写到黎明，或朗读一两页，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斯特尔的床上，演出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这些戏需要花费巨资。库斯特尔认为他应该写简单的东西——例如，写一部清新的喜剧。从此，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库比席克因提到此事而引发另一件事。库比席克说，在瓦格纳死后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为于维兰和史密斯写的音乐剧的提纲。

第二天中午，吃完午饭，库比席克回来了，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想将维兰写成音乐剧。”阿道夫决定用钢琴弹给库斯特尔听，并让他把曲谱作一些修改再以此写大纲。希特勒数晚后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意见。库比席克觉得，基本的主题还不错，不过内容不太好，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

希特勒传

的格式。希特勒不满意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继续成天谱曲，甚至还做起了设计工作，还把主人公的样子画了出来。在晚上，阿道夫写歌词的同时还注意着库比席克，只要发现他打瞌睡，便弄醒他，小声地朗读他的手稿。可是，几星期过去了，希特勒却将歌剧放在了一边，这有许多原因，也许是他有别的事情，或者他已经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后来便索性只字不提了。

库比席克在那年春天回家度复活节。他在来信中说，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他的角膜发炎了，他还说他也许要在回到维斯巴诺夫后戴眼镜。在阿道夫看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是那么枯燥和寂寞。4月19日是那年的复活节，而复活节的第二天便是他19岁生日。希特勒给库斯特尔回了一封既沉重又有幽默感的信：“获悉你双眼要失明，本人哀愁满腹，弹错的音键和读错的音符会越来越多，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即将成为聋子。呸！”

住在林嗣农村一些日子后，库斯特尔认为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竟然是那么黯淡无光。他劝希特勒进行乡间旅行。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二人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并乘汽轮沿多瑙河顺流而下。一般人认为，这应该是年轻人怀春思情的季节，但在他们的生活里，性有些无足轻重。姑娘们常在散步时狡猾地向他们暗送秋波。库比席克起初还以为秋波是传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地发现，阿道夫才是她们的真正目标，他将她们的目邀冷冷地回绝。他们晚间几个小时谈论女人、婚姻和爱情，但并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当然，谈话依旧是被阿道夫垄断。他坚持说，他“生命的火焰”必须保持纯洁，就是说，信奉天主教的他认为不论是男女，要将肉体 and 灵

希特勒传

魂的贞洁保持到结婚，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后代健康。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他会“一连几小时地”谈论“堕落的风俗”。他对于猛烈攻击娼妓，甚至是谴责社会几乎着迷了。在一天晚上，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斯特尔的胳膊说：“咱们必须去看‘罪恶的阴沟’。”他们于是转身沿又窄又黑的施皮特尔伯格街走去。灯火通明的小屋布满街道两旁，里面的姑娘清晰可见。“姑娘们衣着不整并且单薄地坐在屋里，”库比席克回忆说，“涂脂抹粉、梳头、照镜子的同时，她们的目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街上的男人。”偶尔会有男人停在房前，与姑娘聊上一两句，然后，灯火熄灭了。他俩走到了小街尽头，又转过脸来久久地看着这一恐怖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大发议论，“当然话题便是娼妓，客观而冷漠，似乎是与肺癆作斗争，是将之焚毁，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库斯特尔在考试中成绩优异，并且担任期终音乐会指挥，其中演奏了他的三首歌和弦乐六重奏中的两个乐章。在演员休息室里，指挥学校的校长和音乐学院的院长都来向他道贺，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们身旁。

库斯特尔该在7月上旬回林嗣去。他要同父母一起消夏直到秋天，但他仍坚持付一半房租。希特勒只字未提自己的计划；而当库斯特尔立誓要在成为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提琴手以后付一多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早已习惯阿道夫坏脾气的库斯特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视而不见。阿道夫在维斯巴诺夫车站“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独地住在斯通帕加斯该有多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之后，他突然表现异常：他用力握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便一去不回头。

希特勒传

库斯特尔在林嗣给希特勒寄去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希特勒在回信上说：“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凌晨两三点钟入睡是常事。”阿道夫说会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给他写信，还注明要与他姐姐来，他就不去度假了。他指的应该是安吉拉，因为她丈夫与她在他生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两周过去了，库比席克未收到他的片纸只言。7月20日左右，信终于到了。从来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希特勒过着孤单而奇特的生活：

我的朋友：

你或许知道我久未写信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要告诉你些什么，也想不出你会对什么感兴趣。我打算在维也纳常住。查克雷斯在她兄弟家，现在我是孤家寡人，我好像是个隐士，但过得还不错。我只担心一件事：都是查克雷斯太太叫我起床。为工作，我养成早起的习惯，现在我得控制一下自己了。有没有林嗣的消息，写信告之。

他要库斯特尔寄给他一份多瑙河轮船时刻表和林嗣指南。

……否则，任何消息我都不知道，我在今早抓到一长串在“我的”血中游泳而溺水的臭虫，现在的我牙齿“热”得发抖。今年夏天天气冷得出奇。

他这个月就是在那间臭虫遍地、空气沉闷的房子里度过的。8月，他在给库比席克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他的生活枯燥无味。与平常的信一样，满纸的自怜。虽然这信里布满拼写和语法错误，在宽容的库比席克眼中，仍然是一封精致的来信——

希特勒传

“也许在他所有的来信中，这封信的内容最丰富。”来信确实内容丰富，也充满了感情，开始便称：“我的朋友！”他首先为未及时写信而请求库比席克的宽恕。因为他“是有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我没有什么消息可告诉你的。有几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搜集来的消息要告诉你，所以，现在突然给你写信”。他告诉库比席克，房东老太太收到房租后是多么感谢他。希特勒粗枝大叶地将前一封信里他未拼错的她的名字拼成了“查克莱斯”和“查凯斯”。在他刚刚养好了支气管炎后，便开始调侃起天气来：“眼下大雨滂沱，多么好的天气呀！今年天气酷热，这真是感谢上帝。”他还提到林嗣当局决定重修那些破烂的房子而不将剧场重建等，他讽刺道：“河马学会拉小提琴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要去修剧场。”

希特勒还说，他将去希皮塔耳度假，“也许星期六或星期天就动身”。8月底，他已呼吸到乡村新鲜的空气了。此外，没有什么可欣赏的东西。来自约翰娜婶婶的压力迫使他也将维也纳的生活方式加以改变。然而，保拉回忆：“最后一次建议他从政的尝试也是徒劳无功的。”12岁的保拉很反感大哥的劝告，包括给她列的书单。“因为我是她的小妹，所以只能在内心反抗他，不能表现出来。我们兄妹虽然常吵架，但仍然互敬互爱，只是在共同生活时，会破坏掉对方的乐趣。”

手足之情是不会因彼此了解不深或缺少共同爱好而消失的，对于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以及现在的保拉都是如此。那年夏天在希皮塔耳发生的一件不愉快之事结束了希特勒的青春期。他拒绝了家人让他考虑一个较实际的职业的建议，并且与他们断绝了关系。希皮塔耳这个曾为他的童年带来无穷欢乐的地方，便没有了他的立锥之地。这虽然是他第四次去维也纳，

希特勒传

但却是第一次真正主宰自己。

希特勒 9 月中旬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学习美术。然而，这里的人们对希特勒这一年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不屑一顾，连考试他都没资格参加。第二次碰壁的打击，使他不得不面对生存问题。他在斯通帕加斯的房间，也许把他所继承的财产耗尽了。就算他可能分到了母亲的遗产，也不够他在维也纳再生活一年所用。换一间便宜些的房子成为他的一个选择。他在 11 月中旬付清了当月的房租，便退掉了查克雷思的房子，搬进了坐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在费尔伯大街可以俯瞰铁路场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回来稍晚的库比席克连一张条都没有收到。

11 月 18 日，他的新住址在警察局登记在册，职业栏里，他没有填“画家”，只填了“学生”。库比席克随后便赶到维也纳。希特勒曾在希皮塔耳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张明信片，“谨以此信为你的命名日送去最诚挚的祝愿”是惟一的一句话，此后希特勒又杳无音信了，而库比席克已习惯希特勒长时间的沉默。库比席克抵达维也纳时，以为希特勒会出现在月台，但根本没有看到希特勒的身影。检查过沉重的箱子，他便急忙赶到斯通帕加斯 29 号。为什么希特勒搬家时没有留张纸条？他给查克斯太太留下了自己新的地址。数星期过去了，希特勒仍音信全无。库比席克百思不得其解，想想自己不曾得罪过他，分别的时候，他们是好朋友，并且通信中充满了热情。

库比席克再次去林嗣时见了阿道夫的姐姐安吉拉，并且向她询问希特勒新的地址，她无礼地说她没有收到过信，更不知道地址。不仅如此，她还说她弟弟逃避现实，库比席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认为她只会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话。由于他强硬地为朋友辩护致使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而去。

希特勒传

阿道夫割断了与库比席克的联系以及一切会让他联想到家乡及林嗣的事物。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非那样强烈。在希特勒看来，他们的关系至少在目前已告一段落。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并没有像库斯特尔那样取得成功。1909年4月20日，在费尔伯大街那座阴森的大楼里，希特勒孤独地为自己庆祝了20岁生日。他在毫无生气的环境中，继续林嗣那种梦想生活。深居简出的日子在孤独安静中度过。在邻居们眼里，他彬彬有礼，但有些冷漠。邻近饭馆里的掌柜回忆，“因为他的孤僻、安静和其他年轻人不具备的严肃以及对书籍的酷爱”而对他印象深刻且尊敬他，常送给他一大块夹肉煎饼。

夏末，另一个危机摆在了希特勒的面前。每月只有25克朗津贴，他可谓是穷途末路。他又被迫迁至维斯巴诺夫南边塞斯奥塞大街58号一个较小的楼内，他在21号这个小房间里住下。这里并没有先前的住地安静，狭窄的街道车水马龙。希特勒于8月22日在警察局重新登记了地址，职业一栏他填了“作家”。但是，此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在穷困的底层社会隐没。他未留下任何消息，登记表上“将来住址”栏空白；“何时迁出”栏“未定”。身无分文的他又不愿或不能工作，他四处流浪，三个月之内俨然一名流浪汉。门廊下或公园里是他睡觉的地方。多瑙河畔著名的普拉特游乐场一度曾成了他的家。园厅的拱桥成为雨天的住所，外衣成为枕头。那年冬天提前来了。1909年，他不得不在10月底找室内栖身地，酒吧间、储藏室里或价钱低廉的低级客栈，凯撒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埃尔伯格大街一个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一次，他在一个肮脏不堪的劳工营里与其他流浪者共宿。空气的恶臭，孩子们不停地哭闹，以及醉汉打老婆的声音让他夜不能

希特勒传

寐。

他后来写道：“如今，回想起那些可怜的窝、栖身地和避难所，那些恶臭、龌龊的恐怖景象，我依然会全身打颤。”那曾是“‘天方夜谭’里令人销魂的城市”维也纳，而今却变成充满不幸的所在，“我一生中最艰难时刻的鲜活记忆”。他开始向教堂求助，于是，他便加入到每晨9时在离老住所斯通帕加斯很近的修道院门口领汤的队伍里。流浪汉说，这叫“看望卡瑟”。卡瑟也许是修道院长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名字。

深秋已至，衣裳几乎被他变卖干净，连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包括在内。寒冷和大雪迫使他不得不蒙受更大的耻辱。圣诞节前的一个傍晚，他只穿着单衣，匆忙向城郊的梅德林赶去。两个半小时之后，他才艰难地赶到贫民收容所。此时的他难忍双脚的疼痛，筋疲力尽。这家由爱波斯坦家族鼎力资助，由某慈善团体兴建的收容所始建于1870年，后经大力重修，一年前重新开放。流浪的人们只需花点小钱，便有房间可住。凡有能力的住客，仍需做些打扫卫生之类的家务事。在开阔地上，这幢现代化的大楼孤独地耸立着，这里空气充足，房间宽敞，床铺排列有序，金属衣架上刻着床号。饭堂里汤和面包供应充足。气氛融洽，而且工作效率堪称楷模。楼内设有众多一尘不染的洗碗处、淋浴室、厕所。

寒冷的12月，冻得全身打颤的流浪者在收容所大门前排起了长队，希特勒便是其中一员。大门敞开了。列队进入收容所的流浪者被按性别分开，小孩跟随母亲。希特勒被允许在这里的一间大宿舍里住一个星期。在这个独居惯了的年轻人看来，这是多么难受啊。他必须与众人一起淋浴和对那些满是臭虫的衣物消毒，以及必须排队进饭堂盛汤和领面包。

希特勒传

只有那些受过收容所照顾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平日自负的青年第一天来到这里备受耻辱的心情。像这样的收容所，虽然为人们提供避寒之处，可是一旦踏进这个门，便意味着毫无疑问地加入流浪者行列。这里的人们，像犯人一样失去了自由支配自己行动的权利。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新来的人们面对这些顷刻而来的屈辱会不知所措。收容所里的流浪者大都过惯了这种集体生活。老将们在军营式的大宿舍里不停地唠叨。坐在整洁小床上的希特勒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是那么沮丧而忧郁。

睡在旁边小床上的一个叫莱茵霍尔德·汉尼希的流浪者照顾着希特勒。他告诉他，只要花上点钱，买张没有用完的入院卡，便可比规定时间更长地住下去。这个仆人也曾有当画家的梦想。希特勒谈吐的风度和曾在德国柏林度过数年的汉尼希的见识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希特勒如何“观察莱茵河”。他注意到，当希特勒听到“除了上帝，我们德国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怕任何人”这句话时，眼睛似乎有光芒在散射。

汉尼希教育希特勒，要节约每一个步骤，抓住每一个机会。清晨，外衣捉襟见肘，浑身发紫，长着冻疮的阿道夫和汉尼希离开收容所步行至“卡瑟”去喝汤；然后为了躲避严寒，他们会找个温暖的室内或医院呆上数小时，再喝汤，在黄昏收容所开门之际及时赶回。他们会因为在维斯巴诺夫扛行李或为人扫雪挣几文钱而在途中有较长时间的停留。然而，希特勒瘦弱的身体不允许他干太多体力活：每迈一步，他的脚都钻心地疼痛。一次，希特勒想去申请挖沟的差事，但汉尼希及时告诉他打消这个念头。“这等苦工不适合你，你会累趴下的。”

阿道夫想做个乞丐，试试运气。但他不是当乞丐的料，他

希特勒传

的双手根本伸不出去。后来收容所的一名同仁卖些“软心肠者”的地址给希特勒，前提是五五分成。他出去时会带地址以及专门指示。例如，对付索登林碰上的老太太，问候语是“赞美耶稣”，然后告诉她他是失了业的教堂画师或是神像雕刻者。通常她会打发你两克朗，但这句陈词滥调只带给了希特勒麻烦。对于别的，希特勒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只好又一次求助于教堂，因为他可以得到3小块肉饼。希特勒说完“赞美耶稣”的问候语后，修道院院长便给他一克朗，并告诉他可以去找“圣文生协会”。

对于希特勒曾经受过良好教育，且极有天份，现在却流浪这个问题，汉尼希百思不得其解。他问什么是希特勒所等待的，希特勒毫无兴趣地回答说：“我也不清楚。”如此痛苦且令人同情的脸孔是汉尼希前所未见的，他决定尽一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当然，这只是因为现在愁肠百结、骨瘦如柴的希特勒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可成大器，于是他便建议他画明信片赚钱。希特勒和汉尼希商定：由于他衣着破烂，所以由汉尼希去卖他画的明信片，两人五五分成。汉尼希装成癆病患者或瞎子在小酒店里卖，便可省去没有摊贩证会引来警察的麻烦。画具连同衣裳被希特勒一起卖了。汉尼希又为他出谋划策：“这有何难？你不是有亲戚吗？”可是阿道夫连画笔都没了。这并没有难倒汉尼希。汉尼希和西里西亚的一个小贩陪阿道夫一起来到位于梅德林车站对面的阿德伯餐馆。希特勒用一支借来的铅笔，按照汉尼希和小贩的意思，写给家人一张明信片，大概是让约翰娜婶婶用平邮给他寄点钱。

希特勒在几天后便收到一封装有50克朗的支票的信，当晚希特勒喜形于色，在收容所的队伍里炫耀起来。精明的汉尼

希特勒传

希嘱咐他藏好钱，以免遭受“借”债的人的“骚扰”或遭劫。

一件过冬的大衣是咳嗽日益加剧的希特勒所必需的。因为他卖自己的大衣时被骗，于是，他拒绝了朋友的建议而以 12 克朗在政府办的当铺里买了件黑大衣。希特勒坚持要休息一周，才开始作画。另外，在收容所这样的环境里没办法工作。位于多瑙河畔的曼纳海姆有座单身汉公寓，房子虽小，但设备较好，可以每人一间，还有供大家从事自己爱好的公共房间。

希特勒长途跋涉，穿越维也纳市中心，于 1910 年 2 月 9 日来到公寓。汉尼希宁愿当他人的侍者也不想做希特勒的仆人，所以他并未一同到此。这个区叫布里吉特瑙，是维也纳的第 20 区，也是工业区，犹太人数量仅在利奥波德区之下，居民混杂，它又是过路区，并且成为居民们向上爬的落脚点。曼纳海姆的这座公寓大楼可容纳 500 名单身汉，距多瑙河约半英里，坐落在梅尔德曼大街 25 - 27 号。

这座建成不到五年有较好的设备的现代化建筑，让某些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为之惊叹。位于主楼内的大型餐厅灯火辉煌；用绿瓷砖砌的墙围，令人温暖。柜台上摆满食物，只需将餐券塞入自动机即可，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设备。食物可算物美价廉，只需 23 个铜币便可饱餐一顿带有蔬菜加烤肉的食物。

那些付不起饭钱的客人可免费在隔离房间“用最好的厨具”烹煮自备的饭菜，这样的煤气炉有十多个。人们最喜欢用无肉或有肉的马铃薯饼作为主食。大家各尽所能，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有个摆着十多张阅览台的阅览室设在离厨房只有三步楼梯远的地方，这里有众多娱乐室、阅览室，一个图书馆和一间能

希特勒传

同时容纳十多个人使之同时从事自己事业的“写作”室：硬纸板被一个匈牙利人切成明信片，准备到游艺场的酒厅里出售；一个老人正在抄录刊登在报纸上的订婚夫妇的姓名出售给商店。

宿舍有数座，整洁程度不亚于收容所。几乎所有的单身汉都喜欢独居。这里的单人房间宽 5 英尺，长约 7 英尺，衣架、小桌、夜壶、镜子和一张很窄的小铁床，便将小房挤满了。床垫被分成三段，枕头是马棕充填的，还有两张毯子、一周两换的床单——在每位居住在此的下层人看来，这简直是奇迹。这些小房充满了生气，有窗户以及足够的人工照明。洗碗台、洗手间和洗脚槽每层都拥有许多；十多个淋浴室被安排在地下室。理发馆、裁缝店、洗衣间和补鞋铺应有尽有。此外，还为需要存放衣物的住客设有一长排干净的物品箱。

以严明著称的公寓总管要求住客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白天不得入室；娱乐室只允许玩跳棋、骨牌和象棋；大声吵闹或喧哗者，不管是欢笑还是争论，只要声音过大者均有被开除的可能；公寓内禁止一切烈性酒，但饮葡萄酒和啤酒是被允许的；不得破坏市府财产。公寓的住客们很少有违纪的，他们均为有朝一日重新受人尊敬而真诚地努力工作。

1910 年 2 月，阿道夫·希特勒来到这座流浪者乐园。他在付过钱并经淋浴、消毒后便住了进来。这个不太正规的慈善机关比起设备也不错的收容所，更让他感到自由。

不到一周，当了几天仆人的汉尼希也来到了曼纳海姆。他又开始照顾起希特勒，带着作画的各种原料在“写作”室内找了个靠窗子的长台让他坐下。很快，与明信片差不多大的画儿便从希特勒笔下诞生了。他用心地临摹着照片或画中的维也纳

希特勒传

市景。在游艺场的酒吧里，汉尼希轻易地就将画卖了出去，二人五五分成。很快他发现大画可以卖更高的价钱。希特勒于是使用水彩描绘维也纳景色，每天画一幅约等于两张明信片大的画。

两人共同的劳动果实加上曼纳海姆较舒适的环境，这两位青年获得了新生，不再受穷困和寒冷的折磨，不再忍饥挨饿地入睡。因为可在用瓷砖砌的淋浴室里洗澡，希特勒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会每隔几天便在洗澡时洗他仅有的一件衬衣。他现在的钱还不够买衣裳的，他穿的仍然是粘有消毒剂的旧衣，再加上胡子和长发，他看上去并不体面。

他对政治产生的兴趣来自食物和温暖。“写作”室变成他的演讲或争论所。曼纳海姆那些对音乐、文学和艺术略知一二的高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经常在这里聚会。阿道夫又成了他们的领袖，他滔滔不绝地抨击政治腐败，和世界各地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们一样。有时在工作日里也会有这些演讲。倘若公寓另一尽头的房内发生政治争论，还在工作的希特勒会如同一个武士一样挥武着丁字尺或画笔响应着战斗号召前来参战。汉尼希便将希特勒缴械且好言相劝使之回到小屋。然而，汉尼希一离开，阿道夫便又大声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罪行，或称赞由于对群众的兴趣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汉尼希回忆说：“只要一激动，希特勒便不能控制自己，他会大声叫喊，坐立不安，手舞足蹈。但是，安静下来的他如同换了一个人，很能节制自己，举止威严。”

对政治有浓厚兴趣的他在“众议院”里一待就是数小时。那些五花八门的辩论听得他如痴如醉，虽然这些辩论时常成为多种语言混杂的声音，甚至叫骂声。他会在此时独自回房，接

希特勒传

着便大喊大叫——他的自言自语，是泛德主义与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无神论以及谴责他们攻击国家、企图夺取政权的大杂烩。

无论是私下里，还是在暴风雨式的公开辩论中，希特勒从未攻击过犹太人。汉尼希坚信希特勒绝不会反犹太人。相反，阿道夫感激犹太人的慈善事业，钦敬犹太人的反迫害行动，否认犹太资本家为高利贷者。汉尼希只听说过一次希特勒诽谤犹太人。当时有人提出为何犹太人不被这个国家真正接纳。希特勒答道，他们屈服于另一个种族，有“另一种味道”。

他在曼纳海姆结识了两位犹太知己——一个常帮助他的独眼锁匠，叫鲁宾逊；另一个是名叫约瑟夫·纽曼的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此人同情衣着褴褛的希特勒，并将一件长大衣送给他。希特勒很尊敬纽曼，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他也非常尊重为他销售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曾多次告诉汉尼希，他“宁愿与愿意冒风险的犹太人做生意”。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这样写道，他后来死心塌地地反犹是因为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寡廉鲜耻，冷酷无情，一毛不拔的皮条客”，犹太人完全控制了音乐和艺术领域，关键是，犹太人统治了社会民主党报，这些说法出现于后来的可能性极大，而当时他的偏见并不比其他维也纳人多。在维也纳，几乎所有异教徒都是反犹的，人们组织起来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而青年希特勒贪婪地读着那些充斥书籍市场的毫无价值的书刊。

希特勒被证明经常阅读由林嗣的神秘理论家冯·利本弗尔斯创办的杂志《东方天坛星》，其态度和理论与希特勒本人颇为相似。这本杂志用色情和神学体现其“实践人种研究理论，

保持种族纯洁来维护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更好地发展”的办刊主旨。利本弗尔斯大肆宣扬通过黑人与混种人灭绝政策，让雅利安人成为世界统治者。但《东方天坛星》充满了雅利安妇女屈从于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的牲畜的性能力和引诱的淫猥画面。这份宣称种族优越的杂志也显出几分恐惧。这里曾刊登过这样的大字标题：

金发碧眼白皮肤的你，是文明的创造者、支持者！

金发碧眼白皮肤的你正处于危险之中。

《东方天坛星》竭力地煽动读者对犹太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将金钱牢固地控制，他们在戏剧界、艺术界的发达，以及他们对妇女强烈的吸引力。阿道夫对刊登在《东方天坛星》里的碧眼金发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照片火冒三丈。但希特勒在此时尚未实现这些想法和形成观点——随着新想法和项目的推进，他的反犹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弱。

希特勒曾告诉汉夫施坦格尔太太，他恨犹太人完全是个人行为；他告诉妹妹保拉，他坚信，就是因为犹太人掌握了艺术品的买卖，使得他在绘画方面没有成功。对希特勒所说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恨犹太人源于“私事”，我们只能猜测：“私事”的含义也许是艺术品商人、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某一官员或事物的某种综合体，甚至他心灵深处隐藏的某件事情。也许布洛克医生让他的仇恨产生了萌芽——克拉拉去世一年后，他寄去的贺年卡还用“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签名。由于失去了亲人而埋怨医生是司空见惯的，更何况又涉及到医生的种族和对危险治疗方法的争议——理由更加充足。

希特勒传

在维也纳，这个还略显青涩的希特勒曾在致一友人的信中透露了这种深藏的恐惧对肉体的影响以及他对医生的厌恶，对自己命运的感叹：“……我会设法用忌口的方法来治疗胃气痛，反正医生都是笨蛋。说我神经系统不正常，简直是荒唐，在其他方面我是如此的健康。无论怎样，我拿起画笔享受着绘画的无穷乐趣，虽然油画艺术对我而言仍是困难的。”

“不夸张地说，我未能去艺术学院学画，是世界的重大损失。或许我干别的是命中注定的？”

希特勒在 1910 年春已非常关心世界形势和政治，汉尼希的订货他已无法完成。面对斥责，他会保证多下功夫，然而汉尼希一离开，他又置身于各种报刊中。对某项问题的争论，也会使他无法再去画那些已厌烦的画了。绝望中的希特勒为摆脱汉尼希的纠缠，刚到夏季，便与纽曼这个匈牙利人、犹太朋友一同出走了。他俩曾讨论到德国定居，所以便决定一起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了。然而，维也纳那些奇观特别是阿道夫最衷爱的博物馆终于留住了他，他甚至根本就未离开。6 月 26 日，寻欢作乐了 5 天的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重新回到曼纳海姆。然而，这短暂的自由却也让他拚命工作，挣来了仅能维持一周生活的收入。不久，他和汉尼希散伙。他又一次独立了。

希特勒于同年秋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学习。他带着作品，找到了霍夫博物院专门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里切尔教授，以期得到他的帮助。希特勒的作品未能打动教授，即使从建筑学角度看很精准。阿道夫失望地回到曼纳海姆，他在书屋继续作画。然而，解除与汉尼希的约定令他出售无门。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求助于约翰娜婶婶——写信并亲身前往希皮塔耳。他们曾经在激烈的争吵中彼此伤害；奄奄一息的婶婶对侄

希特勒传

儿的态度有所改观并心存愧疚。1910 年底，她提取全部的 3500 克朗存款，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几个月后，她与世长辞，没有遗嘱。安吉拉得悉哥哥得到大部分遗产时，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将阿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的申诉，这要求并不过分，她是个新寡，要抚养自己的子女和保拉。由于耻辱或压力，阿道夫同意将数年来他用以糊口的每月 25 克朗的津贴转给妹妹。他自动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声明现在“自己已自食其力”，“愿意把津贴转给妹妹使用”。法庭很快宣判了。此前，希特勒写信给保拉的监护人梅洛福先生时，就表明了他的意愿。

希特勒没有津贴也同样过着安稳的生活。希特勒生活一如既往，吃自己烧的饭，穿破衣裳——与管理员的关系也不好。希特勒从他婶婶那里得来的钱可能全花费在剧场里，也可能蚀在他的同伴们所设定的圈套里——不怎么合法的或一些非法的勾当非常活跃；或像过去那样，傻头傻脑地在他人面前炫耀，引狼入室。更有可能他将钱藏在别处，随用随取。这是艺术家或作家们为了维持生计常用的办法。

阿道夫有了钱后，便在房间里发奋作画。同伴们关注他了，他的钱让他具有了一股艺术家的风度。他常帮助工人，提出忠告，但不求与人相熟。然而，只要谈及政治，他便激动起来，慷慨陈词，手舞足蹈，甚至得意忘形。由于他乐此不疲，在住客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一天，他在厨房弄火了两个搬运工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希特勒口没遮拦地“污辱社会民主党”，他被人痛打一顿，鼻青脸肿，手上也留了一块伤疤。

继库比席克和汉尼希后结交的一位新朋友约瑟夫·格莱纳警告他：“你不听忠告，活该挨打，没有人能帮你。”几个月

希特勒传

前，约瑟夫·格莱纳被希特勒吸引住了，他弯腰曲背在画一幅教堂的水彩画。格莱纳的想像力十分丰富，常与希特勒谈论经济、宗教、天文学和神学。他们还长篇大论地讨论如何受欺骗。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报上的广告。画的是一个女人，其长发垂地。该广告说：“本人有着莱茵河仙子式的长发，名叫安娜·西拉希。美发从何而来？原因是我使用了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将免费得到一份相关资料，只要给安娜·西拉希去信。”

“这就是有效广告，”希特勒说——据格莱纳说，“宣传，是人们的胡诌。”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假的都说成真的，颠倒黑白。他相信，也知道能使最荒谬的东西，例如保证使窗户打不破的膏药卖出去。“宣传，只要宣传。会有很多蠢人的。”

在1911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专注于他的画，自然画越画越好。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十分不错，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某种角度上，他的画已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平——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未经过正式的绘画训练。希特勒擅长于画建筑物而非人物。画中若有人物，则会影响效果，且比例非常不合。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没有艺术创新。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只是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适合当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或更像是个建筑师，而不是画家。到1912年，他已掌握了铅笔画、水彩画、油画。

他执着地工作着，作品经雅各布·阿尔登伯格等画商行销。希特勒本人也不再吹嘘自己是个天才了。同伴们在他房内聚集

希特勒传

赞赏他的作品时，他常常轻蔑地说，他是在绘画的门外游荡的人。他认为，他在建筑方面有极大的天赋。后来，他私下告诉友人，作画是他的谋生手段，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主题都是建筑。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着装也有所改观，衣着虽旧，但干净利索，剃掉了胡子。人们开始尊敬他，连曼纳海姆主管也常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难得的荣幸”。

他的举止也变得端庄。他仍爱争论政治，但得了深刻教训，“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发现，控制人心的方法不是树敌。

书房最能显示希特勒的成熟程度。因为受崇敬，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没有人去占。偶有几个新客来坐，有人便会说：“请换个位子，那是希特勒先生的。”新客卡尔·霍尼希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我们在那些日子里都糊里糊涂的……希特勒是我们中间惟一的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前程的人。”他对霍尼希说过，他虽遭到美术学院的拒绝，但不久他要去慕尼黑完成学业。

希特勒是书房中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毫无例外地坐在位子上，日复一日。只有送画时他才短暂地离开。他性格古怪。总之，希特勒待人和善，很可爱，怀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与人相处和睦，霍尼希与他还是存在距离的。没有人敢占希特勒的便宜。其实，希特勒本人并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好，乐于助人。他会慷慨解囊，帮助那些需要 50 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的人。”

遇到一般的政治辩论，希特勒会继续作画，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不过，一旦出现“耶稣会会员”、“赤色分子”等字眼，或某人的言论“惹了他”，他便唰地站起来争辩，“非常激

希特勒传

动，甚至语言粗鲁”。然后，他一挥手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似乎在说，“你永远不会懂的，真遗憾，所以我只是对牛弹琴。”

希特勒在某种意义上已融入了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他已有了成绩，并且得到了认可。至此，维也纳已不能让他满足。他的思想于近几月已转向他的“祖国”德国。在他床头的镜框中这样写道：

我们光明正大和自由，我们坚定，
祖国在上！祖国万岁！

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迷人首都度过了五年半。维也纳的五年半生活让他爱恨交加。可以用“在维也纳受苦与学习的岁月”来为他生活中的这一章命名，这是“苦难”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日子”，也是他定型的时期，胜过了所有的大学。他认为“是我人生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希特勒于1913年5月24日身背盛着全部家当的破口袋，永远地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这样回忆，大家为他的离开难过。“我们的好同伴走了。他理解所有的人，乐于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维也纳，满怀希望前往慕尼黑。“初到维也纳，我还是个毛头小子，离开时我变得成熟稳重、冷静严肃。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在那里初步形成。我一直坚信不疑，不断丰富完善。”

希特勒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的单身汉公寓。那儿一度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汉尼希对希特勒当时离开维也纳的情景，

希特勒传

记忆犹新。他目送着希特勒与约瑟夫·纽曼——汉尼希不能肯定是他的名字——渐行渐远，忍不住悲从中来。如果同行的的确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那末，这是绝大的讽刺。

第三章 “欣喜若狂”

1913.5—1918.12

1

阿道夫·希特勒下了火车，沿着楼梯走进了慕尼黑喧嚣的霍班霍夫区。一开始便让他着迷，连城区人们说话的声音都与维也纳多种语言混杂的噪音不同，而是和谐悦耳的。“我对这城市有种归属感，好像我曾久居于此。”

那时正值春天，阳光明媚，空气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洗涤过，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5月25日正是星期天。街上行人很少，雕像和楼宇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个城市的那一刻起，便对这个城市产生了爱慕之情，远远超过其他城市。这个城市属于德国。”

如醉如痴地在街上漫步了半小时后，他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也许刚刚穿过科尼斯广场。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和远处的广场令他惊诧万分。之后，他也许沿着布林恩纳大街来到那座城堡似的巍峨的罗仑酿酒厂。这里位于学生区边缘的施霍宾区，施莱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经过两幢房子，他便来到34号波普缝衣铺。一张手写的告示被贴在该店的窗口“出租房屋，家俱齐全，要求房客人品端正。”

希特勒传

按照这张告示的指引，希特勒来到三楼。波普太太引他到房内，里面有一张床，还有桌子、椅子、沙发。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的石板画。“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波普太太这样回忆，“他说这房子很合他意，就付了定金。”他还填了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来自维也纳的建筑画师。”

“第二天的上午，希特勒先生便离开了。很快拿回一个他在某地拣来的画架，便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数小时。几天后，我便见他完成了两幅很漂亮的画，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我的房客经常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踌躇满志地到慕尼黑求学。但是，他未能如愿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建筑。这里和维也纳比起来更难以以绘画为职业，商业化的市场并没有提供更大的机遇，而他被迫走街串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但他坚信，纵然有重重困难，他终将“完成自己的梦想”。

慕尼黑在1913年时拥有60万人口。多年来它是欧洲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的文化中心。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希特勒发现这些人都是腐朽庸俗之辈：瑞士人保罗·克里，以及像佐仑斯基坎丁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一样从东方逃难而来的那些人。他们领导着“新画家协会”，协会创立于4年前，目的在于让成员获得更多的自由。属古典派的希特勒与新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为慕尼黑在艺术上带来了活力和生气。这也必然刺激了青年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从巴尔干半岛和东方的俄国逃难而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如潮水般地涌进北区施霍宾，那里街道笔直……也许是为了让更多的画室内充满阳光。”虽然希特勒瞧不起这些东方难民，但身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同样需要他们的传

希特勒传

统和自由。他的偶像在这里曾创作出《诗歌会》、《崔斯坦和易梭德》、《莱茵河之金》；雷纳·玛丽亚斯特潘·乔治里尔克等著名的德国诗人避住于此；理查·施特劳斯正在这里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的小说《威尼斯之死》刚刚完成不久，而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几乎一样空荡的室内，奥斯瓦尔德·史宾格勒正疾书《西方的衰落》的首卷。在附近的“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声名狼藉的天才《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他创作的关于堕落性和性生活的话剧，令全国的观众作呕同时着迷。

最荒唐、最可憎的政治和文艺理论，以及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精神，于本世纪初在慕尼黑共存，并吸引了全世界具有创新意识的人们。另一位政治极端者居住在106号，距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他流放俄国归来，居住于此已年余。他以梅耳先生登记，列宁则是他在搞地下活动时的名字。他10多年前曾在这里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出入施霍宾的饭店和咖啡馆，而且贪婪地呼吸着思想自由的空气。他暴躁的神情和叛逆的天性并不可怕。他充其量是另一个怪人。尽管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与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他的画风却始终如一，与他的激进的政治观点与烈火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他学院式的手法不带有试验性质，但很大胆，且刚劲有力。

这个地域如此富饶，实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他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数钟头，凡是关于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均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于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着弄清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对比它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事件与现实的各类现象。我现在破天荒首次集中

注意力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的他常一只胳膊夹着一二本书，另一只胳膊夹着白面包和香肠，迅速沿楼梯回到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回忆，罗文布洛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已经看不见他就餐的身影。他曾几次想请他吃顿便饭，都被拒绝了。在波普太太看来，他是个“很迷人的奥地利人”，“是个待人和气乐于助人又有点神秘的青年。他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他常常数天都不离家半步”。“他闷在房中像个隐士，一整天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热心的房东太太请他上她厨房进餐的邀请。一次，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的关系。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我们不知道在生活上会遇到什么，也不会知道什么可以用上。”学习之余，他常去咖啡馆或啤酒馆。在那里，听他高谈阔论的听众为数不少。但是，他一阐述观点，便马上有人反对，由此引发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在与对手们的辩论中，希特勒的理论和思想变得更加锋利。

在冬天买画的顾客更是少得可怜，这又给希特勒带来了困难，但在他生平“这也是他最心满意足最幸福的时期”。在艰苦的环境下，维也纳会让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拥有魔术般的引诱力。“如果在今天说，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慕尼黑让我热爱有加的话，”希特勒 11 年后在监狱里回忆说，“也许因为，它过去和现在都同我开拓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那时我获得了满意的幸福，也是因为这个居住着维特斯巴赫人的地方对每个斤斤计较且多情的人身上所产生的魔力。”

希特勒虽然艰苦却也有回报的生活于 1914 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突然受到了威胁。1 月 18 日下午 3 时 30 分，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希特勒发现慕尼黑警察局一个神情严峻的刑

希特勒传

警站在门口。名叫赫尔勒的刑警出示了一份奥地利的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1914年1月20日前往林嗣卡瑟琳·伊丽莎白30号码头报到入伍”。不按时报到的下场，是他可能受到罚款或起诉。甚至如当局认为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的罚款数额将增加，或许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感慨万千。他曾在3年前还住在曼纳海姆时就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没有回音。刑警赫尔勒要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意乱心烦，颤抖着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刑警赫尔勒之后将他押回总部。次日清晨，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的他得到了警方的同情。希特勒当时的处境显而易见。这个衣着褴褛、面黄饥瘦的青年画家得到了总领事的怜惜，他被允许至电林嗣，要求延迟入伍时间至2月初。林嗣于次日回电：“1月20日务必报到。”因为1月20日即为当天，加上同情希特勒之惊慌，总领事先生允许他用书信方式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的请求饶恕信——它将这个走投无路的青年的惊慌和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解释，“十万火急”的传票令他已无暇处理私事，例如洗澡。

我在传票中被认为是画家。我得到这个头衔不为过，但只在某些意义上此说法才正确。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本人的确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我卖画是为了继续学习。本人是个仍处在训练阶段的建筑画师，因此，我只能用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甚微的收入，仅能收支相抵。

他没有固定的月收入，眼下又因为慕尼黑书画市场“正在

希特勒传

冬眠，僧多粥少”而收入微薄。他说，他早在 1910 年就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将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描绘一番。

年轻的我那时缺乏经验，又没有经济援助，而我自尊心极强，不愿行乞或向人开口求助，孤立无援，用自食其力所得的几文钱夜求一宿。那两年，“需要”和“忧愁”是我惟一的女友，除了饥肠外，我别无同伴。我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5 年后的今天，长满冻疮的手背、手指和脚仍然充斥着我的记忆。然而，困苦中也多少有点喜悦，因为最困难的时刻我已度过了。虽然我穷困不堪，周围也无人可以信任，但我洁白无瑕的名声没有被玷污，在法律面前我也清白。除未按时服役，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按时之原因本人则一无所知。我的责任仅此一项。小额罚款应该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

他软弱无力的托辞，成功地获得了总领事的同情。总领事于是写了一封便笺——该便笺写道，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慕尼黑警方与总领事均可证明，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由于希特勒的特殊情况，总领事建议他前往萨尔茨堡报到，可免去旅途劳顿。得到林嗣当局同意后，2 月 5 日，希特勒带着领事馆出的路费，前往萨尔茨堡。当局认为希特勒“身体极为瘦弱，不适宜执行辅助兵役或战斗”。他瘦弱的体格不能达到服役标准。

于是阿道夫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继续以出售画作和绘制招贴画为生。然而，使他苦苦支撑的成为建筑师和画家的希望

希特勒传

终于在6月28日破灭了。房间里的他忽听街道上人声鼎沸，连忙下楼去看发生了什么。途中，波普太太大声疾呼：“奥地利未来的国王，弗朗兹·斐迪南大公遭人暗杀！”希特勒拨开她，冲向大街，挤进人群。街上的一块写着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林西普的木牌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这又唤醒了早年希特勒在维也纳首次询访下议院时就发生了的对斯拉夫人的一切的根深蒂固的仇恨。

愤怒的人潮在维也纳已开始向塞尔维亚租界涌去。一部分政界要人感到，这场悲剧将成为欧洲一种危机的导火索。然而，德皇却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压，要他们进攻塞尔维亚。德国已完成备战，他告诉他们，俄国将首先援救塞尔维亚，但它却未准备好。迫于这种压力，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反对奥地利的全国总动员开始了。威廉于是便站在皇宫阳台宣布“战争迫在眉睫”。接着他又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次日中午前俄国必须停止反奥的总动员。8月1日下午5时，德皇在没得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便签署了反俄总动员令。

在慕尼黑，聚集在野战军将军大楼前的人群听见向俄国宣战的消息，兴高采烈。没有戴帽，穿着整齐，留着小胡子的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正在人群前边站着。他对战争的希望超过了任何人。“即使在现在，”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也毫不夸张地说，我欢喜若狂地跪在地上，衷心感谢上苍的赐福。”这对他意味着自幼所怀有的建立大德国的夙愿已实现。

整个德国都处在对战争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是非理性的，纯系感情使然，人们已处于崩溃边缘，急于求得正义，不

希特勒传

惜任何代价。战争被人们看作某种魔术表演。在街上游荡的学生们，高唱《莱茵河的卫士》，高呼要采取行动。一群人将卡尔斯广场的“法利希”咖啡馆夷为平地，因为乐队拒绝反复演奏国歌。知识分子一样兴高采烈，因为它意味人们可跳出厌烦，以及资产阶级虚伪的终结。人们将被战争从文化和社会的弊端中解放出来。连数月前被威廉辱骂为“帝国橡树”之蛀虫的社会主义者也毅然接受了德国的邀请，成为爱国十字军的一员。

泛德主义者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运动的领导者正式地这样宣称：“Heev 万岁！”“德皇万岁！”“我们必须将德语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一个帝国。这样，指导全人类进步的将永远是这个最优秀的民族！”这简直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认为霍亨佐伦王室是中世纪曾在东部斯拉夫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继承人。他由此深信，德国的确要为生存，为“未来和自由”而战。

两天后，也就是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的第二天，希特勒亲自递交了一份请愿书给路德维希三世，请求参军。希特勒当日下午便处于在惠特尔巴赫宫前向这位年迈的君主欢呼的人群中。路德维希终于出来演讲，希特勒暗自思忖：“但愿国王看到了我的请愿书，并批准我入伍！”他于次日收到了回信，“双手发抖”着拆信，他被接纳入伍，成为志愿兵。他于8月16日到巴伐利亚国王近卫兵团的兵营报到，这是希特勒的第一选择。兵营外的牌子上说，该团已满员；但他终于被他的第二选择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接收。

他最需解决的两个问题没有了：第一，他不用加入所憎恨的奥地利陆军；第二，第二个冬天他得到了保障。他找到了一

希特勒传

个可丰衣足食的家，也有了生活目的。他不用再去怀疑了；他生平首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穿上了军装，在参战前战争便结束是惟一让他不安的。

他在几天后被调往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基本的训练在伊丽莎白广场的一间大型公共学校里开始了。训练时间短，课目紧，进行了队列操练以及拼刺刀训练。一天下来，新兵们精疲力尽。希特勒在一个星期后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亚第十六步兵团，在慕尼黑继续受训，课目训练更加紧张。一个名叫汉斯·孟德的同伴发现希特勒首次摆弄步枪时，“如同女人观赏心爱的首饰，兴奋地来回看，使我忍俊不已”。

2

希特勒于 10 月 7 日告诉波普夫妇，他要和部队一起离开慕尼黑，并紧握着波普先生的手请求，万一他战死，请务必写信通知他妹妹领取遗物。如果她不要，这些遗物就送给波普夫妇。波普太太在两个孩子与希特勒拥抱告别时，不禁失声痛哭。拥抱后，希特勒转身便跑了。第十六步兵团于次日开进国王近卫兵团，并且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士兵们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宣誓效忠于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其他奥地利籍士兵亦向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据惟一记载称，他曾告诉同志们，10 月 8 日这天将永存于他的记忆，因为这天，他们领到了双饷，以及吃到了一顿土豆沙拉和烤猪肉的特别午餐。

十六步兵团于次日清晨离开慕尼黑，走了约 40 英里来到勒希菲尔德兵营。士兵们艰难地在滂沱大雨中背着背包行军

希特勒传

11个钟头。“我住在马房，”他在信中告诉波普太太，“全身湿透了，无法入眠。”次日是星期天，他们进行3小时的急行军，露营野外。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寒冷的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虽然士兵们“累得要死，可能随时倒地”，但还是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从一群法国战俘面前走过。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是在兵营的前五天，因为长时间的训练，以及为配合旅部训练的夜行军，第十六步兵团将和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旅。这一切行动都成为合并的一部分。由于新兵训练很紧，直到10月20日希特勒才抽出时间给波普太太写信。他在信中写道，他们将于当晚开赴前线，“我是如此兴奋”。“一到目的地，我会立即写信，告诉您地址。要是去英国就好了。”新兵们当晚上了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也从此开始了他为德国而战的生涯。

当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们上火车时，旅部的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副官——职业军人——见此情景，不禁感慨万千。该团的团长已离役多年，后备役军官成了各连的指挥，而士兵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团里机枪寥寥无几，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制造的，许多士兵甚至连钢盔都没有，如同1812—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他们带油布帽开赴前线作战，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训练与装备之短缺。每列火车都伴着士兵们又唱又笑的景象出站，有如去参加盛大晚会。令人激动而英勇的战斗将进行数周，在元旦前取得胜利。

希特勒所乘的火车在拂晓时分正沿莱茵河奔驰。巴伐利亚兵有很多未曾见过莱茵河。晨雾中朝阳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象征日耳曼帝国的巨大雕像映入人们眼帘。火车上的所有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我只觉得心快跳出胸膛

希特勒传

了”，希特勒这样回忆。

希特勒所在连队于八天后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士兵们冒着晨雾以及比利时军和英军的炮火去解救受困部队。“一阵阵炮弹此时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边开花，树木像稻草似的倒下去。”希特勒写信告诉慕尼黑的一位助理法官恩斯特·赫普，“我们很好奇。我们此时尚不知有何危险，所以谁也不害怕。大家等待着‘冲锋’命令，如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匍匐着来到林子的边沿。头上的炮弹呼啸而过；四周的树木东倒西歪。林子边沿又有炮弹爆炸了，顿时硝烟弥漫，泥块横飞，大树也被整根拔起。我们不能趴在这儿等死，要死也要死在外边。”终于德国人反攻了。“我们四次冲锋，都失败了；我们这群士兵，我是惟一幸存者，我的右袖被一颗子弹打穿了，我却奇迹般地安然无恙。我们在第五次出击时，占领了农庄和林子的边沿。”

在三天的战斗中，团长牺牲，中校副团长身受重伤。希特勒已任团部通讯员。在猛烈的炮火中，他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一起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希特勒回忆，第十六步兵团到

存，但仍不断接到进攻命令。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视察前沿敌人阵地时，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两人奋力将团长推进沟内。恩格尔哈特默默地热烈与两人握手。团长要将铁十字勋章授予两人，但到了他于次日下午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团部的帐篷被一颗英军炮弹打中，有3人当场毙命，团长和其他人身受重伤。因为有4个连长缺席，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被迫就在几分钟前离开帐篷去找他们。从此希特勒开始了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遭遇。

希特勒传

“那是我一生中最惊险的时刻，”他写信告诉赫普法官，“恩格尔哈特中校被我们像神一样信奉。”

德军成功占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一段落，战斗转向阵地战。这样，团部工作人员相对安静了。团部此时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安全区，希特勒获得了作画时间。希特勒用随身携带的画具，完成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以梅辛纳斯村附近的颓垣断瓦和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为主题的画。新的团长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为一军官餐室画画。该餐室原来的那幅画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在铁丝网上横卧，显得与餐室格格不入。梅克斯·阿曼中士被魏德曼派去从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会油漆的人来。阿曼把希特勒带回来了。关于房子是涂成蓝色还是粉红色，魏德曼有些举棋不定。希特勒观察到阳光使房子呈淡红，于是便建议选用蓝色。他找来梯子、刷子以及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攀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很严肃，不像军人，带一点奥地利口音。他的生活经历无疑很丰富。”

阿曼中士和魏德曼上尉列出了应获勋章人员的清单。他们建议将一等铁十字勋章授予希特勒。他是团部人员，名字被列在最后。因此，希特勒最后只得了一枚二级勋章。但是希特勒仍高兴得无与伦比，两天后致信波普夫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大多获勋章的同志牺牲了。”他让波普保存下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假如我没有战死，我要留它们作纪念。”被晋升为班长后，他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并且得到了官兵们的尊敬。

列兵汉斯·孟德自在慕尼黑入伍以来就未见过希特勒。希特勒在慕尼黑时身体似乎瘦弱得连背包都背不动，现在，他头

希特勒传

上歪戴着钢盔，手持步枪，垂着八字胡，眼中“放射出的光芒生气勃勃”，四处漫步，俨然一位前线战士。他的无畏让其他通信兵深表尊敬，但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如此冒险究竟为了什么。“他这人真怪，”有人对孟德说，“自娱自乐。在别的方面他还不错。”

尽管他不停地告诫同志们喝酒、抽烟是恶习，他还是博得众人喜欢，每逢危险时仍值得信任。他从不丢下伤兵，也不会遇有危险的任务时装病。他又是乏味而漫长的战斗间隙中的好伙伴。出身画家使他与士兵们关系更加亲近。他将生活中的笑料画成漫画。有一次，有个士兵准备休假时将打死的兔子带回家，人家把兔子偷换了，所以他带走的是一块砖。希特勒将一张明信片寄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正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一幅是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未像别人一样从家中带来罐头等东西。为了让他旺盛的食欲得到满足，他不得不向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成了全团最大的“老饕”。他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因为他无从报答，所以常拒绝别人的好意。魏德曼中尉要将他在圣诞节的伙食费抽出 10 马克给希特勒，被希特勒当场谢绝。

休假结束，全团重新开赴战场，但打仗不能满足希特勒。“我们仍在以前的阵地上，只能袭击英军和法军。”1915 年 1 月 22 日，他写信告诉波普：“天气很糟，常常一连几天都是上面是敌人的重炮火力，下面是齐膝深的水。我们盼望能喘息几天，并希望在数天内发动全线总攻。事情要有所改变。”

僵持时刻，一条小白狗为追兔子跳进希特勒的战壕，被他抓住。那条白狗开始时老想逃跑。“我以无限的耐心对它，令

它逐渐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叫它“小狐狸”，并教它爬梯子之类的本事。白天，“小狐狸”与他形影不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希特勒于1月底又致信波普，生动地描述了对峙，然后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连连，又是地势低的海边，此地的田野和草地简直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稠的泥浆。步兵的掩体、战壕、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狼窝”、铁丝网、地雷阵等等，都在这样的泥潭里设置。这真是个形态怪异的阵地。

他在2月给赫普法官写信，描述了他战斗的经历。他在信的末尾谈到了政治，确实让人有些奇怪：

我常想起慕尼黑。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与这伙强盗算帐，不惜任何代价，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的幸存者回家时，能看到更加纯洁的家园，并消除了外国的影响。这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忍受痛苦和牺牲，以及为了反抗国际敌人，这里日日血流成河，不但消灭了德国的外侮，且能打破国内的国际主义。

每当人们问他来自何方时，希特勒的回答总是十六团，而不是奥地利，慕尼黑将是他战后的家。然而，这一切都是以赢得战争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他有些疯狂；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必将失败，他便疯狂起来，来回在室内踱步，说德国必

希特勒传

将成功，如同“祷告时说阿门”一样。

他在同志们谈论女人或食物时，专心致志地作画或读书，但是，他会在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时大发议论。他那些头脑简单的同志们，为他滔滔不绝的议论而目瞪口呆。他们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议论建筑、艺术等等。由于“他眼前常有一本摊开的书”，加强了人们对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他背包中常放几本书，其中一本为叔本华所写。这位哲学家强调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必胜的信念，无疑在他脑中引起了反响。

希特勒到 1915 年夏末已成了团部重要的人物，由于连接各营各连指挥所的电话线常被炮火破坏，通讯只得依赖通讯员。“我们很快发现了，”魏德曼中尉回忆道，“谁是最可靠的通讯员。”其他通讯员崇拜希特勒的不平凡的勇气和机智，他就像他小时候书上写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希特勒身上的某些东西使士兵不安。他的责任感重得有些与众不同。“和把信送到目的地比起来，”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讯员说，“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就没那么重要了。”他常不请自来，送其他通讯员的信。

战斗的速度在 6、7 月间加快了，送信任务更加频繁，以至于希特勒的脸变得消瘦而蜡黄。每当英军在天不亮开始炮击时，他总是一跃而起，拿着步枪，在室内快速地来回踱步，“像准备出发的赛马一样”，直到吵醒所有人。他变得更加讨厌别人的笨拙。他会厉声驳斥那些抱怨食品太少的人：法军在 1870 年吃过老鼠！

英军于 9 月 25 日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一同去

希特勒传

查看。他们活着回来报告，电线被打断了。由于敌人即将强攻，希特勒往前沿广播，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葬身于猛烈的炮火。

他在过去数月中多次化险为夷，像有人在暗中保护一样。“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吃晚饭，”多年后他告诉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突然，好像有人对我说，‘快到那边去，起来！’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不由自主地服从，它好像是一道军令。我立刻捧着饭盒起身，沿战壕走了约 20 码。我坐下继续进食，心安定了许多。但我刚吃两口，只见一道火光，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我原来坐的地方传来。一颗流弹在我原来的位置上爆炸了，炸死了全部留在原地的人。”

也许，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正值秋霜染白了大地，他写了首怪诗。此时此刻，或许他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每当寒夜降临，
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便是我的去处。
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有魔力的月色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无比轻率者，
晚间在魔法之中变为渺小！
他们制造闪光的钢铁——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石笋。
于是，真实与虚伪分道扬镳——
我记下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昌隆和祝福，

希特勒传

献给正义的人们！

他几星期后向同志们提出惊人的预言：“我的名字将如雷贯耳。我的时代就要来临！”

那年 12 月，不断的阴雨代替了雪。全团整个弯曲的战壕满是水。比起第二个圣诞节，第一个则并不那么惨淡。别人都在拆包裹和家信，希特勒则独自昏昏沉沉地在行军床上坐着，安静地度过了三天的假期。同志们想使他高兴，让他分享自己的圣诞礼物。他婉言谢绝，回到他自己的小天地里。假期一结束，希特勒便摒弃了忧郁，变得高兴起来，对同志们的嘲讽“安静度假”，还能一笑置之。

希特勒所在兵团于 1916 年夏初开赴南方，巧遇关键的松姆之役。战役一打响，英军攻势如潮，第一天就打死、打伤近两万联军。7 月 14 日晚，在弗隆美尔附近，十六团的所有野外电话线均被打断。希特勒和另一名通讯员在“必死无疑”、“每公尺都会挨打”的情况下去查线。壕沟内或充满水的弹坑成为他们的掩护。同伴累倒在地，希特勒无奈之余只好拖他回战壕。

弗隆美尔战役于 7 月 20 日进入白热化。双方均折兵损将，形成对峙。战斗在以后的两月中成了沉闷的炮火猛烈的阵地战，双方的进退仅能以码衡量了。希特勒在此时失去了亲密的战友——汉斯·孟德去后方的一个战俘营内任翻译。但是伊格纳斯·维斯登基希纳和恩斯特·施密特仍留在他身边，他的爱犬依然还在。“在一战时，在弗隆美尔，我无数次凝视爱犬‘小狐狸’，”他在 25 年后的一个冬夜回忆说。他神往地谈到爱犬

希特勒传

“小狐狸”对一只飞着的苍蝇的反应，首先，它全身颤栗，像受了催眠术，像老人们皱起的眉头，突然一跃而起，朝它猛吠。“我常像注视一个人一样注视着它每次发怒、咆哮。”“小狐狸”会坐在他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吃饭的每个动作。希特勒吃了五六口后它还得不到东西，“小狐狸”便会坐着看着主人，好像说，我的食物呢？“我太喜欢它了，真有意思！”

三个月后，松姆战役中双方仍相持不下。联军进攻不断。双方在此战役中总共牺牲 614000 人；但这却是无谓的牺牲，因为德军的阵线未动毫厘。尽管一周来多次执行危险任务，希特勒仍是受符咒保佑。他的幸运于 10 月 7 日晚结束了，他那时与其他通讯员一起，正在通往团部的狭窄的地道里坐着打盹。在狭窄的进口处，一颗炮弹炸开了，通讯员们被打成一堆。大腿受伤的希特勒仍就让他留在前沿与魏德曼争论不休，“我的伤不重，中尉，对吧？”他焦急地说，“我还能留在这里，我是说团部！行吗？”

3

希特勒来到野战医院。他的伤并不重，但他在病房内患了一种几乎使他“惊”倒的惊骇症，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病床上躲着，猛闻一个德国女护士跟他说话。“两年来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一列开往德国的救护火车将他带走。“我的内心随着火车开近边界而逐渐不安。”他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它漂亮的百叶窗和高高的屋顶象征着祖国！”

他住进了一所陆军医院，位于柏林西南。那段战壕生涯和医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有着天渊之别，开始时“我们不敢躺

希特勒传

上去”。他慢慢地习惯了舒适的环境，但看不惯某些人的犬儒主义。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便被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满眼是“赤贫”和饥饿，以及一群“无赖”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

他在两个月后出院了，被派住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我的奋斗》这样写道，他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士气崩溃的原因。是犹太人！就是他们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几乎每个犹太人都都是职员，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我十分惊讶这些选民中竟有许多勇士，只好将他们与在前线少得可怜的几名代表比较。”他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控制着德国的生产。“慢慢地，蜘蛛正开始吸吮人民体内的鲜血。”

他的同志们在前线未曾听他这样说过。他表面上也并不更加反犹。他有时也会说上几句不关痛痒的话，诸如“所有犹太人假若都不比斯坦聪明，那就没有什么麻烦”。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每次谈起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和维也纳，希特勒并没有什么“恶意”。其实，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过此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曾听说过。

希特勒厌倦慕尼黑了。他适应不了补充营的气氛。前线下来的士兵得不到尊敬，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希特勒在战壕里所受的苦难。他渴望回到前线，遂于1917年1月致函魏德曼中尉，他已“康复，可服役”，希望“回到原团和同志中去”。他于3月1日回到了十六团，官兵们热烈欢迎他的归来。爱犬“小狐狸”更是欢喜若狂——“它疯狂地扑向我。”连队炊事员做了一顿特别的晚餐为他接风，有果酱、面包和糕点。希特勒终于回“家”了。当晚，他拿着手电筒，对着刺刀大骂叛徒，在外边闲逛数小时——后来，他挨了一下别人丢过来的靴子，才回去睡觉。

希特勒传

全团在数天后开赴阿拉斯地区，准备开展另一次春季攻势。但希特勒趁闲暇画了很多水彩画，内容几乎都是对他而言有意义的战场景象。他的艺术在那年复活节转向人民大众。他将煤球用石灰涂成白色，摆成“1917年复活节快乐”一语放在团长的花园里。新团长弗赖赫尔·冯·图波夫少校几个月后来到十六团。他属于少壮派，充满活力，上任伊始便重整军纪。他使官兵们难堪，但允许他们批评上级。图波夫利用出门狩猎来消除受挫的闷气，希特勒的任务是赶兽出林。希特勒就在紧连前沿的林中手持长棍爬来爬去整整两个钟头，叫喊着替团长将野兔赶出林，让团长射击。

希特勒并没有因为服役时间长，战斗勇敢而得到提升。据魏德曼说，希特勒行为草率，不拘小节。“缺乏领导才干”，是重要的原因。他的头老向左肩歪，垂头弯腰地走路。虽然他抓紧一切机会洗澡，并称那些不洗澡的同志为“活粪堆”，但他居住于此却不喜欢擦皮靴。他见军官前来也不立正。从没有通讯员填补过中士的肥缺是关键。希特勒必须放弃其现行职务才能得到晋升，但团部将因此失去最好的通讯员。

十六团于那年夏季回师最初的比利时战场，为夺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战役做准备。这次战役的激烈程度与第一次一样。他们于当月中旬遭到敌人炮击整整十天十夜。可怕的挖掘声在炮击间隙中从地下传来，那是敌人在挖地道。头上，飞机的轰鸣不绝于耳，随即便有爆炸声。此外，毒气不时地威胁他们，士兵们有时得戴防毒面具连续24小时。7月的最后一天，守卫者们面临着坦克的威胁。滂沱大雨幸运地将无人地带变成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受创的十六团于8月退出战场，到阿尔萨斯休整。希特勒

希特勒传

在此时经历了两次惨痛损失。有个为“小狐狸”的滑稽倾倒的铁路官员，出价 200 马克购买希特勒的爱犬。“20 万我也不卖！”希特勒怒气冲冲地拒绝说。不料，希特勒在部队下火车时竟找不到“小狐狸”。他只好随队伍出发。“我如此的绝望。偷我爱犬的猪猡不明白他的作为对我造成的伤害。”另一个“猪猡”在此时用枪挑开他的背负，将装有速写画、水彩画和油画的箱子偷走。由于心灵受创和两度受侮辱——第一次为铁路之懒鬼，第二次为新入伍的兵痞——画料被他束之高阁。

施密特终于于那年 10 月初说服希特勒休假 18 天。这次休假是参战以来第一次。德列斯登是他们的目的地——施密特的妹妹居住于此——但他们在科隆、布鲁塞尔和莱比锡均停下来观赏风景。希特勒特别欣赏莱比锡。在圣·杜马斯教堂，马丁·路德首次讲道；巴赫曾在这个教堂里拉风琴达 27 年之久，并且死后也埋葬在此；维格纳曾在这个教堂里接受洗礼。但使他最难忘的还是那高 300 英尺的巨型“民族之战”纪念碑。这是为纪念 1813 年战争中的阵亡将士兴建的，它更像个堡垒，而不像神坛。“艺术与这纪念碑毫不相干，”他评论道，“尽管它很漂亮，且规模宏大。”他们在德列斯登观赏著名建筑物，参观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术馆在内的各种画廊。他迫切想去剧院，因为没有上演瓦格纳的作品，所以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他后来独自去了柏林，住在一位前方战士的家中。“这城市很伟大，”他在给施密特的明信片写道，“这个世界首都名副其实。交通依旧繁忙。我差不多全天外出，终于可以认真地参观各种博物馆。真是应有尽有。”

十六团的战斗任务于那年年底前没有多少，希特勒也获得充裕的读书时间。他对杂志和小说不屑一顾，只对哲学和历史

感兴趣。“战争引发人们深刻地思考人性，”他后来告诉汉斯·弗兰克，“对于生活中各种问题，4年战争胜过30年大学训练。闲聊文学只会让我痛恨。想要关心人类命运，人们只能读《福音》著作和荷马的作品。我在战争的后期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且反复钻研。此后，即使耶稣是真正的勇士，我也能不用《福音》之道自由行事。但是，对前线而言，‘左脸挨打后换右脸’一说，并不是好办法。”

在前线作战的士兵那年冬天异常艰苦，与先前的西线一样，异常缺乏给养，让士兵们被迫杀猫狗充饥。希特勒的同伴回忆，希特勒更喜欢猫肉，烤面包涂蜂蜜或果酱是他的最爱。一次，饥肠辘辘的他发现一大坑面包片，他有条不紊地机敏地从底部一包包地取出来。同伴们与他分享了这一份惊喜，他们拿用面包片换来的砂糖制成了前线风味——名叫“施马仑”的奥地利点心。

老百姓在国内也被迫以狗猫充饥。用土豆皮和锯末为原料制成面包，牛奶也几乎看不见。德国盟友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维也纳食品奇缺，奥地利政府不得不向柏林求援粮食。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罢工事件此起彼伏。罢工浪潮席卷数月来实际上受军事独裁管制的法国，全德国工人于1918年1月28日实行总罢工。要求和平是罢工的主要目的，但也坚持让工人代表参与与盟国进行的谈判，废除军事管制法，增加粮食定量，在德国建立民主政府等。在纽伦堡和慕尼黑，只有数千名工人上街请愿，要求立即无条件实行和平，走出工厂要求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在柏林多达40万。虽然罢工仅持续不到一周，但叛乱精神却席卷了整个首都，看来，全面爆发革命是迟早的事。

希特勒传

前线得到总罢工的消息时，士兵们反应不一。许多士兵都与后方的百姓一样厌战，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被同胞出卖了。希特勒认为这是“战争中最大的欺骗”。对那些赤色分子和懒鬼，他显得有些疯狂了。“家里人都不想胜利，军队还怎么打仗？贫困和巨大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家里人在闹罢工反对军人打胜仗！”

柏林终于在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苏俄和谈成功。但加在年轻的苏维埃政府头上的如此苛刻的条件，致使德国左翼分子宣称，消灭俄国革命才是和约的真正目的。布尔什维克的投降，使像希特勒那样的军人相信，德国必胜无疑。他们对于全面胜利的把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大部分部队均忠实地响应总司令部大规模反攻的命令，虽然不很积极。希特勒所在的十六团在尔后的数月中参加了鲁登道夫的大规模春季攻势的各阶段，在恩河、松姆以及最后在马尔纳，希特勒战斗精神空前高涨。6月间，希特勒在前线一战壕里发现一种像法国头盔一样的东西，于是往前爬去，原来是4名法国士兵。希特勒拔出手枪——当时，通讯兵已用短枪代替了步枪——大声向他们用德语喊话，好像有一个连。4名战俘被他亲自交给冯·图波夫上校，他因此而获嘉奖。图波夫后来说：“没有任何情况可以阻碍他执行最艰巨、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为了祖国，为了他人，他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安宁和生命。”因为先前所取得的成就，希特勒于8月4日获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而不是为此次卓越功勋。嘉奖令只说：“为表彰其个人之各种优点与英勇。”这枚勋章的授予者是提名让他受勋的营部犹太副官雨果·古特曼上尉。

形势到这个时候已很明朗，马上就打到埃菲尔铁塔的强大

希特勒传

的鲁登道夫攻势惨遭崩溃。在西线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的这场失利使人们大为震惊，因为在西线，德国人民已经征服了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辽阔地区。因此，所有人的士气一落千丈。休假车士兵秩序大乱，军官们被迫朝窗外开枪。士兵们在每个车站四散奔逃。他们用手榴弹和石块袭击那些试图维持军纪的军官们。列车两侧满是用粉笔写的诸如“我们是为百万富翁而战，而不是为德国荣誉而战”的革命口号。

联军于希特勒获铁十字勋章后第四天在亚眠一带冒着大雨发动反攻，德军阵线被突破。鲁登道夫派了一名参谋到前线，并立即派出预备队前往被突破区。退却的士兵高声怒骂向前线运动的增援部队：“你们这些骗子！不要延长战争了！”

鲁登道夫回忆，这天是“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倒霉日”。德皇的反应悲伤而镇静，说：“我们惟一的结论：德国已山穷水尽。战争必须结束。”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与威廉于几天后在温泉议事。当德皇下达和谈令时，兴登堡因为德军仍占领敌人大片领土而持反对意见；鲁登道夫则激动地说，在国内必须加强纪律，同时应“强征犹太青年入伍，因为迄今为止犹太士兵还太少”。

在前线即将崩溃、国内面临叛乱的情况下，希特勒与人争论更加频繁，并大谈特谈赤色分子的欺骗行为。然而，希特勒的声音却湮没在后备部队的抱怨声中。施密特回忆，在此时刻，希特勒“怒不可遏地厉声高喊说，退缩者和和平主义者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有一天，一个见习军官说，继续战争是蠢举，结果招致希特勒的袭击。两人拳脚相加，最后，希特勒在受了不少惩罚后击败了对手。施密特后来回忆，从此以后“新兵都鄙视他，但他却得到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喜爱”。

希特勒传

4年的阵地战使人性沦丧，国内那些“逃避兵役者”和“在祖国身上插刀”的和平主义者使希特勒无比憎恨。他和他的同志们满腔热血，发誓要报复这种背叛，未来的政治也从中产生了。1914年，希特勒绝不是睡眼惺忪的志愿兵。4年的战地生活使他获得了归属感，并且从某种意义上给了他自信。作为真正的德国人，他曾为德国而战。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其力，长大后拥有了自豪感。他在入伍时还是个略显幼稚的青年，尽管在维也纳忍受了24年的艰辛，但仍很幼稚；现在，他成熟了，准备在世间取得成熟人的地位。

十六团于9月初开回弗兰德斯。因为是后备部队，所以士兵可以休假。他与阿伦特一同回到柏林。首都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无疑使他厌恶。他在希皮塔耳老家停留了几天。十六团在他回团后几星期第三次开进伊普列斯下方，第三次出没在科明尼斯一带山间和野地。10月14日，希特勒在威尔维克村附近受毒气侵害致使双眼失明，但是不久便得到恢复。然而在11月9日，德国即将投降的消息让他再次失明，他在此后几天看见了幻影，并听到许多声音。

4

我们无法了解阿道夫·希特勒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深、多大，然而，他在此后一年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便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希特勒在这个时期中不过是成千上万害怕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爱国者”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最近几个月来鼓动的起义接连不断，令人丧胆，德国人的生活结构被威胁着。

希特勒传

巧的是，在希特勒患毒气后遗症时革命恰好开始了。他在10月6日乘伤员列车东行时，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巴登的亲王梅克斯，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照会。照会要求，只有废除德皇威廉，美国才能签订停战协定。德国军方的瓦解加速。叛乱爆发了，舰队两周后受命出海的时候，6艘战舰抗议。叛乱在基尔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短武器橱柜和军火库，该市的大部分被占领。有个伙夫在某兵营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只有一艘在港的舰只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把被俘军官的肩章扯掉，送进监狱。

慕尼黑于11月7日再次爆发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是上了年纪且身材矮小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的大黑帽，他富有浪漫色彩，衣冠不整，是典型的扔炸弹的赤色分子。他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已蹲了9个月的监狱。时至黄昏，包括众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重地，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逃出惠特尔巴赫宫。车子在市南跑出了道路，翻到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应得的结局。

卡车上举着红旗的人们当晚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部下占领了政府大楼和铁路。没有人反抗，在场的警察对于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视而不见。次日一早慕尼黑的市民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一夜之间变成了共和国。德国式的革命已经来临，且没费什么气力，也没有什么伤亡。人民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反抗。慕尼黑人都郁闷地等待着。

在全德国有秩序的革命的火焰自燃。在弗莱德里希市的卓别林工厂里工人们组织起代表会。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工

希特勒传

人在内的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举行了罢工。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者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法兰克福的水手也起义了。卡塞尔的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的整个卫戍部队，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拥有 45,000 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仅放了数枪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并没有混乱多久。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但是士兵们加入了文官的叛乱并获得成功。莱比锡杜塞尔多夫马格德堡，情况大都如此。

在全德国，每一个政府都被士兵或工人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德皇到 11 月 9 日宣布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掌握了国家大权，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成为了领袖。1871 年 1 月 18 日，曾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的日耳曼帝国结束了。

一个时代终结了。俾斯麦早在 48 年前实现统一德国的梦想，为德国人和德国树立了新形象。大工业家和东普鲁士容克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一夜之间倒塌了；帝国国旗缓缓降落，大多数德国人保守而爱国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一夜之间也土崩瓦解了。

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对德国人来说震动最大还是在于一夜之间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取得了发号施令权的竟然是一介平民。这怎么可能呢？埃尔伯特本人登上宝座后也如坐针毡。他也知道，他的出现极大地侮辱了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另外，他甚至代表不了街头上的激进思想。他究竟代表谁？当梅克斯亲王子于黄昏前来道别时，他居然惊慌失措地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任霍亨佐伦王朝的“行政官”。

埃尔伯特政权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于两天后的凌晨

5 时在福熙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上午 11 时停止敌对行动。宣布他在那年的 11 月 11 日 11 时给一个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他同时却无辜地编织出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的“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当然，是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和德皇输掉了战争。但威尔逊总统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拒绝同他们签订停战协定。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并不是自己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阿道夫·希特勒从威尔逊那里得到一种政治工具，四处挥舞使它的破坏力得以增强。

5

希特勒于 1918 年 11 月末以病人“除眼膜发烫外，别无其他”“适于服役”为由离开帕斯瓦尔克医院。希特勒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他那时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不知以后是否还能读书。他抱怨说“医院的病历，写于革命时期。无人能得到照顾；我们成群地出院，未领到士兵的工资簿”。

他来到十六团的预备营设在慕尼黑的营部报到。他在途中经过了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的柏林，这是工人、士兵和“多数和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联合政府的社会改革已经开始，在几月前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它允许工人有自由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建立了 8 小时工作制，增加失业工人和老弱病残者的福利；释放政治犯以及废除报纸检查制度。

这些社会改革希特勒虽然同意，但对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他都不信任：执行委员会出卖前线士兵，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掀起另一个赤色革命是其最终目标。当希特勒前往设在邻近施霍宾地区的图尔肯大街兵营报到时，他遇到了同样叛逆的

希特勒传

精神。这所设施在当月的早些时候已投靠埃斯纳政权，由“士兵代表会”直接管辖。那里看不到任何军纪，兵营就像猪圈。人们一点都不尊敬那些从开战伊始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许多人只以夜求一宿，日求三餐为目的。这地方的糟糕程度超过了曼纳海姆。尤其令希特勒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我讨厌他们的一切活动，我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他幸运地找到一个同样厌恶那个地方的老战友。“士兵中最厚颜无耻的、最懒的，无疑就是那些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当通讯兵时希特勒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懦夫懒汉。”两星期后，特隆斯坦战俘营急需看守人员，于是希特勒建议施密特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大部分由“革命军人”组成。一位军官来迎接他们。他的部队的命令，让士兵们引为笑谈，操练已被取消了难道他不知道吗？曾在战壕里服役的几名士兵被留下，其余于第二天全被运回慕尼黑，施密特和希特勒留下来了。

6

极左派“斯巴达克斯团”在柏林得到起义水兵的协助，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有秩序的慕尼黑式起义。首都到圣诞节前夕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同时揭竿而起，但势头不如想像中的猛烈。全德的警察和军事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丧失了权威，一股新生力量——“自由兵团”突然兴起。这个兵团的组成是部队内的左翼积极分子，和希特勒一样具有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影响的热情。“自由兵团”的成员大都出生于希特勒时代，为采取今天的行动，准备过两

希特勒传

次，第一次，是所谓的“候鸟运动”。战前的青年运动，常穿五光十色衣服的年轻人，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家庭富裕，鄙视产生于他们中间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政治是微不足道和吹牛；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教育是缺乏生气和老一套；经济是欺骗和无耻；艺术是淡而无味又多愁善感；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他们认为，家庭生活不真诚且约束了人。他们还认为，不管是婚内婚外的两性关系“贯穿着虚伪”。建立起一种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的青年文化成为他们的目标。

青年们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有时会随着指挥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会默默地注视着篝火，试图发现“林中信息”，或倾听同伴朗读斯特潘·乔治或尼采著作中那些诸如“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与人民——行动！在杀人犯中你也许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多年昏睡的某人就会突然惊醒，完成这行动！”等激动人心的段落，他们因神秘主义昌盛，由于理想主义的驱使渴望任何一种行动。

在大战中他们找到了行动。这也许就是他们，如同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事业的正义性的理由。战场由此而形成，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人们生出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对他们的领导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他是元首，而不是指挥官！而他们是同志！他们对他绝对服从，甚至可随他下地狱。”他们在前线缔造统一了直到现在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长达几英里与世隔绝的战壕，实际上成了“拥有火焰围墙的修道院”。

这些旧日的“候鸟”，这些前线来的同志，与希特勒一样，

希特勒传

认为投降是耻辱，不信任国内阵线，因为它朝布尔什维主义坠落。军方在路牌上和报上曾宣布尚未消除“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号召士兵们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被世界所嘲笑”。老兵们对此会予以热烈响应，就可以理解了。

这支非法的部队正在组建时，在许多柏林人的支持下，“斯巴达克斯团”也在夺取柏林。交通运输，许多公共设施，以及兵工厂已被他们控制。沦陷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于1919年1月3日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因为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水兵叛乱也得到他的支持。此时“斯巴达克斯团”已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为了报复，公开号召革命。这一号召得到柏林工人的热烈响应，20万身背武器挥舞红旗的工人于6日上午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茨埃尔加登集结。大雾与寒冷并未影响他们高涨的情绪。他们抓住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愤怒的人群还包围了埃尔伯特及其同僚用以藏身的总理府大楼。

共产党人到次日上午已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端坐。在文特登林登，在萨洛登伯格大街，在科尼希大街，铺天盖地的是他们的步枪。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波佐酿酒厂和政府印刷大楼均被占领。不到24小时仍在政府手中的市内主要建筑物已是所剩无几。

若非“自由兵团”干预，柏林乃至全德国也许已成为共产党的囊中之物。不到一周，部队开进城内逐一粉碎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的“斯巴达克斯团”的领袖们被捕并惨遭屠杀。

新共和国在“红色玫瑰”牺牲后4天举行了首次全国大选。那天是个寒冷而晴朗的星期天。妇女自德国有史以来首次

被允许参加选举。3500 万选民中有 3000 万人把票投给了国民议会的 423 名候选人。结果虽有些奇怪，但也是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其实希望卷土重来的霍亨佐伦两个右派政党，得到约 15% 的席位；两个赞同实行共和的中间派政党，得了 40% 的席位，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的席位仅占 7%。选举的结果，是反革命及赞成共和的共同执政。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刀枪林立的柏林危险四伏，国民议会便设在距首都西南 150 英里的魏玛。魏玛据有文化上和地理上的优势，因为这里是席勒、歌德和李斯特的故乡。国民议会于 2 月 6 日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因为没有乐队、马队以及耀眼的制服，所以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

工作政府于 5 天后成立了，埃尔伯特众望所归地成为帝国第一任总统。他任命总理大臣，并由总理大臣组阁，国防大臣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担任——这是最具价值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得到魏玛共和国的支持，将开始行动并继续守护国家，不致使它产生暴乱和赤化。

7

巴伐利亚人深恶痛觉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传统。因此，慕尼黑几乎不会理会魏玛所发生的一切。慕尼黑一个尚未被世人认识的知识界领袖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嗤之以鼻。这个孤单而又贫困既厌世又厌恶女人的光棍，于 1918 年春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的第一卷。虽然书评尚未出来，但书已影响了全德

希特勒传

国“如同 1789 年的法国人，在不幸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我们需要惩罚，4 年来的战争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最后，恐怖必是如此之失望和激动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如同拿破仑一样的独裁者竟被人们认为是救星。”

希特勒自认为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此时的他正准备回到慕尼黑。他与施密特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同时被调往兵营设在施霍宾第二步兵团。该团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已扎根在慕尼黑，他是个疯狂地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的爱斯托尼亚人。他穿过俄罗斯来此寻找真正的家。他与希特勒一样也是建筑师和画家，以及比纯粹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乡背井地目的是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小心曾破坏他故土的布尔什维克，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奋斗。

当他听说他的观点与一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有很多相同之处时，罗森堡便决定亲自去拜访。底特里希·埃卡特——剧作家、诗人、咖啡室知识分子，他身材高大魁伟，有些秃顶，性格怪异，常出没于啤酒厅和咖啡馆，同样喜欢议论和喝酒。他的父亲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所以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他放荡古怪，有些天赋。他反犹太，亲德。他自己出钱出版的周报，拥有 3 万份的发行量。

未经介绍罗森堡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还在走廊里的罗森堡给埃卡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端严肃而热诚。罗森堡直截了当地问：“耶路撒冷的战士阁下是否有反对？”埃卡特笑了：“当然有！”罗森堡当即拿出一篇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一种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在他

们之间这样开始了。埃卡特认为罗森堡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在此后不久不但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出现，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也刊登了他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主题。

8

众多巴伐利亚人认为，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很多人相信，他闹革命是因为有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恰恰相反，他在11月那历史性的一天，口袋中仅有18个马克。他事实上是实用主义而残酷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虽然他统治着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好像他仍在他最钟爱的咖啡室里。埃斯纳试图建立的不是共产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只能称之为独有的激进民主。他是政治家中的诗人，期望一种美丽的、有理性的、光明的统治。比起马克思他更像雪莱。脚下的路已被人遗忘。在1月的选举中，中产阶级的政党获得巨大胜利，和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希特勒认识到前途渺茫，于2月21日晨草拟了辞职声明，但在兰塔克前线递交辞呈的途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派遣暗杀。阿科瓦利公爵在青年骑兵军做军官，受犹太人母亲的影响，反犹集团将他打了下去。埃斯纳即将卸职，其统治将交给中间路线的政府。暗杀让阿科瓦利感到恐惧，从而带来左倾的浪潮。不久前所有人都反对和鄙视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无产阶级和烈士的圣人，革命也开始了。中央委员会开始戒严，阿

希特勒传

道夫·霍夫曼被任命为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的领袖，还宣布总罢工于晚7时宵禁时开始。由于学生们欢呼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在莫斯科举行第三国际大会，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并通过。欢庆胜利的活动接踵而来，列宁号召世界工人团结，强迫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并建立商业关系和恢复外交，并派遣大量工程指导员和技术人员，协助重建这个初生的国家。

那时，世界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柏林。前一天，柏林工人不再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来到市中心示威游行和掠劫。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他激进军事集团的协助下，当地30个警察局被他们攻陷。水兵们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围得水泄不通，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日夜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1500名代表进行讨论，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无电，无交通，陷入瘫痪。

革命者全部在东城集结。主要关卡都被他们架起机枪。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不久前才得到的专权进行反扑。他于3月5日调遣了3万名“自由兵团”士兵进城，并逐楼清理叛乱者。柏林的酒吧间、酒馆和舞厅等照常营业。

柏林发生激烈的巷战。大炮、飞机和机枪扫射对付手榴弹和步枪。激战4天后，诺斯克下达“就地枪决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的命令。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未受审判便在墙边命丧黄泉。1500多名革命者牺牲，近万人受伤。然而，在德国叛乱精神的蔓延势不可挡。由激进派掌握着萨克森的政权，鲁尔盆地被包围，《每日新闻》驻芝加哥代办处记者本·赫希特称：“神经病发作期的德国，无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希特勒传

另一次革命也即将在慕尼黑开始。这次革命受到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3月22日，有消息说，共产主义人民阵线和社会主义，高举工农兵委员会的旗帜，夺取了匈牙利政权，以陌生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贝拉·昆以及32名委员中的25名是犹太人。所以，伦敦《泰晤士报》便称这个政权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给慕尼黑左翼分子壮了胆子。4月4日黄昏，委员会代表们踩着20英寸厚的大雪，艰难地在街道上行走。他们来到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远的罗文布劳大厦，人们在这里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体无产者，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与匈牙利和俄国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这样，世界上任何力量将不能阻止我们全面实现社会化。”

这个咖啡室革命，幼稚地重现了血腥现实。革命的诗人恩斯特·托勒成为革命领袖。他主张改革绘画、戏剧以及建筑的艺术形式，解放人类精神。一群怪人组成内阁，例如住房委员命令，此后各家起居室，一律建在卧室和厨房上方。然而，被挑选为外交委员的弗朗斯·里普可谓是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只因，他修剪齐整的胡子，以及穿一件灰色大衣，颇具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给莫斯科发的电报措辞激愤，攻击埃斯纳的继承人盗窃部里厕所的钥匙。“因为这些猪狗未立即租给我60辆机车”，而向瑞士和伍尔登堡宣战。

4月13日，革命在原总理大臣、社会主义教师霍夫曼企图用武力夺取慕尼黑时告终。即使拥有战功卓著的军人像希特勒，他却未曾得到机会起事。一部分原因是，为防止第二团士兵赤化，他曾登上椅子上高声疾呼：“我们应保持中立！我们毕竟不是为一伙流浪的犹太人站岗的卫士！”虽然曾使慕尼黑

希特勒传

卫戍部队在希特勒等人的坚持下保持中立。傍晚，欧仁·莱内领导的赤色职业分子仍粉碎了“霍夫曼起义”，并夺取政权，他的籍贯为圣彼得兹堡人，父亲为犹太商人，他是共产党派到慕尼黑去组织革命的。将诗人托勒逮捕后，政权被他们立刻变为真正的苏维埃。然而，他们违背了“即使能暂时或在局部取得胜利”下都不要动武的严格党令，派出不少力量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去与霍夫曼为反攻慕尼黑而仓促集结的8000名士兵对垒。那时，霍夫曼的部队正向距城10英里的达豪集结。

红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共产党的俘虏诗人恩斯特·托勒。他一出狱，便骑着一匹借来的马，奔赴战场，如同先前的武士，决心“为革命而战”。这位红色骑士于4月18日指挥部队进攻霍夫曼。但由于他的人道主义，以及个人主义，不顾慕尼黑的命令。首先，他企图通过谈判而不是炮击来攻占达豪。其次，当战斗开始时，他身先士卒，没有什么牺牲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队急忙撤退。苏维埃领导人命令他枪毙所俘获的军官。毫无疑问，他们得到了释放，而他自己又一次入狱。

霍夫曼在达豪一役失利后被迫接受国防大臣诺斯克“自由兵团”的援助。他们迅速草拟了征服慕尼黑的计划，并加以实施且卓有成效。4月27日，慕尼黑完全陷入包围。包围中的红军为报仇雪恨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全部逮捕。反犹的“图里会”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在内的7名成员被水兵抓获。约100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尔德。

慕尼黑包围圈于4月29日不断缩小，城内革命者不知所措。有人谣传，主要的火车站已被白军攻占，顿时间，“除托勒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指挥部的其他人员顿时丢盔弃甲”，

红军指挥官下令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前不久，52名俄国战俘和10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在一石场里被“自由兵团”处决枪杀。他下令处决关在学校里的全部人质。托勒魂飞魄散，试图阻止屠杀。但最少有20人待他赶到时，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逃出了红军残存的阵线，向“自由兵团”指挥官报告了这一暴行情况。他们于是下令拂晓进城。晴朗而温暖的5月1日“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倾泻而来。除施霍宾地区和霍普班诺夫有一些抵抗外，他们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零星的革命力量。“自由兵团”随处都受到被解放的市民的欢迎。群众在马里安广场举行了集会。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代替了红旗。

正当红场上列宁在向大型的“五一”节民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胜利的消息时，“自由兵团”正在消灭慕尼黑抵抗分子的老窝和逮捕红色领袖。“自由兵团”攻占了慕尼黑的大街小巷。他们很快便在路德维希大街昂首阔步地前行，还操起正步经过弗尔德赫仑大厅。埃尔哈特旃头戴卐字钢盔的士兵，高唱着“黑白红袖章，头戴卐字盔……”

慕尼黑于5月3日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牺牲68条生命。当然，此仇必报。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之事属圣约瑟夫会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被捕。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成为关押他们的监狱，有21名危险的“赤色分子”被刺刀挑死或枪杀。数以百计的人死于类似的情况下，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戒”的人数以千计。此外又出台了一系列苛刻告示，镇压继续进行。告示有些根本是形同虚设的，例如，必须立即枪毙不交出武器者。在秩序和法律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挨鞭打，或受侮辱，或被杀害。慕

希特勒传

尼黑被“自由兵团”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然而共和国的做法与这种解救的方法相比，可以算是相形见拙了。

“白军的暴行可以编出厚厚的一本书。”法国驻慕尼黑武官这样报告，“……有组织而又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血腥的屠杀，胡闹的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英国官员们对这些暴行视而不见，批准这些暴行“目前从所掌握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的后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这样报告，“在全德强化了秩序与法律，在群众中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巴达克斯主义名声扫地。”所谓的“赤色分子”共约1000多名死于“自由兵团”屠刀之下。在慕尼黑，瞬间尸体堆积如山，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被抛入堑沟。

9

万德沃格尔的青年以理想为目标，曾带着他们崇高的理想进战壕；现在，他们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于是这些理想又被带上德国街头。他们的金牌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他们是新一代，是中欧的精华，是突击队战士，这是一崭新、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的种族。”这些军人将为拯救德国而战。“我们须用铁拳夺取政权，以鲜血铸造新的形式。”

可以说容格代表希特勒讲这一席话。慕尼黑的赤色政权唤醒了积在希特勒心里的憎恨。在解放慕尼黑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希特勒的生活，将世界历史进程扭转。获胜的盟国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政府很快便批准了条件苛刻的条约的执行。德国被迫独自对挑起的战争负责，并赔偿所有战争损失。大面积的帝国领土被分割，法

希特勒传

国人夺走了阿尔萨斯 - 洛林地区，比利时割走马尔梅蒂地区，波兰得到了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德国的殖民地也未幸免于难。丹吉克成为自由邦；萨尔、东普鲁士和施莱维希公民将拥有投票权。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盟国占领莱茵河至少为 15 年之久，莱茵河右岸 30 英里宽地带成为了非军事区。条约规定，德国不得拥有军用飞机或潜艇，军队数目被限制在 10 万。这样，德国蒙受了空前的耻辱。

德国国防军这支新的力量，几乎立即行使起超过其本身力量的权力。为使部队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骚扰，他们专门成立一个局，调查在部队中以夺权为目的的政治活动，且试图渗透进工人组织。这个单位负责人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包括了希特勒。这一行当希特勒干起来得心应手，但梅耳挑选他的原因也许是他在战时的“模范”记录，也许是出于怜悯。“一条疲倦的、寻找主人的丧家犬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梅耳认为希特勒“随时将命运交给对他表示友善的人的手中。”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极为冷淡。”

其实，革命就像传染病，希特勒的状态正处在混乱和酝酿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关切他所投奔的国家的命运。他不久前曾得到一本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宣传种族主义的书。他立刻想起在维也纳读的那些类似的小册子。“这样，我不禁发现，我自己的前途重现光明。”慕尼黑街头的所见所闻，激活了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掌权的犹太人无处不在，最早是埃斯纳，接着是无政府主义者像托勒，最后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柏林的罗莎·卢森堡，布达佩斯的贝拉·昆，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原先被希特勒怀疑是阴谋的，现正成为了现实。

希特勒传

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在慕尼黑大学受上任前的专门训练。冯·米勒教授、卡尔亚历山大那样激进右派学问满腹的保守派是他的政治教员。“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在我看来，有机会见到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对目前的形势进行详尽讨论。我们或多或少坚信，犯下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社会民主党，均无法拯救将崩溃的德国。而所谓的那些愿望良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也无法弥补已发生的事件。”

希特勒在战争期间曾告诉维斯登·基尔希纳，和平时期，他将步入政界或成为画家。他的同志问他愿意加入哪个政党时，他这样回答：“没有一个。”受训者中他周围的人结论也是，他们需要一种崭新的运动。他们决定将“社会革命党”作为这个组织的名称。“因为我们认为社会确实要进行革命。”

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极为支持此运动。弗德尔是以“打破利息奴役”为学员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职业是工程师，其实是个经济学家。他给学员们讲述借贷资本和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这给了希特勒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便让我知道已找到建立新政党最主要的基础方法之一”。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动他重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首次真正了解了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著作的内容。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终于读懂了。

一次下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进行地讨论生动活泼。“人们着魔似的听着一个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兴奋。我感觉，这些人是因为他的高谈阔论而如此激动。一张苍白的小脸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他头发蓬乱得不像军人，修

希特勒传

得整整齐齐的胡子，蓝色大眼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米勒教授指指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耳上尉：“你知道吗，你有个学生是天生的演说家？”梅耳喊道：“希特勒，过来一下。”希特勒“带着某种目空一切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他终于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而当上了慕尼黑的一个团里的训诫员。“我为我的工作投入了全部热情和爱，因为，我猛然间便得到了大群的听众，我历来不是凭知觉而纯粹凭感觉所假设的东西，终于被证实了：我是个演讲天才。每一次讲演都增添了希特勒的自信，他的声音已发展到营房内的任何角落都可听清他演讲的地步。

由于起初与他相处的人们都认为他是奸细，以致于他的社会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希特勒对一个叫荻埃尔公开蔑视先进者的矮个子兵紧跟不舍，直到街上，口中不停地阐述德国真正的任务。荻埃尔猛然打断他的话：“告诉我，是不是你忘了冲洗他们灌进你脑里的东西？”一位目击者回忆：“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默不作声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无法与同屋的两名奸细相处。他们向梅耳上尉抱怨他的“体格习惯”。另外，“他的梦话，以及梦游，令人难以容忍。”他于是便住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个窗户全钉上了栓的小仓库，但希特勒“好像为有一间小屋而兴奋不已。”

尽管社交中的希特勒有很多的缺点，梅耳上尉仍然重视他的讲演才能，将一次去慕尼黑城外的特别任务交给他执行——被遣送回家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德国战俘，由于支持斯巴达克斯观点，需要组织一个“教化团”改造他们，使之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希特勒传

宣传队于7月12日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上了一堂政治的教育实践课。满腹怒气，说话尖刻的遣返战俘，希望和青春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过着牲口般的生活，饥饿和混乱是他们回来后看到的景象。希特勒慷慨激昂地向他们讲述“十一月罪人”“凡尔赛耻辱”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这些成为了他们仇恨的发泄对象。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均有提及。“也许可以说希特勒先生是天才，是人民演说家。他凭着他的狂热和魅力，让听众聚精会神且相信他的话。”一个观察家评论说。

返回慕尼黑的他，还协助兵营演说，他还肩负着调查最近产生在慕尼黑约50个激进组织的任务。这些人由共产分子、种族主义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超级爱国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其组织由诸如“共产社会主义协会”“革命学生集团”“新祖国”“奥斯塔拉同盟”等一系列政治派别组成。

那年初秋，希特勒参加了一个小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的一次会议。尽管讨论时，他发了言，且发言精彩，但那晚的会议仍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并未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及。慕尼黑铁路工厂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了这个党。关于希特勒是否调查过这点，仍属疑问。该党纲领是社会主义、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奇异组合，党本身就披着件神秘外衣，似乎只由一小撮号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的神秘人物，“是画家，而并非卖弄学问者；喜好奢侈享乐，并非柏拉图主义者对武器情有独钟，却不表现出来。”

他与希特勒一样，相信日耳曼浪潮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掀

起，于是对建立“日耳曼秩序”巴伐利亚分支机构十分上心。三代人都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才有资格加入；成员需发誓积极参加“反对犹太民族和国际主义的斗争”。塞波登道夫迫于全国的革命浪潮的压力让他的组织以“图里会”这个无辜的名字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开始实施多年来的夙愿：吸引工人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他指示一个纯粹的体育专栏作家的会员，建立“工人政治小组”。此人找来安东·德莱克斯勒，于是两者合并组建了一个新政治组织。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召开。与会者约25人，大部分是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简明地阐述了党的双重目标：第一，将阶级斗争结束，解放围困在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的工人；第二，让统治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屈服于德国人的统治”是他们真正所需。德莱克斯勒建议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作为小组的名称，由于“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而遭某些人反对。

德莱克斯勒为草拟党纲而废寝忘食。技术工人并非无产阶级，他们属于中产阶级市民。中产阶级必须牺牲“大资本主义”而加以加强和扩大。纲领小心翼翼地宣布反犹：“国家应反对违背德国之伦理与道德标准的宗教信仰教育”，反对不能仅限于形式。两星期后，图里会总部召开成立大会。无精打采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雷当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成为他的副手。

称之为一个政党略显牵强，因为只有6人委员。“因为面临赤色威胁，我们的会没有公开，”德莱克斯勒回忆说：“除学习和讨论外，我们几乎无所事事。我将想法写进了《我的政治

希特勒传

沉醒》。来源于一个工人的日记。”他梦想着找到一个精力充沛且有胆识的人，从书中得到一些教益，“并找到我们的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具有坚定信念，大无畏，能为此采取行动的人物，一个独眼龙。”

希埃尔少校于9月12日令他去参加规模很小的“工人党”的另一次会议。希特勒可算是一位有强烈信念的“独眼龙”。当天傍晚，希特勒来到位于赫仑大街的斯特纳卡布劳咖啡馆。有40名左右的工人已到席。原定的主讲人——诗人埃卡特因病缺席，经济学家弗德尔被临时换为主讲人，他的题目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手段。”

因为弗德尔在希特勒受训时期曾给他讲过课，所以希特勒才能聚精会神听下去。他的印象很一般。这很明显无非是另一个“昙花一现”的组织。因为他的创建人不知如何变俱乐部成真正的政党。此次会议令他厌烦。弗德尔的发言结束后，希特勒便松快了。希特勒想在自由讨论时离会，但有东西“驱”他留座。希特勒几分钟后便开始痛斥一个主张巴伐利亚从普鲁士支离出来的教授。希特勒以精辟的论点，干练的口才讲了15分钟，使这个教授“……在我的话说结束前，如同落水狗一样离开了大厅”。

德莱克斯勒对希特勒的发言及其逻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他悄声告诉秘书：“此人可利用！”他向希特勒自我介绍了一番。但希特勒并未记住这个其貌不扬、戴着眼镜的先生的尊姓大名。如同一个宗教狂，他将自己封面为粉红色、一本只有40页的小册子，硬塞给希特勒，口中重复着“你必须认真阅读，请你再来”之类的话。

希特勒回到兵营二楼的小屋，与通常一样，又失眠了，便

希特勒传

开始用吃剩的饭菜和面包屑喂老鼠。这已形成习惯，在天亮前，“看这些小东西绕着美食打转。生活中，我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可以想象出饥饿的滋味，更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他那天清晨5时左右，仍毫无睡意。躺在小床上的他眼巴巴地看着老鼠们滑稽的动作，记起了德莱克斯勒硬塞给他的小册子。希特勒本人也有些吃惊：第一页就吸引住他了。“我不禁发现，自己的发展竟展现在眼前。”次日，书中的语句和思想不断在他脑海翻腾。“国家社会主义”和“新的世界秩序”的提出，以及新的政党，遭受剥夺的工人、幻想，吸引中等阶级和公务员的下层的预言，令他回味。

然而，他的兴趣很快消失了。后来，他很惊讶地收到一张通知他已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的明信片，并且被邀请参加下星期三将要召开的委员会。因为他想成立自己的政党，无意参加现成党派，便作出强硬地拒绝。但他“出于好奇”又决定再前往看看这个古怪的小组。

赫仑大街的一家低级咖啡馆灯光昏暗成为会议地点。希特勒通过空无一人的餐厅来到后面，看见四人围桌而坐，其中一位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他受到了德莱克斯勒热情地欢迎，对他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表示祝贺。德莱克斯勒说他们正在等候全国组织的主席哈尔雷先生。

终于体育作家来了。他天生的罗圈腿，样子丑陋，衣冠不整。大会首先宣读前次会议记录，接着会计作了只剩7马克50芬尼克的财政报告。宣读了信件后便是冗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的想象还糟。“恐怖，恐怖！这是最糟的俱乐部生活！我要加入这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从党组织的现实

希特勒传

角度出发，希特勒提出了不少问题。他发现，没有党纲传单，甚至没有一个橡皮图章，有的只是美好愿望。他迅速地扫了几个委员一眼。他们心中无数，思维混乱。

他所见到的令他闷闷不乐，但对是否参加仍举棋不定。这成为他当时“最大的难题”。他内心在尔后2天内，不断打架。理性让他拒绝，但感情又让他接受。他曾立誓进入政界，而这个荒唐小组还未“凝成‘组织’，对个人有很大的施展空间”。由于它很小，他可以随意左右它。

希特勒向梅耳上尉汇报了发现的情况。情况又被梅耳上尉转报给了一群资本家和高级军官，每周他们在“四季”饭店的例会，讨论各种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办法。结论是，只有得到德国工人的支持才能取得。小小的“德国工人党”可认为是一个开端。梅耳上尉回忆，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在梅耳的办公室出现，要求准许希特勒加入该党，并协助建设。

新军的成员是不能加入某一政党的。但“要让鲁登道夫高兴，希特勒便得到我的批准参加工人党并帮助其建设。开始时他为此每周拿到了相当于现在的20金马克”。事实上，希特勒在得到命令前已经想好自己该怎么办了。他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并登记，领到了党证。

投身政界的希特勒，取得了思想上的重大进展——这也归功于梅耳上尉一道命令。教育部门的一个学员来信询问，是否有关于犹太威胁问题的资料可提供。对此希特勒被命令作出回答。希特勒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4天，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揭示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取得地令人惊叹的进展。它通篇攻击犹太人——这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它钻进民主，贪婪地吸吮群众的良知；它爬过人民的尊严，但只晓得金

钱的尊严……它的活动结果，是人人患上种族的肺癆。”反犹的纲领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借口，从法律上夺回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这是他的结论。“但是，最终的目标毫无疑问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铲除”。

这是第一份已知的希特勒的政治文件，也是他首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真正存在的政治纲领。

希特勒传

第二部 道存在于 混沌的萌芽中

希特勒传

第四章 诞生了一个政党

1919—1922

1

“当我踏进这个小圈子时，关于运动或政党，这里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工人党在那年秋天，真正给予希特勒的是他宣传思想的讲台。如同他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首次披露他的希望和发泄他的仇恨，这几个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急需的动力。

把这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全党的委员会成员实际只有7人。它充其量只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希特勒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连载故事中，风趣地回忆：“慕尼黑1919年的日子很艰难。垃圾成堆，昏暗的灯光，骚动，穷困的士兵，穿着破旧的人们。总之，这是革命丑闻恶果和4年战争的情景。”

每逢开会，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会点燃一盏昏暗的煤气灯。“集会时我们是何样子？恐怖，染过的外衣，短军裤，五花八门的戴得发亮的帽子，手持木棍作‘手杖’，脚穿着改制的破靴子。”这是在那些日子里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大众。

“我们依然是这些人……以兄弟般的问候为开始。之后，

希特勒传

众人便报告说，各地已经播种，很多种子甚至生根。他们最后便问，我们能不能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5个马克是仅有的活动经费，而一次活动竟最高需要17马克。”

委员会终于同意德莱克斯勒提出的用召开较大型会议招揽党员的办法。他在兵营里用连队的打字机或手写，亲自制作了首次会议的请帖。7名委员在首次会议的当晚等候“预计的到会群众”。一小时过后，没有人来。“我们还是原来的7人。”希特勒将请帖改成油印的。这次，几个人光临。赴会人数慢慢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34人。

会议捐款成了广告费。他们的广告刊登在一家民间反犹报纸上，宣布在霍夫布劳斯酒馆地下室里于10月16日召开群众大会。

到会人数如果和往常一样，便意味着工人党已破产。希特勒反对哈尔雷的悲观，坚持说，来的人会很多。烟雾弥漫的室内到下午7时已集合了77人。如何接待当晚的主要演讲人，现已无从查证。但我们可以肯定，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粗糙的安放在主台上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像是“触电一般”。他原定20分钟的发言，在不知不觉中就延长至半个钟头，威胁、谴责和保证之辞，有如潮水，涌出他的嘴。他的感情已不能自己。当他满脸汗水的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他精疲力尽，却掩饰不住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在内心感觉、却又无从证实的东西，现在得到了证实：我可以演说！”

这是他人生和“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款300马克。他们现在有钱印刷标语口号和刊登更多的广告了。第二次群众大会于11月13日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召开，

希特勒传

与会人数达 130 多人。共有 4 人在大会发言。每张入场券 50 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新鲜事。人们大都为希特勒而来。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扰乱会场。由于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扰乱分子不到几分钟“便抱着流血的头，滚下楼去。”希特勒被中断的会议激得更加慷慨激昂。他在讲演结束时强令大家反抗。“只有德国的钢铁才能打破法国的惨境。那样的时刻必然会到来。”

听众再次为希特勒倾倒。演讲时他用的是原色声，且感情奔放，这是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有个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的当时在场的警察后来报告说，他“非常好地掌握了火候”，必定是“职业的宣传讲演家”。他的呼吁出自他的肺腑——爱祖国，憎恨导致 1918 年失败的犹太人。老兵们通过这种讲演方式和他所使用的战壕和街道语言认识到，他也曾享受过铁丝网、机关枪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神圣的、前线的同伴的手足情深。

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不到两星期又召开了，有 170 人参加。他们于 12 月 10 日使用了更大的“德意志帝国”酒馆。当群众还是纷纷舍弃大厅内的暖气离场时，几位委员意识到会议太频繁了。由此又引发一场激烈的辩论。希特勒争辩道，在这座有 70 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会议两周一次，就是每周 10 次也不成问题。他说，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回报。达豪埃大街是群众大会的新址，邻近兵营。来开会的士兵们蜂拥而至，与会人数突破了 200 人。

其他委员对希特勒的飞黄腾达深感不安。他那轻松活泼的、火山爆发式的风格遭到他们的反对。另外，由于大量粗鲁

希特勒传

军人的加入，整个组织的面貌正在改变。他们害怕党被毁灭。虽然德莱克斯勒也同样忧虑，但希特勒是党的希望仍是他所坚信的。希特勒在他的支持下成为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迁升后的希特勒，更严厉地批评党务的低效。没有设备和办公室，党如何办公？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斯特纳卡亲自动手，找了一间办公室。房子很小，以前是酒屋。每月才 50 马克的租金。委员会并未抱怨房东拆除木隔板使它“不像办公室而更像殡葬大厅”。他用党的基金和梅耳上尉给的钱，在室内装了电话和电灯，还配备上书橱、桌椅、碗橱等家具。下一步就是雇请全天办公的经理，在兵营他找到个中士，此人“绝对忠诚、正直、老实”。上班时，他带来了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

希特勒于那年 12 月要求全面改革党组织，使这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成为成正的政党。大多数委员满足现状，反对改革。他们不能看清宣传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希特勒再次得到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的支持。2 人在德莱克斯勒家里积极草拟党的纲领和计划，经常是数小时的讨论。维持二人关系的主要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不信任。德莱克斯勒回忆，他因为工会和犹太人的关系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舒适的尼姆芬区居住，希特勒常乘电车去找他。两人埋头工作，废寝忘食。“我的小女儿常在希特勒的膝上爬着，”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的阿道夫叔叔喜欢她。”

希特勒于 1919 年末的一个晚上“夹着大捆的党纲手稿”来找德莱克斯勒。两人经过数小时的埋头工作，尽可能将它“压缩”到最简单。“我们绞尽了脑汁！”德莱克斯勒这样回忆。完成时已是次日早晨。希特勒一跃而起，以拳击桌。“我们的

希特勒传

意见，”他高喊，“可与路德的惠登伯格门上的牌子相抗衡！”

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公布 25 点纲领，这必定要遭到委员会的反对。纲领的许多观点以及召开群众大会都遭到他们的反对。起初德莱克斯勒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支持希特勒，再次开会时希特勒得到了他全力的支持。否决了反对派的意见，于是决定 1920 年 2 月 24 日开会。

醒目的红色路牌、标语口号等遍布慕尼黑。希特勒此时有些害怕了，他怕自己的演讲使“群众感到乏味”。大会于晚 7 时 30 分开始。希特勒在 7 时 15 分步入霍夫布劳斯酒店已是拥挤不堪的宴会大厅，约有 2000 人参加会议。他兴奋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最使他高兴的是，独立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人占了一多半。他相信，他会得到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并且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会场在大会开始时变得安静。富有经验的“民间”讲演者丁格费尔德是主讲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委婉地攻击犹太人，其柔和的攻击甚至未激怒共产党人。希特勒之后站起身来。没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很破旧的老式蓝色外衣，看上去根本不是个演说家。他开始时讲得很平静，语气平缓。他将近 10 年来的历史简要地讲述了一遍。然而，当提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的声音便充满了感情。他手舞足蹈，双眼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席卷了整个大厅。啤酒瓶满天飞舞。那些带马鞭和橡皮棍的士兵们——希特勒的军内支持者——“像迅猛的猎犬、像坚韧的牛皮、像克虏伯公司坚硬的钢铁”，迅速投身战斗，将捣乱者逐出门外。厅内秩序得到恢复，但仍不时有讥笑的喊声。希特勒继续演讲，他并未因喊声而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的经历使他对此早已习惯，似乎他还

希特勒传

从中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以及讲话，温暖着听众。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将怪叫声湮没了。他痛斥当局正在成吨地印刷纸币，谴责社会民主党人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伊西多尔巴赫或汉梅尔伯格，这样的小市民又如何是好？”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反对者与支持者的喊声几乎势均力敌。但是，当他开始攻击东方犹太人时，喊叫声被掌声湮没了。很多人在喊：“消灭犹太人！”

因为还没习惯面对如此多的听众，他的声音起伏不定。但，人们对经验不足的他仍很感兴趣。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学法律的年仅 20 岁的学生被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他首先认为这个人讲得很真诚，冲击了自己的感受，并非故弄玄虚，告诉听众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在第一个用词华丽的演讲者后，他的讲演引起了轰动。他的话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那些以捣乱为目的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声音清晰，深入浅出，声音直达最远座位的听众。他的演讲“能使糊涂的人明白事理……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给弗兰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他要听众逐条地“判断”纲领的 25 个要点。这个纲领几乎涉及除犹太人以外的每一个人。给爱国者的是联合起全体德国人，组成大帝国殖民地；可以解决人口过剩；在全世界德国应获得平等权利；创建一支人民军队；废除“凡尔赛条约”；“无情地斗争”犯罪分子，以加强秩序与法律。给工人的是按劳取酬；无条件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战争利润归公；给中产阶级的是，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大百货商店社会化，以廉价租赁给小商小贩立即实行；“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健康的标准。给有“民族”思想的人是，要求将犹太人当成外国

希特勒传

人，剥夺其公开开办公司的权利，当国家发生困难可随时将他们驱逐出境，立即驱逐 1914 年 8 月 2 日后入境的犹太人出境。

希特勒在每念完一要点便停下问听众是否明白以及同意。高喊同意的听众占大多数，但也夹杂着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名反对者还跃上桌子和椅子，以示抗议。手持鞭子、棍子的弹压队多次投身行动。希特勒讲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待演讲结束时，他讲的每一个字几乎得到了每个人的认同。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年轻的弗兰克相信，“惟有希特勒才能掌握德国的命运。”

在希特勒看来，包括反对派的捣乱者在内的大会，是个彻底的胜利。希特勒在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觉得，通向自己未来的大门终于敞开了。“当我宣布会议结束时，很多人在想，狼出世了。这个狼肯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狼”，一字对他从那天起，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在亲友中这是外号；对妹妹保拉和他来说，它不是真名；在部队大部分指挥部里，它是希特勒的真名。

慕尼黑的报纸对希特勒的崛起并未给予多大的关注，但对德国工人党而言这次群众大会却意味着大步地前进，吸收了 100 名新党员。希特勒坚持造党员的花名册、发党证。为扩大声势，第一份党证以 501 为编号，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编号。555 是“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

2

他的新生活开始了。

希特勒传

他扩大了交往的圈子，与各类人物均有来往，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恐惧马克思主义和热爱日耳曼的任何事物。有位在慕尼黑的相信星宿摆动的内科医生宣称，他可以辨认出在一群人中的犹太人。曾当过连长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居然是个同性恋者，模范军官罗姆是个可以在危险中信赖的同志，他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长得又矮又胖，笑起来很可爱。他是活的战争纪念碑：他的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鼻尖被打掉了，是国防军里的现任军官。他曾说过，“因为我是成熟的恶人，所以，骚乱和战争更令我感兴趣，你们市民平淡无奇的生活我不屑一顾。”两人的首次相见是在一民族主义小组的秘密会议上，罗姆那时就坚信，这个大无畏的下士最合适领导“德国工人党”。罗姆由于带来了许多军人，他实际上已将德莱克斯勒——哈尔雷之组织的工人阶级性质改变了。这些军人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苦难和鲜血紧密地联系着罗姆和希特勒两人，因为他们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不久前罗姆虽然接替了梅耳上尉的职务变成指挥希特勒的军官，但他坚持让希特勒称自己为“你”。这样的亲密关系也让其他军官接受了希特勒。

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与希特勒的关系越发亲密无间。埃卡特说，新生的政治领袖必须有承受机枪的咆哮声的能力。“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能对赤色分子作出尖锐回答的猴子，还有敢于面对向一群有学识的教授扔桌子腿的群众。”另外，此人应没有家室。“这样妇女就可以被我们吸引！”两人尽管年龄相差很大，背景不同，他们成为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观点相同。均是波希米亚人的他们，能讲社会底层的语言；均是民主主义者的他们，同样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日耳曼女

希特勒传

人的犹太丈夫都应监禁 3 年，甚至处决那些执迷不悟，继续犯罪的人。

浪漫革命者埃卡特，是个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冷眼看待人生，多愁善感，常出现于舞台，是个真诚的江湖术士。若有讲演机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津津乐道，讲得极为出色。他吸毒，是个瘾君子兼酒鬼，他的社会背景造成了他的庸俗。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口若悬河的、热情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他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埃卡特是希特勒的导师，他将一件军大衣给了希特勒，纠正他的语法错误，带他逛高级的咖啡馆和饭馆，并介绍他认识名人文士。两人在一起常谈论文学艺术、音乐和政治，一谈就是数小时。希特勒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两人在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散解的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精锐自由兵团”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占领了柏林。并把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安插进去做了总理大臣。由于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地潜力，埃卡特和希特勒两人双双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有没有必要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这一计划得到罗姆上尉批准，并将他们送上希特勒的运动教练机。战时一流的飞行员年轻的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任驾驶员，他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糟透了，尽管格莱姆拥有高超的飞行技术，希特勒还是止不住呕吐。由于罢工工人占领了中转机场，此次任务险些失败。幸亏希特勒急中生智，自己粘上了山羊胡子，把埃卡特化妆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得以前往柏林。

希特勒传

飞机在柏林着陆后，脸色惨白的希特勒发誓日后不再坐飞机。

3月13日柏林虽然未放一枪便献出了城门，他们的胜利却只是徒有虚名。没有一个有地位的人愿意任职于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这次仓促起义，开始便注定是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破坏活动或反攻。柏林人与全国人民一样以高涨的情绪，卷进了反对军方的浪潮。他们认为不能再搞革命了，所以，工人们全力支持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的总罢工，使卡普政权形同虚设。电车和地下交通由于电力被切断而陷于停顿；全城断水，垃圾腐烂在街上；办公室和商店关门。但这些没影响在烛光中或在黑暗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一部颓废的电影拍得十分过分，电影写的是一群浓妆艳抹的11岁小妓女，与穿高筒皮靴的亚马逊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嗜好”、各种口味的人享用的餐馆和咖啡馆——有男女同性恋者、暴露狂、被虐待狂和虐待狂。裸体已成艳事，而艺术的最终目的又是幻想、淫猥和厌世。蹩脚派艺术家的活动中心设在柏林，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俚语和辛辣的讽刺口吻写了一首诗，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未来的图景送给柏林人：

孩子们，快来呀。
让我们快乐地前往屠场，
勒紧裤带，将犹太狼赶走。
带好卐字章和毒气，
到人群里去杀一场！

埃尔伯特政府大罢工被认为是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已然瓦解，却为左派开辟了另一次叛乱浪潮道路。在德国

全境共产分子掀起的混乱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埃尔伯特总统被迫出面恳求数天前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指挥全体武装力量，以平息赤色分子的叛乱。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就是他的第一个行动。事件的发展着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还是叛军，今天却成了法律秩序的加强者。这场闹剧只有出自蹉跎派剧作家的笔下：埃尔伯特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等于卡普政权曾许诺奖给他们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数额。

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苏维埃共和国在萨克森已夺取了政权，一支拥有5万名工人的红军至3月20日已占领了大部分鲁尔区。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在同一天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将飘扬全国。“德国必将变成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苏俄，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和世界革命的跳板。”

“自由兵团”于4月3日横扫鲁尔区，将红军据点摧毁，对待红军残余可谓残无人道。“如果我说了，”一名“自由兵团”青年士兵在家书中写道，“你们会认为我在撒谎。决不宽恕……10名红军红十字会护士甚至被我们枪杀，因为她们身上有枪。我们杀这些小姑娘时很开心——她们喊叫着哀求饶命！带枪的就是敌人！绝对不行！”

埃卡特和希特勒乘着令他们呕吐，恶心的飞机来到柏林时，卡普起义就要结束了。他们从机场直奔帝国总理府，与匈牙利犹太人卡普的新闻代表特莱比希·林肯进行了交谈。此人是个有点流氓习气的冒险家——他曾在纽约，被认为是德皇的奸细而遭逮捕。他说，卡普人刚刚出逃，他们最好不要暴露身份，以免牢狱之灾。据称，埃卡特当发现管事的是个犹太人时抓住希特勒的胳膊说：“阿道夫，走吧，在这儿已无事可做了！”

希特勒传

但是，他们为了见到偶像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鲁登道夫那时正准备乔装南逃，并与众多观点相同包括“钢盔”党人的北德人磋商，以老军人为骨干的超级民族主义集团，以及得到工业家大量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袖等。埃卡特还介绍他的学生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伦·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她一见面立刻拜倒在“德国的年轻救世主”脚下，并答应介绍他认识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希特勒于3月31日回到慕尼黑。他于同一天成了一介平民，这也许是出于自愿，但更可能是得到了授权。他领取了退伍费50马克，打起背包以及一顶帽子、一件大衣、一件外衣、一件衬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若干双鞋和袜子。在德尔希大街41号他向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里靠近易萨尔河居住着中产阶级。这里的建筑物大都是三四层楼，楼下是办公室或商店，楼上是单身房或小单元房。希特勒的房子宽只有8英尺，长15英尺，不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这房子是本楼最冷的，房东埃尔兰格称，“有些租这间房的客人住病了。现在它是杂物间，没有人会再租它。”

希特勒的住房与《慕尼黑观察家报》近在咫尺，这家报纸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并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的大部分的反犹思想是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的。这家报纸不久前还在头版头条以《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为题目刊登文章。作者认为可用任何残酷的手段清除全部在德国的犹太人。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是俄国逃亡者，这给了希特勒不少有关共产主义逐步危险的信息。

犹太人及和平条约是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被置于第二位。他和埃卡特均表示有些钦敬德国共产党人

之献身精神，恨不得争取他们过来。在《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埃卡特曾推荐“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给他用。在一次演讲时，他告诉参加党内会议的人，德国的共产党人有理想，他们不自觉地拯救德国。

这一妥协让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无论在谈话中还是在文章中，希特勒越来越受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的影响。在这些东方“末日信徒”中，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画家兼建筑师，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最善于说服人的。彼此对对方的印象首次相见时均不甚深刻。“他令我倾倒纯属谎言，”罗森堡回忆说。他对希特勒入迷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我这里，看到了一个前线老战士怎样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明确地、赤手空拳地、令人信服地将这一斗争进行下去。15分钟的讲演，就是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

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发表之后的几个月里，埃卡特的周刊以及其他种族与民族主义刊物上的相继转载，两人变得彼此倾慕，互相亲近。给希特勒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罗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只不过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这在具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了最后的“证据”。《人民观察家报》那天刊登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视为“复国长者”，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24次秘密会议书面的报告。《议定书》有力地证明了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恐惧和偏见；同时也是他与罗森堡关系的转折点。希特勒此后便牢记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说，而直到现在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慢慢地加重了在党的信条中的份量。

绝不止希特勒一人接受了《议定书》。伦敦的《泰晤士报》

希特勒传

于那年5月，发表一篇长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自己写的真实文件，须谨慎对待。首先鼓吹反犹太主义的原是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议定书》在全欧各国及南北美洲广为流传，这就加剧了不怀好意的反犹太主义。天主教徒们几世纪来所受的教育是，犹太人杀害了耶稣，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让上帝成了魔鬼，而且“瘟疫、不折不扣的灾难、流行病”就是他们的化身。总之，犹太人是全世界和基督教的大敌，必须用果断措施对付他们。

希特勒仇恨犹太人，主要来自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期他自己所作的观察。而他从图里会、罗森堡，或从路德、戈比诺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起到支持他自己结论的作用。他不过是从这些人那里取自己之所需而已。影响他更深的或许还是那些小册子和反犹的、满嘴喷毒的低级右派报刊。他自早年以来对这些下流低级的文章就生吞活剥。1920年8月13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著名的慕尼黑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滔滔不绝地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讲了两个小时。他一开头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让你们摆脱犹太人的控制”！他详尽地阐述了自中世纪以来犹太人如何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不具有韵律和独创，宣传效果却十分显著。他反犹思想的根源是他自己，而非历史；但他却善于将眼下发生的事件与历史事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煽动仇恨情绪恰到好处。他的话常被笑声和表示赞同的掌声所打断，他可以得到听众十几次的热烈鼓掌。他视犹太人为游牧民族，认为他们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这引起听众尤其狂热的反应。

早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攻击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可

希特勒传

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他公开攻击犹太人，说他们主张的国际团结以及各民族一律平等，只不过是瓦解其他民族士气的阴谋而已。他先前称犹太人卑鄙、是寄生虫和不道德；现在又成了强盗、破坏者和企图“侵食所有民族”的害虫。希特勒认为东西方的犹太人，无论善恶贫富，毫无区别，统统都一样，因为这场斗争是反对犹太种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过时，应该改为“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要求“彻底解决”。这一点他提得虽模糊，但显露凶恶：“从我们人民中间把犹太人清除出去！”希特勒早已在反犹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慕尼黑邮报》在当年早些时候认为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十分好笑，“阿道夫·希特勒就像是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如同杂耍。”而这次演员说让这家报纸有些清醒，在讲坛上希特勒的魔力被它承认。“你们必须相信，希特勒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慕尼黑，最善于鼓动暴民。”

他并非只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号召种族主义者。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对他的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十分感兴趣。这些人早在1913年就深信“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的一席讲话。“一切危险之源就是犹太民族。日耳曼人与犹太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宣称，领导他们反犹的人迟早会来的。“我们恭候元首！要耐心！耐心！他一定会来。好好工作，要坚持，团结起来！”

这一时期希特勒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那么害怕犹太人。“犹太人嗜血成性！人民的精神领导被斩断在俄国的停尸场。”“犹太人与今日之德国的战斗是独裁与民主之战斗——不，是

希特勒传

日耳曼人与犹太人之战。谁能明白？”“投机和股票市场换来的和平时期之饥饿！犹太人是最大的受益者……为大规模疯狂的灭绝种族所作之准备，可由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被视为武器。饥饿服务于犹太人。”“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屈服于犹太独裁者这个世界交易所的主人。”

这些引语表明了，希特勒的仇恨与恐惧正向一种政治哲学发展。尚处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同时形成。他于那年9月，告诉听众：“我们的手脚动不了了，嘴巴也说不出话了。我们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也不惧怕同法国交战。”此外，他还对与外国结盟问题作了考虑。他不久宣称：“我们的敌人在莱茵河彼岸端坐，并非在意大利别处。”还有，他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他将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主张与意大利结盟以反对法国。这些初步的概念表明他正呕心沥血地制定既合乎逻辑又可以施行的外交政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偏见与信念；从一系列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了老百姓固有的偏见与信念。他现在终于开始梳理自己的理论系统了。但是，他首要的目标，即自从他挣扎在维也纳的苦难中时起若隐若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不是固有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实际政治领域内加快步伐。他赤手空拳地扩大了党的基础——现在这个党的名字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希望，这个名字将鼓舞和激励人们，将胆小鬼吓倒，把愿为自己梦想而流血的人们吸引过来。

希特勒出于同样的精神，坚持自己的党旗可以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相媲美。“我们的旗帜要比他们更红。”德莱克斯勒回忆，“要超过且大不同于赤色分子。”最后，一个来自斯坦伯格

的牙医交来一面背景是黑、白、红三色的旗帜，是当初党建立时曾使用的一个卐字。卐字在梵文中意为“包罗万象”，就是长期以来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图里会”、“自由兵团”都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代表欧洲人以及生命之始末或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此后，或许是永远，卐字将被赋予某种罪恶的涵义。

3

卡普起义，以及共产政权在德国中部的灭亡，使社会主义事业危在旦夕。由于采用机会主义的立场，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利用“自由兵团”去反对鲁尔区工人，加深了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鸿沟。内部又于1920年秋初分裂为旗鼓相当的反共和亲共两派的叛逆者，在哈勒集会5天，以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为目的。来自莫斯科的、最鼓舞人心的第三国际的总裁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是大会的发言者。他受苏维埃的委托，要把大约90万人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他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讲的“是有点不连贯的德语，然而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博得亲共分子对他的演讲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激烈的辩论在左右两翼之间展开了。一些观察家认为，后者的论据虽然充足，但令人兴奋的却是世界革命的思想让人无法抗拒。会上，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第三国际的有237票，有156人投票反对，他们在投票后，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成为共产分子。

希特勒传

有个名叫奥托·斯特拉塞的代表带着觉醒和惊诧离开了哈勒。季诺维也夫的演讲让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起来像新的救世论”，德国接受莫斯科统治。斯特拉塞和他的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抱有社会主义梦想很久了，两人均准备承受受外国左右的激烈的改革。德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他们所追求的。这点，奥托认为，只存在于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

奥托在哈勒大会后，成了无党派人士。心烦意乱的他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商量。格里戈尔组建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炮队、步兵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俄国人最为危险，但没有任何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他说：“只有行动才是惟一的。”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这个问题。

奥托·斯特拉塞回忆，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停在他哥哥的药店前。两个男人走出来。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鲁登道夫，所有民族主义者心中的英雄。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在他身后不远处，他的胡子又粗又短，蓝外衣有些不合身，“像营长的通讯员”，此人便是希特勒。“我们必须团结起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鲁登道夫将军说，“希特勒先生负责政治训练。”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则由鲁登道夫接管。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指挥，并加入希特勒的党”。

希特勒许诺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让格里戈尔担任，并许诺把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不屑一顾。他插话问，有没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纲领不是关键问题，”希特勒说，“权力是惟一的问题。”奥托反驳说，权力只是实现纲领的手段而已。“这些只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

勒扼要地回答道，“权力才是我们需要的！”希特勒不喜欢奥托是显而易见的，不一会儿便指责他串通赤色分子，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当即进行反驳。自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怎能支持卡普之流？他这样解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曾在柏林奋斗，如同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的希特勒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正确，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只有他。

鲁登道夫打断了他的话，“民族主义反对派政治绝对不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绝不是资本主义政治。”任辎重兵监时，他比诸资本家、工人的麻烦更多。这惊人之语带来了新鲜空气，在友好中会晤结束了——但格里戈尔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他要认真思考。格里戈尔当晚告诉弟弟，他已决定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会面，即使希特勒未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将军对他的使用会恰到好处，”他说，“我在这方面相信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透露党纲给奥托·斯特拉塞，并不是因为他难于启齿或没有，只是他太顽固，不愿和曾反对卡普的“卖国贼”讨论此问题。再有，希特勒此行是为争取格里戈尔以及他的部队。他在分别时感到这两者必定要加入他的阵线。他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属同一种人：打过仗的下级军官，也是一级铁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他显然是有信念的人。他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且认为犹太人是两者的“大脑和脊骨”。

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只是希特勒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在不到一年时间，改变党的性质，而且党员人数还被提高到近 3000。所有

希特勒传

时间他都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四处游说，使党和他本人均相当出名。曾任主讲人出席过约 80 次群众集会的他，与埃卡特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一同前往柏林，并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发言。

希特勒并未被讲坛上取得的成绩冲昏头脑。事实上，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步，“不能出去，告诉人们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好能讲演！最好能讲演！”他常常如此高喊。由于不满意自己的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和讲演方法，他便顽强地改进这两者。为此他参加对手的群众集会，并认为对方的主讲人“妙语连篇的有如报刊文章，又像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语，中间还穿插些小笑话”。他懂得了这种冗长的集会是该忌讳的。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具有鼓动力又生动活泼，气氛也是亲切而实事求是的，与会者还可享用免费的香肠、啤酒等；有时，若经费许可，还有民歌和手风琴演奏助兴。然后，时机一成熟，希特勒便在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和奏乐声中出场。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场，然后像演员似的善于观察听众的反应，使讲演方法与内容达到观众的要求，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使会议达到高潮。

希特勒并不满足于群众集会的成功。他需要一份自己的报纸，一个更宽阔的论坛。原来那份诽谤言论过多的《人民观察家报》早已濒临破产。他需要这份报纸，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盼望已久的时机。希特勒于 12 月 17 日清晨两点钟，突然闯到埃卡特的居所，万分激动地宣称，资不抵债的《人民观察家报》将被卖掉，但不能落入外人之手。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让它成为宣传自己纲领的论坛。党必须买下它。出价便宜，仅为 18 万马克。希特勒认为，埃卡特在富有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

子不应该不成问题。

德莱克斯勒于次日上午 8 时，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埃卡特式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有苦说不出的时刻。德莱克斯勒回忆：“他起初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起出门了。”他们至中午时分，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募得 6 万马克，其他人捐款达 3 万马克，该报 10 万多马克的债务由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当日下午 4 时便办理妥当。希特勒及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到此时，已作好了为进一步跃进的准备。

4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于一个月后的 1921 年 1 月 22 日，在慕尼黑召开了首届年会。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党已发展得具有一定规模。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像磁铁似的迷人的精力和引人的个性以及讲演才华，把原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的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对这一转变十分关切。虽然他们感激希特勒为了无生机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不知这是否值得。希特勒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人们的支持。罗姆、罗森堡、斯特拉塞兄弟这些追随者带来的，毫无疑问，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众多的同仁和私交，非常反感这个老兵，他们认为，他有太多的波希米亚同僚。还有，有哪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企业家、银行家以及贝希斯坦似的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如此亲密呢？

首届年会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希特勒公开夺权，发动叛

希特勒传

乱。但权力垂手可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只得到 411 名代表的响应，希特勒控制住了自己；另外，关于策略和政策方面的逐渐增大的分歧，一般党员也不明了。因此，大会表面上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心中有数，大会在明争暗斗，大家于是便齐心协力，准备让希特勒在 12 天后在齐尔库斯·克罗纳成功露面。

那年冬天尤其难熬。抢粮事件在德国全境此起彼伏。德国给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巨额战争赔款使社会混乱加剧了，濒临破产的德国要支付 1340 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生活在寒冷中，忍饥挨饿。工人的年工资额仅够糊口，中产阶级的日子很苦。

各主要政党由于群情激愤，均在考虑在科尼希广场联合举行抗议示威是否可行。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这一行动最终被取消了。希特勒于 2 月 1 日要求作出最终决定，因组织不充分，行动委员会答复他们初步决定一周内举行大会。“我对此忍无可忍，决定单独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希特勒于当日中午，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第二日晚上的大会场地，据说，戏院租金低廉，甚至免费。希特勒随后口述了一份内容华而不实的海报，令许多忠实的党员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 6000 名观众，由于时间紧迫，上座率不会很高。

直到星期四上午海报才张贴出去。希特勒本人也为当日雨雪交加发愁，匆匆口述传单内容，并派人送去付印。他们下午坐上两辆租来的张灯结彩的卡车，挥着卐字旗，在城里穿行，每辆车上有 10 多个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的党员。在慕尼黑街头，还是首次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他们在某些工人住宅区，受到愤怒的拳头喊声的“欢迎”。

希特勒传

希特勒于7时左右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与会者寥寥无几，情况在10分钟后稍有好转：7时45分，厅内的座位已坐满3/4，票房门口还排起了长龙。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希特勒“满心欢喜”地进入演讲大厅，“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大厅。它似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面前。”整个马戏院的人群黑压压一片。

他以“毁灭或前途”为演讲主题。他满心欢喜，将自己前途期冀于眼前的人群。他开讲半小时后，已与听众沟通，知道他拥有了听众。“自发的掌声”开始将他的讲演打断。之后，会场沉寂一片，非常庄严。“在这庞大的人群中，你仅能听见呼吸声。演讲结束的话音未落，场内立刻掌声雷动。人们以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歌声中大会结束。”使人们的情感如洪水般宣泄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如痴如醉了。他呆立在讲台上足足20分钟，目送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黑冷的小屋内。

在慕尼黑报界希特勒的皇冠马戏院表演，同时受到嘲笑和赞扬。嘉奖和辱骂同样令他兴奋，他认为自己遭受猛烈攻击和反对的情况同样表明他已打进了人们的内心。尽管骚乱由希特勒而起，他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当时民族主义者正欲变慕尼黑成首府，且获得警察局长及其“政治处”主任秘密的支持。其时，人们向警方投诉，党在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这两名官员竭尽全力地平息了这些暴怒。“我们知道，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运动是不该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证。“我们的确那样做了。因为在党内我们看到了德国新生的种子，我们有意克制自己。我们至今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扎根于深受

希特勒传

马克思主义折磨的工人中，并把争取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员。我们保护希特勒先生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原因就在于此。”

他多少也得到了巴伐利亚政府官方的承认。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接见了希特勒以及其他党的领袖。这位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奇特地位的总理，使魏玛政权未侵犯到巴伐利亚，使之保持许多自治权以及继续抵制愚蠢的北方佬发来的一切指示。希特勒在这件事上与卡尔持有共同观点。虽然卡尔与这个“奥地利狂人”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他感到这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友好的接待使公众领悟到，希特勒是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老头子与他的分歧现正向赤热化发展，希特勒是欢迎这样的。由于希特勒本身颇强的吸引力以及群众对他们颇浓的兴趣，使他成为知名人士。这情况说明，他不但改变了原来党的目标，而且有全面夺权的意向。他的政敌便因此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与一群奥斯堡的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是无害的，但希特勒认为，这招很狡猾，以削弱他的影响为目的。他迅速赶回慕尼黑，准备攻其不备。他于7月11日，宣布退党。3天后，他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将退党原因提交给全体党员。他宣称如果不能出任党的主席并拥有独裁权力，他将永远离党。他说：“我提出这些要求，不是因为我极切地渴望权力，而是近日的事件使我坚信，如果没有铁一样的坚强领导……党原来的性质便会在短期内失去，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与西方的某个协会不能等同。”这是战争给予希特勒的领导原则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绝对服从指挥官。

希特勒命令委员会在18天内必须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

希特勒传

怒发冲冠，拒绝屈服。随着一本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的匿名小册子在党内的散发，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把幻想与事实混为一谈，蓄意捏造，恶意中伤。但是，例如，希特勒浪费了大笔金钱在女人身上，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是犹太人的雇佣兵之类荒唐可笑的内容，连作者本人也不相信。

8天的期限过去了。委员会和德莱克斯勒并未在8天限期过去之后开始行动。希特勒的讹诈看来要失败，然而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埃卡特成功地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德莱克斯勒以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小组为条件，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于是，他们正式通知希特勒，同意了他要求的独裁权，并以“您超凡的学识，您为本党成长作出的光荣的贡献和不平凡牺牲，以及您超凡的雄辩口才”等华丽词句请他去任党主席。

7月29日召开特别大会，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大会由巴伐利亚人赫尔曼·埃塞主持。因为希特勒年轻，以喜与女人交往著称的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他被希特勒称为“必须拴链的猎犬”。他于会上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希特勒接着便宣称，他曾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进行反复斗争。“我们并不希望联合其他组织，”他说，“我们只接受合并他们，以保持领导权。不接受的可以走。”这话是说给奥斯堡小组以及其他城外入听的。“慕尼黑是我们运动的发源地，也将在慕尼黑继续下去。”他在结束讲话时，一再重申与德莱克斯勒之友谊，并宣称，准备就任党主席。投票结果是：1票反对，543票赞成。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对权力被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掌握后，他们抛弃了一切德国工人党的

希特勒传

传统，因为党内精英完全同意新秩序无法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民主的秩序和议会式的辩论不得再出现在党内。他们此后将恪守元首原则。

希特勒与此同时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竭力抚慰老头子。他未加强纪律，也未颁发命令。相反，当年夏天他在慕尼黑为加强党内支持力量忙碌，并悄悄地扩充原用以维持政治大会秩序的那个手段凶狠且召之即来的小组为一支身穿制服、组织严谨的编外部队。8月初这支名曰“体操运动师”的编外部队建立。建立该师的目的据党的一份公告称，“是要纳入青年党内一强大组织，使他们成为进攻力量，听党指挥。”它两个月后获得了一个显耀的名字：“冲锋队”。对希特勒来说，冲锋队只是一种维持秩序的政治工具，同时，因为他们在街上巡逻时身穿制服，可在热爱纠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它被冲锋队队长罗姆看作是自己的私家军，是支真正的武装力量。“自由兵团”各部是冲锋队的核心，他们略微修改了早期的战歌：

卐字盔戴在头上，
黑白红袖章戴在臂上，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如此响亮！

党这个工具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军，又由他完全控制，希特勒便准备让党走上一条更加“革命”的新道路。他在尔后数月内，调唆起一系列公开挑衅的事件。这次骚动开始时，所有行动从表面上看，都是无意的：有人袭击街上某犹太人，散发小册子，不住地挥舞旗帜，还有一些小争吵，等等。然而，

希特勒传

1921年9月14日在“巴伐利亚团”在罗文布劳酒店召开的会议上，继这些小小的扰乱治安行为后，有一件大事发生了。“巴伐利亚团”这个联邦主义者组织，反对其集权主义，却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正当被希特勒认为是“最危险的反对派”的该团的领导人工程师巴勒斯特开始演讲时，希特勒大踏步进场。大批便衣冲锋队员在此之前，已安插在前排听众中。他们在希特勒进来时全体起立，高喊着为他助威。加入助威行列的还有安插在听众中几百名党的追随者。赫尔曼·埃塞站在一把椅子上高喊：“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犹太人！”此话一出，听众便异口同声要求巴勒斯特“让出发言权”给希特勒。有人为了防止争吵，关上了电灯。结果是乱成一团。冲锋队在灯火重新亮后，涌上讲台，围住巴勒斯特，将其一顿痛打，并抛进听众席里。

希特勒在警方调查此次扰乱事件时，毫无悔改之意。他顽固地说，“没有什么，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堵住了巴勒斯特的嘴。”事情还在发展。埃塞与希特勒二人得到通知，因扰乱治安他们将受到审判。对他俩审判激起的却是暴力，暴力事件于11月4日，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斯酒馆讲演时爆发了。希特勒在晚7时45分进场时，800多人挤满了大厅。妇女们被安排在尽量远离太平门的前排。这番警告并未吓走马格达莲娜·施威耶太太。希特勒住所对面有一家果蔬店，她就是那儿的老板娘，忠实地追随着希特勒。“我过分激动，并不害怕什么。毫无疑问麻烦就在眼前，厅内的赤色分子占了一多半。”实际上，来自伊萨利亚仪表和其他工厂满怀敌意的工人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因为总理冯·卡尔已被迫辞职，巴伐利亚政府也不再暗中保护党了，更温和的温

希特勒传

和派掌权了。

希特勒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来得更早，大部分位子都被他们占了，便下令关闭所有的门。他告诉冲锋队员们，他们表示忠心的机会到了，“在死之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他们认为进攻是最有力的防守。希特勒富有浪漫色彩的叙述，也反映在他追随者的回忆中希特勒如此自信地看待自己，追随者们也是如此：只有具有钢铁般意志、战壕里出来的战士，才能恢复祖国的光荣和荣誉。

工人们在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高喊，以示威胁。希特勒继续前行，旁若无人。赫尔曼·埃塞此时已在前边的一个讲台上站着，叫大家安静，要开会了。希特勒在他跳下讲台后登台开讲。会场上开始时“呸！”声不止，但是，即使以嘲讽为目的的人们也被迫洗耳恭听。这样，他很自在讲了半个多小时。然而，他的对手们正等待下手的时机——无数充当武器的啤酒瓶子，被他们藏在桌下。某人猛然间打断了他的讲演，遭到希特勒大声反驳。愤怒的喊声在大厅内此起彼伏。有个男人高喊着跳上椅子：“我们要自由！”有个啤酒瓶飞向希特勒脑袋，接着又飞过来七八个。“快蹲下！”前排的小伙子们高声告诉妇女们。“你只能听见怪叫声，扭打声，啤酒瓶的乒乓声，被木椅的折断声和推翻的橡木桌椅声。他们在厅内，大打出手。”刚蹲下的施威耶太太出于好奇抬头一望，只见希特勒岿然不动，尽管他周围啤酒瓶在四散乱飞。人数不占优势的冲锋队员们与捣乱者凶狠扭打，半小时之内，把对方全赶下了楼。厅内桌椅全被打翻，到处都是啤酒瓶，看上去，好像刚挨过炸弹似的。赫尔曼·埃塞的声音在嘈杂声中终于传来了：“请发言人继续演讲。继续开会！”

冲锋队员们在希特勒继续演讲时，或包扎伤口，或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讲毕，掌声雷动。一位警察就在这时，匆忙跑来，大声喊道：“散会！”

5

霍夫布劳斯的争吵进一步证明，只有敢于使用武力者才能取胜。希特勒及其德国全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那晚的胜利使之威震四方。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诚实善良的市民们便要求结束这些粗鲁的行为。巴伐利亚新政府也迫切想遏制希特勒，但又没有掌握希特勒挑衅的证据。新政府发给希特勒携带手枪的许可证，以示公平。

全德国的民众和民族主义者表示不满的先兆是他之炫耀武力。德国那年早些时候，拒绝了盟国增加战争赔款的要求，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被比利时军和法军占领了，作为对德国的制裁。盟国两个月后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每年支付 20 亿马克，以及出口总额的 25% 作为赔款。通牒还同时威胁说，若不应允，鲁尔区将被全部占领。

温和和保守派的内阁决意不从，但此时控制政府的“中央党”却妥协。像希特勒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被这投降举动激怒了，从而引发了包括暗杀“中央党”的领袖、签署停战条约的“罪犯”马西阿斯·埃尔茨伯格等一系列暴力行动。许多要求维护秩序与法律的德国人，都把杀人凶手当成了英雄来欢呼。

国联于 1921 年年底宣布将西里西亚还给波兰，这又成了民族主义分子愤怒的新原因。马克贬值和冬季来临，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使德国人更为不满。外交大臣霍尔德·拉德

希特勒传

诺于 1922 年复活节星期天，突然转向东方，与苏联在拉巴罗签订了条约。这进一步激化暴力气氛。由于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之流，不懂这一联盟对他们振兴帝国事业将有所帮助，而对此万分愤怒。德国从政治孤立中觉醒，痛击了西方盟国。他们对此竟然视而不见。

俄国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得到恢复，彼此放弃向对方赔款的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一方与第三方签订影响对方经济的协定必须事先争得对方同意。俄国急需现代技术；德国则决心在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怀疑的情况下，违背凡尔赛条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列宁早已提出让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对此求之不得。于是，两国军方的联系日益加深，来往密切。红军得到德国军队的训练，并学会使用特种武器。

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这种合作的范围及影响的。尽管苏联与他签订的条约极大地推动德国的重新武装，要求德国必须拥有强大军队的德国人却把他说成是个赤色分子，因为他们勾结苏维埃人。这是在给他抹黑。其实，他由于决心遵守在凡尔赛条约中许下的大得有些恐怖的经济诺言，早已成了对西方奴颜卑膝的代言人。此外，拉德诺是个富裕的犹太人，纳粹又诽谤他为犹太人统治世界暗中出谋划策。这位天才的爱国者于 6 月 4 日，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暗杀。

巴伐利亚最恐怖的行动分子在同一天交上了厄运，被逮捕入狱。希特勒告诉追随者：“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 2000 年前也是如此将一个人拖赴刑场的。”话音刚落，他就被以煽动暴乱为名抛进斯达德廉监狱。他跟着狱卒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狱卒“友善地”指出，这间房子曾住过许多名人，例如巴

希特勒传

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纳等。听到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希特勒并没显得很高兴。在他看来，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此次的行动却让他懂得了安全之重要。此后，他的车后被装上了探照灯，没有一个跟踪车辆的司机能“睁开眼”。

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严酷的旨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的《共和国保护法》。它遭到了巴伐利各色民族主义分子强烈的反对。就在吵得不可开交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他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隔绝的期间，被迫重新检讨其狂热的思想。在近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每天只是思考和看书。对犹太人的恐惧和憎恨在此期间形成了较系统、比较明确的理论。他一出狱，便积极地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他出狱当天，便作了一次生平最尖锐的、题目叫《自由国家还是奴役》的讲演。这表面上是针对新法，实质却是痛斥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的阴谋。对犹太人为何取得了如此的权力，他使用了从未如此丰富的材料，效果从未这样强烈也从未这样“合情理”地得到解释过。

他在布尔格布劳酒店，对听得如痴如醉的听众说，在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与民间力量和民族主义间，在全欧洲猛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的奠基者便是犹太人，工人运动和控制股票交易所的仍然为犹太人。希特勒说到这里，学着舞台上犹太人的样子，一个耸肩，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又说，犹太人为破坏者，是剥削者，是强盗。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为决战做准备，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使国家解除武装。”犹太人为此就得堵上敢于公开抗议人的嘴。希特勒在长达一个多小时对犹

希特勒传

太人的斥责后，才转入正题。“众所周知，今天自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只是压制批评、封人嘴巴的手段。”但是没有谁可以封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他公开宣称要采用武力。“所以，在我讲话结束前，希望青年们做点事情。这有特殊的理由。原来的党只训练青年们的口才，我要让他们学会运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还处于茫然之中的青年，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都会真正找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如果对哲学做研究，在这样的时刻在家中炉火旁闲坐，或继续埋头书本，他肯定不是德国青年！响应我的号召吧！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将面对十分艰难的命运，得不到什么，还会失去一切。“与我们并肩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物质好处——也许会在牢房里度过一生。今天的领袖，必须有理想。如果只为了领导一些人去反对一些人，那么，好像一切就是不谋而合。”由于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听众欢喜若狂。

希特勒在尔后的两星期里，继续攻击新法，到8月16日，在科尼希广场他成了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这次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的召集人原是“祖国联合阵线”。会场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比较安静。突然，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从远处传来。接着，数队带卐字臂章的人们踢着正步列队进场。他们打着15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共排成6个纵队。广场上不到几分钟，便挤满了狂热的人群，人数高达1.5万！

在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在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讲演。起初，他的语气平和，也不怎么动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回忆：“他的声调不一会儿便

提高了，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他的声调缩紧了人的感情，具有神奇效果。”他摆动着小手，钢蓝色的眼睛在闪烁，似在恳求，又似在恐吓威胁。不知不觉中卢德克为希特勒所陶醉。他中了催眠术似的如痴如醉。猛然间，“狂人”希特勒变成了爱国英雄，成了又一位路德。“他的魅力，是让德国男人拿起武器，如同他赖以宣传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拥有了一个随和的皈依者。

卢德克当晚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又听了希特勒的讲演。在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认识了头发蓬乱，满头大汗的，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又破又脏大衣的希特勒。然而，在卢德克眼里，希特勒那么有性格、有勇气。卢德克次日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奔向希特勒。他们在4个多小时畅谈后，庄重地握手。“我将灵魂托付给了他。”

6

对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使巴伐利亚和魏玛之间逐渐加深裂痕，这孕育了另一次政变。慕尼黑是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政变的策动地。他计划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为依靠，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代替巴伐利亚政府。

于是，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库尔特·卢德克，便受命到柏林地区将最后的指示传达给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他穿越北德，其身份是“德国人保罗·里维尔”，掀起床上的民族主义者们——后来据说，巴伐利亚平安无事。他于1922年9月底乘火车返回慕尼黑后，在驱车赶到彼庭格总部时，恰巧遇上这个

希特勒传

医生。“这就是政变？”卢德克质问道。但是，“神态高傲，戴着眼镜”的彼庭格，对他不屑一顾，坐着“麦塞蒂斯”牌轿车，去阿尔卑斯山度假了。他的起义从此杳无音信了。只有领袖被迫隐藏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

在一间破阁楼里卢德克找到了希特勒。卫兵格拉夫和一条巨犬正与他作伴。“我和我的人都作好了准备！”他愤怒地对卢德克说，“我从此以后，要独行其事。”即使单枪匹马也要自己干。“不再需要彼庭格之流，不再需要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先生君子们，这些将军们和公爵爷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单独干！”

希特勒于那年早些时，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承认：“我一无所有。你创造了德国复兴的精神食粮，我只是一个召集人、鼓手。我们应该合作。”摩勒认为应成立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被希特勒拒绝了。他告诉同事：“那家伙永远不能掌握它。如果看见他在办公室里我宁愿自杀。”

彼庭格丢人的起义让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自行其是的元首。这个想法让卢德克兴奋异常，卢德克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正力图成为意大利领袖的技巧。他的法西斯运动是社会主义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拉维纳和意大利其他城市最近被他的黑衫党占领。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去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能否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墨索里尼在米兰热情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对希特勒其人未曾有过耳闻。他同意希特勒关于国际金融问题和凡尔赛条约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措施的问题上，他却没有明确的回答。当问到墨索里尼假如意大利政府对他的要求毫不妥协，他会不会动武时，他的回答非常肯定。“我们会成立新国家，因

希特勒传

为这是我们的意志。”他口气强硬得似乎是君主。这给卢德克留下了深刻印象。

卢德克向希特勒汇报时是那么的热情。他说，也许在几个月内墨索里尼会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国家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是狂想的民族主义，都是反议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两者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另外，两个领袖都来自人民，且久经沙场。

墨索里尼准备用暴力夺取政权最令希特勒感兴趣。卢德克回忆：“当他听到黑衫党占领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军队严守中立，有些地方竟然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好像若有所思。”它是靠胆略可以取得伟大胜利的证明！

希特勒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起义地点在上巴伐利亚位于慕尼黑以北约 160 英里一个叫科堡的小城。那天，几家当地的民间协会组织，正在庆祝“德国日”的活动，公爵夫人和科堡公爵是主宾。两人都是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已故沙皇还是公爵夫人的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带“若干随从”前来参加，于是希特勒便率领近 600 名冲锋队员于 1922 年 10 月 14 日上午，乘专列离开慕尼黑。每位冲锋队员带了两天的干粮，踏着由 42 人演奏的吹打乐节拍，像过节似地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像是出发旅行似的说说笑笑，节日的气氛也充满了希特勒的车厢。共有 7 人与他同行，都是他内层的左右手和知交：前军士摔跤手，酒吧间保镖兼马贩，小册子作者兼前共产党人，建筑师，作家和自封的老世故的卢德克，热情奔放的埃卡特和冷若冰块 of 罗森堡。前者之杰出才能与知识，令他人黯

希特勒传

然失色；后者一直目光迟钝地盯着他，好像他不在场。

在纽伦堡列车停车半小时，以便追随者得到享受。车上的人又叫又喊向窗外挥舞卍字旗，乐队再次奏乐，引来许多好奇的路人围观，像看马戏团似的。在旁边停着的列车内的犹太人，冲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尤利埃斯·施列克，未来的希特勒的司机，“跳进犹太人群，勇敢撕杀”，才结束了这场热闹。冲锋队人数越来越多，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已达 800。脸色严峻的希特勒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选科堡为战场，是因为这里有众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科堡人民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见这群打着红旗吹吹打打，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的人，都十分惊讶。进行曲一响，冲锋队便操起正步，开进城里。8 名只穿短皮裤衩身背铁扞手杖的巴伐利亚粗汉走在最前面，接着是挥舞黑旗和红旗的队伍。希特勒以及 7 名随从走在旗队后边。800 人的队伍走在最后，他们有的持橡皮棍，有的持大刀。有些人穿着灰军装，打了补丁褪了色，有的则穿着华丽。左臂带着卍字袖章是惟一共同标志。希特勒本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头戴垂边帽，穿着军大衣，扎着皮带，脚穿滑稽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高喊着“强盗！杀人狂！罪犯！江洋大盗！”从两旁涌过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依旧操着正步对此置之不理。当地的警察引着队伍来到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锁上大门，但希特勒固执地认为他的人马应进驻在射击场。冲锋队员们于是又踏着鼓点，再一次穿过敌对的人群，走向市郊。这时如雨点般的鹅卵石打来，希特勒一挥鞭子，冲锋队员们立刻拿起橡皮棍朝进攻者还击。队伍在人群慌忙后退时才继续前进，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那样趾高气扬。事事考究的卢

希特勒传

德克最自豪，他觉得老百姓接纳了自己。“人们不管衣着好坏皆英勇奋战。他们看到这点便原谅了我的裁缝。”

左派分子于星期天上午，举行示威，“赶走纳粹”，大约一万人的抗议队伍将集合在广场，庞大的反对派队伍反而使希特勒要破釜沉舟。他决心“一劳永逸地铲除赤色恐怖”，此时便命令 1500 人左右的冲锋队穿越广场，挺进科堡城堡。希特勒中午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抗议者只有数百名。市民们昨天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无言的反抗眼睁睁看着冲锋队开过；今天，窗台上挂出了的帝国国旗数以百计，一排排友好的群众站在路旁，向戴奇怪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们欢呼。他们今天成了英雄，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各个角落的统治被他们推到明处。“这是你们典型的资产阶级，”希特勒对在他身边走的人说，“危险时是懦夫，事后又变成了吹牛家。”

在科堡的成功使希特勒感到，他的冲锋队和他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墨索里尼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墨索里尼的黑衫党 10 月 28 日开赴了罗马，攻占了该城。

与通常一样，4 天后，作为希特勒之代言人，埃塞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希特勒是德国的墨索里尼！”

第五章 “如此通情达理又 如此疯狂的人”

1922—1923

1

希特勒到了 1922 年已在身边笼络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职业与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尽管存在很多的差异，但所有人的共同点都是恐惧马克思主义赞同民族主义。包括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和鲁道夫·赫斯，前者是众所周知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后者在是战争初期希特勒所在团的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为了飞行员。虽然两人家境富裕，且对希特勒将成为德国之前途坚信不移，但两人性格脾气上和外貌上都有显著差异。

戈林，装腔作势，为人轻浮，易与人交友，性格外向，且常常能控制友人。曾当过区法官的父亲，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 8 个孩子。戈林排行第七，他对时髦的学者身份毫不在乎，却意在从戎效忠国家。他通过教父的关系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成为了知名人士，在结束了第 27 次空战后，获得了“功勋奖章”这个最高军事奖章。他在瑞典航空公司任飞行员，与卡琳·冯·坎佐这个

希特勒传

有夫之妇订了婚。卡琳的父亲是瑞典贵族，母亲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世家。他俩在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过安生日子，但他急欲返德，以“雪失败之耻，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铲除穿越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习政治学和历史，但他对现实中的政治更感兴趣。他为此曾试图在上过沙场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政党。“我记得，他们曾以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为主题开会。‘你们这群蠢货！’我告诉他们说，‘你们难道认为，一个优秀的军官找不到一张睡觉的床来？就算漂亮姑娘的床他们也找得到！见鬼，眼下还有更主要的事情呢！’我给老着脸皮的人头打了一下。当然，大家大笑，会议也散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此了结。他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才找到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的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各党派的发言人逐一上台。群众后来高喊着“希特勒！”说来也凑巧，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夫妇的附近，他们偶然听见他说，他根本不想讲话“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听”。希特勒那时身着军大衣，扎着皮带，戈林被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于是，戈林便参加了一次在纽曼自助餐馆举行的党的会议。“我坐在后边，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罗森堡也来了。希特勒解释他为何未作发言。他说，讲得不痛不痒法国人都会有睡觉的机会。你的威胁必须用刺刀支撑。是的，我要听的就是这些。他要建立一个能粉碎凡尔赛条约，能使德国富强的政党。‘是的，’我告诉自己，‘这才是我需要的党！推翻凡尔赛条约！见鬼，太符合我的胃口了！’”

他在党的总部填了入党申请表。这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如此破旧的办公室里，这无疑引起了轰动。他回忆说：“有人对

希特勒传

我说，希特勒立刻想见我。”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风度翩翩的戈林就满足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碧眼闪闪发光、身材高细的、皮肤粉红中带白的北欧人。“他说，正当他要找冲锋队的管理人时，我恰好找他。这是运气！”他们决定一月后宣布，但戈林却立即开展了冲锋队训练的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训练。我告诉众人说：“军队！这是军队！”

他看上去是地道的日耳曼人，然而，他还不是希特勒所说的种族主义者。他的许多朋友事实上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希特勒的政党，“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革命，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我想我要参加一个搞革命行动的党派！”他热衷于行动，所以被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也正是希特勒当时急需的人。他与社会各界人士和容克军官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会议上和在游行时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毫不在意。

若鲁道夫·赫斯与戈林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是他的出生地，父亲是个富有的出口商和批发商。父亲想让他经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想当个学者。他曾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就读，后在瑞典进了高级商业学校学习。后来由于战争他辍学了，战后他根本不想从商。他与戈林一样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历史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认为“十一月罪犯”出卖了他，但他没有从事自己的革命，只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在街头演讲，也参加示威游行。作为“自由兵团”成员，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也参加了。

他同样在寻找领袖。他的论文《谁能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辉》在大学时期曾获奖，他认为，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上街游行使用口号和煽动民众。他必须从人民中来，但又绝对的与

希特勒传

众不同。他必须生来具有“完整人格”，“不惧怕流血，是靠铁和血来解决大是大非的”。他为达此目的必须敢于“践踏挚友”，施行法律铁面无私，“机敏而小心谨慎地”对待国家和人民，必要时“可将他们踩在骑兵的马靴下”。

在希特勒身上赫斯看到了理想，并以希特勒的心腹和亲信的身份呆在他身边一年多。他与此同时还效忠于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日语讲得流利，1911年回国后，他致力于亚洲事务，坚信国家存亡与其所控制的疆域关系密切。战争就证明了他这一理论：德国为什么受窒息，受包围，最后战败，就因为它缺乏生存空间。他于停战后出任慕尼黑大学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自给自足才能救国，为此，德国需要自给自足及生存空间。对希特勒和豪斯霍弗教授，赫斯均极为佩服，希望二人可以联手。豪斯霍弗太太的父亲是犹太商人，这是其中的障碍。赫斯虽然认同种族主义理论，但他毕竟有血有肉，既忠心于教授先生，也忠心于教授夫人。

风华正茂的赫斯不独断专行且谦虚，他虽曾奋战在街头和战场，其具血腥味的论文也曾获奖，但他并非是嗜血成性者。他爱音乐与书本甚于激烈辩论，但也常出现在咖啡厅论战中，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他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眉毛黑浓面目方正，两眼炯炯有神，嘴唇紧闭，俨然“准备好了践踏挚友”。只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出青面獠牙的机智灵敏的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真面目。伊尔塞·赫斯回忆道：“他不苟笑，不喝酒，不抽烟，厌恶战争失败后还社交和跳舞的年轻人。”对不熟悉他的人来说他是个谜。他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而不屑于争权夺利，他是个理想的信徒。

希特勒传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是另一个盲目追随者。他秃顶矮胖，肥头大耳，看上去很粗壮。无论是在床上，或在餐桌旁，他都有过人的胃口。他时而亲善而直率，时而又残忍而狂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伤感跃至冷酷。他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手中经常拿着鞭子。希特勒将鞭子套在手腕上像一条狗链子似的，而他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他年轻时到处游逛，身上的背包装满了反犹小册子和书籍，他的演讲，满是疟待狂的想象，用最污秽的语言攻击政敌。由于他坚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喘气满是无穷无尽的谩骂之辞。

他参加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纽伦堡支部于1922年刚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报纸《冲锋队员》专门谴责犹太人。这份报纸在“毒素”和污秽方面已大大超过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维也纳杂志《东方天坛星》，并引起了希特勒的许多亲信的惊愕。希特勒本人极反感色情文学，反对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十分关注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但是，他与此同时又佩服施特莱彻的疯狂与充沛的精力。“底特里希·埃卡特多次告诉我，当过中学教员的施特莱彻，从许多方面看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支持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必会取得胜利。”施特莱彻常招人斥责，因为他在《冲锋队员》里常大大言过其实，对此，希特勒的回答却让人惊讶：“人们说，他理想化了犹太人。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凶狠，更加卑鄙，更加穷凶极恶。”

这种人就是希特勒的亲信。他的运动贯穿了社会各阶级，因而拉拢各色人等在他周围——有知识分子、各种怪人、街头战士、流浪汉、理想主义者、雇佣兵队长、不守纪律的和守纪

希特勒传

律的贵族和劳工。既有残酷无情者也有文质彬彬者；既有善良的人们，也有流氓无赖。有作家、短工、画家、牙医、店主、士兵、学生以及牧师。他的魅力是无穷的，而他也心胸开阔，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他都能容忍。许多人认为，他就是一切，而他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们。

“这个时期是我最愉快的，”19年后的一个冬夜，希特勒动了感情，回忆了很多。他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时很高兴。“当我今天偶遇他们中的一个时，我极为感动。他们真诚地爱护我，甚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上我，‘送几个鸡蛋给希特勒先生’，……我爱这些真诚的人们。”

他从不贬低那些卑贱的追随者，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新总部，地方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避寒之地的追随者而设的。菲力普·波勒回忆说，“冬天一到接待室便成了支持者和失业党员暖身之地。在那里他们吵嚷地打牌，热闹极了。自己的说话声常听不见。克里斯汀·韦伯主管常用长马鞭才能轰走他们。”

2

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于1922年秋引起盟国的兴趣。美国在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指派杜鲁门·史密斯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此人是西点军校毕业生，耶鲁大学学生，驻柏林副武官，美国派史密斯去见希特勒，“对他的人格、性格、弱点和能力”作一估计。他也要调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潜力和力量。也就是

希特勒传

说，史密斯必须设法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巴伐利亚能否宣布独立？慕尼黑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是否存在？巴伐利亚的政权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否夺取？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还是完全忠于帝国呢？如果发生左派或右派叛乱或骚乱，它能否镇压他们？”

史密斯上尉于 11 月 15 日午前抵达慕尼黑。他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立即前往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 28 岁的代领事罗伯特·墨菲。墨菲告诉史密斯说，巴伐利亚新总理“是个谈和派的人物”，因为他只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他说，力量正在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其领袖虽“是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正在挖掘潜在不满的真正的人物”。巴伐利亚人的心态希特勒很是了解，但能否“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不能确定的。

他与政府官员陆军将领，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以及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在尔后的数天里进行了交谈。罗森堡之密友舒本纳·里希特对希特勒开始产生的影响向史密斯保证，党的反犹主义只是“纯粹的宣传”。他随后邀请史密斯到新的党总部前参观检阅冲锋队。

史密斯当晚在旅馆客房内作了如下记录：“确实壮观，我从未见过 1200 名壮汉挥舞着旧帝国国旗，带鲜红的卐字臂章，正步走过希特勒跟前，接受检阅，希特勒在检阅完毕后，发表了讲话……高呼着‘消灭犹太人’等口号。人们狂热地欢呼。我生平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史密斯于次日，也就是星期六，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交谈。这位将军曾认为，“首先要消灭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然后才能消灭德国。”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

主义抗衡的强大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混乱的现有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只有靠爱国人士组织”。他坚信：“欧洲反动势力觉醒始于法西斯主义运动”，墨索里尼“真正同情德国的民族事业”。

史密斯于星期一下午4时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之地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乏味单调得让人不敢相信，就像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面的卧室”。史密斯于会见后在笔记本里这样称希特勒是“杰出的在野党领袖。”“一个如此通情达理又如此疯狂的人发表的议论我很少能够听到。他有巨大的控制群众的能力。”希特勒用“联合体力脑力劳动者反对马克思主义”来描述他的运动。还说，“如果要镇压布尔什维克主义，必须停止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必须取代议会制”，“令德国站稳脚跟的只有专制主义。”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文明的决战，最好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而不是在英国或美国土地上，这对英国和美国更为有利。德国的民族主义若得不到我们的支持，必将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存在了，而德国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必然会出于自恃之动机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了很多事情，但对犹太人他却只字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尖锐地提出反犹主义。希特勒回答，他只是“同意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取消其公民权”。这便顶回了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史密斯已坚信，希特勒将是德国的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1月22日，希特勒将发表演讲，史密斯也得到了入场券，但由于出乎意料他被召回柏林，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便得到了这张入场券。此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个子很高，一副瘦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汉夫施坦格尔会

希特勒传

去看希特勒这家伙，并转给他结论吗？史密斯说：“我认为，他能起很大作用，不管你是否喜欢他，他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因为汉夫施坦格尔有不寻常的背景，希特勒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汉夫施坦格尔母亲出身于虐德维克斯家族这个新英格兰名门，他祖上南北战争时期出过两个将军，其中一人曾为林肯扶棺。曾在萨克赛—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的有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两代人，他们对艺术品颇为了解且有收藏。在慕尼黑，这个家族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精美的艺术真品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从小受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他的家是威廉·布希、黑利·雷赫曼、菲力克斯·文加纳、理查·施特劳斯、威廉·巴克豪斯、弗马克·吐温和里特佐夫·南森等人的会见地点。他本人也能弹出美妙的钢琴曲。人们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也常可看到他那高达 6.4 英尺伏于琴键上方的身躯。“小家伙”是他的外号。

汉夫施坦格尔于 22 日那天乘电车到 L 形的大啤酒馆金德酒馆，里边挤满了人。听众中有些小官吏和退伍军官，也有小店主，工人和青年占了大多数。许多人穿着巴伐利亚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但一个也找不到。他想知道希特勒在哪儿，幸好有个记者向他介绍台上的三人：小个子的是梅克斯·阿曼；安东·德莱克斯勒戴眼镜；第三个便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又笨又重的齐脚踝的鞋，身着黑衣，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他在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时，昂首挺胸地迅速地走过记者席前，那无疑是个穿便服的军人。”

掌声雷动。希特勒双手背在身后，叉开双腿，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的语调，将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件作一回顾，然

希特勒传

后便把矛头巧妙地指向政府，却又不使用讥讽或庸俗之辞。他用的是文质彬彬、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的高腔德语，仔细地讲着，汉夫施坦格尔离希特勒只有 10 多英尺远，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眼中充满了正直、真诚，又有无言的尊严和苦难。”希特勒在开讲 10 分钟后完全控制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打着手势，以狡猾的恶意，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旁敲侧击。坐在汉夫施坦格尔邻近的妇女，津津有味地看着。有个妇女后来竟喊出声来：“讲得好，一点不错！”希特勒在此时突然提高了声调，好像是在感谢她们。他手舞足蹈，极力谴责发国难财之人。

希特勒拭去额头上的汗水，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的啤酒。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认为，这是很富有戏剧性的。他的手势在恢复讲演后更有力了。经常有听众叫骂，此时的他便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地作答，或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抵御叫骂者的进攻。“他的技巧如同击剑运动员的招架和冲刺术，以及走钢丝绳运动员娴熟的平衡动作。他有时候也像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用一种弦外之音去表达思想。”但是，他一旦猛攻他的敌人——赤色分子和犹太人时，谨小慎微之举便不复存在了。“如果你不愿当德国人，你的头颅就会被我打破。这是因为，只有斗争，我们才能成功。我们用思想斗争，不过，从不放弃使用武力。”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如痴如醉，清醒后，环顾四周，使他因听众态度的完全改观而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嚷着推搡他的群众，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深受感动，鸦雀无声。

希特勒传

他们屏息倾听，眼前的啤酒被忘得一干二净，似乎喝进去了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她忘却了自己，完全陶醉于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他在演讲达到高潮时，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演讲猛然间结束了。听众敲打桌椅，狂热地欢呼。精疲力尽的希特勒，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精疲力尽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音乐会”。他的脸和头发都浸透了汗水，汗水软化了上过浆的衣领。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希特勒在那里面带自信的笑容，谦虚地接受着群众的欢呼。“请允许我转达杜鲁门·史密斯上尉对你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史密斯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怎么看他之演讲。“哎，你的意见我同意”，他谨慎地回答，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我赞同你讲的有95%，我们以后再谈其余5%。”其余的5%，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太主义。

“我相信对此小小的5%我们不会争吵”，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说话的同时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拭去脸上的汗水，显得既友好又谦虚。他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然后伸出又硬又粗的手，握起来“如同前线战士的手”。

汉夫施坦格尔当晚失眠了。“当晚的印象在我心间挥之不去。所有演讲家和保守的政客都惨败于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但是，自学成才的希特勒，却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成功地交给了人们，而我们恰恰需要这么大的支持。”汉夫施坦格尔决心辅佐他。

史密斯上尉刚刚向上司呈上慕尼黑之行的报告，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于2月5日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私人报告。该报告

希特勒传

称：“本人的结论是，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出现严重的分裂只是时间问题。战时效忠德国的奥地利青年下士，一场法西斯运动的领袖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缓慢地、高效能地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前进。我们曾前往该地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是杰出的演说家，虽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却是个伟大的领袖。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资支持，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但进展缓慢。他告诉曾前往该处之杜鲁门·史密斯，我的武官助理，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他不拟发动大规模运动，他正募集装备和资金，一切顺利。”

国务院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的事务，这份报告被束之高阁，并未引起轰动。但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及冲锋队人数的激增，却受到逐渐慎重的关注。巴伐利亚州内务部于12月中旬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说，以希特勒为领袖的运动，“无疑是政府的威胁，危及现政权形式甚至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若得以实现，混乱和大流血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几乎与此同时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很奇怪的报告竟是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写的，它系希特勒与保加利亚领事进行的坦率谈话。希特勒说，因为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德国议会政府面临崩溃。不可避免左派或右派的专政。虽然左派控制了北德的大城市，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入党，在巴伐利亚肯定会得取胜利。还有，75%的慕尼黑的秘密警察是工人党党员，在普通警察中，数量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控制北德。巴伐利亚为拯救民族，必须组织反革命，一位

希特勒传

铁腕独裁者是必要的，即“如果需要，随时可以踏着满是尸体和鲜血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以后所作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预测，尤其是它预言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支持希特勒反对法国占领鲁尔区和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恐怖岁月，并准备随时采取冷酷的行动，消灭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3

英法两国于 1923 年初，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执，英国代表团离开了该委员会。法国便有机会以武力解决赔款问题。法军与比利时军于 1 月 11 日以德国未信守诺言为借口开进鲁尔区。这一行动唤醒了全德国的民族主义精神，马克随即更快地贬值。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不到两星期，便从 6750:1 跌至 50000:1。魏玛政府为一次柏林之行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由 7 个办公室人员抬着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 20 马克的纸币，从办公室直到火车站”。现在则需要 49 人。

通货膨胀、鲁尔区被侵占，以及失业率上涨，不单加固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使更多的人追随希特勒。对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之事，希特勒不屑一顾，他组织独立的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也就是 1 月 27 日，举行 7 个公众集会。

希特勒全然不惧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对于集会将会查禁的警告。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动武，那请便，他反正在第一排

希特勒传

坐。他果然如此。那一天，他匆匆坐上车子，视察会场。“在战时以及革命时期，如此激愤之群情我未曾见过。”曾在参加罗文布劳酒店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迈着大步穿越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走过。此时的他显然完全不同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他苍白的脸上透露了内心的狂热。他寻找要征服的敌人似的双眼横扫左右，是群众赋予了他这神奇的力量？是他身上的力量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而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

他们次日又不顾警方之禁令，6000名挥舞旗帜的冲锋队员，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打着冷颤站在雪中。有些人头戴同样的滑雪帽，身着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穿商人服。他们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字大小不等。这群穿五花八门衣服的人，听到立正口令，他们都笔直地站着，就像德皇的精锐师团。警察虽然作好捣乱准备，却未出现混乱情况。实际上，这两天的集会很正常。没有暴力事件以及公开的骚乱，但也引起极大的反响，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因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而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走向更激进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降低了。希特勒获得了与当局首次严重对垒的胜利。

“他是杰出的人物，”参加了几天后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强烈而简短。他的拳头，攥紧了又放，放了又攥紧。他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很短的时间里有些不正常：神经质的双手，奇异的双眼，头奇怪地摆动着。”他的私生活依然不正常。茨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依然是他的家，房子虽然大了些，也比先前的暖和，但家具却未

希特勒传

有增加。这间房子 10 英尺宽，室内惟一的窗户又小又窄，地板上铺着廉价的旧油毡，简易的书架在床对面的墙上。墙上挂满了插图和画幅。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色书籍，有德国历史，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汉夫施坦格尔回忆，书柜下方放满了小说，其中包括埃杜阿德·伏希斯写的半色情书籍，和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认为，他的房客异乎寻常地阴沉。“他有时候一连数星期脸色阴森，一字不说。甚至不看我们一眼，无视我们的存在。”他虽然提前或按时交付房租，却“是地道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她因为他很好，原谅了他，还允许他用过道里的大钢琴。他的生活简朴异常，一条名叫“乌尔夫”的巨犬常伴他左右。自从战时与“小狐狸”建立亲密关系，狗身上特有的那种忠诚是他需要的，而他对狗的了解是独一无二的。“有些聪明得令人痛苦，这些狗很愚蠢。”住在阴暗的小屋里，他无疑会想到母亲及其惨死，他大概就在那年写了一首以《想想吧》为题的诗。这首诗内容还相当丰富：

当你母亲年事已高，
而你也不再年轻；
当昨日之轻而易举，
成了今朝的重挑；
当她亲切而忠诚的双眼，

看待人生已不似往常；
当她软弱无力的双脚，
再不能带动她的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扶住她，
幸福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时刻终会临降；
她最后的旅程你伴着她走完，
假如她向你发问，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再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发问；
再次回答她吧，
切莫雷霆大发，
而是轻声细语！
若她不明了，
温柔地解释给她；
悲痛的时刻终将临降，
当她不能再启口！

希特勒承认，他年轻时是个遁世者，从不与人交往，但他在战后“不能再忍受孤独”。虽然他的房间是孤独的牢房和避难所，但他在慕尼黑的沙龙里、自助餐馆里、啤酒馆里和咖啡馆里过着并不孤独的生活。他是卡尔顿茶馆、威查德餐馆和赫克餐馆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僻静的角落里。他就是如此观察他身边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与他的心腹总是在组迈埃尔餐馆会面——那里是个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的老式

希特勒传

咖啡馆，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凳子是固定的，墙上镶有木板。他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常告诉追随者自己的最新想法，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也是在这里一边吃着经济晚餐，一边说笑和闲聊。

他在其他的夜晚，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是多么和谐！他是如此地照顾他的小安娜！”安娜，事实上是安纳尔，他的管家。他与妻子分居以来，一直与她同居。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在这些日子里，也许是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人。他常介绍希特勒认识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和威廉·冯克那样重量级人物。他常和汉夫施坦格尔一同出席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这位出身匈牙利豪门，成为出版商妻子的政界新秀对希特勒印象极深。她生活的水平让希特勒晕眩。他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告诉汉夫施坦格尔，他穿的蓝衣裳使他尴尬。贝希斯坦先生身着晚宴服，仆人们身着制服，晚宴前是香槟酒。“他的浴室你还没看见呢，竟然可以调节水温。”

汉夫施坦格尔常去茨埃尔大街那间小房子作客。一天，希特勒让他去过道弹上一曲，好“让他安静一会儿”。汉夫施坦格尔用这架老掉牙的走调的大钢琴弹了巴赫的一首曲子。希特勒其实心不在焉却不住地点头。汉夫施坦格尔又弹奏了《诗乐会会员》前奏曲，他边弹边担心这架老钢琴会因他的重击而垮塌了。他“满带浪漫的姿态，以李斯特的架势弹奏着”。希特勒兴奋地在狭窄的过道上踱步，还像管弦乐队们的指挥那样比比划划。“这首曲子让他倍感精神，待我结束弹奏时，他变得兴高彩烈，一切愁闷烟消云散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背得“滚

希特勒传

瓜烂熟，还会用奇特的振动音和谐地将每个音符吹出来”。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每天都在举行音乐会。希特勒对莫扎特和巴赫的作品不感兴趣，比较喜欢肖邦、舒曼的作品，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一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瓦格纳和贝多芬的作品。他“能真正欣赏和理解”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用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演奏的《罗安格林》和《崔斯坦》百听不厌。

希特勒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而将他当作值得炫耀者让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认识。“其他人被他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他们不知道他与谁谈过话或去何处，”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写道，希特勒“拉我出去，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走家串户，让我演奏钢琴。”一次，他在摄影家汉利希·霍夫曼家中演奏了哈佛大学的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奏进行曲的乐队和拉拉队的头头们能使群情激昂，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的叫喊。汉夫施坦格尔说具有快活节拍的美国音乐可以改编成法国进行曲，希特勒很快便来了兴趣了。“很好，”希特勒边喊，边比划，如同鼓乐队指挥。“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好极了！”汉夫施坦格尔用给冲锋队的乐曲写了几首这种体裁的进行曲，但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才是他最重大的贡献。

汉夫施坦格尔住的施霍宾的对面，便是希特勒 1914 年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希特勒是他家的常客。汉夫施坦格尔有德国血统的美国老婆赫仑纳也许吸引了他。她是高个子，皮肤、头发、眼睛均为非常引人注目的褐色。“他来时，穿的是蓝哔叽做的那套他最好的衣服。他很大方庄重，甚至有些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拘泥于下层。有较高爵位的人士、

希特勒传

受过较高的教育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谈话形式。”很明显，赫仑纳的魅力、热情和美貌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他。他很尊敬她，几乎是崇拜。她在10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描述了1923年年初与他在慕尼黑街道相遇时的情形：“他那时是个羞怯、消瘦的年轻人。他的碧眼中闪着恍惚。他穿着破旧——廉价的白衬衣，黑色领带，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一身旧蓝外套，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廉价黑鞋，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看上去颇为可怜。”

她邀请了衣着寒酸的希特勒到家里吃晚饭。“他打那天以后，便是我家的常客，跟我的儿子玩耍，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谈论复兴日耳曼帝国的希望和计划。邀请他的人很多，但我们家他好像最喜欢，因为我们不会用一些古怪的问题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炫耀他是‘未来的救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做笔记或读书看报。我们不把他当成‘名人’。”在她眼里希特勒只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对她两岁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他很喜欢孩子，而且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为迎接希特勒朝门边跑去，却一头撞上了椅子，哭了。希特勒假装用力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埃贡小宝贝’。这使孩子又惊奇又高兴。从那以后，他每次来都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淘气椅子的屁股。’”

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到春天时相处得已轻松自如。他为了使他们高兴而常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或模仿那些追随者的动作。他会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边闲聊，一聊就是数小时。有时候，他也喝加上“满满一匙的糖”的“约翰尼斯伯格酒”。他们常公开一起外出，有天晚上还一起看了电影《弗里

希特勒传

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年迈的君主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是他最喜欢的一场戏。在回家的路上他评论道：“太有风度了，老国王为了加强纪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德国法律也应如此。不是砍头就是释放。”

多愁善感闪电般地转到残酷无情，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也就多议论了一些关于他的私生活。比方说，女人与他真正的关系。一天，他对他们说，“对我说来，我的女人就是人民，群众，”他的听众也被他当成女人。只有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才能有效地演讲。“你自问，男人身上的什么是女人所希望的？决心，干脆利落，行动，权力……若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为你作出任何牺牲。”又有一次，他宣称永不结婚。“我惟一的新娘便是我的祖国。”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他为何找个情妇？”希特勒回答说：“政治是女人，你若不真心爱她，她就会咬掉你的头。”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确信，他的情妇是他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自愿当他的保镖，她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却不相信。她说：“去！告诉你，他是中性人物！”

希特勒此时的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形影不离一起追求姑娘，”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他俩常在画室或艺术学院去看裸体模特儿。希特勒有时自称“乌尔夫先生”，于晚间在街头巷尾与莫里斯一起游逛，寻找姑娘。莫里斯由于对姑娘们有吸引力，所以充当中间人。莫里斯回忆，在自己房内希特勒常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他还常常送花，即使身无分文，我们常欣赏那些芭蕾舞演员。”

希特勒传

汉夫施坦格尔已全天为国社党工作。从建议希特勒将小胡子弄时髦一点，到看不起他的顾问罗森堡，他都大胆地提出意见。希特勒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仍向在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的借了不给利息的1000美元，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变成了一笔巨款。希特勒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变周报《人民观察家报》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大方慷慨，竟出人意料地使他恨之入骨的人走了红运。因为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希特勒让埃卡特代替了罗森堡，提任《观察家报》的编辑。这个职务不但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还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神秘人物里希特与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的德国高层社会和企业界有着联系，已慢慢地成为希特勒的一位主要顾问。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所有俄国逃亡者，大部分人满脑子都是沙皇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粉碎犹太的阴谋。这些狂热者认为，用经济手段和社会手段反犹已无济于事，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有效。

4

希特勒于1923年春天忙得焦头烂额。他四处奔走，为党筹集急需的经费。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二人于4月初，坐上希特勒的由莫里斯驾驶的“塞尔夫”牌的老爷车，前往柏林。他们穿过萨克森，因为共产党控制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他们在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碰到了赤色民兵的阻拦。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尔挥挥他的瑞士护照，然后用带美国口音的德语

希特勒传

说，他是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外国造纸厂，车内是司机和随从。他果真蒙混过了关。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称“他们会砍下我的脑袋”，但是，他显然不喜欢别人称他为随从。

他们在柏林不仅到处讨钱，星期天还参观了国家艺术馆和军事博物馆。希特勒在国家艺术馆内，欣赏雷姆卜兰特的《戴金头盔的人》，对画中人军人般的英勇表情尤为注意。他说，这个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他在内心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和雅利安人”！他们后来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希特勒没显出狂想，却坚持要继续看几场。他说，“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毕竟不如这个嘛。”

他们次日离开了柏林，绕开了萨克森。一路上，希特勒为了驱除长途跋涉的烦闷，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纳的歌剧，并手舞足蹈地表演，使同行旅伴不致乏味。他借一首以“依特勒”结尾的对偶长诗，嘲笑自己。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高兴时希特勒就会反复朗诵经他改编的这首诗，使我们捧腹大笑。”

在理查·瓦格纳的家乡的莱特，他们作了短暂停留，节日剧院的看门人带他们参观了剧院。舞台上仍是《飞行的荷兰人》的布景。此剧自1914年宣战以来一直在此上演。汉夫施坦格尔看见此布景乘机指出，他的曾祖父费尔迪南·海涅设计了此剧的最初布景。希特勒陶醉于这里的一切，特别是瓦格纳墙上仍挂着他对艺术家和职员们教诲之词的书房。

在那次最后一天旅程的中午野餐时，莱比锡城外那座纪念“各国反拿破仑战役”的纪念碑使汉夫施坦格尔深感不安，他对此作出了评论，他说：“在下次战争中，有一点很关键，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一定要控制好。”这话表明，罗森堡及其

希特勒传

俄国朋友们在对希特勒宣传。汉夫施坦格尔认为与俄国交战是完全没有必要，需要考虑的是美国。“如果你对他們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战争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而没有其他什么意见。很明显，这个论点“他并未听进去”。

希特勒一到慕尼黑就开始着手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的准备，但他却未直接表达，他更乐意做的事情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在4月13日，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无产阶级充当了领袖；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其实，犹太人的真正目的是独占世界！“所以，”他喊道，“德国和俄国推翻古代的预言才能得以证实！全世界才能义愤填膺！谎言大肆宣传，德国——最后一个思想主义者的国家开始被反对！这样，犹太赢得世界大战！或者说，你们更希望看到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讲演时，希特勒自己被自己所感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200万德国人和数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或因战争导致残废者申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必须建立一个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开始变得不实际。他们的反犹主义看上去合乎逻辑，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界限。他颠倒了世界：英国、法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德国才是最后的赢家，因为犹太人的控制逐渐失去了。如果希特勒是自我欺骗，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呼吁原始的感情，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能记忆的细节已所剩无几；他们只记得要拯救德国，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必须将法国逐出鲁尔，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是最主要的。

希特勒传

希特勒的讲坛技巧在过去一年来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纷繁复杂。他手臂的突然高举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他具有伟大的管弦乐队指挥的风格。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向下的手势打出节拍，还能将其指挥棒向上挥，挥指出内在的意义和节奏。”在演讲中希特勒使用了音乐感觉和知识，使自己的演讲极富音乐节奏。三分之二为“进行曲节奏”，然后速度加快，引出最后“狂热”的三分之一。他的仿声技巧也炉火纯青。他善于模仿想象中的反对派，“常以反论打断自己，在彻底粉碎假想敌后，再继续原来的思路”。

无论他的演讲结构多复杂，其主要目的是要产生感情共鸣，要跟上并不难。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转换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恐惧、愤怒、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折，他仍像一个杰出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那样，带领听众向前。

希特勒的才能还在于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当我发表演讲时，尤其是对那些因种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或对非党员讲话时，我常讲得好像他们的决定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应是众人的榜样，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激起了他们的雄心和虚荣心。一旦我目的达到了，剩下的就好办了。”他说，不论贫富，所有人的内心都有尚未履行义务之感。“沉睡在某处意味着将要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某种冒险或最后牺牲于险境。最后一分钱会被他利用于彩票。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是我的任务。每次政治运动实质上的基础都是以其支持者为自己为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东西的愿望。……人们的地位越低，对参与他们高贵的事业就有更强烈的欲望，如果我能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的现状，他们便会成为不可抗

希特勒传

拒的所有阶级的运动的一部分。”

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历来都是准备好的。除了迎风飘扬的旗帜和扣人心弦的音乐外，现又增加了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敬礼和罗马式的旗帜这新的色彩。这两者也许都是通过墨索里尼而借鉴凯撒的，但他说，直臂礼是德式的。“我曾读过描写关于‘昆虫国会’开会情形的文章。人们在此期间，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表明，人们并不是要与他刀枪相见，而是和平相见……我大概是于1931年在不来梅的拉首次看见这种敬礼方式的。”不管源于何处，在旗海和乐声中，举行礼在振颤的“万岁”声中进行，他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德国真正的声音。

希特勒在公开声言反犹和反法的当天再次公开对抗巴伐利亚政府。他和一名前军官共同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战斗组织工作组”由一支私家军官任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与右派激进集团混合在一起。两人向总理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动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这一要求被魏玛拒绝，那么，巴伐利亚就意味着公开违背法律。

19日这天是星期五，希特勒要求星期六给予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由于没有得到答复便于星期天也就是复活节举行“军事演习”。希特勒在敞篷车内站着，当冲锋队和其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伸手检阅。透过戈林的私家车，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看到，希特勒双眼“满是满意和胜利”的光芒。希特勒于检阅完毕后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献给了她。之后，他们“快乐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他却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能吃用乐

希特勒传

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他的小屋几乎堆满了这种蛋糕。他说：“别忘了这座大楼是犹太人的，为了毁灭对手，让毒汁沿墙壁往下流，这太小儿科了。”

总理星期一终于给希特勒答复了：他本人也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它是现行的巴伐利亚法律，他只有执行。希特勒爆炸性的号召群众于5月1日举行游行，以示抗议，因为“五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工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苏维埃共和国统治摆脱慕尼黑统治的周年纪念日。右派激进势力于4月30日晚上，便涌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几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已有近千人拂晓时便集结在那里。为防止意外发生，他们还设了岗哨。逝去的时间按小时计算，但仍没有行动。希特勒回忆说，“6时，一伙伙赤色分子来与我们对垒，但他们并未对我们的挑畔作出反应。”

城外的各队人马于9时许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增至1300余人。在温暖的阳光下他们持枪而上，焦急凶狠的希特勒，手提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藏在哪儿？”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和一支军队，团团围住武装示威者。恼怒的罗姆上尉与他们一起前来。他对希特勒说，他刚去了当地驻军的将军那，将军说如果希特勒不立即缴械，那么后果完全由希特勒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的请求撤销。缴械的决定无疑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如果发动进攻，希特勒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终结他作为政界领袖的前途。他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取得了成功。他的部队在施霍宾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共产党被打得四散逃窜，旗帜也被放火焚烧。这

希特勒传

是希特勒得意之时，他即席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标志着消灭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它只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前奏。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使部下士气高涨，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转瞬即逝。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傍晚时已彻底失败。这一失败令许多坚定的追随者离他而去。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我完全唾弃希特勒！5月1日他惨遭失败，他将永远失败！”

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则是更大的难堪和失败。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将他送上了法庭。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招架之力。希特勒坚定不屈，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他反败为胜。

然而，包括罗伯特·墨菲在内的很多国外观察家预言，他的结局因此开始。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热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厌烦了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因他既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也没产生什么成果。他的反犹运动四处树敌，他年轻的追随者近乎捣乱的行径使众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万分痛苦”。

5

墨菲所反映的，只是巴伐利亚地方官员的印象。这些官员误认为“五一”后的政治沉寂是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表现。这种政治上的沉寂一直在延续，中间只有一次暂短的骚乱发生。这次骚乱的导火线是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炸坏在杜斯堡附近铁路以抗议鲁尔被法国占领

希特勒传

而被处决。他的罪名是破坏罪，于5月26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在下周众多爱国组织将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认为，希特勒应放弃山中度假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位于德奥边境的美丽的疗养圣地贝希特斯加登，找到了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化名为乌尔夫先生，在“英里茨公寓”居住，该公寓建筑在一座陡峭的山上。希特勒起初并不打算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因为听讲的什么人都有，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两人于是草拟了讲稿。

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当晚抱怨说，希特勒到处虚张声势，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向公寓经理夫人炫耀。“我看不惯希特勒的这种做法，”他说，“这家伙显然已疯了。”他还说，希特勒为了在夫人跟前卖弄自己谴责伯林言过其实，“……那荒淫无度，那奢华，那种不公平，犹太人的财富以及那华丽摆设，让我讨厌极了，几乎叫我不敢置信。我也许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耶稣是以兑换金钱为业者。”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着皮鞭，高喊他神圣的任务是如耶稣降临首都，鞭笞腐化贪污的人们。

希特勒次日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去火车站。他在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说，被撤换不久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他被叔本华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若听从他那些胡言乱语，我将走向何处？人们的意志与愿望被降到最低限度！多妙的高论啊！丧失意志，便丧失了一切。这一生就是战争。”他说完便“以奇特的颤音”吹奏起《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妻子也不赞成。希特勒逐渐高涨的革命热情，几乎让他们惊慌失

希特勒传

措。那些反对希特勒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建立，而是与富人、工业家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惴惴不安。希特勒心里必定明白，党内的又一次次反叛正在他的眼前——一次次产生于那些起初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认为他是德国新生领袖的人们的惊愕和不满。

希特勒于那年9月初，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阻止威信下降。在纽伦堡9月1、2日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向这个古老的城市涌来，在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警方报告，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有什么活动可以产生如此的“热情”。街道上成了巴伐利亚和纳粹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着“万岁”，向游行部队及鲁登道夫投掷花束和挥动手绢。“那些悲惨的、被战败的、被粉碎了的、背井离乡的人们，看到了一丝摆脱穷困和奴役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让这种情感无拘无束地流淌。许多女人和男人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了。

游行者大都是国社党徒。希特勒于大会开始后在其中之一会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他比在科堡更显潇洒：平平整整的衣裳，整整齐齐的头发，鞋也变成是矮筒的了。“骰子用不了几个星期就要滚动了，”他预言，“正在今天形成的东西比世界大战更伟大。在德国土地上它将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德国战斗同盟”于次日成立了。这从表面上看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却是国社党的发明。施勃纳·里希特任秘书长，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罗姆统辖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它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的第一个公告：宣布反对国际资本、议会主义、和平主义、阶级斗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传

“德国战斗同盟”在纽伦堡的“德国日”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重返革命的舞台。在一个月后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组织的政治领袖。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是它的“行动纲领”。有谣传，希特勒正部署另一次革命。他事实上确曾宣布，他也许会采取行动，赤色分子再次夺权将不能得逞。“我们的运动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作好帝国崩溃的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长起来的幼树可代替倒塌的老树干。”

巴伐利亚总理欧仁·冯·尼林虽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却对希特勒煽动暴民的战术忍无可忍。尼林于9月26日对内阁说，迫于形势，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是“可放手行使执行权”的内阁领导。他提议任用前总理卡尔，因为几个民族主义团体都支持他，天主教会和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也很尊敬他。

卡尔以秩序与法律的名义接受这繁重的职务。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是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对此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机会。如果他成功反抗，他就也许会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人们建议他退却以后再寻找机会，认为党还没有强大到可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鼓励他行动。“若现在还没有表示什么，战士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黑团的团长说。“为保持士兵们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不能无所事事，否则，他们会转化为左派激进分子。”

希特勒注意到这些敦促的言辞。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向革命，并准备在慕尼黑及其附近寻找行动的盟友。他终日忙于探

希特勒传

访和会见各类有影响的人物：政客、军界头目、官员和工业界人士。他还与党的动摇分子和中坚分子谈话——威胁，许诺，诱惑。有一句话他常说：“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妥协，才会让他们与我们一起前进。”

“谁也不可能动摇他的决心，”赫伦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我注意到许多时候，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他眼中表现出一种不予理睬的、遥远的神情。好像他已封闭脑子，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不予理睬的、遥远的神情有种特殊的含义。他认为自己正与墨索里尼较量——而柏林是他进军的目标。这并不只是向亲信透露的幻觉。他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全巴伐利亚全力进攻柏林。“救世主的和拿破仑的思想现在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人回忆说，“他宣称，他脑中响起了拯救德国的号召，而这个任务落在他身上是早晚的事。之后，他作了一系列与拿破仑的对比，尤其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起义在啤酒馆

1923

1

希特勒于 1923 年 9 月的最后一天收到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写这封信的人是“你们党的一个狂热的党员、一个老党员”。信中写道，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惊异的预言。“1889 年 4 月 10 日出生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粗鲁，也许会出现危险，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非常可能由此而发。”此人必须认真加以对付，他在未来战斗中注定要扮演“元首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虽然她未指名道姓，但她所指很明显是希特勒。她未明确说是哪一天，但她警告说，如果近期的行动过于鲁莽，也许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也预言了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并指出了具体日期。总之是凶多吉少：如对某事在 1923 年 11 月 8 至 9 日“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后果”。

许多人士均十分关注这些预言。几个德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已考虑“心理占星术”的问题。瑞士精神病医生 C·G·

希特勒传

荣格的热心门徒 O·A·H·施密茨博士不久前指出，占星学可能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希特勒以“星象和女人究竟与我何干？”这句话评论埃伯汀的预言。

不管相信占星术与否，希特勒确信自己的命运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赫伦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他一概不听肯定以外的声音。他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意外地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正在此拜访瓦格纳 86 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齐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极为佩服希特勒及其国社党。她热烈地欢迎他，她 6 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厚厚的毛袜、巴伐利亚皮短裤、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红蓝花格衬衣的希特勒有些滑稽。“他的脸色灰白，颊骨高高突起。眼睛蓝得不自然。他看上去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其他的东西，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在书房里和音乐室里希特勒很不自然地、笨拙地、羞怯地来回走动。他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蹑手蹑脚地走动。后来，他在花园里向瓦格纳一家谈起他最近的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逐渐深沉。我们后来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听音乐的小鸟，但他说的任何一个字我们都没有听进去。”瓦格纳太太在他走后说，“你们不认为他注定是德国的救星吗？”齐格菲大笑不止。希特勒在他看来明显是个“骗子”和暴发户。

在街道的另一边，希特勒拜访年迈的已瘫痪在轮椅里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英国一位海军上将的儿子，是认为德国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来到此地的。他过于神经质但是个天才。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当时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崇拜瓦格纳，娶了瓦格纳的女儿爱娃。希特勒给这个英国种族主义

预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当晚“他睡得更香，睡的时间更长”——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香最甜的一觉。他于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便已改观。德国在最需要的时候产生了希特勒——这证明了德国之活力。”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更让希特勒自我感觉良好，即：他掌握着德国的命运。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约在一星期后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大雾笼罩着公路，他们红色的“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的一路上没有人开口说话。后来，他告诉赫仑纳说，“在这次失误中，我注意到你一点儿都不害怕。我知道我们是安全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化险为夷，并且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

2

伪装在通货膨胀面目下的命运的另一方面，好像也有利于希特勒为其进军柏林。战前的一马克到10月初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如今一个鸡蛋的价格在1913年大约能买3000万个。为应付支出，许多工商企业和城市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帝国银行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或被迫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笑柄：票面额为1000马克的去年12月印的纸币，现在用红印打着“10亿马克”；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票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已变为200亿马克。假定这200亿马克当时可以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不怎么漂亮的带天文学数字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

希特勒传

时，它也就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意换给他硬通货。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让钞票在身上呆一小时。一个人的月薪有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要是他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的话。一个年轻跑堂在巴登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攒的钱原本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现在呢，却买不起四瓶香槟酒。“德国为要欺骗盟国而将货币贬值，”跑堂说，“不过，我得到的是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无疑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老年人和工人的身上。工人们面临着饥饿，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人寿保险之利息或债券维持生计的人们，已彻底地破了产。现在用钞票支付用黄金保道的马克购买的股票，一过手便遭遇贬值。只有美国在国内战争后普遭相同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其中的滋味。

大概惟有债务缠身的人们是高兴的，因为他们的债务可用废纸偿还。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投机倒把者、交易所的大亨、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滑稽的价格购买产业和珠宝首饰。这些贪婪的家伙只要花上几百美元，便拥有了大厦和大型产业的资产。“传家宝”也只维持一家人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令人无法置信：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丢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找，钞票在污水沟，只把篮子偷走了。一个每星期有 20 亿马克工资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糊口。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已不新鲜。

希特勒自 1 月以来吸收了新党员约 3.5 万名。到 10 月中旬，希特勒坚信，对于另一次革命，人民已经准备就绪。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当整个德国人民要我如此做时，我惟

希特勒传

有采取行动。”他从未在演讲时如此激动过。“你简直无法想象，此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一个狂热的追随者于那年10月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似乎停止了呼吸。“有时候，我似乎认为，男女老幼被希特勒的符咒弄得无条件的信任他，另一个离希特勒近的听众，几乎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此人对我们说来，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明白怎样

的，所以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而是学会了用狂热地高声喊叫方式，但主要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感染人心，且具有野蛮的和原始的效果。”

这种煽动性演讲给巴伐利亚所带来的震撼，使冯·卡尔无法继续工作，他尽管有独裁权。上司虽然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他受到许多来自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压力，要他对希特勒温和一些。巴伐利亚的脾气本是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对希特勒激愤言论和粗暴行径，许多人虽然表示遗憾，但他们就像他，梦想德国恢复青春和强大。“原本一些崇高的感情，却导致人们走上纳粹的歧途”，一个巴伐利亚民主党党员说，“这些人原亦确实为民为国服务。”巴伐利亚警方人士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怒火满腔，却对希特勒的暴力未加干预。在柏林来令要管制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抵制了这要求。由于继续违令，洛索夫被解职了，但巴伐利亚政府被这一行动激怒了，结果他被政府任命为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全巴伐利亚驻军于次日集体违令，差不多像是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待重新得到调整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

希特勒传

系时，本人才继续服从上级的指挥”。这是正式的、合法的没有暴力的反叛——不可否认，它仍为不折不扣的反叛。“国内战争不会发生，”一巴伐利亚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无非是国家这条航船向左偏离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和现在都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也亲自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他在《慕尼黑日报》上为巴伐利亚违反命令开脱，并号召将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推翻。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他笃信政治权利和自由。斯特莱斯曼本人系民族主义者，在普鲁士，他攻击说，占据了各种官职的马克思主义者高达 1 - 2 万人，“所以，国内的政治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以鼓动、强迫、街头打架和煽动为目标。外交政策也开始国际化，而手握外交大权的人们仍心虑重重，阻止德国重新强盛。”这些言论和思想，可以说与希特勒如出一辙。

尽管冯·洛索夫将军被魏玛共和国解职，但此时仍指挥其部队——并且于数天后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一切如原先一样缓慢不前；巴伐利亚摆脱帝国；进军柏林，宣布进行军变。希特勒极力赞成最后一个建议。从联邦政府中分离出巴伐利亚，这是与希特勒的口味相吻合的，巴伐利亚一旦独立便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国家体系。然而，巴伐利亚如果不宣布独立，他能否迫使冯·洛索夫将军和冯·卡尔委员加入其战线？施勃纳·里希特和罗森堡作了回答。他们计划在 11 月 4 日庆祝“德国纪念日”时绑架卡尔和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悻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占领弗尔德赫仓大厅周围的通道，希特勒随后便能客气地告诉

阶下囚，为了防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伐利亚独立，他已然夺取了政权。这次起义按罗森堡的说法将会“时间短，无痛苦”，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因此不得不与之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把这看成是“妄想”。对皇太子的一切攻击，他争辩说，无疑会使陆军被迫反击。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缺乏头脑、如何不通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继而向罗森堡进行个人攻击。他说，希特勒如果总是屈服于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党将灭亡。希特勒反对绑架但对罗森堡一事又不马上作出承诺。“我们首先得考虑进军柏林，”汉夫施坦格尔想起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解决完当务之急后再调动罗森堡的工作。”

3

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到此时已控制在三个政治巨头的手里：洛索夫、卡尔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任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的赛塞尔，在附近招集了一批年轻而干练的参谋。这些年轻人，不用挂虑官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此点来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却像专制政府。三人虽然代表了各种右派激进人物和超保守主义人物，然而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不是为大众的利益，需绳之以法或加以适当引导。分裂于10月30日爆发。那天，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希特勒正式向狂热的听众宣布，他准备进军柏林。“就个人而言，德国问题只有在柏林宫上空飘扬黑白红三色的卐字旗帜时，才能彻底解决！”他喊道，“我们都认为，这个时刻已来临。如同战场上的军人，我们决不会推卸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惟命是从，以一致的步调，迈向前！”

希特勒传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希望会见冯·赛塞尔上校。他们于11月1日，在一个兽医家相遇。这个兽医是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奥伯兰联盟”的负责人。希特勒极力使赛塞尔相信，卡尔仅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接着他建议，洛索夫和赛塞尔与鲁登道夫和他自己应如同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联合起来。赛塞尔却又一次声称，对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他不愿与之有丝毫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亦是如此。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不赞成鲁登道夫，但少校以下的军官都全力支持他。“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机，”希特勒警告说，“采取行动是必然的，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否则，他们就会向共产党人倾斜。”

赛塞尔与卡尔二人虽然都认为纳粹是“一堆废物”。但二人都有所表示。三位政治巨头于11月6日与各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迫切的事情是在全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会议中各方达成共识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联合推翻，不能自行其是。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清楚希特勒便是其所指。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能否推翻斯特莱斯曼，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套不寻常的方法。准备工作已就绪。不过，若采取不寻常的方法，大家须同心协力。大家必须切实执行准备充分、考虑周到的计划，且必须同心协力。”

接着洛索夫发言。对于卡尔及其用武力镇压一切起义的想法。他全力支持。“若有望成功，本人将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有51%的成功可能性，他就参加。“不过，如果起义的前身只是骚扰，几天之内就会失败，那我将不予合作。”结论是，冯·赛塞尔上校与他将着重讨论“战斗同盟”是合作

还是各行其是。

当晚，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希特勒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拟定行动目标。大家一致同意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起义。作为起义日选择在这天有两个原因：现实的与历史的。那天为德国投降5周年；同时是假日，军警少，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市内交通不太繁忙，冲锋队可随意前进。

密谋者们于次日上午再次会面，“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参加了会面。或许鲁登道夫也出席了，但后来他极力否认。希特勒、施勃纳·里希特和戈林无疑是在场的。为起义他们作了最后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邮电局、火车站、广播电台、电话局及公共设施、警署和市政厅；逮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工会主要负责人和商店管事。希特勒在慕尼黑占着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者对抗2600名军警。

希特勒于当晚早些时候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亦有另外两人：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及前警察署署长波纳，他们给希特勒及其下属以暗中保护。密谋者们讨论了事态的新发展，这要求必须修改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进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表面上看，其主要目标为要阐明其政权，但更可能是，他试图未雨绸缪，防止国社党人联合军方将领、政府要员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一起进行行动。希特勒得到参加这一大会的邀请。这一邀请显然也许是个陷阱。三政治巨头也许准备宣布巴伐利亚独立，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道，这是最佳时机。冯·尼林总理，三政治巨头，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时出现。何不将他们聚在一起，说服他们参与政变，若他们执意不赞成就将他们监禁？希

希特勒传

特勒谈论的毫无疑问是有效果。他心里极为清楚，得不到三政治巨头的支持，他的起义将不能成功。对夺取巴伐利亚政权他毫不在意，只是企图以这种方式去唤醒巴伐利亚人，以便更有力地与柏林对峙。他实际上并无长期纲领，只想听天由命碰运气。

他的同谋却不愿这样。争论如此持续了数小时，希特勒还是坚持不改。这样大家于11月8日凌晨3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计划：起义在贝格勃劳酒馆当晚举行。当客人们步入寒冷的晨风中后，立刻由施勃纳让仆人将一大叠写给重要出版商的信件在他们开办公室门时便交给他们。

次日，寒风刺骨。巴伐利亚那年冷得早，雪花已在市南山区飘了起来。希特勒生平最关键的一天，开始头痛，牙也跟着捣乱。他的同事曾劝他去看医生，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焕然一新的革命正在进行”。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他的病如果加重，那么事业会如何？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的如此，我病死了，这证明，我的任务已完成，我的星辰也已终其天年。”

给冲锋队的命令于时近中午由书信、电话或派出的人发布了，是让冲锋队员全体做好准备，没有详情和解释。另外，希特勒的许多追随者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一无所知。罗森堡中午时正与汉夫施坦格尔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与拿破仑决战托洛根的将军的照片在该报头版刊登了。照片说明称：“在紧急关头，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互相鄙视的两个人，却在一起讨论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他们此时听见外边有人跺脚，并问道：“戈林上尉在吗？”此人声音沙哑，门开了，身穿

希特勒传

军大衣，腰扎皮带，手拿鞭子的希特勒在门口出现。他冲进来，“脸由于激动而显得铁青”。

“你们发誓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希特勒焦急地说，“我们今晚行动。时间到了！”他请这两个人带上手枪，作私人陪同，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立刻赶回家，叫妻子带着儿子埃贡到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去。之后，他通知包括尼卡博卡在内的许多外国记者，说“不管怎样”，当晚的大会不可错过。

希特勒下午已将他的兴奋情绪控制住，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在赫克咖啡馆大谈特谈起来，这好像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他突然建议去探望身患黄疸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当晚他将宣布全国革命开始。他需要埃塞于晚9时整打着旗帜，冲上正举行民族主义会议的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宣布国社党将开始全国革命。

出来后，希特勒对霍夫曼说，埃塞已然好了许多。于是，两人便闲逛于施林大街。戈林片刻后走上前来，希特勒拉他到一边，两人交谈了一会儿。他回来后说，他的牙痛十分严重，必须立刻走。霍夫曼此时如坠迷雾。他问，希特勒那晚到底要做什么？他神秘地回答，他“很忙，忙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他说完，便返回了国社党总部。

冲锋队员们此时正将身上的工作服换成冲锋队的制服——灰色的滑雪帽，卐字袖章，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茄克和腰间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将要集结于目的地。根据计划，鞋匠约瑟夫·里希特被派往霍夫布劳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亦在行动，他们戴的是薄雪罩，而不是卐字袖章，头上还顶着钢盔。关键的元首百人卫

希特勒传

队，则集合在托布劳。他们的领队，一个烟鬼，正大声训话：“不是一心一意的，现在就走。”他说，当晚无论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任何情况，开路先锋是他们的任务。“我们要推翻政府！”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停在了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鲁登道夫从车内出来，他呆了几分钟便走了。里希特与他的仆人片刻后也飞车而去。敦勃纳·里希特说：“汉斯尔，若今天进展不顺利，就意味着明天我们全军覆没。”在党总部他们见到了希特勒以及党的其他领袖。晚8时左右一群人经过一阵磋商，便分坐两辆小车，前往坐落在伊撒河对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的贝格勃劳酒馆。这是个没有规划的大楼，左右两边是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酒吧间和餐厅。这是有除“克罗纳”、“济卡斯”以外最大的主厅，里边摆放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容纳3000人不成问题。官员们明白也许会有麻烦，为控制人群，他们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另外，还有不少军官和一队骑兵被安插在人群中。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还有1/4英里外的兵营里一连州警援助。

待希特勒的车队开过伊撒河，大厅的门就已关闭，除要员外，任何人不准进入。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入。8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麦塞蒂斯”轿车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抵达。团团打转的人群，使希特勒十分忧虑。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车缓缓驶近前门。

此门被一群警察把守。希特勒为使马上要到的部队能顺利通过，忙劝说警察离去。然后，他便带领大家走进由赫斯把守的啤酒馆的大门。由于发生口角，希特勒一进来门便被关闭，

希特勒传

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被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若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就会引起纠纷。但给他们开道的实际上是叼着香烟的美国记者。希特勒在客厅旁，站在一根大柱附近，注视着讲台周围密集的人群。卡尔正在台上声音单调地讲话，他谴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人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老学究似的神态，似乎是在讲课，而不是在演讲。听众象征性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私下想，希特勒也要喝啤酒才更能适应环境。他于是便在服务台花了 30 亿马克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时呷上一口啤酒，不耐烦地等待着。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正在等待出击命令，准备就绪，只待八时半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武装纳粹跳下卡车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惊慌失措。由于毫无准备地应对政治战，他们无能为力。

戈林带着连发手枪，率领着卫队冲了进来。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的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此时走到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先前的衣服，只有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还披在身上。格拉夫在希特勒耳边说了几句。一旁观者回忆道，就像顾客求大班要铺好桌子似的。卫队队长喝道：“到那边去，别挡着！”警察乖乖地转向后面，像美国的警察，步伐整齐地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放下手中的啤酒，拔出勃朗宁手枪。希特勒在冲锋队的“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率领施勃纳·里希特，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哈佛大学毕业生、他忠实的奴仆汉夫施坦格尔，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前警察局奸细梅克斯·阿曼，以及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人们，

希特勒传

手挥武器，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径直走向讲台。此时，太平门已被褐衣党徒封锁了。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许多桌子在混乱中被打翻。一内阁成员藏到桌子底下。有些内阁成员则连忙涌向太平门，但被警察挡回去。反抗者，挨了踢或遭到鞭打。

希特勒一伙的去路被挡住了。他在混乱中，爬上一张椅子，一边喊“安静！”一边挥舞手枪，但仍然混乱一片。一梭子弹从他的枪膛射向天花板。人们吓得目瞪口呆。希特勒说：“大厅已被包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任何人不准离开大厅。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已喝醉了酒或疯了；另外一些人却觉滑稽——这个持枪的革命者的晨衣如此不合身。虽然看来滑稽，但希特勒却严肃异常。他要三政治巨头奉他之命跟他去旁边一所院子，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未动一下。卡尔在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倒退了一步。一位少校，赛塞尔的副官，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说：“拿出手来！”

希特勒向听众和三政治巨头保证，在10分钟内所有事情均可解决。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这时随希特勒进了屋。“装个样子。”洛索夫小声说。希特勒一到室内，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我别无选择。”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承诺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道歉，说：“这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告诉他们，鲁登道夫将军将指挥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而向柏林进军。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希特勒保证，三政治巨头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将有更为大的权力：卡尔将摄政巴伐利亚，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

希特勒传

希特勒在三人反对的情况下，粗声粗气地说：“里边有五梭子弹：卖国贼吃四梭，我自己吃一梭——如果失败的话。”他把手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支机关枪。“生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地回答。希特勒连忙喝了几口啤酒，向卡尔连声道歉，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出房子。听众在外边已乱作一团，眼看无法控制。有人大喊一声：“演戏！”另一人喊道，“墨西哥式的革命就是这样。”大厅里响起了尖利的讥笑声和口哨声，直到戈林仿效其主子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全场才平静下来。他高喊道，他们此次行动的目的并非针准帝国国防军卡尔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幽默地喊道：“你们有啤酒还愁什么？”

希特勒并未因大厅里的混乱而失去信心。人们在高声怒骂和怪叫，希特勒排开众人，走向讲台。厅内仍乱作一团。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这么混乱，阁楼上的机枪就会开火！”人们突然间已不再嘲笑他。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授回忆说：“紧接着，希特勒发表了那么杰出的演讲，令每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始，毫不怨天尤人。”他向听众保证，卡尔他将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还保证，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赛塞尔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要向罪恶的巴别、柏林进军，拯救整个德国！”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第一句话开始，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这个穿着滑稽的小人物希特勒，摇身一变成了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仅是几根肠线，几块木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有悦耳的音乐声。”冯·米勒教授在他整整一生

希特勒传

中，再也不能回想起来，“群众态度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转变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的情形了。毫无疑问，“一些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然而大多数人的感觉确已全盘改观。希特勒短短的几句话便使他们完全转变，如同人们翻转手套一样。似乎有点像念咒，又若变魔术。接着满堂喝彩随之而来，反对之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希特勒诚挚地说，“正在努力抉择。我是否告诉他们，你们支持他们？”

群众狂喊着：“可以！可以！”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自由的德国，可以容下自治的巴伐利亚！我可以如此说，不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就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回去，将三政治巨头叫起。

能解决问题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奔向贝格勃劳酒馆，这就是鲁登道夫将军。他的继子与他，以及施勃纳·里希特，在后座上。虽然大雾笼罩，他的车子仍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大桥。在啤酒馆门口鲁登道夫将军一露面，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被如此过火的事情惊得“极不高兴，目瞪口呆”。希特勒连忙走出客厅与他握手。他们简要地谈了几句话，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巨头。他们在侧屋里消失。

虽然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令他愤怒，但鲁登道夫依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他对他们说：“先生们，好啦，”“把手伸出来。与我们一起干吧。”

将军首先响应。洛索夫伸出手来，说：“没问题。”然后，上校也伸出了手。最后一个屈服的是文官卡尔。但大家回到讲

台后他第一个讲话。他站得笔直，面无表情。他声称，现在的身份是摄政王并且效忠于巴伐利亚王朝。据在场的一警察说，狂热地掌声打断了这清醒的讲话。

希特勒见听众十分兴奋，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5年前作为一名失明病人在陆军医院我曾发誓：不推翻“11月罪人”，不在今天四分五裂的德国废墟上重建一个强大的、既富丽堂皇又自由的德国，我就誓不罢休。我正努力在实现这个誓言。”

脸色阴沉而苍白的鲁登道夫接着发表了认真且简短的讲话。在米勒教授印象中，鲁登道夫清楚“这是个生死未卜甚至死多于生”的人。局势完全被希特勒控制后，他便在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与众人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的作用，听众全都兴奋起来。起初的讥笑甚至抱怨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全场听众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满面泪流，有些人甚至激动得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却说：“这里惟缺一名神经病医生！”

4

高昂的情绪也出现在伊撒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里面响着两支乐队的演奏声，挤满了2000名“战斗同盟”的冲锋队员和成员。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追随者是只听众里很少一部分，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中心人物。他“煽动人们复仇，并是报复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蠹贼和卖国者……”

从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的埃塞接着走上讲台。他由于计划改变而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未马上声称革命。他正期待着希

希特勒传

特勒成功政变的消息。20时40分，贝格勃劳酒馆在他讲话中间打来电话：“成功、安全！”埃塞的讲话被走上讲台的罗姆打断。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消灭，阿道夫·希特勒已向全国宣布了革命。国防军士兵跳上桌椅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狂欢起来，乐队高奏国歌，冲锋队员们相互拥抱。待热烈气氛渐静下来后，罗姆大声叫众人进军贝格勃劳酒馆。人们争先恐后地从罗文布劳酒馆涌出来，似乎它已着火。士兵们欢呼着、叫喊着走上街道，向伊撒河走去。一辆摩托车迎面开来，将队伍拦住——原来，他传来了希特勒的命令：冲锋队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3000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罗姆率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司令部。“奥贝兰联盟”的成员独自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在一个乐队陪同下的罗姆的队伍来到布里恩纳大街时，聚集的人们大声欢呼。靠近队伍的前面，有个狂热的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民族主义青年，骄傲地挥舞着帝国国旗的他来到那里，因为他忠于斯特拉塞和罗姆，并非效忠希特勒。兴奋的观众们热情使人陶醉，像征服者一样的士兵们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罗姆在工作了多年的军区大楼的大门前。令部队停下，自己走了进去。哨兵们鸣枪威胁，盛气凌人的罗姆毫不畏惧，径自来到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声称，他只屈服于暴力，并下令开门放进暴乱者。罗姆在各窗户前架好机枪，布好了岗哨，大楼周围也安上了铁丝网。一切都已就绪，只有电话总机还未占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让值班军官看管电话总机，而此人却无革命意识。

赫斯在啤酒馆内，“人民的敌人”充当人质。他在大厅的椅子上站着，将军官和官员逐一点名叫出，包括警察局长曼特

希特勒传

尔、总理尼林和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被叫到的人顺从地站了起来，就像调皮的小学生。赫斯起初将他们关在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级指示要赫斯将人质转到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一带的一所房子，且要严加看管。

希特勒集团的内层人物都有自己的任务：身材矮小但极凶狠的街头打手梅克斯·阿曼，率人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中央办公楼。埃塞施勃纳·里希特以及汉夫施坦格尔则率部巡视于大街，检查革命进展情形。他们看到，市内已乱作一团。有人迷惑不解，有人满腔怒火。很少有人明白什么事发生了——包括参与行动的人在内，贝格勃劳酒馆因为发出的命令常是自相矛盾的。

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是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关键人物。他说服值班警察不要反攻起义部队，自己则在电话机旁守候，安抚那些迷惑不解的、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警官们，他让他们静候命令，不可贸然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罢免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来到警局，以和平方式夺取了警局。召开各主要非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的记者招待会是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由于警方被控制了，军区司令部又被罗姆占领，希特勒身在贝格勃劳酒馆，正陶醉在欢悦之中。工兵营地后来传来报告，起义部队与工兵们正吵得不可开交。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指挥岗位，前往该地亲自解决问题。这是重大失误，以及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冯·洛索夫将军在希特勒走后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有理，便允许洛索夫离开啤酒馆——不远处赛塞尔和卡尔尾随。刚到兵营门口的希特勒未起丝毫作用，便被驱走。他一小时后回到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均已脱逃，吃了一惊，他责骂鲁

希特勒传

登道夫。他怎能做出这等事？洛索夫会破坏革命的！鲁登道夫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德国军官是永不会违背誓言的！

上午 11 时，希特勒的精神随着 1000 名大军的到来又振奋了。这是精锐的学生军，是步兵学校的援兵。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劝降，率领他们参加起义。这批青年军将他们的司令扣押，返服于罗斯巴赫。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吹吹打打，挥舞国社党的旗帜，戴着卐字袖章，奔赴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前下士希特勒和将军鲁登道夫等检阅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接着，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他们在罗姆的指挥所讨论了革命的发展计划。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提议，打电话立即找赛塞尔或洛索夫。电话打了不少，却找不到任何人。施勃纳·里希特认为事情有变。洛索夫曾说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去哪了？赛塞尔和卡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三位君子先生曾起过誓，不可能食言。

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此时正步入大楼。他曾因为听到起义的谣传，便来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可疑，非常肮脏。”施万德纳回忆说：“我们正在说话，胸戴所有奖章、穿着老式军服的罗姆生气地冲进室内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直接违反了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计划。罗姆真诚地说进展十分顺利。冯·洛索夫、冯·赛塞尔和卡尔宣布过，他们同意所有的事情，并马上和希特勒在军区司令部汇合。我只说，那就不一样了。”

值班军官等罗姆走后，示意施万德纳前来，悄悄对他说：“起义没戏了。”他说：“卡尼和洛索夫在 19 步兵团兵营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肯定过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约束

希特勒传

的电话总机转来了在新指挥部的洛索夫打来的电话，下令反攻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并让英格尔斯达特、奥格斯堡、兰舒特、雷根斯堡及邻近一带的忠实部队立即乘火车奔赴慕尼黑。施万德特马上向回输军官转达了洛索夫的命令，并同意亲自致电半数部队。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在预谋破坏起义。密谋者时至深夜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限制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早已传出了镇压命令。

乐队在吹吹打打，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多数慕尼黑人在他们的城市却不清楚革命已再次爆发。海因里希·霍夫曼，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特殊事件已经发生，他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时已至深夜。这时，一群群兴奋的年轻人正作客于闹市区的旅馆里，又喊又唱，欢庆胜利。

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在美国领事馆内，正在写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听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责任是进军柏林，进攻将于12时发动。他宣称，至拂晓若新国民政府没有建立，便是他的死亡……

对那些被从家里拉出来充当人质反对政变的人们来说，这个夜晚是恐怖的。有些人家因姓氏像犹太人的姓氏，而遭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进军慕尼黑《时报》，不由分说便将印刷机捣毁。希特勒下令立即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在军区司令部里说的话已不作数，事

希特勒传

态已然失控。施勃纳·里希特与仆人埃格纳出外寻找赛塞尔，却徒劳无功。他们看出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去一印刷厂，将把由主要的负责人们签署的新政府告示印出来。罗森堡完成这一任务后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第二天的报纸赶写社论。

回到军区司令部后，埃格纳的主人便令他回家取吃的和香槟酒，并向施勃纳·里希特太太转达“一切顺利，不必担忧”的消息。形势十分恶化。罗姆最终对隔壁房间发生疑心，将值班军官逮捕，并下令逮捕大楼内所有的军官，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却漏网——在完成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一名文职人员向他暗示了些什么，就在警戒圈未布设好时，从大楼里偷偷跑出。

起义部队在冯·卡尔委员办公的地方的各项活动开展不顺利。逃出了啤酒馆之后，卡尔曾到过办公楼，已开动的粉碎起义的机器被他发现。可以理解，这些措施他并未着手阻止，而是帮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千名步校士官生及其罗斯巴赫不停地进行恐吓威胁。本来革命军执行鲁登道夫“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大楼”的命令获得重大胜利是可以轻而易举的。但是，警方与士官生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等待对方第一个开火。没有人愿意流血。士官生不想用枪打警察，而很多的警察也如同士官生一样，十分信任希特勒。他们偶尔进行谈判。主张采取行动 的罗斯巴赫心里越来越急了，向士官生喊道：“做什么呢？不要再谈判了，对鲁登道夫的命令你们清楚得很，为何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枪！”

士官生最后冲进了阵地，伏击队则在机枪队的掩护下以半

希特勒传

圆形阵势勇往直前。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谈判。这一建议被士官生接受了，但宣称，如在 10 分钟内三人不出来，他们便进攻。10 分钟后，学生军刚要开始进攻，突然一道命令传来：“各个连队，后撤！”

士官生急忙后撤，包围就这样失败了。由于命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丧失了取胜的战机。主要同为希特勒的部队并不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枪。士官生的行为，无非是在关键的几小时将冯·卡尔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后撤，卡尔便从大楼走开了，前往 19 团驻地与赛塞尔和洛索夫会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得知在凌晨 2 时 55 分冯·洛索夫将军向“所有德国的无线电台”发出如下通电后，原来还抱的一线幻想，即三政治巨头公开反对起义是不可能的，也就破灭了。电云：

希特勒起义已被冯·赛塞尔、冯·卡尔州委员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镇压。枪口下宣布的支持无效。上述人名请勿误用。

冯·洛索夫

卡尔在 19 步兵团团部正伏身于扶手长椅上，给将张贴全城的公告打草稿。他终于把一份令众人满意的告示写完了。他说：“若让盲目的反叛得逞，德国将与巴伐利亚一起会落入深渊。”他下令把国社党以及其他右派组织解散。他宣布，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将“受到应有的毫不留情的惩罚”。就卡尔委员看来，这是个痛苦而漫长的夜晚。

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直到清晨 5 时才得到证实，军

希特勒传

区司令部也知道了。被罢免的步校指挥官送来消息，他遗憾地对希特勒说，三政治巨头没有履行承诺，因为那誓言是被逼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暴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感到震惊，他也未表现在脸上。他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在结束时宣布若需要，他决心坚持到最后，誓与事业共存亡。他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仆人，寻找他们委任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领一支“奥贝兰”部队夺取警察总部。波纳兴高采烈地率部出发，且充满信心。他只与一同伴迈进警察总部。当他们进入主事少校的办公室时，在震惊中他们被捕了。波纳先前的助手弗里克早已被扣留起来了。

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此时正返回啤酒馆，只留下罗姆及其部下保卫军区司令部的安全。希特勒虽被搞得吓破了胆，但依然坚持起义。他阴沉地说：“如成功，就很好，否则，我们自己就去死。”天那时还黑。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得到希特勒的命令，从四周向贝格勃劳酒馆涌进时，下起了刺骨的雨雪。士兵们感到凶多吉少，却又什么也不知道。即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着埃卡特写的《斯通里德》：“德国！醒来吧，什么也不知道你的锁链！”

5

清晨，阴森、寒冷而潮湿。寒冷的雨雪仍旧下个不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阴云密布。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阴冷潮湿，烟雾弥漫。没洗脸更没有刮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餐——面包、咖啡和奶酪。昨晚的狂喜和兴奋已不见了。有人宣布，陆军不参加起义了。另一人走上讲台，高声责备所有卖国的将军

们和资产阶级。“进军柏林！”他喊道。厅里有稀疏的掌声响了起来。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认为，这一建议具有“高度罗曼蒂克，一点政治性都没有”。

起义领袖们全在楼上的密室里坐着。鲁登道夫“稳如泰山，面无表情，安静得恐怖”，边喝着红葡萄酒，边吃早餐。他身着旧粗呢射击茄克，样子很威武。然而，当他获知洛索夫已公开反对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便没有了。“德国军官的话永远都是谎言”，他高喊一声之后，便默不作声。

在午夜还被认为是极为成功的政变，被日间寒光照射成了泡影。希特勒的绝望很明显地表现在他下一步的计划中。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占领警察局，并将被囚禁的波纳营救出来。他继续表现得似乎还有信心，一支冲锋队受命前往名为《帕卡斯》犹太人印刷厂，没收全部一堆堆贬值后的刚印好的纸币。总数为14605百万兆马克，据德国人的传统，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更多的起义部队此时坐着卡车开了进来。他们筋疲力尽，又冷又湿，但仍精神抖擞，根本不知事态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兰舒特来人最多。他们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中，碰上了一车警察，彼此还高呼“万岁”。他们的领袖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在首车的驾驶室坐着，沿着繁忙、平静的街道向前开去。有人喊了一句，说大家要像平时工作那样。“这不是革命。革命不应是如此。”

“静观发展吧。”斯特拉塞说。他到酒吧间后被戈林上尉告之，“那些人”自食其言，不遵守对元首的诺言。“我们要全部再来一次。”接着，一个身材又胖又矮，头顶很光的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以希特勒的名义向众人说明情况。

希特勒传

他指手划脚，手持鞭子，用洪亮的声音和肮脏的语言向众人讲话，企图鼓励大家，激起众人的热情。没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众人于是再次上了车，奔赴自己的岗位。

奉希特勒之命前去占领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此时已撤回军区司令部大楼——任务未完成。为了避免开火，他们在离开警察局前，曾与警方争吵几分钟。希特勒让他的忠实的卫队营救波纳。上午9时30分，这支精锐的部队到达了警察总部后，立即把机枪架起，对准大楼，好像要开始猛攻。但叛乱者仍不想流血。他们仍然未完成任务就奔回啤酒馆，他们又在几分钟后去执行一项较易完成的任务：把马克思主义的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卐字旗的市政议员们逮捕了。

他们冲进旧议会大厦。他们那位抽烟斗的领袖，推开了议会室的门。他手持武器，高喊道，逮捕所有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在马里安广场上“以谩骂和讥讽迎接议员们。他们其实是靠我们军人的保护才得以免受群众的袭击，否则，伤亡将会发生。经过我们如此多帮助后，他们才能安全上车。”

演讲者当这些卡车开向啤酒馆时开始向人群讲话。听众越来越多，以致阻碍了开往森德林的六路电车的通行。施特莱彻是主要的演讲人。比起议会大厦大钟上的旋转数字他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广场上此时卐字旗林立，党旗也飘扬在市政大楼上空。

双方都犹豫不决、混乱不堪是这次起义的特点。市警在市内的某些地方把起义军的口号标语撕毁了并且逮捕叛军；叛军却在内城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和逮捕市警。希特勒的部队把闹市区伊撒河上包括连接市中心和啤酒馆

希特勒传

的路德维希大桥在内的大部分桥梁占领了，市民们在博物馆大桥附近盘问年轻的起义者。“在街上玩弄这样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不反对吗？”有个工人高声问道。10人小分队腼腆地向啤酒馆奔去了。

在伊撒河另一座桥头的兰舒特来人中，谣传四起，说“情况不好，肯定被人出卖！”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身穿绿色制服的邦国防军于上午10时，坐卡车来了。他们一到，便把两挺重机枪架起了。由于上司命令不能开火，所以，起义部队没有开火。邦军的上级叫他们等候命令。双方便这样对峙在那里。

叛军的头目们在啤酒馆里争论个不停。曾服役于鲁登道夫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主张撤军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他们在那里有可能争取到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戈林同意此意见。因为这是他老家，他保证说，大家都极其支持希特勒，在那里他们可得到兵员，重整旗鼓。“运动不能结束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鲁登道夫讽刺地反驳，“这应由希特勒作出决定。”他犹豫片刻。由于他生性就像是赌徒，这个长期游击战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需要一举失败或成功。所以，克里贝尔的计划被他否决了。

街上的形势恶化了许多，但他们仍争论不停，直到近中午。陆军和警察包围了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并没马上开火，但罗姆的150名部下却求战心切。

贝格勃劳酒馆得知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争论完结了。无疑，起义部队如不想可耻地投降，就要立即行动。据鲁登道夫说，调部队至慕尼黑内城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第一个想到

希特勒传

的。“我们走着去！”他说。假如说是鲁登道夫出的主意，那么，主意则以希特勒方式实施——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更多的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后来作出保证说，“要夺取人民来我们这边，看看公众做出如何的反应，然后再看看赛塞尔和卡尔·洛索夫对公众舆论作何反应。这些先生们毕竟没傻到向人民的总起义开机关枪的程度。”进军城内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来的。

鲁登道夫坚信，陆军士兵阻挡游行队伍前进是不可能的。他不久前曾向一位友人保证：“要是我遭到巴伐利亚国防军的反对，那根本不可能发生。”希特勒也坚信，无论是邦警察还是国防军，都不会将枪口对准鲁登道夫那样的战争英雄——游行时，他将在前排带领群众。希特勒于是作出了决定，向镇守各座桥梁的部队仓促传达了命令。此时，职业军人克里贝尔上校在啤酒馆外开始把游行队伍集合。11时30分许，埃卡特在希特勒要起身离开会议室时走了进来。从前，他们是心腹之交；现在呢，希特勒“生硬地脸色难看地说了声‘你好’”。这位被冒犯的作家，在会议室外彬彬有礼地问候鲁登道夫时又受到他的冷遇。将军只向他“冷漠地歪了歪帽子”。

游行队伍立即组成了。由于乐师们当日上午到啤酒馆报到时既没领到工资又没有吃早餐，在履行公事式地演奏了战时希特勒所在团的进行曲《巴登威勒》后都走了，所以，没有乐队给游行队伍开路。在第一排的是挑选出来的尖兵和另外八名士兵，他们挥舞黑白红三色旗和卐字旗。跟着旗手的都是起义领袖，施勃纳·里希特在右，鲁登道夫在左，希特勒在中间。慕尼黑冲锋队的指挥官克里贝尔上校与其卫兵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上尉在旁边——一白色大卐字的钢盔在他头上戴着，一

件漂亮的黑皮衣穿在身上，敞胸以显示其“荣誉奖章”，看上去，既罗曼蒂克又雄壮威武。他心中有点不高兴，因为他提出把俘获的议员带去作人质的主意没被通过，元首拒绝了此计谋，他什么人员也不想要。

排成四列纵队的三支部队在领导人后跟着，并肩而行。左方是手持卡宾枪，头戴钢盔，身上还带着手雷的希特勒的百人卫队，右边是“奥贝兰联盟”，经过战斗考验的慕尼黑冲锋队兵团站在中间。接着是穿着各式各样的队伍——有的穿商人服或工作服，有的穿世界大战时期的又破又旧的军服或制服。步校的士官生，既潇洒又斗志昂扬，夹在店员、学生、中年商人和面无表情的流氓中间。左臂上的卍字臂章是队伍惟一共同的标志。大部分人都手拿着步枪，许多还插上了刺刀。其他人，尤其是冲锋队，则持手枪。

戴夹鼻眼镜的施勃纳·里希特握住罗森堡的手说：“情况看来十分不妙。”之后，他郁闷地向希特勒预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游行。元首本人也脸色严峻而苍白。在寒冷中，他手持垂帽，身着那件人们熟悉的军大衣。鲁登道夫身穿一件大衣和狩猎茄克，他镇静自若，令仆人回家，以免受伤。

散兵游勇式的队伍于中午时分出发了。2000人的队伍于15分钟后来到了路德维希大桥，与一小队警察碰面了。当起义部队的尖兵缓缓前来时，警察指挥官迎面上前，下令他们停下来，否则会开枪。他转过身，令手下准备开枪。他正在说话，那边有号角声传来。精选的尖兵手端刺刀，包围警察。喊道：“别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警察犹豫。这样，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起义部队便走了过去。他们过桥后一直前行。兹威布鲁肯大街两旁人山人海，许多人在欢呼，并把卍字旗挥舞

希特勒传

着。旁观者开始加入游行行列，人们的热情鼓励了游行队伍，他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虽然没有乐队演奏，他们唱着最喜欢的《冲锋之歌》。作家埃卡特在队伍开进伊萨托尔时，站在左门旁的人群中。他发现了行进在第一排的面无表情的希特勒。四目相遇，“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似乎在说，‘你在什么地方呢？’”

寒冷的人们，口吐白气，继续前行。15分钟后，走进了马利安广场。广场上因刚开完群众集会，卐字依然旗飘扬。市政大厅上空的纳粹旗迎风招展，一大群人在高唱爱国歌曲。游行人群中此时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认为应返回啤酒馆，其他人则觉得应继续朝市内前进，以救出罗姆。克里贝尔上校发现，鲁登道夫领着队伍向右走，进了威因大街，走向奥德昂斯广场。上校觉得奇怪，但又告诉自己：“鲁登道夫如此走，我们当然一块儿去了。”鲁登道夫将军并未作此筹谋。“人们在生活的某些时刻只凭本能考虑事情，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想去罗姆那里，把他救回来。”

体格魁伟、身披深棕色大衣的鲁登道夫，一时冲动，带着起义部队与政府军劈面相遇。游行队伍不到几分钟便来到了慕尼黑最森严的议会大厦。他们在这里被一队警察拦住了。但是，起义部队高唱着“啊，德国荣誉高”继续前进。

威尼弗里德·瓦格纳太太从窗上下望，看见她的偶像希特勒正与鲁登道夫沿狭窄的统帅府街并肩走去，觉得很是吃惊。在前面的奥德昂斯广场，数小群身穿绿色军衣的士兵，正争先恐后走进阵地，阻挡游行队伍。街道只能并肩行走。希特勒挽着施勃纳·里希特的胳膊，准备赴难。鲁登道夫则单独走了起来，坚信没人敢向他开枪。麦柯尔·弗莱赫尔·冯·戈丁中尉指

希特勒传

挥的邦警在正前方，封锁了去路。戈丁面对正在前进的队伍喊道：“二连，跑步，走！”邦警向南慢跑，但起义队伍仍未散开。他们停住脚步，举起手枪或端起刺刀。戈丁用步枪拨开两把刺刀，“高举的枪打倒他们后边的人”。突然枪响了一声。戈丁聽見子彈從他頭頂飛過，把一名下士打倒了。“我的連隊此时吓呆了，都站住不动。接着，我还来不及下达命令，我的部下开枪了，一梭子弹扫了过去。”

起义部队立即还击。接着，旁观者和游行队伍四散逃窜，于是秩序大乱。首批倒下的有施勃纳·里希特——他肺部中了一枪。另一个是格拉夫——他中弹前跃至希特勒跟前，替希特勒挡住了五六颗子弹。格拉夫倒下去时还抓住希特勒，猛地把地放在地上，造成后者左膀脱臼。施勃纳·里希特在另一旁也用尽全力协助将希特勒拉至人行道上。鲁登道夫忠实的仆人，正躺在柏油路上流血。面临死亡的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他的朋友埃格纳，连忙朝他爬过去。他已牺牲。有人跨过他身上——那是鲁登道夫将军。他昂首阔步，一手插进衣袋，朝交火线走去。

希特勒摔倒了，以为左臂中弹。同志们都掩护他。18人死在街上，其中，有14位是希特勒的追随者，4人是警察。这18人，顺便说一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只有在前排走的人才明白发生了何事。后边的人们只听见前边鞭炮声响起了。接着传出谣言说，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已双双死在枪下。起义者惊慌地逃跑。

鲁登道夫大步越过封锁线，与一名中尉碰到了一起。中尉将他逮捕，押至统帅府。片刻前还像小说里象英雄一样的鲁登道夫，一进入大楼，变成了一个被宠坏了小孩。有个上校提

希特勒传

出，是否可通知将军的家人将军现在很安全，他粗暴地予以拒绝，还不许人们称他“阁下”。他此后是“鲁登道夫先生”，只要冒犯他的警官把制服穿在身上，他将永不穿军装。

希特勒痛苦地站起来，托住被打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头发散落在脸上，脸色惨白。慕尼黑冲锋队医务团的医生瓦尔特·舒尔兹陪着他。他们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小男孩受了伤并且在流血。希特勒想背走他，舒尔兹连忙叫来他妻子的表兄弟，让他把孩子背走。他们在梅克斯·约瑟夫广场终于看到了希特勒的旧“塞尔夫”——车内装满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年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坐在前排，医生与希特勒则在后排上坐着。舒斯特抱着受伤的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开车到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知道那里的情形怎么样了。他们在马利安广场，碰到了密集的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变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醒了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驶向森德林格托尔广场。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伏击。由于无法到达啤酒馆，他们只好向南走，奔向萨尔茨堡奔去。

戈林的“荣誉勋章”并未能使他逃过一难。他大腿中弹，在人行道上倒了下去。他被人们抬至帅府街 25 号的院子里。一个起义者拉响门铃，他们问房子的主人罗伯特·巴林愿不愿意收留伤员。“我们当然愿意收留并抢救伤员，不过，请注意，这里都是犹太人。”于是，戈林便被抬上楼。经抢救，戈林留下了，直至他的朋友们前来接他至安全地带。犹太人施恩于他，他才得以逃脱险境。

6

以战斗姿态开始的运动最终以人们疯狂地四散逃窜而告终，好像自然灾害把他们袭击了似的。一群起义者躲进一所青年女子中学，有躲进厕所的，有钻床底的。另一群人冲进一家厨房，四处藏匿武器，或藏进面粉口袋里，或藏在灶下，或藏在咖啡桶里。警察到处追捕叛乱分子，数以百计的人在街上被缴械。守在咖啡馆指挥部的，被这一灾难吓失了魂，一枪未发便向警方投降，把武器堆好后，回家悔过去了。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省悟到顽抗已是徒劳，遂投降缴械。起义虽结束，但从啤酒馆得胜而归的警察部队却被市民们唾骂。他们高喊：“去！犹太保护者！猎犬！卖国贼！打倒卡尔！希特勒万岁！”

兰舒特的冲锋队在统帅府前惨败的消息传来时，仍在把守阵地。谣言传开了：希特勒受了重伤，鲁登道夫已死。格里戈尔·斯特拉塞收拾了残部，队伍“在对卡尔的出卖的失望中，在痛苦中”逃离了战场。他们在一座林子里发现一支慕尼黑冲锋队竟朝树上摔枪。斯特拉塞命令停止这种行为。枪将来还是有武之地的。兰舒特冲锋队团结一致，高唱着改了词的《卐字旗与钢盔》，昂首挺胸地走向霍班诺夫。他们唱道，我们忠于祖国，但是被出卖了。

公路上还有另一支冲锋队。他们乘着小车押送抓来的慕尼黑市议员——他们坐的是卡车。车队在通向罗森海因的公路旁的林子里停下来了。队长把俘虏带进了林子，他们吓得脸色惨白。他们觉得“最后的时刻已来临”，但他们所蒙受的耻辱只

希特勒传

不过是与冲锋队把衣服换了而已，没什么别的。这样，冲锋队员便可乔装市民返回慕尼黑。冯·尼林总理及其他主要人质也获释了。他们被赫斯成功地运至特根西的一间别墅里，但当他在给慕尼黑打电话查问情况时，用车送他们回家，看守他们的青年战士竟被劝服。赫斯不但把人质丢了，还把交通工具丢了。

武器藏好后，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身着借来的便装，探听主人的情况，潜回屠杀地。他被拦在统帅府外，埃格纳向一名警官说出了身份，“经多方求情，他才领我进去。在进口处旁边，摆着一具具尸体。我得在死尸堆中找寻他。我简直快疯了。”埃格纳发现，主人在他好友鲁登道夫的仆人身边躺着。“我极度伤心，希望完全破灭。于是我便回到维登梅尔大街的寓所。”施勃纳·里希特太太问她丈夫在哪里。埃格纳虽然撒谎，但是瞒不过她。“我还记得她说：‘太可怕了，可我为什么会是军官的妻子。’”

汉夫施坦格把一切行动的机会失掉了。他在家，妹妹来电话说，起义部队正向慕尼黑中心开进。他在街上碰到一个筋疲力尽的、熟识的冲锋队员。那人说，鲁登道夫、希特勒和戈林都已死了，国社党已经完了。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转身回家准备逃亡时，一辆敞篷小车呼啸着停在他身旁。车内坐着埃塞、阿曼、霍夫曼和埃卡特。他们一同前往照相师家中，大家一致同意他一个人前往奥地利。

希特勒从未想过，但由于不幸之事发生了，使他被迫到乌夫因乡间别墅藏身。在离慕尼黑 10 英里左右的地方，希特勒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突然说，他的左臂肯定中枪了。舒尔兹大夫问：“发烧吗？不发烧。或许里边有颗子弹，要不就是子弹

希特勒传

打断了什么。”他们在林子里停住了车子。医生困难地解下了希特勒的两件毛衣、皮茄克、解下来衬衣和领带。舒尔兹发现，他左膀严重脱臼，可又无法将它复位，因为在车内，且无帮手。他用一块手巾将希特勒受伤之手在身上固定着，并建议逃往奥地利。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意见。他们于是继续往南走。希特勒说，快到慕尔瑙时，汉夫施坦格尔在乌夫因的别墅就在数公里外。他令司机将“塞尔夫”停放好。之后他便与医生、急救员一同步行前往乌夫因。

下午4时许他们来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这是个用石块建成的小建筑，离该村的教堂很近。赫仑纳将三个筋疲力尽的来客领进上楼会客室。希特勒这时开始可惜鲁登道夫和他忠实的格拉夫之死——他曾目击两人倒在地上。他越发地激动。他说，正因为格拉夫的忠诚，他希特勒才失去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副官；正因为鲁登道夫的可靠，他才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他接着便谴责三政治巨头的叛徒行为，并发誓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要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赫仑纳建议他先休息一下，因为敌人很可能会发现他，需要力气拒捕。急救员和舒尔兹医生扶他进了楼上的一间卧房，试图帮他将脱臼的膀子复位。因为膀子特别肿，初次尝试失败了。希特勒脸在再次复位时出现痛苦神色——这次成功了。接着，急救员将他的肩膀和胳膊绑上了纱布。透过房门，赫仑纳听见希特勒痛苦地喊叫。

外国报纸纷纷作出歪曲关于慕尼黑起义的报道：在纽约市，它被说成是武装起义，希特勒的作用不大；在罗马，午间各报均说，皇太子卢伯莱希特已是革命党中的一员。

希特勒传

起义者于 11 月 10 日上午不是在逃就是被捕。被摁在特根西的赫斯，虽然什么也没有，最终还是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打电话，告诉她放走人质的事并问她能否找辆车给他，送他到豪斯霍弗家里去？伊尔塞骑自行车从慕尼黑出发了。由于该地与慕尼黑之间的距离有 30 多英里，与赫斯一起回城的道路是十分艰苦的。一人先骑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上，继续走路；另一人赶上来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继续这一过程。他们终于到达巴伐利亚的首府，找到豪斯霍弗教授的家。教授虽然认为这次起义不正义，但还是同意收留这位逃亡者。尽管赫斯有其局限性——“他的优点不是他的才智聪明，而是他的性格和心肠”——教授仍喜欢他。赫斯沮丧的认为人质若未被放走，起义也许会成功。豪斯霍弗教授据理力辩，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让他去投降。赫斯是不会接受这个忠告的。他几天后离开了豪斯霍弗教授家，到城外与友人一起藏了起来。他不久后便常骑自行车回城照料生病的伊尔塞。

7

在乌夫因那个着急的不眠之夜。汉夫施坦格尔未回家，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式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却又睡不着。希特勒把赫伦纳·汉夫施坦格尔找来，并告诉她，他已派急救员回慕尼黑找寻贝希斯坦，希望能用她的车子送他去奥地利。舒尔兹医生也进了城。为了确保把希特勒的膀子治疗好，他要找寻他的同事，名医沙尔勃鲁赫的得力助手。

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翌晨，连女仆们也紧张得不能进餐，只有不满三岁的埃贡十分自然。人们将埃贡严加看管起

希特勒传

来，以免他向墙外高喊阿道夫叔叔在这。舒尔兹医生快到中午时才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了进来。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勒的肩膀，因为情况良好，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离开期间，由德莱克斯勒代替他。他还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鲁登道夫和赫斯等人——如果他仍活着的话。

希特勒在两个医生走后再一再告诉女主人，她丈夫的安全有保证。他心里老惦念着同志们，坐立不安，不知道他们情况如何。如果他当晚确曾睡过，那末，次日清晨附近教堂里响起的震耳欲聋的钟声也扰乱了他的精神。

那天是星期天，11日。希特勒直到午饭时才走了出来。由于吊着夹板，他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深蓝色的提花浴巾。他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他觉得自己好比一位假罗马参议员。他还告诉赫仑纳，他父亲如何讥笑他是“穿办公礼服的孩子”的。

希特勒下午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坐立不安。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发烦躁了。为何还不来？根本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的。他在黄昏时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了下来，并将窗帘关上。之后，他又在房内走来走去。过了5时，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在附近的别墅里住。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老太太在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时，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制止她说话。他接着便直接与赫仑纳通话：他将带他的部下立刻到她的别墅去。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衣，期望着好消息，站在走廊里。她悄悄地告诉他，警察马上就要到。

希特勒传

“他霎时间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全都完了——继续下去也是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手枪。

赫仑纳说：“你到哪里去？她抓住他，轻而易举地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么能够一受挫折就丧气灰心？”她训斥他。“想想你的那些支持者，他们信任你、相信你。你现在若将他们抛弃，他们就不会再相信你。”她镇静自若地说，“你怎能离开那些相信你的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将头埋在手心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她偷偷出去藏手枪。她在隔壁房间，首先瞥见一只盛面粉的大箱，便将手枪插进雪白的雪粉里。她匆匆回去，发现希特勒独自一人坐在那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该怎么活动？你该给你最亲密的同事发出你的指示，她以后再一一填写，他只需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之后由她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搞好商业来往事情以及党内的财务；罗森堡要将党报照顾好以及——与先前向舒尔兹医生发出的指示背道而驰——“这场运动此后由你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要利用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其他领导人和埃塞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文件被赫仑纳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大作。接着便传来短短的喝令声和警犬的吠叫声。又过了一会儿，有敲门声。两名警官和一个年轻的警察中尉。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之后，抱歉地问能否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打开客房门。希特勒身披浴巾和睡衣，静静站在室内。希特勒的突然出现，吓了警官们一大跳，竟不敢靠近他。她招呼叫他们进来。希特勒在众人进房后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大声谴责政府及其官员。他口若悬

希特勒传

河，声泪俱下。”希特勒刚才还萎靡不振，此时像是已完全恢复了常态。他突然住口，叫中尉不要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天气很冷，但是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只在蓝色浴巾外添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把“铁十字勋章”别在军衣上。正当一行人下楼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他问：“你们这帮坏蛋，为什么捉阿道夫叔叔？”希特勒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静静地与女仆们和赫仑纳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赫仑纳从窗口看去，只见警车朝区的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面色惨白。

晚9时45分左右他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他之后便被急忙送进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刮来一阵大风，并天又下起了滂沱大雨，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道路弯弯曲曲，人烟稀少。希特勒愁眉苦脸，情绪低落。除问了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他便是沉默。

典狱长在兰茨贝格监狱已准备采取行动，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然而，希特勒被送到满是铁钉的铁栅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还未到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7号牢房。这是仅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纳一个哨兵。谋杀埃斯纳的凶手阿克罗·瓦利是这间牢房的前任，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帮他脱衣的是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里希。“他不喝也不吃，躺在床上。我把他锁好后被打发出去了。”希特勒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复明；在南德，现在，与他作伴的是天花板与空墙。从北德到南德，恰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知起义消息后说：“要谴责希特勒，有许多话题。然而，

希特勒传

人们可如此说：他是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本质。他不知怎样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他是个狂热的化身，没有一点儿调和的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用了过去时。一般人们认为，他不再是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已经把骰子甩了出去，输得精光。莫勒写道：“我国的历史已走上歧途，我们在地球上的一切都失败了。昨天是，今天也是。我们回忆一下，这一代人以来，没有任何事不是失败的。我们的事业，一开始便是死亡的……好像一切都有些不对之处。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所有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拥有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藐视当局的一道命令在慕尼黑，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结束。它已按原计划净化了‘空气’。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又为德国淌了血。由于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和希特勒的鲜血，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希特勒年轻时，受过两次严重的打击：被挡在维也纳艺术学校门外，以及母亲的死亡。他后来，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失败，以及在统帅府前遭受灾难。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才能东山再起，吸取以前的经验，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作为鼓手的希特勒，在过去几个月里，已让位给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第三部 不断成长

希特勒传

第七章 在兰茨贝格狱中

1923—1924

1

希特勒被捕的那天清晨，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电话给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他说很想同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起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不好推辞地应允了，于是便挂电话给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位将军——此人乃是她婆婆的娘家人。

她历来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绝不会让这次实在难得能参与时机的机会溜过去……于是，妈妈兴奋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时局还谈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我一直没开口说话，多洛绥·汤普逊至少认为我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来照料希特勒的。

一行人在会见后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将希特勒的文件和手枪偷出来放进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前往慕尼黑，去见希特勒的律师。她对他说：“这是他的文件，请你帮我给他。让我们看看什么新情况会接

希特勒传

踵而来。”

兰茨贝格这个小镇虽然已近 500 年的历史，却依然还是老样子。还是躺在莱希河谷，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在两边耸立着。自中世纪以来，它抵抗住了斯华比亚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因此，不少古老的岗楼和城垣还保留着。从慕尼黑前往监狱，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是必经之路。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修建在前面的山头上。监狱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组成，高大的石墙围绕在四周。它分成两部分，分别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和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 号牢房的犯人绝食好几天。在牢房内，希特勒在墙角蜷曲着，一言不发。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曼纳海姆时，他居住过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的地方，在提埃希大街的房子的光线更差。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却也够舒服的。加了双重防护的那扇窗户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透过窗户，还可看到灌木林和树木等景致，慕尼黑的风光也不过如此。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夜不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的诊断是，“他上臂骨折，左膀脱臼，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从未中断，布里斯坦纳认为，他可能“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可能伴他一生。”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原因并不仅是疼痛，也不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是一个错误。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被出卖——被陆军，被三政治巨头，被命运出卖。更为气愤的是，因为溃败被报界嘲笑为“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外国记者在文章中说他是“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把他的政治死

希特勒传

亡的消息刊登在头版：“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皮肉之苦和饥饿，尚可忍受，而嘲笑却深深地把希特勒伤害。

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使前来探监的人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一动也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在回忆录里写道。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告诉德莱克斯勒说，如他再什么也不吃的话，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他，又来到7号牢房，“我说，无论现在环境如何恶劣，不要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在等待着他的东山再起。但我的话他没有听进去。他完全绝望了。从而使我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他，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又45分钟，直至相信他已“开始找回自信”。

希特勒或许真地回心转意了，因为几个人开始激动地声称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是他的功劳。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精神不振、骨瘦如柴的希特勒时。希特勒招呼了一下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弃从而辜负了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革命很难成功，党也可能解体。希特勒开始不住地摇头，他后来胆怯地问“还有人会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吗？”尼尔希回答说，事实上群众的热情已被唤起了。“希特勒自己不能自我放弃。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走向成功的。”尼尔希说。这一席话让希特勒又找回了自我。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不再绝食了。“之后，他始终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是谁拯救了希特勒？可能是尼尔希，也许是德莱克斯勒，

希特勒传

甚至可能是赫伦纳·汉夫施坦格尔，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赫伦纳写信给希特勒道，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不是要让他兰茨贝格狱中绝食。如果他绝食自杀的话，那么这就正是他的宿敌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她的劝告起到了扭转作用”，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十分崇拜她。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出现在乌夫因，没有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是难以完成的，而她也紧密配合着他这种压抑着的欲望。还有，乌夫因的那间别墅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无疑获得了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伦纳的一席话，在希特勒身上产生的效果无疑是巨大的。曾为他效劳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便可以用言语感动希特勒，使尼尔希最终说服了他。不管是何种情况，希特勒在同意进食之前，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是被迫的。

停止了绝食的希特勒，不愿出庭受审。起初，他同意受审，但见到审问者时，他又拒不开口。首席检察官在绝望中，派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能否让希特勒开口”。他与先行者一样无功而返。后来，他与希特勒相对而坐，耐心地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方是一匹病马”。希特勒一声不吭，愁眉苦脸，“双眼有如一只绵羊似的空虚”。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阻止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好，希特勒先生，你也许不喜欢书记员。”于是，他便请出了监狱雇用的书记员，并带走了惹人讨厌的文件。埃哈德在室内只剩他二人时，改变战术，说他是履行公事。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探讨此事？由于被埃哈

希特勒传

德解除了非官方态度的武装，希特勒一反常态，一肚子话滔滔不绝地倾泻了出来。他将起义计划如何制订、执行和盘托出，并解释了采取如此激烈行动的原因。他的脸色铁青，声调高昂。埃哈德认为，他像是面对一大群听众。偶尔助理检察官也提出问题。若是令他难堪的问题，他就沉默，但另一肚子话几乎就在同时，又爆发出来。埃哈德回慕尼黑后，向格奥尔格·尼特哈特和他的上级作了书面汇报。报告给前者留下深刻印象，但后者却说：“希特勒也许要把未说完的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对此不屑一顾。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有更多的话没说。忽然他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闷死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了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12月初一个大雾弥漫，天色阴沉的晚上”她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会看到意志消沉的他。“在我有生之年，我永记这个时刻，”她在写给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聊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高涨得跟先前一样，身体也不错。他的胳膊虽然有时会不舒服，但他已觉复原了。人们这些日子来，对他的忠诚多么令人感动！就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来探视他，他还从B城万弗里德别墅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取得了稳如泰山的成就。胜利与目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些来到。”瓦格纳家送来了这包礼物。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几天后，又送来一包，包括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如继往地信任他。“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告诉一群听众，“不管怎样，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他为了这一切，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希特勒传

他的种族主义盟友，仍坚信革命最终会胜利，并改组了队伍。他们采用极不惹人注目的名称：“人民拓荒先遣队”、“人民歌咏俱乐部”、“德国步枪步行团”、“德国忠实妇女团”等等。在罗姆的领导下，旧“战斗同盟”，被“前线社”代替，组织终于复活了。其目的是要变为“保护伞组织”，保护那些正在改组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这个主意希特勒不喜欢，但仍把自己当成希特勒下士上级的罗姆，并不理会他的抗议。

虽希特勒的政党被依法解散，但在暗中并没停止活动，以慕尼黑为中心。为了纳粹活动能继续进行，在慕尼黑罗森堡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思想分歧和私人争吵受阻。自认是希特勒政治继承人的罗森堡，被放逐到萨尔茨堡的一群人——旋特莱彻、埃塞、汉夫施坦格尔和阿曼——却认为他是骗子，讨厌他，看不起他。然而，这也许是选他的原因。他没有追随者，也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另外，也无其他人选。施勃纳·里希特死了；戈林在奥地利避难，并慢慢养伤；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只剩半条命；而德莱克斯勒又反对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希特勒坚信一点：罗森堡极为忠诚。

他一天晚上，“穿越大雪覆盖的森林”，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一一与同志们交谈，戳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并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几天后，罗森堡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滑雪越过边境回到慕尼黑。然而，他们自卫的信念更加坚定：此人为无能之辈。他们开始自己制订计划，包括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用武装偷运或制造伪钞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等。任何计划都行不通，包括

希特勒传

派卢德克为希特勒筹款前往美国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将是未来的领袖时，”卢德克报告说，“我会遭到耻笑。”

人们在慕尼黑仍相当器重希特勒。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于那年圣诞节，为庆祝节日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的活动画。帷幕拉开：一间牢房，雪花飘在小铁窗外，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坐在书桌前，音乐有景是男声合唱《神圣的夜晚，沉静的夜晚》。接着，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被天使放在桌上。那人慢慢地转过身来，露出脸孔。“许多人认为那就是希特勒”，海因利希·霍夫曼回忆说，“抽泣声弥漫整个大厅。”放幻灯的人在灯光亮后注意到，许多女人和男人的眼睛湿润。

在伦敦，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于1924年元旦那天，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迎刃而解。业已废除紧急货币的沙希特，起初便坦率地告诉对方德国的财政困境。他说，一俟解决了鲁尔危机，“德国的工业也许会再度崛起。”为此，德国急需外国贷款援助，并建立“继帝国银行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基础完全黄金的银行。”他说，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他可在德国本土筹集。“其余的一半英格兰银行可否贷款？”

在他的回忆录《老术士》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没什么兴趣。沙希特后来宣布，新银行拥有两亿马克的黄金资本，他准备发行银行支票。“我准备发行英镑支票，”他说。沙希特在诺尔曼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继续说道：“行长先生，想想吧，这样一个措施在德国的经济合作和加强大不列颠

希特勒传

全球帝国方面会产生什么前景？假若我们想使欧洲和平，就必须摆脱大会宣言和会议决议的局限性。在经济上欧洲各国必须更加紧密地联系。”

诺尔曼在 48 小时内，以 5% 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并说服了伦敦的很多银行家，让他们可以接受高出贷款数额很多的支票，“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只挥了挥大笔，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经济灾难这一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

2

狱医证明，希特勒在体力上可以承受审判。布林斯坦纳医生在 1 月 8 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断言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病或精神紊乱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一时刻均能自控，疾病并未损害其思维能力及意志，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理想的地方的。”

希特勒两年前，曾短期被禁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这使他受益匪浅。他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被迫重新检讨过去。他在安静的小牢房里，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准备将起义变成进军柏林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夺取政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我吸取了起义失败的教训。每个国家为民族振兴，必须采取自己的方法和方式。”

他坚信，拯救他的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是这次起义的溃败，”他后来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本是“绝不可能的”；在全德迅速夺

希特勒传

取政权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必然会导致 最大困境”；前 14 位统帅府的同志“流血牺牲”，“最有效地宣传了国家社会主义”。

他在过去几星期内，所作的不仅是面对现实，他可谓博览群书：张伯伦、尼采、兰克、马克思和特莱斯克的著作。他泛读了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和俾斯麦的回忆录。“国家出钱供我在兰茨贝格接受高等教育，”他告诉弗兰克——而且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反正，知识不能与意志力量相比。如果上帝只是‘认识’世界，并没有‘用意志创造世界’，今天仍旧混沌未开。”

希特勒初入牢房时，只怪自己没有好运。通过条理化，他现在认识到，命运是在拯救他。汉夫斯坦格尔回忆，列宁于那年 1 月间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德国和自己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告诉汉夫斯坦格尔，历史在重复自己。腓特烈大帝于 1762 年得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去逝的消息时，也是如此狂喜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投降，整个共产主义结构都将崩溃。

希特勒 10 个星期后，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起来。他深信自己将领导德国，长时间地考虑国家经济问题。为此他想出了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好办法：建立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的公路网，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大量的人有能力购买。2 月 12 日，他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已在肉体和精神上作好受审的准备。受审将于 4 天后开始，希特勒之未来将被决定。

曾成功预言此次起义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那时，恰巧也在慕尼黑写一篇占星文章。她再次为希特勒预言：惨败不会让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像凤凰一般飞起。“近日的事件，在

希特勒传

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的同时，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以巨大的推动力推动世界历史的钟摆。”

2月26日上午，全德国甚至全世界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鲁登道夫、希特勒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不只是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民主和新生，也与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斗英雄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现在，审判正于慕尼黑举行……啊，上帝保佑他平安无事，一切顺利。”此时，她所关心的是胸佩铁十字勋章，穿着最好的衣裳，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正泰然自若地坐着的，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的希特勒。他要求成为歌德的“铁锤或铁砧”。

鲁登道夫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然而，显然，希特勒从审判一开始，就成了中心人物。他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很明显，从开口辩护时起，他就想当铁锤，仿佛他是原告而不是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用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他被迫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血腥的袭击游行，他的出逃，以及他在兰茨贝格被捕的情况。他惟一觉得后悔的只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一起牺牲。

他主动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但矢口否认他有罪。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荣誉，在世界上重新确立德国的地位。他怎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番话表达了虔诚信徒的信念，这点在主持审判的检察长和矮个子法官的脸上就能看出来。希特勒的态度并未遭到他们的抗议，他一直在滔滔不绝地演讲。对检察长和法官阻止希特勒发言的助理检察长埃哈德也

希特勒传

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与他一样，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坚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将鲁登道夫释放。因就任此职检察长曾遭学生攻击，现在他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这次审判。

法庭上的这些官员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除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之外。他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嘲笑纳粹喜欢游行、旗帜和口号。“这些东西毫无疑问，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却不会有政治作用。”他描绘此次审判为“不值一提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个潜在的凯撒。

次日，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但到了2月28日，审判再次被希特勒左右了。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激进地对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进行了描述。“在慕尼黑，这就是典型的例子。多亏健康群众的觉醒，否则人们很难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人们对他的话反响很大，他大声申辩，为向柏林进军开始申辩。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希特勒的雄辩口才和精明战术动摇了法官们。同时，鲁登道夫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他越来越怨恨其他被告。在审判后汉斯·弗兰克抱怨说，“希特勒诱导我”，“我被欺骗了。在他发动疯狂地进攻前，我被告知陆军百分之百支持……不只是个冒险家和演讲家而已。”他的怨恨有道理，这位冒险家和演讲家只是个卑鄙的下士，但他的做法却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的所为。希特勒为此受到责罚。鲁登道夫则极力推脱责任。希特勒举止傲慢，对律师和法官不断攻击，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他是主宰。“他用教训士兵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G·霍德·普顿斯批露。“字字句句都尖刻而粗鲁。他抬高了蛮横的语调，坐在中间位子上的

希特勒传

小个子首席法官气得山羊胡子不停的抖动着，却不得不保持法官的仪态。”

媒体对于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开始有些不满了，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审判有失体统。3月4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部长们公开地批评了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认为，被告对州警的污辱，是对州警的人身攻击。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的审判能力。一位部长宣称，全国，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并非如此。另一位部长发言道，他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连续长时间发言而置之不理的作法很不满——而尼哈特却回答说：“他没有办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公审后，希特勒又重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就是在这里，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那两个死对头探访了他。罗森堡带给他不愉快的消息：正在密谋一股力量坚持要作为代表民间组织——地下党来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那样的人来说是十分的诱人，因为这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终于达成了共识，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对这一主意却嗤之以鼻。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可能会被解散的情况下，联合是不可以的。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不得不做出反应。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得到的越容易，那么失去的也就越快。最安全的办法是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重新计划。希特勒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反对意见的：如果我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选，那就是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其他社团们的名义，准备工作完全没有时间。我们必须等待，等到合法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同意了他的观点，开始为此而四处游说了。

希特勒传

汉夫施坦格尔作了很亲切的探访：带来了他 3 岁的儿子。“小心呀，孩子，”在前往探访的途中，他对儿子说。阿道夫叔叔虽然现在被关在监狱中，不过，总有一天他会脱离苦难，并成为德国的领袖。孩子曾认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还有老鼠。但现实并非如此。牢房下面有一个花园般的后院，和普通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两个大人谈话时，小孩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两个大人谈得非常热烈。孩子现在只记得，阿道夫叔叔是个大嗓门儿，把小桌子都振动了。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衣柜顶拿出点心，并沏上好茶。

尽管社会上的抗议不少，对希特勒的审判依然在进行。在 3 月 11 日和 14 日两天的审判，希特勒出尽风头。与英国的审判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允许被告发表长篇讲话甚至可以向证人提问。希特勒把话锋直指政治三巨头。冯·洛索夫将军刚坐下去，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大声向他痛斥。高大威严的将军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手指希特勒，像支手枪直逼着希特勒。希特勒碰了个大钉子，坐着不说了。片刻后，他又开始指责三位先生曾保证加盟于他。

冯·洛索夫将军反驳道，希特勒仅够扮演政治上的小角色。希特勒在法庭上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迫使法官叫他放低声音。他稍收敛了一下。但是，洛索夫说他不仅感情用事，而且残暴，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他暴跳如雷，像按了弹簧从椅子上跳起来。“你的花言巧语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感情用事和残暴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说，“不，只不过良心坏了的是希特勒。”此话又招来了希特勒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然而法官并未斥责希特勒，将军便起身鞠了

希特勒传

躬，愤愤地离开了法庭。此后，尼哈特法官才慢条斯理地宣称，希特勒此举是法庭不容许的，是人身攻击。“本人接受这一提醒，”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荒谬的审判我就觉得痛苦和悲愁。”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次审判，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欢。被告不被允许长篇发言，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外行法官竟宣布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一位让一个有罪的人嘲笑帝国最高官员的首席法官；一个官员高声对两位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必须讲德语！’由于怕此事成为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只有在慕尼黑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

颠三倒四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强辞夺理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陈述，可以说是训示，是勉励，是谩骂。无论怎样却始终吸引着听众，而且利用人们的好心肠博得同情。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当有人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其动机中包含着野心之说时，他完全不承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自始至终，我的目标并不局限于当一名部长。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达到这一目的，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不是被人强迫的，他自觉自愿；不是被人驱赶向前，而且自己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极为骄傲的……认定自己有主宰人的权力，是统治者。我有我的责任！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们需要合作。”

他在法庭说，虽然 11 月起义失败了，但是，他成为德意志未来的领袖是肯定的。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的人们是注定会

希特勒传

和解的。“我相信，虽然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是死对头，但离团结一致的时刻已经不远了。我坚信，这次的流血并非意味着我们分开。当我得悉首先开火的是市警，不是国防军我感到十分欢欣。因为我知道军队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永远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有些激动地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希特勒对法官的驳斥不屑一顾，继续抑扬顿挫地说完了他的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即使在此时此地，本人仍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新兵会不断发展，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泥潭中的帽徽将会拾起，昔日的旗帜将飘扬在我们面前。你们不能对我宣布判决，因为只有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的起诉作出判决。”

唇枪舌战结束了，希特勒胜利了。法庭休庭准备做出判决，许多观察家都预测，他定会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证人所作的证词，要对鲁登道夫开释。其余3名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以阴郁的目光看希特勒的法官，也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依据我的辩护词，”宣判后希特勒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才真正有罪。如若开释，人们将反对他们，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这就使陪审团开始进行讨论。他们的结是，只要判我有罪，尤其是他们才可得到保证，后判决6个月内我将赦免。”

4月1日，宣判时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佩花的妇女。上午10时左右，被告们被带到大楼前

希特勒传

拍集体照。鲁登道夫身着军服、头戴钢盔怒容满面。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希特勒在他左边站着。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精心准备的。他的胡须剪得很整齐，头发柔顺，看上去，显得很精神，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结结实实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一大群人聚集大楼外。判决书几乎宣读了一小时。当希特勒被判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 5 年徒刑时，法庭内还比较平静。因为审判前已拘留 6 个月，刑期减少半年。人们早就预料到，鲁登道夫无罪开释。对他所作的照顾，他还愤愤的说：“这次开释，被我看成是耻辱，释放不是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他的抗议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羞成怒，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人。

人们仍旧尊敬被判有罪的希特勒。希特勒押解回奥地利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希特勒的思想、感情和德国人一样，在战时在德军中志愿服役 4 年，是一个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军人……‘共和国保护法’对他是不适合的。”法庭对希特勒的 3 位敌人也开始表现鄙视。它宣称，如果卡尔、赛塞尔和洛索夫“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抗议，或者，在 11 月 8 日晚，被告要求反复澄清事实时，如果互相配合”，那么什么事情将不会发生。

希特勒第一个被宣布判决。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在外边等候的小汽车，是为了不必要的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到老地方。在他不在期间，重新装修了这里，更加引人注目。但是，以前的信心却没有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愁苦更加多了”。阴郁的情绪转

希特勒传

瞬即逝。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写下：

充满狭隘个人主义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我的斗争开始了。

1924年4月1日于
兰茨贝格

所有起义者盼望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赢得了一场宣传战，却没有赢得自由战。他知道，在那里他要呆上4年半。一大部分德国公众和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可以说是极其荒谬了。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此次审判表明，对帝国宪法的反对在巴伐利亚并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3

希特勒的两名同志关在楼上。克里贝尔上校“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分别关在8号、9号牢房。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狱卒到下班的时间，牢房门才可得以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漱完后便在等候。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的门打开，犯人被允许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希特勒由于膀子有伤，“只好充当裁判”。

希特勒传

半小时后，犯人们在又窄又长的花园里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一旁则是 20 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在那条砂石小路散步。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并告诉他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一位看守回忆说，“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并没有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和他们一同高声齐唱的犯人越来越多，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不得不禁止”。

上午 10 时左右，犯人各自带回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许多民族主义的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大量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他的邮件是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每星期由国社党一群女党员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香肠、烤肉和火腿分发给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得不到平等。”

中午午餐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他们的午餐几乎都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进来，希特勒一到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在桌旁一站，“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在这里他们不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汽车或艺术。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闲谈一会儿。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 4 时左右还是在公共室喝茶或喝咖啡。下午喝过茶后，花园门会开着，希特勒有时一个人，有时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到了晚餐时间晚餐通常是——青鱼、香肠或色拉。如果你需要当然可买半升葡萄酒或啤酒。一小时运动或活动，犯人各自回房前先在公共室内集合，晚 10 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的作息制度也会改变，一吃完早饭便回房

希特勒传

会客或学习。崇拜希特勒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影响力巨大。由于他“纪律性很强”，监内未出现过犯人聚众闹事的情况。“因为他们都听话，给我们的工作和服务带来很大方便。”

通常，他自得其乐，只要一听到坏消息，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神情忧郁”。党内的争吵不休特别令他不安。纳粹党分裂的趋势逐渐地开始明朗，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是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与鲁登道夫勾结，“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组成了俩人候选人。

4月首先举行巴伐利亚的大选，杂牌的民间团体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不得不说是个意外，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戈林夫妇对这一胜利非常满意。卡琳在给她父亲信中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真让我难以置信，欣喜若狂。最近，我们的处境艰难。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据我们估计，希特勒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他是个天才，人好极了，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独一无二的天才！”

次月，全国的选举如期举行，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获选——包括斯特拉塞尔、弗德尔、罗姆、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反对希特勒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许多投票人了解“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希特勒坚定的神情及其滔滔雄辩的才能，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持久、更深刻的力量——在全国，种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

希特勒传

想的带动。只是，通货膨胀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从而得以避免，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失业工人，对投票不很热衷。

可以想见，选举结果令希特勒非常生气。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归功于自己。更让希特勒气愤的是，由于鲁登道夫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走在鼓掌欢呼的行列，同时开始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政党吞掉。他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那本小册子上写道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他们并非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被威胁。在希特勒看来，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而宝贵的教训。他发誓，只有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权力，他才会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内部的攻击。在起义后遭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办公室里，弗德尔和德莱克斯勒二人，正在开展运动反对希特勒。“他们认为希特勒是带神经质的演员和独裁者。并宣布，若要重建党，他就要受到严格控制。”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德莱克斯勒遇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入狱的领导者。“他设计害我，违背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用这狂妄的起义，永远将党毁灭！”只要希特勒重获自由，褐衣暴徒便会重新回到街头。“德国未来的日子是恐怖的。希特勒将我出卖。这是我四处反对他的原因。”

库尔特·卢德克于那年5月，从国外募捐归来，发现地下纳粹党一塌糊涂。“各派内部，各派之间，争吵不断。他们的敌对行动已扩展到私下丑闻以外——在街头敌对各方竟大打出手，根本不顾现丑于惊愕的旁观者面前，也不顾损失自己形

希特勒传

象。”他从阿曼、汉夫施坦格尔和埃塞处获释，党变坏的根源是罗森堡。但罗森堡又是另外一套说法。他说：“因为我代表希特勒，他们攻击我。希特勒虽一筹莫展，他们也不敢攻击。若将我铲除，他们便更靠近最高领导。”

卢德克决心亲自前往兰茨贝格，请示希特勒如何以最好的方法消除危险。希特勒根据卢德克地说法宣布，党必须有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并非武装政变，而取决于投票箱。“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相信，这是我们最佳的行动路线。”希特勒对党内的争吵似乎一点儿也不沮丧。“他的确坚信最后地胜利，连我自己也消除了疑虑。他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逐渐扩大。鲁登道夫与斯特拉塞尔几个星期后，共同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统一的人民党，其中包括国社党。这使党内的斗争更加严酷，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希特勒已“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放弃，服刑期间任何政治活动都不参与。他不同意追随者前来探视，因为他正致力于著作，且工作繁忙。”

某些圈子里的人们猜测，著书立说只是希特勒以躲避相互残杀的政治斗争地借口。但是，他早在被捕之前，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他现在，已有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以致使他来个政治休假，好让自己的想法跃然纸上。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来，他还口述给莫里斯。然后，在安静的牢房中，用两个指头吃力地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将手稿打出来。

看守赫姆利希回忆道：“当他写完每一部分后，便于晚间集会时朗读给大家听。”写这本书的环境并不好，例如，窗户

希特勒传

会在下大雨时漏水。有一次，当他在擦地板时，竟大笑起来。原来，“有只监狱饲养的猫，在水潭和杂物中间”，“蹲在矮凳上，津津有味地舐着凳子”。顶楼的一位新来者是他最得力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建议，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想办法、出主意，希特勒的口述由他记录，并打出来。瓦格纳太太提供给他大量复写纸、打字纸、铅笔、橡皮和墨水等等。

这部书初定为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题目冗长，名为《四年半来与愚蠢、谎言和怯懦斗争之情况》的第一章里——却把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也包括进去。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书，同时也提供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能使他讲述三个他最擅长的题目——马克思主义、犹太人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艺术的衰落、梅毒的毒害、战争失败，以及君主政体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跃然纸上，本身就是在接受自我教育。“我在我坐牢期间，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历史的、自然的基础。”当局将他逮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假若他们让我不停地讲演，不给我喘息之机，那会是更明智的做法！”

希特勒也非常善于争取狱卒。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已被他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可以在午夜以后继续用灯。看守得很松弛，使犯人们竟打印并发行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严肃又轻松。通常会由希特勒撰写头版头条文章，他也常画讽刺漫画。地下报纸本来很隐蔽，有人后来，不慎在家书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赫姆利希到一号牢房搜查编辑部时，却一无所获。

希特勒传

侦察晚间的集会是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以确保无人密谋革命。但是，希特勒的讲话宣传却影响了此人，不久便陶醉于他的讲话。他与助手们常在门外集合，“听得全神贯注，尤其要听听他怎么说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我们对他的演讲印象极深刻。”

希特勒常用“万岁！”结束会议。人们此时便不约而同地唱起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起义那天改编的那组歌词：

即使他们出卖我们，
或当我们是牲口虐待，
我们了解我们的事业，
效忠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消亡，
希特勒冲锋队，
有朝一日终再起！

由于希特勒专注于他的著作，便允许他的人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十多个人，逼他做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床单裹住身子，用锅黑涂黑了脸，拿着扫把和火钳，进入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武器，希特勒被迫受审。他们接着便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重现。赫姆利希记得，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的审判结果，“边摇头，边笑着回去继续工作去了。”

希特勒传

汉夫斯坦格尔这个较不虔诚的来访者之一注意到，希特勒胖了。他说狱中的运动希特勒应多参加一些，少吃甜食。希特勒对每个劝告，都有自己的回答：“一个领导人在体育运动中，是输不起的。多余的体重可以用讲话解决。”汉夫斯坦格尔带给他几本书，但最能使他振作的是最近一期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着一幅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白马进入柏林的画，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他说：“你瞧，他们随便讥笑吧，但我一定要进柏林的！”

他接见过许多女宾，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而忠实的祖母”。她身材不高，却风韵仍存。从前，霍夫曼太太退休后为希特勒洗衣裳，给他吃糕点和奶油。要是他吃了糖，她就会告诉他，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生活应注意。卡琳·戈林前来借钱，希特勒给了他一张自画像外加一句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光荣的妻子”。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经常来。星期天，她再次来到兰茨贝格，还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每次希特勒与赫斯在楼梯口等她。她一来，希特勒就十分绅士地吻她的手，然后同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与母亲前来，她母亲不怎么喜欢赫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使之态度大为转变。“我母亲对政治是不闻不问，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探望过赫斯，带给他政治、地理的文章和书籍，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很少独自一人去。“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总有一种感觉——他受过教育不多，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有防备性。”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说过，赫斯步入政界是个错误，

希特勒传

而应继续他的教育和学习，又或许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性错误。他知道希特勒还致力于自己的著作，也知道他曾与赫斯有过共同的话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确信，希特勒不会理解这些，连了解它们也是个问题。”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只和他们讨论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可是没有什么用，希特勒只从中取其所需。

赫斯尽管崇敬这位教授，可坚决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为国家社会主义奉献一生，后来他如愿以偿。他证实，希特勒不喜欢有损于党的争吵，且忙于写作。7月16日，赫斯致函一朋友说，希特勒先生对现实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对发生在外边的事情一无所知。也许是与他们意见不统一，他对没完没了地争吵无能为力，至少在此处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他认为去介入如此分歧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坚信，只要重获自由，一切都将在他的掌握之中。”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对所谓的民间合并持否定态度。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说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如果他们达成统一战线，“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只有退党，北方的左派分子同意埃塞的看法，可是不可能合并，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指出，显然，信是写给元首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后到北德，赫尔曼·埃塞则是不受欢迎的，北方是不能接纳这种人的。“1923年时在慕尼黑的历史不会重现，在希特勒万里长城正逐渐被修建。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强硬，他们鄙视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所以，他们目的只是为了……与元首密切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希特勒传

由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希特勒更加坚定了脱离政治的决心。7月29日，他通过《人民使者》发表声明。“因本人目前潜心于自传，除书面回复者外，恕不会客。”他虽然厌烦政治与会客，但他曾会见过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和他讨论一个关键的问题：“对犹太人的立场你是否有某些改变？”“是的，是的，”他回答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所改变。我终于领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不够严厉！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必须采取最强制的反犹办法才会胜利。我认为，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都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公敌。”

整个夏天，希特勒生活得舒适而快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着手整理他的著作，期待早日能宣布获释。9月18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伐利亚司法部拟定了一个有关希特勒的报告，获释指日可待。该报告中写道希特勒服刑数月来，“严守秩序和纪律”，“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本机关官员彬彬有礼。”在最后写道，雷波尔德确保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和其他不正当活动。“毫无疑问，监禁使他变得更加沉静和成熟，更稳重。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报告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很快获释。但是，巴伐利亚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务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必然会引起暴乱，“因为他有煽动力”。为以防万一，将他押解出境。刑法一处不理睬此建议，宣布希特勒可即日获释。但是，司法部长不同意，理由是，犯人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被其他官员认可，出狱因此成为泡影。

希特勒传

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与从前一样致力于著作。赫姆利希回忆说：“从早晨直到深夜，人人都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他似乎忘了自己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在公共室“深情地”向集合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承担全盘责任”，同时又向他们分析失败的历史原因。听众被深深地打动了。

11 月后，出狱宣誓的迹象仍不明显。他与先前一样作息。

此时，希特勒的随者戈林住在威尼斯旅馆，企图向墨索里尼借款，以应急需。戈林虽然伤未全愈，还在接受治疗，但仍不忘效忠元首。他和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奥·纳格雷里联系。计划能从法西斯手中借到 2000 万里拉，并取得希特勒一出狱便与之会见墨索里尼的承诺。作为交易条件，国社党将公开支持意大利对第洛尔南部提出的领土要求，这将失去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巴伐利亚。

很明显，法西斯头子认为“向罗马进军”中遭到惨败的政党没有能力归还这笔贷款。戈林的请求变成了无谓的呐喊。“从前，法西斯同样弱小，遭到耻笑，”他辩解说给了一些新的建议，“人们应该相信国社党的未来是光明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一定会总揽大权。他把纳粹党由于支持像南第洛尔那样不得人心的事业而面临险境的情况作了细致的说明，他也指出，墨索里尼用 200 万里拉得到了多多少少的帮助。“为此，你将在我们的报纸上大肆张扬。另外，这 200 万里拉至少要用 5 年来还清。”

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比往常更急。“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把运动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这确实不错……从某种方面上说，反犹太主义是一个国际问题。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反犹。”

希特勒传

11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但墨索里尼却未遵守诺言（恐怕从未借出200万里拉时，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被释放。尽管每次他对“自由”都很失望，但他却很平静地处理它。赫姆利希回忆说：“狱中的同志们为庆祝圣诞节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最高兴的时刻，却被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的影响，因为他们呼吁要公开，所以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希特勒是从雷波尔德典狱长的口中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下午，希特勒在狱中服刑一年余后，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并将身上仅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感谢赫姆利希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也道了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几乎都哭了。——但我除外，我们要把他们吸引过来为我们的事业而奋斗。”

那天，天阴沉沉的，希特勒简短地和前来接他回家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打了招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的旅行车。由于在狱中不允许拍照，霍夫曼未给希特勒照相。此时，希特勒叫霍夫曼为他在古城门前照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因为城门有点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问希特勒，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要卷土重来。”他说。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兴奋不已，他让米勒把车子开快些。米勒答道：“我一定要坚持到25年之后再死！”

车到帕辛，和一群骑摩托车迎接的纳粹分子碰了头，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效忠的部下们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

希特勒传

在楼梯口，他的狗因为太激动而几乎把希特勒撞倒。鲜花和桂花圈放满了室内。邻居早就给他预备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瓶葡萄酒。他觉得监狱并没有对不起他，他并不后悔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很感谢牢房生涯为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刚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认识还很肤浅。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服刑期间我对未来、对命运充满了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

逆境锤炼了他，使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党内的纠缠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打击，并未使他感到难堪。他决心返回慕尼黑后开辟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先前，他只不过挂个“元首”的头衔，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元首，实现自己的目标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估计好当前的形势。在12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选票从191.8万张下降至90.7万张，几乎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惟一让人欣慰的是，他不但能重获自由，而且连押解他出境的上诉也被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样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受到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许多民间组织已把出狱后的希特勒看作是敢于为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伟人。尽管在12月选举中不顺利，但他的种族主义运动，仍呈现出勃勃生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发展竟然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犹豫不决的人们，由于对那次不成功的起义相互赞赏，便成了极端主义的同盟。

从某方面说，纳粹党比以前更有实力了。党内的两派虽然互相攻击，分歧很大，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都归顺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支持者也将不得不将人民的追求与

希特勒传

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就联系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牺牲自己而捍卫事业的伟大形象，也将象征着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

在监狱那个可怕环境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还不成熟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差得太远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也不知所措。“我有这个想法，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请假。我无法摆脱这个念头。”但希特勒不笨，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让他和现实联系上来。于是，他便决定保持一段沉默，然后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重新和好”的任务。

为了这些，他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在圣诞之夜拜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他们已搬到伊撒河的对岸，这个区靠近赫尔佐希公园，环境优雅，房子面积也比以前大得多，托马斯·曼那样的名人也在此住。希特勒走进钢琴室后，便惊讶不定地到处看，然后用恳求的语气说：“汉夫施坦格尔，给我演奏《利贝斯托德》吧。”在汉夫施坦格尔专注地演奏完《崔斯坦和伊索德》里的名曲后，希特勒情绪才慢慢稳定。赫仑纳将刚出生女儿赫尔达带了进来。希特勒和婴儿逗乐一会儿，然后为发生在乌夫因的事情道歉。“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传统的一个，”他一边说，一边环视琴室。他话没说完突然转过身来，“对不起，”他解释说，“是监狱给造成的，无论何时总觉得有狱卒站在身后阴魂不散。”他解释道，在兰茨贝格，总有人透过门洞在监视他。“真可怕！我确信，他们在寻找机会把我送进精神院。你知道，我绝食了两个星期。他们想以此来控告我已经疯了。”（这可能是他不再绝食的原因）

他们晚饭后分发了礼物。之后，赫仑纳、希特勒和4岁的埃贡都在钢琴边坐下。汉夫施坦格尔用“斯坦威”弹了《军队

希特勒传

进行曲》使希特勒很振奋。他昂头挺胸像军人似的在室内来回踱步，回忆起了“大战”时的情景。他还为埃贡模仿战场的情况，有火箭炮声，75cm口径的大炮声和机枪声，有时一个一个的模仿，有时全部声音一起发。

接着，他谈论了政治，不知不觉地为“反犹”大发感慨。汉夫施坦格尔认为，他的反犹太主义种族味道更浓了。他相信，犹太人控制了华尔街甚至整个美国。接着，他的话——猛然转到兰茨贝格他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啊，我的卢迪，我的赫塞尔，”希特勒动情地说，“想到他还未出头，多可怜啊！”

在他离开前，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内呆了片刻。赫仑纳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我要是有人照顾就好了。”他说。

“喏，这样不好。”赫仑纳说。她问他不成家的原因，他说：“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属于整个国家。”她想，他简直和孩子一样。她母亲也是在17年前之前的这一天去世了。“若那时有人进来，一切都坏了，”赫仑纳回忆说：“会讽刺他的。他的确冒了很大的危险。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装作没发生过任何事。”

第八章 秘密著作

1925 - 1928

1

元旦期间，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共度佳节。但是希特勒没答应。晚会开始后，一位姑娘叫他再给元首打个电话碰碰运气。出乎霍夫曼意料的是，希特勒竟答应前来，但只答应呆上半个钟头。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尤其是女宾们，因为她们谁也没与他过面。他果然不负众望。“他穿着长礼服，显得潇洒而有风度，”霍夫曼写道，“那时，他的头发未盖过前额，头发虽然不浓，但却使他更有魅力。”女宾们特别喜欢他的小胡子。

一位漂亮姑娘带着希特勒到了槲寄生树下面，吻了他（按英国风俗，圣诞节那天，槲寄生树被用作圣诞的装饰品，凡走过槲寄生树下的女人，她可以和任何一人亲吻）。“希特勒脸上不安的神情我永远记得！这位姑娘也感到，自己太冲动，便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紧绌嘴唇，显得很生气。他的到来，使室内本来就不热烈的气氛显得更加拘谨冷淡。”霍夫曼试图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在不是发生在长辈客人身上。不过呢，希特勒先生，你会

与女士们都幸福的。”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高兴。于是，他便和大家客气而又冷冷地告辞了。

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过着半自由的空间生活。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应付。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绝口不提自己新的计划，也尽量推辞和各种人见面。与此同时，他也在避免伤害普通的追随者。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出狱后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了解目前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他需要集中精力。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已经成为历史，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不久前，盟国针对战争赔款问题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款。经济上，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秩序已经有所缓和。与法国的妥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表明希特勒已没有政治资本。

另外，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分散以及过去 10 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已经溃不成军了，大势已去。小商贩、自食其力的商人和农场主，地位也摇摇欲坠。在通货膨胀期间，中产阶级深受其害最深。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这一切，全成为牺牲品。许多人将责任强加给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化痛为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抱有赞赏态度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新的局面。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怎样处理这两者的能力了。他于 1925 年 1 月 4 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决定，这是他的第一个行动。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支持他们的

希特勒传

统治，并愿意与其合作，共同打击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绝不使用违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至于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屈服，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了”。

在这一阶段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几乎与世隔绝。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被排斥其外。他对自己受到排斥很恼火。“他很器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大概是因为生气或者是对党内分歧太在乎了，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一败涂地不可。

希特勒接到文章的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那次会见的地点是提埃希大街的小屋。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根本不注意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然后严厉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别再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样”。

看起来，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他却接受了——他一向都我行我素，关于从新治党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有了成绩。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给了纳粹党自由。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希特勒撰写的一篇题为《新的开端》地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遵守组织和政策，绝不搞个人主义和宗教主义，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为党的团结决心采取合

希特勒传

法的行动，也愿意妥协。但是，他又要按自己的思路去创治党。虽然他曾保证按政府的规定做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2月27日，希特勒宣告重返政界。在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了党的会议。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所以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点是警察关门的时间，4000名听众已聚集在大厅，而门外不能进场的还有1000人。全国的国社党人除了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都来了。“我不愿介入这里面，”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和好的骗局。”罗森堡很自信，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热烈气氛与起义情形很象。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向他呼叫，挥动啤酒瓶，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他的话是激昂的，但并不得罪任何一方。他并未细致地辩论1924年的争吵是谁对谁错，他故意一字不提。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心里装着老国社党的人们，要在卐字旗帜下团结起来打败首要大敌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针对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则是针对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让人振奋的激昂陈词后，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不要求他们忠心，也不希望他们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的运动，他们将被解除党籍。“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的要求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做群众的工作的。党员同志们，你们一年后再下结论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

希特勒传

对，我会自动出局。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按我的思路，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将承担一切责任。”

他的情绪带动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有的从后厅往前拥去。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握手言和，不少人感动得眼睛湿了。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家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元首的演讲已把他的怀疑打击得无影无踪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只限于背后。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当权，不准怀疑。

疲惫不堪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住了一晚。由于是保密的，人们在多年后才知这个消息。

希特勒卷土重来后不久，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便在德国发生。在埃伯特去世后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显然，这位右派英雄对共和并不欣赏，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他并未大力扩张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然存在，而且常常是源于小事。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伦家族提供高额赔偿，社会主义派却强烈反对，但是最后还是通过了。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补偿的条例，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该用什么颜色的问题内阁内也是矛盾重重，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自然而然的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了新

的优势。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让人措手不及，而且成绩如此显著，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接受。它只证明，他的口才给巴伐利亚州造成了很大的危机。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没有遵守中产阶级标准而是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原因，禁止他在原定于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演说。

希特勒亲自表示了异议。“想跟我们找事的尽管来，”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一败涂地。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获取自由而奋斗，如果‘和平’解决不了，我要采取‘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纷纷。”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分量很重。其结果是，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但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不久，类似情况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失去了主要的政治武器。他无奈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地特点是，他是坐着讲的。太恐怖了，大声叫喊，还有动作。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象唱戏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他与普通人一样，好像……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重振党风上来。他不知疲倦地参加无数次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很有基层工作的技巧，不停地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无数的人聊天——这使他与市内的党员联系起来。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

希特勒传

力，而且党组织也操纵在他的手中了。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同样手段，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拉拢过来。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无奈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尔。格里戈尔很有组织和演说才能。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让人兴奋的演说后，他决心向希特勒低头。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不完全赞成。他想，与希特勒“同甘共苦”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在狱中希特勒差不多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但这机会他却很好地利用了。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希特勒利用“休闲时间”“巩固了党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普·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毕恭毕敬。他虽挂着党的执行秘书的头衔，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施霍茨曾是慕尼黑政厅里的会计，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大权，工作起来，像是个加减机，精打细算。这两人全力效忠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然有序，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专心致志地深入探索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频繁地旅游，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充足的时间去调节各类关系，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个人私事。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亲自写信给他，赞扬他的精神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伙伴”。

数天后，令他头痛的驱逐他回奥地利的问题，又被他用一

封信解决了。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取消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他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还没有德国的真正国籍，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这个问题不在话下。

最让人费劲儿的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部署军队而不是希特勒的统治武器。当元首还未出狱时，他便把冲锋队的残余势力纠合起来，重新搞了个叫“前锋会”组织。罗姆确信，如果将“前锋会”交给党来管，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说，“前锋会”现在有3万名人员可以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得完全听从于罗姆的指挥。在提出条件的时候，他还提到过去的合作，并立誓永不背叛希特勒。

希特勒很清楚，要让一个人操纵大的组织，这就是为灾难埋下伏笔。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完全变成自己的“武器”，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公开地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来给希特勒施加压力。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回应，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同甘共苦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关怀表示感谢，并请求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友情。”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不久便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缄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以毫无障碍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生机勃勃的新冲锋队。

希特勒传

罗姆很震惊，也感到很伤心。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听我们的，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却我行我素。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不知羞耻地借别人的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对什么事都犹豫不决，对问题往往待其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地步才突然作出处理。理由是，他的行动不如他的思维和语言那样层次分明。希特勒做事喜欢自以为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会大发脾气。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谄媚讨好的人。不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他也有不少像伟大的地方。很明显，谁也不能与他相比。”对一位毫不重要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亲切地叫“你”的罗姆，实在叫人不知是该佩服还是该鄙视。

2

那年春天，希特勒至少有两个心愿已全兑现了。首先，不管怎么样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已属于他了，他坐着它，与心腹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勒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那风景怡人的地方调节自己的生活。他生活很朴素，外出散步常穿皮裤。“穿长裤真是不舒服。他从前就是在零下 10°C 的气温里也常穿短裤。它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放松。”

起初，他住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莫里茨公寓”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无人打扰的地方，他完成了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读者是当了他私人秘书的赫斯。在写社论时，他还常向两位反犹思想不严重的编辑请教，他们是本哈

希特勒传

特·斯坦普弗勒神父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劝他避免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不听，对这些意见置之不理。“除非你了解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不会有自己的世界。”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各国看看，花上3至4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我如果这样做，运动将会怎样呢？”他坐牢时，党内分裂极为严重，所以不得不重新建设。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新的预测。但这也无法使希特勒动心。“你的主意很新奇！”他说，“你想想，他们能帮我什么？我干嘛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时间。”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希望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信息。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从不反对，可就是狠不下心。就连赫仑纳也不能影响他。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来适应交际。他拒绝了，理由是政治家不该如此。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善于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女人味太足，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所以灭亡，其中地原因可不小。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的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拒绝他的事有联系。此时，他已寻找到新的安慰目标。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反对，说希特勒比她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悻悻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的所

希特勒传

作所为已超出了交往的范围。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没有答应。他便宣布，此后两人永不再见。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无人的地方，他吻了她。“他说，‘我要吃了你’。他欲火上升。”不久后，他们便情侣般的形影不离，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的错误加以指责。他是这家人眼里的英雄，而他也很高兴扮演一个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很晚还呆在万弗里德别墅。“夜已很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恐怖的故事。我们听了之后非常害怕。他还让我们看他的能随身带的手枪。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 20 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战斗中毒气给他留下的“纪念”。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他很讨众人的欢心，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叫的狗也好像不讨厌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很爱他。“他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们吸引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令人向往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他的生活就像一个故事一样。”

7月18日，他的著作的第一卷在慕尼黑问世，由埃赫尔出版。根据阿曼的提议，书名被改成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我的奋斗》。销售得很好，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但刚开始，《我的奋斗》却遇到攻击，被认为写得很差劲，过于夸张，读起来政治味很浓，类似于何拉西奥·阿尔吉尔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账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陈述，却也使读者对整

个德国人民运动的浪潮，了解得很清楚。

自出狱以来，党内事情很多，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告了一段落。这本书是发泄这种感情的阵地，而他将这一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曾公开地说过，他的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仇恨和恐惧犹太人。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眼睛那一章的最后，他进行了攻击：“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干脆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没什么可商量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借上帝的名，用残酷地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所以，我确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蔓延，《我的奋斗》的有关内容在军队中很受欢迎，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针对国内外敌人地斗争的象征。

3

希特勒心里清楚，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不安全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斯特拉塞尔虽然反犹，但绝不表现在行动上。他的政治哲学范围包括了史本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为基础的。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特别出色，他身强体壮，为人亲切温和，很有号召力。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战果”令希特勒很吃惊。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斯特拉塞尔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及其不和“慕尼黑独裁领导者”为伍。

9月初，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对南方的斗争正式公开

希特勒传

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主持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反对慕尼黑的官僚统治。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夺回来，让革命领导德国。斯特拉塞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为了增加组织和宣传力度，代表们被允许发表一系列具有纲领性政策的文章——包括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约瑟夫·戈培尔担任，他是一名29岁才华横溢的青年。戈培尔代替了办事效率不高的希姆莱，当上了斯特拉塞尔的秘书。他又矮又瘦。此外，由于小儿麻痹症的缘故，他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很有天赋，他很有文采，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非常的出色：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富有感染力的手势，一双吸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基督教徒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身上刻下的是知识而不是家庭和宗教。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慕尼黑大学。由于走路不方便，他免服兵役，但他的偶像却是身材高大、人材出众、信奉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他给戈培尔灌输的思想对他以后的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信奉神秘主义的多斯托耶夫斯基，这也使年轻的戈培尔很受鼓舞。

戈培尔被派往德堡。1921年，戈培尔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还有几出话剧和不少的抒情诗歌。为了生存，他曾在银行里工作过，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也当过家庭教师，还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贫困的日子里，他与弗里斯格斯彻底分开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

希特勒传

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象征着信仰和理想的希特勒身上，他找到了他的第二个偶像。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混得很熟。这种彻底的分裂及其免不了的了断决定了纳粹党未来。

思想上的左右为难使这种斗争更不简单了。戈培尔在许多方面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让共产党和国家社会党人统一起来。他决心创造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团结起来。”他的观点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党应该支持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最大差别就在这里。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证明给他，共产党与纳粹的区别在于共产党遵行国际主义。

两人终于在 11 月 4 日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和戈培尔握了握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他看见我很高兴。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次相见，是戈培尔信奉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的好感又增加了一层。“太激动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我，照顾我。我多么敬佩他呀！”

然而，24 小时不到，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攻击党的中央组织。他被调往北方的原因就是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使元首脱离“反动的”慕尼黑集团之手，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归复领土，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 1926 年 1 月 24 日至 25 日呈交给了长官会议。这次会议在汉诺威举行，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造成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金钱的奴隶，是经济

希特勒传

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只有罗伯特没对新纲领投票，对什么都极不赞成的弗德尔最终说：“我和希特勒都不会赞成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但他仍毫不在意。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没收皇室财产的决定，说它是“犹太人玩的把戏”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解除希特勒的党籍，让他不再受他们的控制。这些话竟出自不久前还声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的口中，太不可思议了。但，它也许正是“热爱”的表达方式，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在害死希特勒。

不管怎样，听了弗德尔关于这次决裂会议的汇报，希特勒到最后决定要采取措施。2月14日，星期天，他在班贝格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感到很紧张。南方代表在数量上占绝对上风，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控制了整个局面。他前来班贝格时，事先就已考虑过。他明白党所要解决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统治已面临危机。所以，他一开始便说明，他是元首，运动要以他为主。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许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存在分歧，无论是谁都必须对元首忠心，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并未直接点评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在这点上他是对的。也许，他能肯定两人的忠心，他们只不过是让他和施特莱彻和埃塞尔分道扬镳而已。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让北方代表难堪，而是让他们走上正路。他用左派的语言不露痕迹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分歧很大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作为中间人，他让党抛开政治，把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

希特勒传

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逆行，将意味着对不起我们的思想和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希特勒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但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复活的希特勒，得到永生，要让民族振兴起来。

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出乎北方代表的意料，他们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以用左派影响希特勒，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也不对此反驳。如果失去了希特勒，那么整个党都不复存在，斯特拉塞尔简短地、沉重地给予了回复。他失败了。戈培尔，除喊了几句口号外，别无多言，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很伤心！”

希特勒坚信，时间会愈合班贝格的伤痛，而党的势力也会扩大，于是，他便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演讲——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不再针对狂热分子，这显示出他在思想上成熟了很多，他把眼光扩展到所有的德国人。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平静的口气发表演说。他说，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德国在大战中才会失利。赤色分子企图控制国家，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听众便接受了他，他靠的不是感情上的共鸣，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

然而，一提起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又回到从前的强硬了。“在斗争中，总会有一方要以失败告终的——若不清除马克思主义，那么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人民群众站出来，对赤色分子进行无情地攻击。“正如人们对症下药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大家的力量，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是属于那种立场坚定的人的。”对于上层建筑来说，这番话

希特勒传

虽是难于接受，但引起地反响是强烈的。

他说，为了成功，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毫不犹豫。这是不能怀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将会不存在；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手软。若不将他们彻彻底底的清除，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绝不存在中间妥协的问题！”

这场演讲是精彩的。它表明，在争夺权力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最终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他没忘记，班贝格会议尽管召开了，但他并不能操纵自己的全党。他开始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终于不太情愿地屈服了。他写信给他的追随者，追回了全部纲领。

4月，希特勒为争取戈培尔亲自到了慕尼黑。在被元首厚待了两天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三天，希特勒领着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把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又论述了一遍。戈培尔很感兴趣，一步一步向希特勒的信仰靠拢，最后彻底屈服。

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巧妙地回答。他太值得我们爱了。他把所有的问题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让人有种安全感。无论哪一方面，他都是坚强的。他如此炽烈，当我的领袖当之无愧。我自叹不如，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满意地离开了慕尼黑，把过去的罪过全都一笔勾销，而且发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希特勒传

在争取到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支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汉堡东面约 60 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没有公开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 2 时，来自阿尔托纳、汉堡、不莱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已挤满了整个大厅。《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的乐声足以震倒整个屋子。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进行了“学习”。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在柏林见过面，当时是在一个社会上很著名的人物家中。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跻身于政坛，希特勒先生，您应该学会演讲。”哈努森是动作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把语气和动作配合好。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经常碰面但时间很短，哈努森不但教他演讲技巧，而且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他直到 1932 年底，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这一年他也与世长辞了。

4

1926 年，希特勒提出了把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作为运动的中心地带的原则，这样，纳粹党完全在他的掌管之下了。这条原则在 5 月 22 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同时，作为元首的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那就是，他有权处理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

希特勒传

民主程序再不存在和对元首原则的全部认可。为慎重起见，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 25 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他统治了党。

其实，戈培尔已完全站在了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他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因为此人并不相信元首。6 月 10 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不左右摇摆，作为希特勒的代表，除了柏林他哪儿也不希望去。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全盘接受邀请了。“那时，时光就不会被我白白浪费掉了。现在，一切全听他的。他能接受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完全沉迷于英雄崇拜之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切的战友。他是真正的男人，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无人能及的思维。在那颗固执的脑袋中，经常会出现新奇的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将手势、动作和语言配合得天衣无缝。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感觉对一切充满信心。只要给他足够的空间，他就能彻底改变整个共和国的腐败现象。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关怀。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不例外。”

7 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调解好所有的关系。之所以在此举行会议，是因为图林根没有禁止希特勒演讲。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 7 月 4 日作的，完全是以情为主，很富有哲理性。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从生活的沼泽区走过来。他讲得太全面了。谢谢上苍让我们遇到他！”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穿着有点小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 3500 名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敬着礼，

庄重整齐的走过。

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就足够了。此时此刻，希特勒并不为此担忧。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坚强的。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暗中准备，实现对全国的统治。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他是想委以重任的，这个人就是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隐退后，戈培尔曾去探访，更深地对希特勒表示敬意。“他像个孩子，可爱、善良，像一只猫，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雄伟、高大。他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7月25日，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终于出现了转折点。“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戈培尔当晚写日记，“这些日子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一颗耀眼的星星把我引向了光明！我永远属于他。我最后一丝顾虑消失了。我获救了。希特勒万岁！”

他一下子等了希特勒两个月。后来，当他确定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奋笔疾书：“定局了！柏林！万岁！”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至少这是个成功。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收进纳粹党的上层建筑中时，希特勒已与他复合了关系。然而，斯特拉塞尔仍是元首的强大对手。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之所以调戈培尔到柏林，希特勒是想让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和他对着干。

11月7日，戈培尔动身去柏林，一步步向权力迈进。他在生活上、政治上都迈进了新境地——他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悔了婚；虽然他们曾爱得轰轰烈烈。在国社党星座中将要升

希特勒传

起的明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合呢？

党员人数在那年底已疯狂地增加到 5 万人。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工作效率很高，这并不是个确切的党员数字。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很难知道谁已不是党员。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谎报数目，这样便能保留一部分党费。党的工作机关起初只有 3 辆汽车和 25 名工作人员，现在却不断扩张。这是个内部小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这些辅助性的组织也被建立。

冲锋队是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 8 个支队，这足以证明冲锋队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元首的亲口命令下，各阶层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纪律性很强的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冲锋队一开始就应该公开，”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公开化，用来证明它不是秘密组织，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带有情绪化了；它是个普及全世界的伟大运动，是反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场战争。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二百名忠心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无数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拼搏向前的英勇战士们。我们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德国的未来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某一天国家的主人将是国社党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颜色全是褐色的。采用这种颜色纯属意外，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

希特勒传

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货量很充足。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这一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从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历史味很浓，完全不是个人自传。从意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马基维利以来，政治上很少出现如此有价值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普通斗争思想的人们来说，价值是不可及的。他很了解群众心里所想，也许他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团心理及自我分析》一书。“集团的独自思考能力太差劲了，”弗洛伊德写道，“缺乏自己的见解，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总给人一种空洞而又华而不实的感觉，所以，它不知什么叫做迷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分析过它，但他们的著作还未翻译过来。令人可笑的是，希特勒竟向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请教：演讲者如欲影响群众，他必须夸张地复述自己的观点。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虽然固执，但听从权力……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武力解决。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它们心服口服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中精选出来的可能是最有个性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和他的观点统一起来，铸造出一种杀伤力很大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在外交政策的态度上有了极大地转变。战争结束时他一直认为，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曾说过，如果把犹太人赶出去，就与苏联联盟。6年后的今天，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中，他承认那时候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对重新再战持反对态度。国社党的对外政策也要变更，他说“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争取更多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直白：“我们要继续

希特勒传

600年前没有做完的工作，不再让德国人民离开家园，应该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说，苏俄已沦陷在犹太人地桎梏下，命运让德国担当重任，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德国的愿望一直是向外扩张。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无论哪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扩大自己的领土。它必须把领土延伸到国外。它必须用武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太主义结合起来。他说，国家的领土皇室已无权干涉。今天的情况是，“粗暴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用武力解决，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逃脱厄运。”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把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一举消灭，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突发而想的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最终确定了这个结果。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能不能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意见。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很不满意，尤其是希特勒对种族主义的侮辱。他也看不出他的很不满意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捉弄人的、不会长期存在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进行了全面检查，向弗兰克承认，他自己的写作水平的确有限。“写作时，总感觉一些事被忘记了。”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这本书我是不会写的。”

在出版《我的奋斗》第二卷后几天，希特勒在霍夫布劳斯

希特勒传

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中又一次把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对他们进行了恶毒的批判。“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犹太人的斗争中最让人敬佩的战士。”他不主张和平。他活着就是要为自己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杀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留下来的工作，将由我阿道夫·希特勒继承，继续战斗。”

几个月后，把自己常与弥赛亚相比的希特勒终于重新拥有了最强大的政治武器。1927年3月5日，公开演讲的禁令在巴伐利亚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疯狂的听众发表了演讲。晚8时3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在外面响起来。接着，激动人心的进行曲也被乐队奏起来。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一群随从随后也进来了。在听众的强烈呼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上讲台，厅内顿时静了下来。接着在两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的褐衫党徒们也步入会场。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万岁”的口号震耳欲聋。台上，希特勒十分严肃的举着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举着类似罗马兵团的花圈老鹰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大部分都坐在台下，而在台上的，则笔直地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不慌不忙，讲得很慢。接着，他速度加快了。据警方说，他激动得手脚并用，“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由于掌声而无法继续进行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就像演员一样。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中用的口气。”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演讲中，希特勒对德国的处境谈的很多，他的结论是，局面即便是如此混乱，犹太人也能成功。这是个扣人心弦的讲演，吸引人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但有一点他敢肯定，也就是这一

希特勒传

次，他将名正言顺地，并尽可能地使用其迷人的魅力，达到他的目的。

希特勒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常常要喝 20 小瓶矿泉水，而且还汗流浹背。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一块冰用来降温。每次讲演完毕，他便去洗澡。

5

在这次和以后的演讲中，希特勒没有违背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来讽刺资产阶级。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重任委以了一位很有实力的人。约瑟夫·戈培尔早已抵达了柏林。他走时，肩背一个旧书包，买的是三等火车票。到了柏林，他发现这里的党组织很乱。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党组织名存实亡，人很杂，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说的虽然比现实现实，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争吵大会，抽耳光之举很正常。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要求用决斗结束。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显然不轻松。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不仅仅是不和，在街道上，还遭到数量上占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地下室、肮脏不堪。“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除了债务一无所有。”戈培尔没有对此失望，反而充满了信心。他将总部转移到好的地方，便开始正常办公了，他亲自管理着财会制度。到 1927 年 2 月，区党部不但还清了

所有的债，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并且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扩大党组织影响力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调动公众的兴趣。“柏林人需要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他写道，“他们以此为生。若不注意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毫无用处。此后，他不是写文章，就是发表讲演，为了让柏林人适应，他把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生事——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把街道征服，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每一次演讲，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几个小时的姿势，果然他的台风进步很快。不久，他对各类的风格便运用自如了，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众的身份。“我该用哪种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

他常用幽默吸引观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演好幽默、伤感、谩骂的各个阶级。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反抗，从而达到目的。“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动的有力的箭。”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在这方面造诣颇深——他用美国式的招术来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独一无二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是以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为作战的方式的。1927年2月11日，他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并且请来了很多工人。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举行集会的老地方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开始正式的战斗。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提出了强烈抗议，希望澄清议程。主席没有任何反

希特勒传

应。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赶了出去。于是斗争从此展开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殴打。纳粹分子也有10多名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这些人在主席台上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充分证明了戈培尔是宣传天才。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出了名。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不了解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来是别有用心。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2600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冲锋队也增加了500人。

参加大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已达5000人。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像列宁一样开了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他们通过不公平的手段来压榨，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来衡量，他们采用不公平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无论怎样，我们要把它消灭掉。”接着他便把重心转到了土地上，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6200万人口，面积却只有45万平方公里，太挤了！“若提到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太不公平了。”解决办法有两条，其中之一是驱逐人口出境，“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流血牺牲也值得。这是上帝制定的普通方法。”

戈培尔本来以为会出现赤色分子，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没有重视这次演讲。为了使党引起公众的注意，于是三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的口号很有挑衅性，这口号被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贴。德国的大银行家戈尔德施密特，也被邀出席这次大会。他本来应该到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

前往，于是他便派私人秘书出席。

他冷嘲热讽，令听众很解恨。“欢迎！柏林的工人！”他说，“也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秘书的到来！请不必在乎我的每一句话，明天你的老板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党”，态度显得极为轻浮。“你以为你是谁！”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连续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冲锋队给他点颜色看看。牧师被打成重伤抬进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令人敬佩的老牧师。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把柏林的纳粹党宣布为非法党。

戈培尔对禁令很生气。与此同时，他又用“坚持到底”之类的口号，想扭转局势。由于党成了非法组织，他只好打出一些没有情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1927年步行团”等，以遮掩其组织。警方采取了措施，禁止纳粹党人以后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

戈培尔并未因此大乱阵脚。他办起了周刊，取名《冲击》，于美国独立日当天出版，但是，现实并不象意料中的那样，第一期便令他震惊。刊物失败了。“多惨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认，“毫无用处！”订阅的只有几百名党员，报摊上卖出的更是寥寥无几。但是，戈培尔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于是，他便借鉴共产党报纸的装帧和内容，赖以生存。

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的不和使柏林问题更加严重，这让7月下旬举行的慕尼黑年会有了觉悟。党在城市里的发展令人很不满意。希特勒并未在会上细谈这种危机，只一略而过，而将其矛头对准一个谁也不会有异议的目标——犹太人。

对党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根本不放在心上，好像他胸中有

希特勒传

更大的事情似的。据近来他所作的演讲看，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向东方扩张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不符合逻辑的达尔文主义原则，即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3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更进了一层。约2万名党员，其中8500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会场依旧壮观，在激动人心的军乐的伴奏下，与会者打着旗帜，步入会场。8月21日，即庆祝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把土地又和反犹主义扯到一起。由于他没详细说明，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桩下贱婚姻的目的何在。他重申了让德国人民有更多土地的观点，然后，他指出，只有拥有权力，才能取得新的领土。但是，他说，德国的权力因素已被国际主义、民主和平主义三种可怕的力量剥夺了。接着，希特勒又将这三位一体与种族主义统一起来。国际主义、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创始人就是犹太人？确实，希特勒已将生存空间论和反犹主义完全统一起来了。希特勒对新概念之不系统的探讨就要胜利了。

希特勒在提埃希大街的那个小房子里居住。虽然，在德国很多奢侈的家庭里，他像英雄一样受到接待，但是他的生活至今仍很朴素。邻里间传说，他还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借给别人。在这间陋室里，他接见了各种类型的人，有穷人也有富人，他待人很和蔼。他给女人们的手吻，赢得了她们对他永远不变的忠诚；实事求是、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榜样。在那年秋天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普斯发现，希特勒的演讲是按着提纲的，上面有关键性的问题。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也都是准

希特勒传

备好的。希特勒并不像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他知道自己该如何达到预期的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深知元首胸中酿造着大的计划。“他很清楚，只有摆脱那些用‘臭’的词，使用新词和新概念，才能吸引群众。他的思想具有煽动力，人们可以接受他不同的政治目标。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满怀疑虑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换成了满堂喝彩。后来，连很理智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不赞成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要好的多。”

他也正在学习怎样做才能让德国人满意。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令人恐怖的“战士”了，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牵挂着祖国未来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大家很认可。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只不过是一个掩盖激进纲领的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会使整个欧洲变更，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希特勒那年秋天在柏林呆了一阵子，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斯特拉塞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尔说，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不要再闹下去了。“那你先给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欺人太甚。”奥托的无关紧要的表现，绝不能代表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除了给他恢复党籍之外，元首还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亮相时，是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弟弟一再警告格里戈尔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得超出了范围，但他就是不听。“喂，”他说，“和我一样，

希特勒传

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他只不过是一个演讲家。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就像一匹烈马，我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制服他，为人民服务。”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匹马，而是一只虎，“一旦你被他摔下来，你死定了。”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左右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还不太成熟。“你不知道他多在乎我的话，我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不知会怎么办呢？你以为这些话他会给施特莱彻说吗？”

6

1927年年底，从表面看，希特勒也能顺利地处理各种问题。在重新建党问题上，显然他是从长远利益出发。换句话说，他知道的东西别人还无法理解。在增加党的巨大影响前，他必须抓住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大家给予支持。同时，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来领导。1年后他如愿以偿。但他所期待发生的却得等到2年以后，且发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春天来了，柏林党也恢复了自由，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即将举行的国会大选中露一手，取得大胜。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合作起来。“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取长补短，不可分割的。如果继续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5月20日的全国大选，由于戈培尔被派往国会，所以他获得了成功。但元首却失败了，因为党只选出另外11名代表。在过去的两年中，10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已离纳粹党而去。

希特勒传

这个损失和希特勒和党组织毫无关系，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影响的必然。只提“凡尔赛条约”和“11月罪人”不会再引起选民的注意了。政客们往往到了最后才明白新的道理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们，被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的惨败数字弄得一下子泄了气。

希特勒来得很晚。他对此毫不在乎，却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篇含意很深的演讲，这使大家很奇怪。老政客们原以为，他们将听到的应该是一位惨败元首的见解。但希特勒却对其他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既不否认他们的胜利，也不把它当作纳粹党的可悲，相反，他对这两个“敌”党击败了德国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一事，好像感到很欣慰，虽然这好像有点不合乎情理。与他的同志们不同，元首觉得，纳粹党，明天会成功的。

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在奥伯萨尔茨贝格，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瓦申费尔德寓所”。这是一所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的很普通的乡舍：屋子周围全是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大瓦，以免大风掀起。第一次见到它时，他便下了决定。幸运的是，房主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100马克。“我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在维也纳的姐姐，并恳求她当房东。”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她很开朗、活泼，年方20岁。“她并不是十分的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不过魅力很大。”几个评头论足者，也包括汉夫施坦格尔说，“她很贱，又笨又没个性，有的是女仆般粗俗的年轻”，但是，她却讨大多数人，包括赫伦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喜欢。赫伦纳认为，她“是个相当负责任的姑

希特勒传

娘”，绝不是那种轻浮的女人。照相师霍夫曼说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神态，令人着迷。”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又觉得她“俗气、好搬弄是非，还有点没事找事”，但，与此同时，他又深信，“魅力挺大”的吉莉，是元首的惟一。“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而言，他甚至就放弃会议。带着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但就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游泳。他说，没有一个元首乐意在游泳池里被人拍照。

他们的年龄差距与元首和情妇米茨·莱特的年龄差距几乎一样，都是 19 岁。据米茨自己说，出于嫉妒，她前一年夏天差点自杀。她连自杀都是那么的有个性：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套着脖子，企图窒息而亡，可惜被她姐夫救了。

在与吉莉谨慎的不公开的相处中，他们很可能从未有过肌肤之亲，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上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的与光着身子没什么区别的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他一边狠狠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比他还急。她拾起那幅画，砰的一声关上门，跑出门外。希特勒很后悔，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使他暂时忘却了感情的烦恼。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理想、目标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写的很散，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 4 年他的演讲历程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为自己的心灵开辟了新的过程。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很明显冒了他是很大的危险的。在这本书中，希特勒认为，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人的自利原则和土地完全联系在一起。“生存空间的限制，使得人们忍受不了而去反抗、去争取。

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存在着‘优胜劣汰’。”结果是，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不断发生，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团结一致、为国家不惜一切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好坏混合，灭亡也就不远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这个国际‘敌人’就会毫不留情地清除这种民族。”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个人想法，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统一起来。

在《我的奋斗》中，他只是对犹太人是大家共同的敌人进行了批判，并有力地阐明向东扩张是为了人民更好的生活的原因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合并在一起，贯穿起来，尽管不合乎情理，但这是写在新书的最后段落中。“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隔绝”，它不是“一个局限国家”里有信仰宗教的民族，它是世界的寄生虫，这些，他不只一遍地说。但是，此时，他突然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每个民族都以自保的狂热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渊源。犹太人也不例外。”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然一直保持这种风格。他写道，犹太人也是为生存而斗争，与所有人的动机是相同的，惟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但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使其他民族变质，降低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然后取而代之的方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分歧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世界的主人，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仅仅是代表着德国，而是为了全世界。

到1928年夏，希特勒已完全清楚，他的两个急切想法

希特勒传

——反对犹太人和德国进行领土扩张——原来是统一的。若得不到必要的领土，帝国就会毁灭；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进行领土扩张，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坠落。

很可能，这就是希特勒达到极限的标志，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最精采的地方。现在，他肩负着双重任务：在东方扩张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不相交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却合二为一了。这好像是几个月前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见的双峰的想法：两个山峰都想攀登——至此他才明白用一条路就可通向双峰！他已看到了光明。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希特勒却继承其遗志，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变成超越哈曼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封杀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 32 年才公布于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难以琢磨了，其追随者搞不懂，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其中含着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其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也在里面。书里全是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如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为了求得生存而斗争的人们的灵魂”的鼓吹者。他还说，俄国在播散毒害的种子。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称为“国家躯体上的伤疤”，“是使种族变质、降低种族水平的发源地。结果，在这些坏了的地方，国际犹太人的种族后代在增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不公地将签署 1918 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私

希特勒传

生子”。这可能是针对他的父亲。“某人得了无药可救的绝症，即使开刀也不行，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记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身上具有犹太血统的恐惧，母亲的死给他带来的巨大地打击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治疗她的伤口——所有这些，都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中显露出来。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进行过心理咨询，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他是慕尼黑的一名党员，希特勒求他驱除“癌恐惧”。治疗记录至今没有找到，不过，这位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最佳时机，他也未能消除希特勒当时对癌症的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伴他终生。

第九章 永别

1928—1931

1

希特勒新思想的统一刚开始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为了重振党风竭尽全力。他在新近的竞选中落选后，1928年夏，一连为《抨击》写了3篇文章，企图拉拢左派工人的选票。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批判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经麻木了。他已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使他们拥有自尊，使他们有人格。在很短的时间内，戈培尔就成了北方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把斯特拉塞尔取而代之。这样一来，显然为元首除掉了一名竞争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的这一举动大为赞赏，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提拔编辑为党的宣传部长。

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很有容忍性的。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既往不咎。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想法，于是他便负责了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掌握了治理大权，在纳粹党中举足轻重，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人已猛

增到 10 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绩，希特勒于 1928 年 11 月 16 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发表了关于怎样振兴国家民族的演说。由于怕赤色分子会突然袭击，希特勒加强了自卫工作。他的卫队组成队员全部经过千挑万选。这些人在 18 至 20 岁左右，都对元首忠心耿耿。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 SS。听众约有 1 万人，但是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人并不多。开始时，因为新增系统的问题，他的话并未引起多大反应。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的声音。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劝德国人不需吃柑子，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就关掉了麦克风，大声演讲。几分钟后，捣乱分子便全平静了，他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敢欺负德国人民，我们就让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已经开始堕落了。不仅是血统——黑人化发展特大，连世界也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也正在变质，群众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人多就是力量。”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讲了这么久，他的声音仿佛都是挤出来似的。他觉得自己全身毫无力气，“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多数胜少数也反对狂妄自大的人。掌管政府的应该是才华出众的人。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 10 万。只有元首才有真正的价值，这 10 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谎言。”这是磁对于铁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时说，“他的话仿佛带有磁性，反抗全没有了。人们全变成他的朋友……他的力量的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真心爱戴。”

希特勒传

1个月后，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无动于衷，认真地与和鲁道夫·赫斯交谈着；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故意‘奋笔疾书’，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不一般。”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听得全入了迷。“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琢磨，这个人的演讲并不怎样，他夸夸其谈，大话连篇，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臣服？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是多么不合理。”

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的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很不愿意参加，但因为学生们的纠缠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全身戎装呢。“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很有绅士风度。他的一切都说说明，他和蔼可亲。”给斯卑尔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紧张，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而我认为，他很有吸引力，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让我无从怀疑，他是个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就手舞足蹈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使他洋洋得意。”希特勒的演讲很有吸引力，又有征服力，与其他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被吸引住了。“任何不踏实的感觉此时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2

党的效率很低，希特勒本人再努力也无法扭转形势。从表面上看，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似乎标志着党已走出了低调区，

希特勒传

是为元首的目标献身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硬撑着。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作为党内高职的方法，来讨好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他让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尽量拉拢工人，而自己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下手”。因为他明白，离开了这些人，就没有他的今天。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民族主义很强的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战争赔款的“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很危险，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确定，他能制服双方，而且他期待着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票中大获全胜，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尝到了与工业界“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买了一座叫“巴洛宫”的三层楼房作为党的全国总部。9月初，他告别了过去的日子，来到了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一共有9间，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与他回来的还有赖舍特及其母达希斯太太。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但她却允许21岁的女儿吉莉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居住、求学。他和吉莉的感情依旧，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是她的舅舅；另一方面，他却已小心翼翼地公开追求她。有时，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现在剧院或餐馆里。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用情很深，以致“常常被她牵着鼻子走，他常装出一往情深的样子。”她常诱使她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对霍夫曼说过，他不喜欢“吉莉‘大购物’，

希特勒传

还认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并且时间很长，然后，觉得不适合的东西，便空手步出店门。”希特勒明知这种情况每次都不会改变，但每次都没有拒绝过。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厉的舅父。他把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圈子仅仅限定在餐厅，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经过她的请求，他便让她参加了忏悔节舞会，但条件非常苛刻：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在11点之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很生气，但元首却回答说，作为舅舅他有责任照顾好外甥女。“我爱吉莉，可以与她结婚。”可是，他又坚持不结婚。他说，吉莉认为这是一种束缚，其实是明智的。“我决心不让她落入我这等人的手中。”

希特勒在情场上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海因里希·霍夫曼的17岁的女儿拒绝吻他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享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非常正经地问：“吻我好吗？”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她非常客气地拒绝了。沉默了几分钟后，希特勒往自己手上抽了一鞭子，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趣的，倒是与另一位叫爱娃·勃劳恩的17岁姑娘的约会。她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她的性格跟吉莉很相似，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非常喜爱爵士乐和美国音乐喜剧。惟一不同的是她比吉莉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差生，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回忆说，“但她很聪明，学习方法很好又肯动脑筋。”

他们是在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天快黑了，

希特勒传

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东西。“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和一个胡子很可爱的男人一起进来了。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坐在我的对面。”她感觉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很不好意思，因为裙子剪得不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介绍他们认识了。“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几分钟后，三人在一起用餐。“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个男人还称赞了我。我们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盯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吃下似的。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很快就要回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我爸肯定会大加‘盘问’的！”但是，在她走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知道他是谁吗？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啊？”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礼物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他很少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一角去喝茶，也不再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连霍夫曼的照相馆都很少去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炫耀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说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和希特勒没有任何关系。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是胡说。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炒她鱿鱼。

1929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妥协性的计划占了绝对优势。虽然，在结果出来之前他已死去。为了获胜，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动态关系需要2100万票，而他们只获得了600万票。对于胡根贝格，这是个令他一蹶不振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悲痛化为力量。希特勒是个从不再想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与胡根贝格闹事、分道扬镳，其目的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让人捉摸不透。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为即将到来的全国选举开辟道路。但是，给于纳粹高度赞扬的观察家太少了，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希特勒自1924年以来已渐渐被人忽视。”这和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对此的看法十分类似。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成功。他明白，如果能将工人重新利用在他的计划上，取胜的希望很大。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对策。1930年初，柏林死了一个法律系的学生，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21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彻底与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划清了界线，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在《愤怒》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后来还谱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很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的风格。”原歌词大意如下：

你我眉目传情，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改得激昂一点”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是为纪念死在“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下的同志——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并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告诉了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包围了这对情人的房子，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这样做的原因，你会知道！”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得到好处，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了工人同盟。“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失败作家”戈培尔写道，“在看不起他的人们中生活，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活力却又平凡的生活。他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用贫困让人们觉醒的人物！”

当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正被抢救时，戈培尔将这起个人纠纷写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大家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号声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革命的旗帜迎风飘扬！”韦塞尔在2月23日终于死了。“他将永存不朽，”戈培尔写道，“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向前。”为了扩大影响，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举动，元首是不太赞成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他戒毒后急忙回到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非常严峻，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

希特勒传

慎，后果将会很严重。毕竟，我们议会中才有 12 人，势单力薄，没有任何优势，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么，如果把共产党比喻成一头牛的话，而希特勒就如一块斗牛士的红布。我们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的。”

希特勒假装生病，没有参加韦塞尔的葬礼。戈林是正确的，整个葬礼全被赤色分子袭击。当戈培尔站在墓前一本正经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而冲锋队员也遥遥呼应时，从墙外飞来许多石头打在墓碑上。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埋葬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同胞，永远和我们同在，你将永远召唤着我们，跨过坟墓，前进！德国一定会胜利！”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很难明白，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攻击，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如果他们在酒吧间或啤酒馆中殴斗惊动了警察，他们便联合起来，这也许是自然而然的。双方都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的目标应该是相同的，同样对议会存在着极大的反感。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地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要恢复游行队伍的自由且喊着同一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还有，他们同样对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恨之入骨，都认为警察和“伊西多尔”同流合污，是所有革命者的敌人。

当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再也搞不出任何新花样的时候，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间的竞争已成了公开化。自他弟弟在慕尼黑任党内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 3 家报纸的主要社论撰稿人。它们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

希特勒传

帜，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否定“个人主义”的论言阵地，而这些观点与希特勒的观点恰恰相反。4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对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给予全力的支持，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资本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否则他将采取经济制裁。

开始时，希特勒手段很强硬，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到柏林亲自解决，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谈判。在7个小时里，希特勒用尽了各种手段，然而，两次会见没有谈出任何结果。两人都当仁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没有谈出任何结果，但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没有脱离党，“因为事情已有转机，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事情闹大，因为这可能影响党在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是否获胜。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尔也知道，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与纳粹党为伍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将借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原则，与工业界合作。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让人们无法摸透他的新思想、而自己可随心所欲，以便使用绝对权威控制整个党。他明白，一旦纲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元首原则将不会存在。

年轻的斯特拉塞尔竟敢明目张胆地与他背道而驰，这让希特勒很难堪。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没有发表评论，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他有权力做任何事。他只在报上宣布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事，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没有公然地对付背叛他的而是将支持奥托的党员全部开除党籍。6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含义很深

希特勒传

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我还在，”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社会主义党俱乐部。它将和从前一样纪律严明。它的创立没有任何目的，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人人平等，德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毫不留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已完全办妥了。后来，斯特拉塞尔公开号召社会主义党员全部退党，但响应的只有 24 人，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宣布说：“他们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真心合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格里戈尔曾对朋友说，“他弟弟一直都是那么的懦弱。他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真的是太冲动了。”

媒界对奥托·斯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很重视，但党内几乎毫无反应。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党内担任要任，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的面给他难堪的时候，他也全力掩饰他们之间的矛盾，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迫使自己出党似的。现在，内部矛盾已经解决，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投入将于 9 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4

1930 年，希特勒给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几乎所有的选民都带来了礼物。他把中心盯在由于 1929 年华尔街冲突而引起的全球的经济萧条上。这使德国经济也深受其害。到那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

希特勒传

已达 300 万，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希特勒暗想，他能控制整个德国的政治时机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共产党人的号召。“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冲破束缚！”——戈培尔的《抨击》报是这样宣传的。对农民们，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为了让为他们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满意，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希特勒给的却是一个满意的答复。

虽然类似的青年很少，但他们是希特勒未来的忠实的接班人。当希特勒对“自私主义”和“唯物主义”大加批判并保证建立一支为实现德国社会主义而勇往直前的先头兵时，他们一个个听得像着了魔似的。他们相信，只有希特勒建立的政权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在大城市中游行示威，高呼着与他们的敌人——共产党一样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新崛起的一代“感到事物正在发展，昨天的倒退已经结束了。”有个追随者回忆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亲自去体验。而此时就是呼吁广大青年为此奋斗的最佳时机，而希特勒是惟一有此魄力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皇亲国戚，都无法抵挡其吸引力。那年春天，德皇的小儿子奥古斯特·威廉给他的亲密同志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发自内心的”告诉他，他刚加入党。“这是最让我激动的时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永远的对您忠心。”王子害怕共产主义势力会继续扩大，连菲力普·冯·赫森亲王——德皇的侄儿，维多利亚皇后的孙子也被他带动了，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1930 年，希特勒为德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他欢

希特勒传

迎人人都加入远征，不在乎任何条件。但是，他必须是心甘情愿地跟随希特勒，为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感觉到的，”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也是我们最想说的话——希特勒，你永远属于我们。你讲话时，就像是亲身经百战的人，与我们一样经历过各种磨炼，是个被人遗忘的军人。”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使各种投票者与他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在“清除”犹太人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需要一点即可。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纵观全局的计划，便不辞劳苦地四处奔波。在最后6个星期内，竟发表了20次重要的演说。希特勒天生就是做政治家的料。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感情的流露，而且还能增加信心。他不仅仅是与上层名流一起吃饭，而且经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仰慕者共同用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赢得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的赞赏。

为了接近各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言的方式，但他却仍记着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获得群众的支持。所以，在小事上，他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的态度。而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使很多人失业、使农产品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弄得一贫如洗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联合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的消极合作可以说是全世界，没有的。戈培尔在大厅内组织了集会，还有火把游行，各个角落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纳粹党拥有发行报纸的专利，且一印就是

希特勒传

数百万份，范围扩展到全德国；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选举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虽然可笑，但却有使用价值。“假戏真做，要把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用在他们身上，要刺激他们，让他们发火，然后他们就变成被动的了！”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到处人头攒动。投票总数比 1928 年多出 400 万，大概共有 3500 万。希特勒下午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兴奋地告诉他说：“我们胜利了！有 66 个席位已属于我们！”若与此前的 54 个席位相比，增加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如果德国人民能理解得更透彻一点，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 100 个席位才好呢！’”其实，他们有 107 个席位。“那时我的心情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从 12 个席位增加到 107 个！”

国社党人对他们的反对派的得票很震惊。为慎重，官员们反复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党得票 637.1 万张，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两年，纳粹党便变成了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希特勒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之后，社会民主党便把斗争矛头都指向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 132.6 万张得票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少得了 6 万张票。这一情况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靠中产阶级政党的失败换回来的。纳粹的得票，大多来自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相当高。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几乎把目光投向那些痛苦中的人们。现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让他们幸福的人们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希特勒具有魄力的演讲，但是，

希特勒传

“结果”如此喜人却离不开成千上万的支部不辞劳苦的工作。

一年多来，希特勒曾因汉夫施坦格尔的讲话而和他保持很大的距离，但在选举中取得的惊人胜利却使希特勒消除了对汉夫施坦格尔的误会。赫斯在电话中对他说，元首希望马上见到他。半小时后，希特勒便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家里。希特勒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外国新闻部主任。“我们的事业大有前途，过不了几个月，最多一两年，整个政权就会属于我们，这是不可阻挡的。你的联系很广，我们很需要你。”

汉夫施坦格尔没有拒绝。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3名年轻军官被指控在军队内为纳粹党做宣传。9月25日，希特勒亲自出庭作证，讲了一次含糊不清的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他对政权的取得，做了承诺，并答应与可耻的“凡尔赛条约”斗争到底，即使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自卫机构。“到那时，便能让他们人头全落地来报1918年的11月革命之仇！”希特勒再次充分利用了他的政治手段，同时市民和革命派都几乎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对前者，他提倡的是和平，给后者却是血腥的复仇。他讲话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煽动性言论已很让人重视了。

汉夫施坦格尔被外国记者团团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构思了一篇文章。“这次大选，”他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冒火。这个温度还不够用来反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不但要求变更“凡尔赛条约”和“青年计

划”，而且还要求“收复波兰走廊，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然而，他却不承认战争是德国挑起来的，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对祖国人民许下的诺言。“如果以后德国人民仍需要像今天一样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那就让我们在沉默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增加我们的痛苦。”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作战路线。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他的活动严格地遵循法律。“所以，倘若我们和你们一样——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别走德国的后路，但是，如果它像德国那样，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袭击，那么，如果有一天英国站起来了，它将怎样办呢？英国的爱国者会怎样对待要残害他们的敌人？”

10月13日，107个全副武装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国会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大声喊道：“到！希特勒万岁！”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很为此震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这帮自以为是、身穿制服的家伙！我看清了他们的面孔。我越观察越感到震惊：许多人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与这伙可恶的人在一起真是一种倒退！”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国会的讲话很有分寸——“让我们到此为止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们就不变制度……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现在拥护魏玛共和”——然而，数以百计的冲锋队便衣已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咖啡馆和百货商店的橱窗，这次首都街头发生的事件，为后来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希特勒传

它的好坏。希特勒的名气越来越大，于是和他母亲一起居住在英国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前来拜访。1909年，在都柏林当侍者的小阿洛伊斯，与爱尔兰姑娘布里吉·伊丽莎白·道林结了婚。因为他四处流浪，所以他们的日子很紧。阿洛伊斯在利物浦开过小饭馆，将它变卖后又买了一所公寓供出租。他当过旅店老板，破产后又去售刀。布里吉很不适应这种贫穷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亲的思想，认为孩子应当从严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把孩子毒打了几次。等威廉·帕特里克长到3岁时，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说，他们是被阿洛伊斯抛弃的，但阿洛伊斯则对亲友们说，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和工程师一块儿跑了。

当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报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时，他们认为，“赚钱的机会来了，于是接受了赫斯特报记者的采访。”阿洛伊斯毕竟从未尽过义务，于是，他们便在伦敦开始与赫斯特报纸的代表谈判。10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国的新政治首脑道夫·帕特里克的侄子的照片便不断地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照片的解说词说：“在伦敦工作的小职员威廉·特特里克·希特勒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在利物浦出生，所以对叔父的了解很少。”事实上，他的确了解不多，不得不写信给父亲，细听新政治首脑所有的故事。“父亲回信了，”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说，“信中说，阿道夫要求举行家庭会议，于是就连同车票和信一块邮了出去。”一到慕尼黑，母子2人便发现，希特勒很生气。在安吉拉·拉包尔和阿洛伊斯也参加的家庭会议上，希特勒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你们不要指望借我之名得到任何好处。”他说，由于

希特勒传

小阿洛伊斯未与布里吉离婚便又结婚，把家事告诉了赫斯特的报纸，这种做法会让他在政治上前功尽弃。“我一直对私事小心翼翼，从来不愿向媒体提起！”他说，“我的一切都没告诉过他们……即使在我的书中，关于这些事情，我都从未提起过，现在呢，他们在搞调查，还派出间谍去挖掘我的身世。”据《巴黎晚报》的那篇文章说，说到这里时，希特勒大发雷霆，宣布威廉·帕特里克根本不算亲戚，因为他的父亲小阿洛伊斯并不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的亲生儿子。他与他母亲应立即返回伦敦并向赫斯特的报纸说，纳粹党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是另外一个人，和他们无任何联系。这种解决办法使希特勒很满意，在敦促母子二人“尽快返回英国，从此以后不要再有任何联系”后，希特勒给了阿洛伊斯 2000 美元，作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的生活费和路费。阿洛伊斯买好了车票，支付了费用，并答应将剩下的钱如数邮寄出去，因为这样做“是为了保险起见”。威廉·帕特里克发誓说，钱根本就未收到。

在威廉·帕特里克与母亲回英国后不久，希特勒便把其律师请到自己的公寓里。希特勒指着眼前的的一封信说：“这封信是一桩可恶的骗局，是他的一位最讨厌的亲戚搞的，连他的祖先也不放过。”据汉斯·弗兰克的回忆，希特勒指的是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他的是，报界对希特勒的祖先的某一方面想大作文章，也就是说，他有部分犹太血统。于是，元首便把此事交给弗兰克私下调查。

他从“所有的发源地”收集的报告是最让人不放心的：希特勒的父亲看来是“林嗣城附近的里昂丁一个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厨娘的私生子，她的主人是格拉茨的一家人。这位厨娘为犹太人弗兰肯伯格工作时与他的儿子发生了关系。十九世纪三十

希特勒传

年代末，弗兰肯伯格代表他 19 岁的儿子给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女人支付了一笔抚养费”。弗兰肯伯格与之还长期通信，“通信中谈的大致是，当事人心里都明白，施克尔格鲁勃怀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弗兰克的报告对此很遗憾：希特勒的父亲具有犹太血统是毋庸置疑的。

元首对弗兰克的推论表示出强烈的抗议。他解释说，他祖父贫困不堪，伪称弗兰肯伯格的儿子是当事人，成功地敲诈了一笔津贴。希特勒肯定地说这情况绝对真实，因为他父亲和祖母亲口告诉他的。弗兰克的证据使希特勒很害怕，否则，他不可能说出这让人可笑的话来，因为他祖母在他出生时已死去 40 多年了。更重要的是，他承认犹太人给过祖母钱，这样一来，他的血统更让人怀疑了。其实阿道夫·希特勒具有犹太血统的机会是不大的。格拉茨大学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维奇所进行的研究认为弗兰克的证据并不能让人相信。在格拉茨所作的犹太会员记录中，他并没有发现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的名字，这些登记册，记的只是希特勒父亲出生后 19 年的东西。但，那可能是因为犹太人于 1496 年被逐出斯苔尔马克，于 1856 年才获准重返家园的原因。据普里拉多维奇说，在此之前，格拉茨不存在犹太人。重要的是，希特勒怕自己真的跟犹太人有关系，为了确信，他此后至少调查了 2 次。据从 1917 年起便认识希特勒的内科医生舒赫回忆，他“一生都在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犹太血统，他常与我们谈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别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证据来，而自己却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对威廉·帕特里克说“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的一切”。

尽管此事令他很头疼，但 1931 年的预兆是好的。他的书一夜之间销量猛增。《我的奋斗》自出版以来，年销量不过

希特勒传

6000 余本，可至此销量猛增至 54086 本。这给他带来一笔很大的财富。另外，党的新总部“褐色大厦”在新春伊始对外开放。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会的收入、赠款及党费支撑起来的大厦，是纳粹党权利的象征。希特勒、赫斯、戈培尔、斯特拉塞尔和党卫军的办公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面积很大，屋里被装修成非常漂亮的红棕色。透过窗户能看到整个科尼希广场。办公室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有一幅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团首次进攻弗兰德时的情景，此外办公室还有一座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希特勒并不是常呆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很没规律，他来去就像风一样。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匆匆忙忙地办完，然后便会大说上一小时。”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度过时光。那里有张上边挂着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的台子，被称为“元首台”。他不久也觉得这没意思了。他很不适应“褐色大厦”里的环境。他喜欢的是为自己、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交流。1931 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很复杂，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势力不断扩张造成的，党的发展，使党每个部门也日益强大。其结果是，各部门争权夺势，矛盾重重。

最令人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的要守法的要求持反对态度。他们赞成用暴力解决一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听从慕尼黑的文官。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的社会主义——元首为此深感耻辱。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有分歧，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认为它的主要

希特勒传

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罗姆上尉是一个。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便自告奋勇的去南美。后来是普腓弗·萨洛门——他也提出要增加冲锋队的实力，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便也“吹”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也直接影响着士兵。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便抗战起来，理由是，他们从未吃饱肚子过，但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伤亡很重。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当护卫，但戈培尔却对他们的7条要求全部没予以否定，这一支部队发怒了，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亲自干涉，才使这一风波平息了。在武装的冲锋队的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软硬兼施劝大家重归于好。但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7项要求，他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来处理，号召人们要对他忠心。然后他便宣布，此后他亲自指挥党卫军。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预示着这次短暂的叛乱已经平息了，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不可兑现的债券。他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况且时间也不允许。到1931年初，党卫军仍找不到合适的领导。1月4日，党宣布，罗姆上尉刚从玻利维亚回来，将担任党卫军的参谋长。他这次重返德国是希特勒用让罗姆在拥有6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事的条件换来的，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员作为受限制的游行队伍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便着手建设自己心目中的党卫军。

然而，效忠对积怨已久的组织并不是万能的。不久，另一次严重的叛乱的种子已在首都悄悄地种下了。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丝毫没有改变。组织内部的不公平令他们的领导人瓦

尔特·斯登尼斯很气愤。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公平”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的思想变化太快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很困惑。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想与元首背道向驰。

1931年2月20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禁止公开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人后，这个问题再也遮掩不住了。“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他对褐衫党徒说，“但你们绝不可这样。”他们虽然极度不满，但却没有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遵守了魏玛政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要经警方的允许。斯登尼斯对这一举动大加谴责，并于3月31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从此与希特勒对着干。

为了解决问题，希特勒命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秘书。斯登尼斯拒绝了。于是，希特勒便动用冲锋队镇压叛军，不到24小时，便结束了这不堪一击的叛乱。斯登尼斯期待的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走，谁就不会顺利的，”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要效忠希特勒，因为我们要让国家社会主义生存下去。”

4月4日，希特勒在《抨击》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发表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义”。他重申，纳粹党的主要理想本来就是社会主义。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捣乱者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其中一员，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系列共产党希望得到的思想拿来侵蚀党卫军的心灵。”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

希特勒传

柏林进行调解，这次他把汉夫斯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斯坦格尔写道：“希特勒无奈地来回奔跑，红着眼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才能保护一切。”经过很多努力，一切才恢复了正常。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住在一家贸易与旅游旅店。汉夫斯坦格尔对斯登尼斯的印象是，他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带头造反者。“我发现，此人很有教养。科隆的主教舒尔特是他叔叔。他将我拉到窗前，嘈杂声淹没了我们的声音。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真正的叛乱煽动者就是他身边的戈培尔。尽管希特勒下令禁止我们殴斗，但戈培尔不断煽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呢，我却成了‘牺牲’者。”

与平时一样，希特勒的出现使党卫军和睦起来，而这次将是长久的。对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的处理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应。戈培尔安然无恙，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知道，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很卑鄙。

希特勒也明白，他是用武力才达到目的的。于是，他使用冲锋队的人把斯登尼斯在柏林的职务取而代之。由于自己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得到扩充，冲锋队高兴得要发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我们的，”在几星期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上，其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会在角落里默默地尽职尽责，我们乞求得到感谢。但是，元首知道我们。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因此他对我们一直有信心。”

与此同时，作为和事佬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犹豫不决的党卫军返回岗位——但不包括那些“个人主义”者，必须把他们消灭，让忠心者担当他们的职务。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反应是相同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左派思想已

失去了信心。但在他坚定的诺言面前，这种想法被否定了。希特勒说：“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而我将与你们并肩作战。”

党卫军刚平静下来，其领导人罗姆上尉据说因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希特勒以前已经消除了这种控告。“党卫军是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建立的。它不是道德机关，而是勇猛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这些纯属个人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管。

但是，这件丑闻却在党内影响巨大。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尼斯起义中有所牵连的军官，其职位均被罗姆的同性恋伙伴们接替了。对这些指责，罗姆毫不在乎。“我知道，过去我对冲锋队员们态度很不好，不过，亲爱的德尔默先生，从今以后，请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将会很听话。我的任务是让失业工人不受共产党的影响。我要将他们变成遵规守纪的公民，保护德国，反对国内外社会主义。”这番话是罗姆在4月底会见伦敦的《每日快报》的记者德尔默时说的。德尔默反驳说：“德国快觉悟吧！”“消灭犹太人！”之类的高声怪叫，似乎不像所说的那样。

“啊，你可不能只理解它的外在含义。”接着，他说了一些吸引记者的话。“我正在清除党内军中的所有狂妄之徒。对这样的军队，还是应该经常清理‘垃圾’的。”他因为这才来到柏林。他解释说，首都曾发生过叛乱，煽动者是斯登尼斯上尉。这个人简直疯了，他竟然敢公然反抗希特勒。罗姆向德尔默保证说，叛乱已完全平息了，秩序都恢复了。

罗姆暗示他一周后将去“褐色大厦”采访元首。希特勒没有否认他的两个条件，即取消战争赔款和“在东方自由行动”。

希特勒传

他并不是想收复失地，只要求允许几百万剩余的德国人迁徙到苏联。德尔默问：“你怎样进入俄国而又不侵犯波兰的领土？”希特勒简短地回答说：“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

就在此时，奥古斯特·威廉王子匆匆忙忙地进来，激动地宣布，在1931年的头4个月中，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格斗中已经有2400名同胞受伤或丧生。“我的元首，”他喊道，“这是内战呀！”“不错，”希特勒随口答道，“这当然是内战。”德尔默已完全知道希特勒的本质原来是如此的残暴，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该文于5月3日见报，并预言“德国正迈进欧洲法西斯国家阵营。”

6

1931年夏季，希特勒忙于针对斯登尼斯叛乱留下的种种缺点，重新整顿党卫军。而此时，一件私事也令他很烦恼。他得悉，他的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订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的那座寓所里，很不自由。然而令人可笑的是，这个媒人竟然是元首。“你结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饭，”希特勒叮嘱他说。“我听了他的话，”莫里斯曾对一个会见人说，“决定与吉莉订婚，因为，我的确很爱她。她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但一直没有很多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莫里斯曾在戈培尔面前对这“无奈的爱情”表示反感。最后，他还是坦白了。希特勒大发雷霆，斥责莫里斯对他不忠，于是把他“撵”走了。

了解元首的某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很好的亲人而已。“他的爱纯属是父爱”，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仍然这样认为。

希特勒传

“他只关心她的幸福。吉莉对感情很不专一，她谁都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内。他只不过使她收敛一下。”在某种意义上，吉莉成了俘虏。希特勒除了自由外可以给她任何东西。即使去上音乐课，他也要派他信得过的人去陪她。她曾对一个亲戚抱怨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希特勒走了，那她也得跟他走。尤其是她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反对她与希特勒公开同行后，她为此深感耻辱。另外，她也不能认识其他的年轻人。

一天晚上，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在雷西登茨剧场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尔德餐厅一起用餐。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吉莉“心神不定，似乎对此很不耐烦。他不能不觉得她很痛恨她与希特勒的这种关系。”汉夫斯坦格尔太太也感到，吉莉“压力很大，她好像很失落。”但是，文特太太却坚信是吉莉主动。“她自然想成为元首夫人。他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人……而吉莉用情很不专，她不是一个好姑娘。”

当然，吉莉是很为舅舅的名气自豪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馆饮茶时，总有一群追随者包围他们的桌子，其中有很多是女人。她们对他很亲热。同样明显的是，元首喜爱她已远远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喜爱的范围。“他爱她，”莫里斯肯定地说，“但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爱，一种隐藏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他不敢承认自己迷恋女人。”

也有人说，两人关系很不正常。奥托·斯特拉塞尔还将听来的传闻写成文章，传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们的关系已经完全超出正常的两性关系。这当然让很恨他的敌人相信。他爱他的外甥女，虽然爱得很深，但是，却不可能发生两性关系。希特勒这个人很保守，不敢公开追求任何一个女性，而他自己也小心翼翼，将情妇放在寓所，怕这断送了他的前途。

希特勒传

到9月，吉莉又和一个奥地利的画家勾搭上了。他们一见钟情，据克里斯达·施洛德说，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哭诉了她的感情生活。她没有否认与画家的辛酸爱情，她突然改口说：“哎，就到此为止吧，我们都无可奈何。还是谈点别的吧！”希特勒闻讯后，立刻禁止她与那位画家来往，这很明显，他姐姐安吉拉进行了暗示。

9月中旬，吉莉打电话给她的声乐老师说，她准备去维也纳所以想请假。打完电话后她便到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亲。她刚到那里希特勒便打来电话，请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觉得自己不能拒绝，但，当她得悉他加入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议得离开慕尼黑时，她“责怪他让她白跑一趟”。希特勒禁止她一个人去维也纳，这样，她便从生气变成大怒。9月17日，两人在进午餐时，仍在争吵不休。文特太太在厨房里都能听见他们争论的声音。后来，吉莉满脸通红地的冲出了餐室。

吉莉呆在房里，一直没出来。后来，她听见舅舅走下楼，便跟着他走到过道上。霍夫曼正在楼下等候。吉莉左手拿着东西，但莱舍特太太没有看清楚。“再见，阿道夫舅舅！”她朝楼下喊道，“再见，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门口停住了，回头望了望，又重新上楼。他爱抚地摸着吉莉的脸，还在她耳边窃窃私语，但她没有任何反应。后来，她对管家说：“说真的，我与舅舅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当新司机尤利乌斯·施列克驾着“麦塞蒂斯”在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时，希特勒一声不吭。他后来突然转身对霍夫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难受。”霍夫曼为了让他高兴便

告诉他，可能是爱得太深了。希特勒没有说什么，他们继续朝纽伦堡驶去。

在寓所内，莱舍特太太在厨房里听见东西摔破的声音，便对她女儿说：“吉莉肯定是把香水瓶打破了。”这可能是因为吉莉才从希特勒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的原故。这封信原来是爱娃·勃劳恩写的。几个月前，希特勒与她恢复了交往，因为很秘密，吉莉竟全然不知。当晚，安妮·文特亲眼见吉莉将信撕成四片。多管闲事的管家将信拼在一起，信的内容大致是：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

再次感谢您请我看戏，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着实感激您对我的感情，我急待再次相见。

你的爱娃

吉莉将自己关在屋里，不理任何人。她虽发了脾气但文特太太感到并没什么。当晚，她与平时一样离开公寓回家。莱舍特太太与她的女儿睡在公寓里。夜里，她们听见沉闷的响声，但她们没有在意。她们早就对此习惯了。

但是，第二天，莱舍特太太发现吉莉的房门仍然没开，便预感到事情不妙。她连忙给梅克斯·阿曼和弗朗兹·施瓦茨打电话。两人打开了门。吉莉靠近睡椅，躺在地板上，旁边放着一枝 6.34 毫米口径的手枪，她的生命已停止了跳动。

那天上午，在纽伦堡，希特勒与霍夫曼离开德意志旅馆一起去汉堡。“麦塞蒂斯”汽车出城后，希特勒发现他们被人跟踪了。他怕遇到刺客，便让施列克加速。后来，他才知道，后面的是辆出租汽车，坐在司机身旁的是德意志旅馆的一位服务

希特勒传

员，那人打着手势示意停车。服务员告诉他，赫斯先生从慕尼黑打来电话说有急事找他。希特勒便立刻返回旅馆，冲进了电话室。电话室开着门，霍夫曼听见希特勒在说：“我是希特勒。出了什么事？”一阵沉默后，他喊道：“啊，上帝！太恐怖了！”接着，他几乎吼道：“赫斯，回答我——真的还是假的——她还活着吗？”后来，线路不是被切断便是赫斯挂了电话。

“我们也都传染上了希特勒的狂乱，”霍夫曼回忆道，“司机将油门踩到底，小车呼啸着往慕尼黑驶去。我从后座镜中看到了他。他紧闭双唇，目光呆滞地望着挡风玻璃，一动不动。”回到寓所后，吉莉的尸体已被安排妥当。因为是周末，各报均未宣传，直到星期一此事才见报。有人推测说，是希特勒抛弃了她；也有人说，司法部长古尔纳掩盖了事实的真相。社会主义者的日报《慕尼黑邮报》发表长文，将此事分析得一清二楚。它甚至宣称，她曾被人毒打过，身上还有受虐待的痕迹，希特勒是不能杀害吉莉的，因为他身在纽伦堡，而他的手下也不会为避嫌而杀她。倘若是如此，那末，杀害她的地方绝不是这里。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说，吉莉之死纯属偶然，或许她受了一些惊吓，不小心杀了自己。也有一种理论说，她是玩手枪走火。然而，事实证明了，她是自杀的——也许是出于绝望，或出于嫉妒，或很多别的原因。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母亲对汉夫施坦格尔说过，“家里人都明白为什么吉莉会自杀，因为一位犹太画家使她怀了孕。”1931年，在一次会见中，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认为这纯属诽谤。

希特勒很难堪，对弗兰克说他无法再看报了，因为已经忍受不了那些伤害。他想退出政坛，从此不再抛头露面。在绝望中，他与霍夫曼逃到出版人阿道夫·米勒在特格恩西的乡间别

希特勒传

墅里。到了那里，司机施列克小声对霍夫曼说，他把元首的枪藏起来了，因为怕他想不开。希特勒一进屋，便倒背着双手，在室内来回走动。霍夫曼让他吃东西，但希特勒拒绝了。他不停地踱步，很长时间。天快亮时，霍夫曼轻轻地敲他的房门。没有声音，他径自进房，发现希特勒仍在背着手来回地走动，目不斜视。

霍夫曼给家里挂了个电话，询问元首最喜欢的食物——意大利面条的做法，但希特勒仍拒绝吃饭。他不吃不喝地来回折腾了两天。他接过一次电话。弗兰克在电话里说，他已想办法让法律解决这些问题。他无力地说：“谢谢你。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我不会让你失望。”

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吉莉已在维也纳安葬的消息，罗姆、米勒、希姆莱，以及自封为国社党维也纳长官的青年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弗尔德出席了葬礼。由于他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不能回到祖国，但他决定冒被捕的危险去奥地利。当晚，他便和施列克一起坐上了“麦塞蒂斯”，霍夫曼独自坐在后座上。他们悄悄地朝奥地利边境驶去，卫兵坐在一辆大汽车上、紧紧地跟在后面。到地方时，天已快亮了。

弗劳恩弗尔德早已为希特勒备好一辆小车，在维也纳城外——因为怕“麦塞蒂斯”暴露身份。他们悄无声息地来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搁了鲜花。墓碑上写着：

这里睡着我们的爱女吉莉

她是我们的阳光

生于 1908 年 6 月 4 日

卒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

希特勒传

拉包尔家族

在去弗劳恩弗尔德寓所途中，希特勒突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问他们是否要经过剧院。弗劳恩弗尔德说，得多走一点路。“啊，请绕吧，”希特勒说，“不用在乎是否进去，打旁边过也好。”在弗劳恩弗尔德家中，希特勒认认真真地吃了一顿早饭。然后，他便平静地说起来，但是他并没谈这件事，而只是谈德国的政治前途和他自己。他声音沉着，对未来的期望很大。他对弗劳恩弗尔德说，在波兰人占领但泽以前，最迟1993年他就会总揽德国大权。一回到自己车里，希特勒又表现出极度的伤心。后来，好像在喃喃自语似的，他说：“就这样，现在开始战斗吧——一定要赢得这次斗争，只能成功！”

大概在两天后，他去参加北方首席会议。一行人在一家小旅店里住了一晚。次日早餐时，希特勒拒绝吃火腿。“我感觉很恶心。”他对戈林说。从此后，他再也不吃肉。

他发表了演讲。在汉堡，听众很多，情绪很高。他的演讲与以前一样既有力又精彩。和在帕斯瓦尔克，还有兰茨贝格时一样，希特勒再次超越了自己，闯过了愁苦关。也许，这是一种新生吧，因为，每次他都能从深渊中挣脱出来，争取新的目标，他要进行第三次的复活。